

申報

滬杭甬路全線打通
慈谿甯波均告解放
本市蘇州河北亦已肅清

宋軍軍著

申報的興衰

1976年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申報的興衰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ISBN 7-80618-190-3



9 787806 181904



ISBN 7-80618-190-3/K · 207

定價：5.40元
(冊) 40元

周鼎安
1996.5.

本館告白

天下可傳之事甚多矣而泯沒不彰者比比皆是其故何歟蓋無好事者為之記載述

申報的兴衰

宋軍 著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申報

英 四 月 三 十 日

啟者新聞紙之設原欲以開新奇廣閱親與流佈四方者也使不事搜羅博採以撰我見聞復何有裨焉豈以傳其新異是不可徒拘拘于一鄉一邑也茲本館特將條例開列于左如 貴客賜賜或蒙教者祈惠顧一切為幸

一本新報設于上海各店零售每張取錢八文各遠處皆以郵取每張取錢十文本館選買每張取錢六文

一如有閱人願以短什長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區竹枝詞及長歌紀事之類概不取值

一如有名官紳商賈有係乎國計民生地利水源之類者上聞 皇朝經濟之旨下知小民稼穡之苦因登所報概不取閱

本館條例

申報

壬 中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本館告白

天下可傳之事甚多矣而泯沒不彰者比比皆是其故何歟蓋無好事者為之記載述觀奇聞逸事固然無賴可嘆惜也溯自古今以來史記百家載籍極博山經地志記述詳然所載皆前代之遺聞已往之故事且寫情繁文辭高古非尋常紳先不備有也非文人學士不能觀也至於初宮小說代有傳焉若魏華志博勒干雙記現則實則有本報之奮興初為文章之選凡往諸類均可觀觀其事實或荒誕無稽其文皆典而有則甚僅能助儲者之清談未盡益裨俗所共賞求其紀述當今時事文則費而不促事則簡而能詳上而學士大夫下及農工商賈皆能通曉者則真如新聞紙之善矣新聞紙之創始自西人傳於中土自見香港唐字新聞創始於今仿其意設申報於上海凡 國家之政治風俗之變遷中外交涉之要務商賈貿易之利弊與夫一切可驚可喜之事足以新入聞者不事虛務求其真實無妄使觀者明白易曉不為浮誇之辭不為荒唐之語思熟留心時務者於此可以得其概而出謀生理者於此亦不至受其欺此新聞之作固大有益於天下也且夫天下至廣也其事才至繁也而其人又散處不絕相見也夫誰能周知而周知者自新聞紙出而凡可傳之事無不揭揭於天下矣自新聞紙出而世之覽者亦皆不出戶庭而知天下矣豈不著哉惟是事雖微與例若初急恐閱於方隅限於知識遺漏尚希 四方君子進而教之匡其不逮實有厚望焉申報主人謹白

本館條例

目 录

引言	(1)
一、报纸的创办	(5)
门户开放的产物	(5)
英国商人的创举	(7)
《申江新报》的由来	(14)
秀才主持笔政	(19)
二、早期社会新闻与新闻纠葛	(25)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25)
与《汇报》的争论	(30)
涉及郭嵩焘的一场纠纷	(35)
三、新闻业务的进步与发展	(38)
近代传播工具的运用	(38)
中法战争报道的政治色彩	(42)
美查回国	(48)
甲午战争中坚持主战	(51)
四、维新运动冲击之下	(55)
主笔们掷笔三叹	(55)
黄协埙批康批梁	(58)

1905年的改革	(64)
五、辛亥革命风暴到来前后	(74)
报纸产权转归国人	(74)
举袁是“以暴易暴”，会使革命夭折	(77)
六、报业发展的新时期	(84)
史量才接办《申报》	(84)
(85) 致力于报业现代化	(90)
(87) “过激主义”在新闻中的渗入	(95)
(89) 《最近之五十年》	(103)
(91) 来自前《天津申报》	
七、在风波频繁的年月	(111)
康通一临城遇险	(111)
(93) 《诚言》引起的风波	(115)
(95) 左右为难的“局外人”	(119)
(98) 十余年的艰难处境	(124)
(99) 来自前《天津申报》	
八、历史性的转折	(131)
(96) 新的起点	(131)
(98) 激进的抗日救国舆论	(137)
(101) 发表《宋庆龄为邓演达被害宣言》	(143)
(103) 刊登《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	(148)
(105) 三论“剿匪”与“造匪”	(152)
九、新闻文化与副刊革新	(158)
(108) 《申报月刊》与申报流通图书馆	(158)
(108) 黎烈文改革《自由谈》	(162)

鲁迅、茅盾投枪式杂文	(166)
腰斩张资平和“挥泪斩马谡”	(171)
史量才遭特务暗杀	(176)
十、抗日战争中的进步倾向	(182)
从犹疑持重中走出来	(182)
来自延安和敌后的报道	(189)
从汉口版到香港版	(197)
借“洋旗”再回孤岛	(201)
报纸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	(210)
太平洋战争后遭日伪劫持	(213)
十一、在终刊的那些日子里	(219)
附录：《申报》七十八年大事记	(225)

(561) 文坛巨匠林语堂 (61)

(131) “新报”创刊“报平说报” (131)

(171) 中国新闻史上 (171)

(281) 中国新闻史上 (281)

(381) 中国新闻史上 (381)

(481) 中国新闻史上 (481)

(581) 中国新闻史上 (581)

(681) 中国新闻史上 (681)

(781) 中国新闻史上 (781)

(881) 中国新闻史上 (881)

(981) 中国新闻史上 (981)

(1081) 中国新闻史上 (1081)

(1181) 中国新闻史上 (1181)

(1281) 中国新闻史上 (1281)

(1381) 中国新闻史上 (1381)

(1481) 中国新闻史上 (1481)

(1581) 中国新闻史上 (1581)

(1681) 中国新闻史上 (1681)

(1781) 中国新闻史上 (1781)

(1881) 中国新闻史上 (1881)

(1981) 中国新闻史上 (1981)

引 言

《申报》创刊于1872年4月30日，那还是清朝的同治年间。经历了清末、民国至1949年上海解放，前后发行时间长达78年，成为新中国成立前近现代报纸中历史最为悠久的报纸。在漫长的岁月中，它记载了我国近一个多世纪的朝代更迭和风云变幻，反映了自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殖民主义侵略下我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过程，也从中看到了门户开放，西学东渐，上海以至中国商品经济产生发展、走向近代化的缩影。

创办这张报纸的是英国人安纳斯脱·美查，他一直主持经营到清朝末年。在人们的想象中，既然是英国人办的，那末必然是以老牌殖民者的意志为意志、殖民色彩和西方文化十分浓厚的报纸了。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美查虽然身居上海租界办《申报》，但他对于中国的皇帝也不是无所顾忌。他曾经告诫主笔们：“慎勿评品时事，臧否人物，以纓当世之怒，以取禁止之耻。”他知道弄得不好报纸是会被封门的。而且，要办一张中国人看，并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报纸，他亦无能为力。因此他出钱经营，而把笔政完全交给中国人。这就形成了中国近代报纸发源时期洋人出钱，秀才办报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些秀才，也就是清末时期榜上有名的最后几批秀才中的一些秀才，直到1909年报纸产权转归国人以及民国之后，也还是清末最后一批秀才中的史量才、陈景韩等等。正是这些秀才们，引进西方新闻纸形式有益的东西使之中国化，奠定了近代报纸的雏形。在以后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中，《申报》进行多次革新，从形式到内容，包括新闻评论、专栏文章、

副刊专刊、读者服务、摄影漫画、广告发行以及围绕报业为中心创办年鉴、月刊、丛书等新闻文化事业等方面，把近代报纸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称《申报》为申报纸，把它作为中国新闻纸的代名词。它的影响不仅遍及上海和东南沿海地区，而且扩展到海内外。这些主笔秀才们在中国皇帝、地方军阀、国民党政府和上海租界当局的统治和压制之下，也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们知错能改，而且有时还把错误登在报上，广而告之。他们历经沧桑，对国家，民族经受的磨难和不幸遭遇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为此他们有时也掷笔三叹，但基本上是随着社会思潮的变化和发展前进，表现了民主、进步和爱国主义精神。如果不是这样，一代报人史量才凭着报纸的声誉和社会影响，尽管可以发财致富、高官厚禄，不至于惨死在蒋介石屠刀之下了。

上海刚解放时，毛泽东主席来到上海，问起《申报》哪里去了。人们告诉他已停办接收。他为此感到可惜，说这样好的报纸你们怎么把它弄掉了！毛泽东为什么要如此称赞《申报》，自有道理，我们无法深究。但《申报》当时作为一张民间报纸，确实能够比较真实客观地反映现实，记载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发展过程，为此留下许多历史的见证，成为后人研究历史的丰富的资料宝库。尤其是1932年的那次改革之后，在急剧变化的时局中，它舍弃了原先的那种持重温和的观念，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激烈地反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积极地主张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进步。抗日战争发生前夕，毛泽东曾在延安窑洞里接见《申报》记者，彻夜长谈，为报纸后来进一步传播民主、进步、抗日和爱国思想起了促进作用。这一历史事实，对我们理解毛泽东为什么称赞《申报》是有帮助的。

《申报》，作为中国近代化开始最早的报纸，它是商品市场经济的产物，之后又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办报纸要有必

要的经济实力，而它既没有政府津贴，也不接受任何集团的支持，完全靠报纸适合读者需要，适销对路，扩大发行。尤其是靠刊登广告，传播商品经济信息，广泛为社会服务或其他多种经营的方式，争取有更多的经济收入。在30年代连胡适先生的这样的著名学者也被招揽来为报纸写广告文章。所以，它赚了不少钱，盖起了旧中国唯一的现代化的报业大楼，使报纸业务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可是，有人把它斥之为只想赚钱做生意的报纸，其实这是一种偏见。事实说明了它不仅政治上走向进步，而经济上它也是遵循着市场经济、报业竞争的正常途径。当8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认识逐渐开阔起来，感到报纸是一种具有阶级性、政治性的精神产品，也具有一定的商品属性，为此鼓励报纸介入市场。这除了从各个方面传播市场经济信息，丰富报纸的内容，进行正确的舆论导向之外，就自身的发展也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才能生存和发展。我们稍稍观察一下十几年来报纸逐步介入市场的情况，且不说它在形式到内容方面前所未有的改进，即就其报业自身的发展，由于经济收入增加，几年之内现代化的报业大楼一幢接着一幢拔地而起，大大改善了报业环境和工作手段。这似乎是过去《申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方式和报业发展的再现。而从发展的轨迹来看，这似乎是走过了S型的漫长的过程，而最终也必然要走到适应市场经济的这一轨道上来。

现在，我们有了完整的78年《申报》缩印本，这是上海书店为新闻文化的积累做了一件大好事。由于卷篇的浩繁，谁也不可能翻阅全篇。但是人们有兴趣来看看它120年前创刊之初这些年代关于上海的记载：当时跑马圈地，高楼叠起，黄浦江上风帆与大洋轮并驾齐驱，银行街、外滩的形成，商品市场，国内外贸易交通运输，城市建设迅速发展，国内外商人抢滩上海、投资贸易，外地民工成群结队地来沪打工淘金等等。这些景象与改革开放以来

上海出现的某种景象有些相似。当然，那时的门户开放是在殖民主义炮舰政策下被迫的，而今天的改革开放则是完全是我们自己作主自觉的，但在商品市场经济滋生和发展所产生的视觉形象上则给人一种惊人相似之处。把今天与昨天作绝对比拟，并不恰当。但人们终是从以往的道路走过来的，长达78年的《申报》，也许能为人们提供借鉴，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

这本纪实性的叙述《申报》兴衰的史书，只想在近现代报纸的产生和发展上提供一点有参考价值的东西，其中主要的又是对那些秀才主笔们在社会思潮演变中，他们的思想矛盾和冲突，最后又是如何走上民主、进步的过程。由于水平有限，研究又不充分，错误和不足在所难免，这就有待于大家的启发、指正。

一、报纸的创办

门户开放的产物

在上海，也可以说在中国，近代报纸几乎都是外国人办起来的。这是因为近代新闻事业，主要为报纸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市场信息，人们在经济贸易中交往活动频繁，需要借助报纸作为传送信息的媒介。过去，中国长期处在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缺乏近代报纸发展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基础。鸦片战争后，随着殖民主义的入侵，中国门户开放，中国南方和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滋生发展。《申报》的创办正是和商品经济在上海与东南沿海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1843年上海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等五城市同时开辟为商埠，随着东西方海上交通运输逐步发展，殖民主义者通过进出口贸易，首先是通过香港这块跳板经过广州侵入内陆。当时广州的海内外经济贸易曾经盛极一时。可是，这个地处中国南端的口岸，不能满足东西方越来越大的进出口贸易业务。而且内地货物运抵这个城市，并将进口物资运往内陆路程遥远，需要承担高昂的运费，而且受到港口吞吐量条件的限制。而上海这个濒临太平洋的城市，南接东南沿海各城市，北连青岛、天津和大连，又处在长江出海口，万吨以上巨轮可以自由出入，海内外交通便利。中国的丝绸、茶叶是当时欧美市场上的热销货，靠近上海的江浙一带又是丝绸、茶叶主要产地。这项大宗商品几乎都是从上海出口的。此后，包括丝绸、茶叶大宗商品在内，凡长江流域和沿海

地区城乡从上海出口的商品，差不多占了中国全部出口货物的一半以上。而国外的商品货物包括非法的鸦片也从这里输入再转往内地。上海英国怡和洋行的老板就是一个大鸦片贩子，他的财源不少来自贩卖鸦片。19世纪60年代开始，上海的进出口贸易迅速增长，仅以与英国的进出口贸易为例：1864年为10,500美银，至1872年增长至15,800美银。^① 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外国的金融势力也乘机入侵。创设于1864年原名叫上海银行有限公司的汇丰银行，1874年在外滩建造了一座结构宏宽，雕饰华丽的汇丰银行大厦，使外滩靠近九江路、天津路一带的银行街逐渐形成。当时，上海的外国人已有2600多人，除少数从事政务、宗教活动外大多数是商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上海取代广州和香港成为进出口贸易繁忙的口岸城市，并成为中国的经济贸易中心。

太平天国进军江南时，上海周围地区以及江浙一带的富商大贾纷纷逃来租界避难。当战事平息，大部地区出现了相对的稳定局面，这些富商大贾见到上海繁荣安逸，也就定居下来。他们做生意、办钱庄、介入证券交易，有的进入洋行，成为新一代买办。各地来谋生的人也大量涌入，为上海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一时，上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申报》描述当时的景象时写道：“上海益见兴旺，房租随贵，购地造屋莫不利市三倍。更有轮船风驰，西商云集，奇巧便利之事日出无穷，如造码头，制地火……”^②。经济的发展，交通的便利，为近代报纸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外国殖民者和商人们的活动，需要了解世界大事和周围环境变化，市场交通信息，他们也把盛行于西方的新闻纸带进中国。

^① 引自上海海关纪事簿，《申报》1873年5月9日。

^② 《上海今昔》，《申报》1881年12月10日。地火，是指煤气灯。1865年12月18日，南京路上点燃第一盏煤气灯，当时的上海还没有电灯。

近代报纸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还与经济贸易重心的由南向北转移有关系。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在马六甲华人较多的地区办起中文报刊，至19世纪中叶发展至香港、澳门和广州。到了六七十年代，随着经济贸易重心的北移，作为近代化传播工具的报纸，它的发展势头也逐渐北移。自60年代至维新运动这段时间，香港的外文报刊为8种，上海发展到31种，为全国外文报纸的55%以上。香港的中文报刊是3种，上海发展到31种，为全国中文报刊的57%以上。外文报刊中不仅有英文，而且有葡萄牙文、法文、德文和日文。中文报刊中不仅有宣扬基督教义的宗教色彩的报纸，而且有被人称之为商业性的商办报纸。其中1861年12月的《上海新报》则是上海最早的中文日报。但它基本上是英文《字林西报》前身《北华捷报》的翻版。由于它带有宗教色彩和西方文化习惯，不能适应商品市场和广大读者的需要。在此种情势之下，《申报》也就应运而生。

英国商人的创举

《申报》的创办者是英国商人安纳斯脱·美查(Ernest Major)，清朝同治初年(1860年)来到上海。起初，他和他的哥哥菲而特利克·美查(Frederic Major)一起从事进出口贸易，将中国江南一带的丝绸、茶叶贩运到欧洲，又从欧洲把洋布等工业日用品贩运到中国。赚的钱多起来了，他在苏州河南岸的新闸区开设了燧昌自来火局。这是上海开办的第一家火柴厂。到了80年代，这个自来火局雇佣男女工人包括临时工有四百多人，在当时看来已经不是一个小厂。他同时又开设了江苏药水厂。70年代初，他的经营一度不景气，想开辟新的财源以振兴自己的事业。当时上海唯一的中文日报《上海新报》销路虽然不大，但刊登广告可以赚钱获利。他的买办陈莘庚建议他不妨也来办一张中文报纸。这时美查

来中国已有十多年，对上海的情况已相当熟悉，也粗识几个中国字。他觉得上海这个地方外文报刊已有好多家，而中文日报只此一家。租界有外国人，而华人毕竟是绝大多数。而且近几年来人口不断增多，市场日见兴旺，海内外交通运输发达，再办一张中文日报，可能会有销路。于是，美查采纳买办陈莘庚的建议，与他的英国朋友伍华特(C·Woodward)、普来亚(W·B·Pryce)和约翰·瓦基洛(John Wachillop)三个人一起商量。朋友们都认为这个主意很好，可以合伙集资兴办。商定各人出银子400两，共1600两作为办报资金。于1871年5月19日签订了合资创办的协议，并推举美查为报纸的主持人。为防止这笔资金移作他用，协议明确规定：此项股款为投资印刷机器、铅字及其他附属设备兴办华文报纸之用。并规定全部股金一分为三，美查负实际经营的责任，占其中两份，其他三个朋友各占一份，今后无论盈利或亏损均按此比例分担。也就是说，报纸经营盈利美查可以多得，如果亏损则要美查来承担，实际上，美查也就是报纸的全权负责人。他们租赁了公共租界汉口路以东的一所房子作为馆址，开始了办报的筹备工作。

办一张西洋新闻纸式的中文日报，内容上不但不能同过去传教士办那样宣传天主圣道，即在形式上文字上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模式，而是应当按照中国读者的需要来办。这些美查是考虑到的，他曾经说：“这报是供给华人看的，文字应从华人方面设想”。为此，他聘请华人办报，清朝秀才蒋芷湘出任总主笔，钱昕伯、何桂笙襄理编辑业务。财务会计(相当于现在的经理)最初由他后来的买办赵逸如兼任，不久赵逸如离去，改由青浦人席子眉继任。为了同馆内外华人打交道，聘用早年来中国熟习中英语言的葡萄牙人毕德礼当翻译。为了把西洋新闻纸办得更能适应华人，还派钱昕伯去香港考察。那里的中文报纸《中外新报》发行已有十多年。

钱昕伯去香港，主要是找到王韬。王韬是江苏吴县角直镇人，原名王瀚，字利宾，清道光二十九年他二十一岁时来到上海，应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的邀请至英国教界办的墨海书馆工作。钱昕伯与墨海书馆有联系，因之与王韬相识。1862年4月太平军进军江南时，上海洋枪队和英法联军同太平军在上海市郊七宝附近打了一仗。战斗结束打扫战场时，清军检得具名“王畹”的人致太平军刘肇均的书信一件，内容为王畹向太平军攻取上海的建议。意思是建议太平军停攻或缓攻上海，把兵力集中到长江流域，首先在那里站稳脚跟。清廷认为这个“王畹”就是王韬的化名，决定对王韬进行通缉，以追究他献计于太平军的罪责。王韬得知消息后立即逃进英国领事馆避难。英方为此向清廷上海官方解释“王畹”是否王韬还属疑问，可否不必通缉。但清廷认定“王畹”是王韬的化名无疑。英方无奈只得让王韬在领事麦华陀的庇护下，乘坐怡和洋行的轮船出走香港，从此王瀚改名为王韬。他去香港前将留在上海的女儿王婉托付寄养在钱昕伯家里，后来嫁给钱昕伯为妻，彼此成了亲戚关系。

王韬在香港期间，游历考察了法、俄等国，扩大了视野，进一步加深了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改良主义的思想，积极主张中国必须变法自强。他还是中国近代报纸创始人之一。当钱昕伯去到香港时，王韬集资买下了华英书院，并正在筹办《循环日报》，后来他就是这张以政论著称，以鼓吹中国必须变法自强的报纸的主编。在香港，钱昕伯帮助王韬筹办《循环日报》，同时商量如何把《申报》办起来。王韬为《申报》的创刊，从内容到形式提出了不少建议。《上海新报》基本上没有评论，王韬主张《申报》不但要有新闻，而且还要有评论，在评证中议论一些什么问题，他也出了许多主意。《申报》的创始，借鉴于香港，得助于王韬。又因为《申报》是近代中国最早创行的新闻纸，所以它开始就向读者宣告：“新闻纸之制创自西人，传入中土，向见于香港唐宇新闻，体例甚善，今

仿其意，设《申报》于上洋”^①。

从美查当时创办《申报》的动机来看，他办报纸是为了谋利。他把报纸作为一种商品，把报馆作为自己其他企业一样赚钱获利的手段。但当他与中国主笔们相处接触之后，感到报纸毕竟有同其他物质产品不同的地方。在当时文化事业还不发达的社会里，报纸还不是大多数人必读的。作为一张商办的民间报纸，没有任何方面的资助和拨款，完全靠读者的自愿订阅来扩大发行。读者多，发行量大，报纸成本降低，发行费收入增加；报纸发行量越大，越有人来登广告，获利也就越多。要不断扩大发行量，就不能不考虑读者的需要，读者从报纸中能否得益。而这一切往往是报纸对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态采取何种态度，能否适应经济发展和时势的变化决定的。因之，报馆的谋利不能不与华人读者的需要与时代发展的潮流大体相一致。否则报纸无人要看，不但无利可图，连报纸的生存都会成问题。作为一个英国商人，他不会放弃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在谋利的前提下，也不能不考虑华人的利益。美查曾经说：“新报之开馆大抵以营业为生计……若本馆之开馆，余愿直不讳焉，原因谋利所开者耳。本馆不敢自夸惟照义所开，亦愿自伸其不全忘义之怀也。”^②美查在这里承认他办报是为了谋利，但又申言他不会利而忘义。这个“义”表现在哪些方面，他没有作更多的解释，但他明确地表示：“所卖之报皆属卖与华人，故依持者惟华人，对国家使除其弊，望其振兴，是本馆所以为忠之正道。”^③从这一点出发，他将报纸的笔政交付给了中国的主笔。报纸为维护华人的利益，为中国的兴利除弊，发表了不少新闻和评论。

上海的租界，是外国殖民者强加给中国的一个特殊地界。美

① 《创刊告白》，1872年4月30日《申报》。“上洋”是当时上海的通称。

② 《本报作报本意》，1875年10月11日《申报》。

③ 同上。

查来中国之后的一二十年间租界不断扩展。这里居住的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可是一切属于外人管理，中国人处于被统治的地位。外国的官员、传教士以及某些商人以自己的特殊身份自居，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而中国人却要受到租界当局的管束。早期连外滩公园、法国公园（今为复兴公园）这样的公共游憩之地也不准中国人入内，为中国人所不满。至于有的外国人蛮不讲理，横行不法，侮辱中国人的事情常常发生。1876年7月间，北京路上一个行人被西人的马车撞倒，西人竟不闻不问扬长而去。《申报》在发表这个消息后议论说：马车碰人或出无心，然既已撞翻，亦宜下车详问疾苦，方为合理。若竟然置之不顾，岂华人之性命可草菅视之哉！随着吴淞江（即今苏州河）两岸来往人员剧增，英国威尔斯桥梁公司于1856年在河上接近黄浦江、吴淞江出口交汇处修筑了一座木桥，规定西人过桥不收钱，华人过桥要收两文钱。这早就引起了华人的不满。《申报》发表评论认为这事偏而不公，指出：此桥建成至1872年已有十多年，“每日过此桥者约五六万人（华人），一日过桥之费为六十余元，以此计之则每年应有二万余金，获利甚巨，何以为此贪得无厌？”^①文章还声称，华人公所已派人向工部局交涉，如无结果，将添置免费之渡船五艘，作为抵制。租界当局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不久就停收了华人的过桥费。因为此桥建在苏州河近外滩的黄浦江边，人称外摆渡桥。自华人过桥不收费之后，人们改称为“白渡桥”。1906年改木桥为铁桥，仍称“白渡桥”或“外白渡桥”，一直沿用至今。

租界内一切政务都操纵在外国人的手里，中国人无权过问，对于这种状况，《申报》认为不公平，曾发表评论指出：“上海租界仍为中国之地，乃未闻上海租界内之西人举引诸事而取议于华人。因此，工部局的值董除两人外，应添公正殷实的华绅数人参与议

① 《拟易大桥为公桥议》，1872年4月30日《申报》。

事”^①。而且指出：捐助给工部局的钱也都是华人出的，华人应当参与其事。这样的要求当时虽然未被采纳，直到55年之后的1928年（民国十七年）才实现。但反映了当时的《申报》是鼓励中国居民争取参与租界政务的权利。

《申报》广告的费用采取华廉洋贵的方针。每50字一天收费250文，每加15个字加钱50文，这限于中国人登的广告。上海的洋行，资本雄厚，都是大企业来赚中国人的钱。所以同样50个字，一天收费大洋一元，每加一个字，加洋一分，比起中国人登的广告高出四倍。这样报馆可以多赚钱，但多赚洋人的，少赚华人的。在这里华洋之间，美查也是有分别的。

以上这些，只是主笔们所发议论中的一小部分，对于这些议论，美查未加任何干预。看来他主持社会公道，注意维护华人的利益，也许这就是他自己在“告白”中申言的“不能利而忘义”。

维新运动之前上海的报纸，不论是外文还是中文，几乎都是外国人办的。早于《申报》十年的《上海新报》由英商字林洋行出资创办。迟于《申报》二十年的《新闻报》也由英商丹福士创办。后来丹福士经营不善卖给了美国人福开森，也仍然是由外国人经办。这个原因固然由于近代新闻纸是舶来品，是在门户开放、外国资本入侵、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当上海成为经济贸易中心，租界的外国人必然把报纸作为他们政治、经济需要的手段。而中国自己的商品经济本来就不发达，民族资本发展微弱，也不善于为发展自己的事业而运用近代化的新闻媒介。但这还不是唯一的原因，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禁锢封闭，在这样政策之下，中国人要想自己办报刊，尤其办开放性的近代报纸是很困难的。清朝的文字狱残酷，报纸刊登新闻、发表议论，不管怎么谨小慎微，也可能在一个事件或一言一语中触犯

^① 《拟上海租界仿照香港延清华绅会议地方事宜议》，1873年8月27日《申报》。

朝廷或地方官吏，这就会受到责难、干涉、查抄甚至封闭。在这一点上，《申报》主笔们较为了解情况，他们曾就此问题发表过评论：

夫民间创设新闻纸，难免犯君官之语，君隔九重或尚不知，官则未有不知者，一旦大肆威虐，重则封闭，故民间亦不敢冒罪开设也。近因通商开市，香港设华字新报三馆，于上海开设华字新闻一处，主笔系华人，而馆主为西人也。至于汉口新闻馆，内无西人，甫开即关闭矣！现闻粤人拟在上海另开新闻馆一所，首创捐者，上海叶邑侯也。倡议开馆者唐君景星诸人也。倡立馆规者，容君纯甫也。主笔诸君，皆延请粤中名宿也。机器铅字，皆容君所承办也。馆则设立招商局侧，并闻另延西人，代为出名。堂堂粤绅，办此事尚不敢出头，反请西人露面，未负心欲大而胆欲小矣！^①

这篇议论文章，已经把中国办新报借助于洋人的原因和盘托出，说得维妙维肖。《申报》的创办当然不只是借助洋人，而是直接由洋人创办的。美查不是百万富翁，也不是英国的爵士。他来上海之初还是一个做生意的年轻人，他曾与一个酒吧间老板的女儿发生恋情，后来娶之为妻。这在素重阀阅的英国习俗来说，认为开酒吧间的不是上流社会人物，为此他受到同乡同行的讥笑和奚落，甚至被取消了西侨组织的万国总会会员资格。但他对这件事情没有介意，继续埋头于自己的事业。《申报》的声望日高，他逐渐为外人器重，不仅恢复了他的万国总会会员资格，而且还被推举为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在租界所处的地位提高。但是，美查对于中国的皇帝也并不是无所顾忌，他曾经要求主笔们多登新闻，少发议论，“慎勿评品时事，臧否人物，以纓当世之怒，以取禁止之耻”。然而，一当主笔们主持笔政，议论开来，而且愈到后

^① 《论新闻日报馆事》，1875年1月24日《申报》。

来议论愈多，有时还比较尖锐，身不由己，他也就听之任之了。

《申江新报》的由来

《申报》原来名为《申江新报》，《申报》是《申江新报》的缩写或简称，以中国地方特点而定名。申江即黄浦江，战国时期，上海一带是春申君黄歇的封地，因而得名，名之为《申江新报》，也就是一张上海出版的新型报纸的意思。并且标志着与中国朝廷发行的《邸报》、《京报》相区别。

报纸在创刊时多次论说，世界局势是以时事的演化为变迁，不能老是讲过去的事情。要让人们了解时势和周围事物的变化，必须由新报来传播新闻。“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是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①。“中华为天下第一大邦，其间才力智巧之士，稀奇古怪之事，几乎日异而岁不同，而声名之物从古又称极盛，则其记述已详明，议论已精实，当必大有可观者”^②。因之，报纸的首要任务是传播新闻。凡本市和江南主要城市的商业、金融、贸易、交通等等的发展和变化的消息都有刊载。对于上海租界的状况有较多的报道，如租界外国人的数量，几乎几年就有一次。1876年10月18日报道租界内有外国人1673人，其中原英租界1018人，原美租界568人；以国籍分，英国人最多，为878人，美国人180人，其他有葡萄牙、日本、西班牙、丹麦、法国、巴西、马来亚、瑞士、印度、奥地利、荷兰等二十二个国家的外国人。社会新闻占有一定地位，杨月楼、杨乃武案延绵连续报道几年之久，社会新闻中也有谈狐说鬼之作，为一般读者酒后茶余提供笑谈的资料。

^① 《本馆告白》，1872年4月30日《申报》。

^② 1872年5月6日《申报》。

报纸内容的第二部分为论说。当初，这是一种评论与文章不加明显区分的文体，有浓厚的八股气，一般对社会新闻议论较多。后来逐步减少八股味，对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议论增加，而且把言论列为每期必要的内容。

内容的第三部分为诗词、歌曲、散文、译著。诗词、歌曲中有注重文字供名流学士推敲揣摩的，有描绘地方社会风土人情的竹枝词。《谈瀛小录》，刊登译自英国的小说《格列佛游记》和根据欧文短篇小说改编的《一睡七年》。《申报》可说是我国最早刊载文艺内容的报纸，后来由此逐渐发展为报纸的文艺副刊或综合性副刊。

内容的第四部分为抄录清朝廷的谕旨、奏折和宫门抄。初时，这方面内容要占到一个版。供官方人士、绅士了解朝廷意图，人员升降调迁，送往迎来的情况。从这些文件中也可以看到皇上（如西太后）“知道了”“让××部知道”等的批示。这部分内容，也为在报纸上传播统治当局治国的方针政策提供了先例。

最后一部分的内容是广告，包括船期行情、企业洋行告白和商品广告。后来发展到图文并茂，又增加戏院剧目等。这部分内容有时要占到两个到三个版。在第一版显著地位也刊登广告以至题前广告，即在评论或头条新闻之前的地位刊登广告。商品以报纸广告为媒介，以此来渲染商品经济。1874年5月22日刊登元芳洋行拍卖货物的广告，报纸还为此发表论说：元芳洋行在伦敦卖茶叶有年，订有货物规章，其货物无限价。现流行在中国采取同样售货方式，此举将对上海市场产生影响。这是中国报纸上对市场经营采取拍卖形式最早的宣传。

开头几天，报纸隔天出版，分八个版（当时称之为页）每版高宽均约为20厘米。到了第五号（期）改为每天出版，星期日没有轮船开航，无航船信息，报纸休刊。至1874年4月27日起不再休刊。最初用手工制造的毛太纸，以手摇印刷机印刷。发行量增加后，

改用煤气发动。毛太纸不敷应用，改由机制赛连纸印刷。第一年发行量足有1000份左右。1887年起在江浙及全国三四十个城市设分销处，还在日本、英国和法国等国家的首都设分销处，发行量增加到1万份。

报纸开始只有主笔(相当于编辑)，没有记者、通讯员，有的消息靠翻译本市和香港的外文报纸，或摘自朋友的来信。随着读者对消息需求的增加，开始在全国各地主要城市招聘访员：“欲延抄写案件及采访新闻之友”，条件是：“学识兼长，通达世务，实事求是者”。从此新闻来源日渐增多，尤其几次战争消息的采访，使报纸名声大振。1874年，日本借口台湾生番加害琉球人及日本人，兴兵进攻台湾。7月，美查以自己是英国人的有利地位，亲自前往采访。当时，东南沿海各处的人都以不了解战况而惶惑不安。《申报》将获知的消息登在报上，并搜集台湾史实风物的资料加以配合，使读者得以了解真相。这对长期闭关锁国，信息不灵的古老中国来说，使人们大开眼界，开通思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名之为以崭新的新报，不为过分。在《申报》之前十年创刊的中文日报《上海新报》，由英商士林洋行经办，伍德，林乐知两个英国人编辑，他们信奉耶稣教，并在报纸上宣传耶稣教旨。当太平军洪秀全进军江浙、莫都金陵时，该报利用自己外国人又是教会的关系，能较多地获知清军与太平军双方作战的消息，曾一度为留心时局的人所关心。但报纸的宗教色彩不为当时盛行孔孟之道的士大夫所欣赏。由于外国人编辑，文字也不如《申报》得体，没有议论和外地通讯。《申报》主持者美查也信奉耶稣教，但他不主张把宗教意识和宗教宣传带到报纸中来。由中国主笔编辑，语言文字适合中国读者的习惯。《申报》创刊后，《上海新报》为了与《申报》竞争，由原来的二日刊改为日刊，革新版式，用瑞典纸两面印刷，成本提高，报价也高。而《申报》用毛太纸单面印刷，成本低，报价低，又在外地设分销处，发行量大大多于《上海新

报》。该报因不能与《申报》竞争，终于在《申报》创刊这一年12月被迫停刊。自此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申报》成为上海独家中文日报，也开始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一张大型日报。

《申报》创刊前后的几十年间，京城中有邸报发行，这是发行量不多的朝廷出版物。民间报房或驿站人员从邸宅抄录邸报上的官方文书，加以印刷成为京报，在京城和各地发卖。内容还是朝廷官门抄、上谕和奉旨，只供官场阅看，一般读者不会看，也难看到。这是新闻传播中最保守、陈旧的形式，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报纸。《申报》的出现，不但结束了近代只有外国人在中国办外文报纸、办宗教报纸的历史，也改变了中国只有古老邸报的局面。《申江新报》的“新”字，则是它作为近代报纸与古代报纸区别的标记。以后，我国东部沿海城市和内地一些省城办的报纸，大都也冠以“新”字，标志着文明的进化，在新闻传播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申报》创刊伊始，就对新报的意义作过反复论述，报纸写道：

各国新报，系传各国国家之事，上自朝廷，下及闾里，一行一言，一器一物，无论美劣精粗，备书于报。中国邸报只传朝廷之事，不录闾里之琐屑，故阅者士大夫居多，而农工商贾不愿焉。“邸报作成于上，新报作成于下”^①。

过了几年，在宣传提倡近代报纸时，进一步强调报纸与国家兴旺发达的关系：

泰西各国之所以振兴之由来，大半是由于准民间多设报纸，盖报纸上刊载的上则国家政事之是非，皆准许其论述，下则民间创设之善法美器，亦准其陈述，故互相采用，互相匡救，以成其振兴之道。”为此“中国不欲西法则已，欲取用西法，则必自报纸开始。”^②

① 《邸报别于新报论》，1872年6月8日《申报》。

② 《申报总录后》，1875年2月4日《申报》。

在中国封建制度之下，君民之间隔言如隔山，所谓上情下达，特别是下情上达，是无法想象的。《申报》试图通过新闻媒介报纸这一形式，找到消除隔阂的途径，每天以一个版至一个半版的地位，摘登邸报的内容，传达朝廷政事，这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上情下达。但只有进一步做到下情上达，上下通气，才能使报纸有益于国家和社会事业。有一个时期《申报》曾以“金口木舌”（一种以木为舌的铜铃）为报徽，印在报纸上、信笺信封上，并制成徽章，分发给报社同人佩戴，以表示自己为民间的喉舌，主张发扬古代“谏瞽善旌”设鼓于朝廷，让民击鼓进谏的风气。

在中国封建统治下，皇帝是国家和人民的主宰，《申报》也必然要尊皇的，但她对尊皇还有自己的解释：

所谓尊皇，非但以歌功颂德。凡事有裨益于国家者，则剴切详明，深谋远虑，必思贻国家于安，而无一事机阻。凡事之有损于国家者，不辞苦口，不悛逆耳，虽批逆鳞触忌讳在所不辞也。”“中国当局权不下移，不可与泰西之民主与夫君民主共和国相比。应天而顺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若不得民心，欲长治久安之道不可得也。而欲知民情，莫捷于新闻纸。泰西诸国袭取中国古时之法，使下情得以上达，君民联为一体，国势日隆，中国何独不可追复古昔先王之法，变通尽利①。

当时清皇朝已把长达18年的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取得了局势的暂时稳定。但广大人民对清政府的统治已日益不满。从封建帝制与人民的根本矛盾上来说，要“应天而顺人”是根本办不到的。但报纸在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时候，强调“顺人”在报纸中的作用，则是中国近代报纸最早提出的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一种新思想。这在当时还处在封建统治的社会，是难能可贵的。

① 《论新闻纸之有益》，1886年8月11日《申报》。

秀才主持笔政

这张由英国商人创办的报纸，在人们的想象中，可能会照搬西方模式。在内容上，也会按照西方的要求或遵命于租界当局。然而，美查并没有这样作。他基本上引进了西方近代新闻纸的模式，传播新闻，刊登商情，首先作为推动市场商品经营的一种手段。至于在报纸适应时势的要求上（这里所说适应时势的要求，也就所谓导向，这在当时可能并不是那么自觉的），他基本上是依据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又倾向于那些企望从西方寻找近代文明的官绅们。他所以这样作，主要的原因是他依靠了一些学识见长，追求进步，在思想上具有近代启蒙意识的知识分子。

六七十年代之后，由于上海经济中心的逐渐形成，东部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开始发达。上海不仅万商云集，而且成了人才荟萃之地。邻近上海江浙地区的文人学士纷纷来到上海参加工作，受聘于洋人开办的学校、书馆、报刊或洋行工作。《申报》则是成了当时人才聚集的文化机构之一。

《申报》馆内当时先后汇集有如下一些主笔：

第一任总主笔蒋芷湘，浙江人，秀才，在任十二年。1884年考中进士，离开报馆。继任总主笔钱昕伯，浙江吴兴人，秀才。后来钱昕伯体弱多病，总主笔由他的助理何桂笙代理。何桂笙，浙江山阴人，秀才。70年代初，避战乱流离至苏州教书，还到正谊书院进修，得到学者冯桂芬的启蒙，萌生民主改良主义思想。他通博经史，著述亦多，有《劫火纪焚》、《红楼梦题词名录》等。“每出一篇无不骇其敏捷，外邦文人学士、航海而至者，如朝鲜，如日本，如越南，无不执贽请谒，而求其诗文。”①总主笔之外的

① 《何桂笙五十寿序》，1890年《申报》。

主笔中也不乏学问优秀的人才。如沈定年，浙江山阴人，秀才。曾在八旗充任教育，当过知县。1875年进报馆，写得一手好文章。吴子让，江西人，曾在曾国藩部下任幕僚，当过知县。因与王韬相识，介绍进报馆。早期不少评论文章均出于他之手。蔡尔康，上海嘉定人，秀才。1876年曾主编申报馆办的通俗性的《民报》，又参加编辑申报馆办的《瀛寰画报》。离开申报馆后曾任《字林沪报》主笔、《新闻报》主笔和《万国公报》华文主笔。吴友如，江苏吴县人，善绘画，举凡景物速写、山水花鸟，画得真切动人，曾应召赴北京为宫廷作画。1884年《申报》创办点石斋画报由他任主编。绘制了许多的新画，如描述洋人强夺公所的海盗行为，乡间恶霸借庇催租、人民怨声载道等等。也有不少描述当时社会生活、风土人物的工笔画。其他还有秀才高太痴等人。

这些学有专长的主笔们，一般都有自己的别署。如钱昕伯因为眼睛近视，自署“雾里看花客”。何桂笙自号“高昌寒食生”，到上海定居后，改署“曲园居士”。蔡尔康自号“铸铁庵主、海上蔡子”等等。他们除编报外，有的还爱好文学，能诗善文，常常互相间以诗文唱和。因之，这些主笔秀才们，被人们称之为当时的“洋场才子”。但他们服务洋人企业，生活待遇不算高，最多的月薪不过40元，以下的依次递减，少的一个月只有十多元，吃饭、穿衣等生活费用及书籍笔墨都得在这些钱里支用。何桂笙月薪30元，他平时喜欢看书，每月要花不少钱买书，有时生活陷入困境，吃饭时只好跑到杨柳楼台泡一壶茶，买几个烧饼充饥。那时报馆在汉口路礼拜堂对面一幢二层楼旧式建筑物里，除西人办事的房间略为宽大明亮外，主笔们则挤在场地狭小、光线暗淡的几个房间里，工作、休息、饮食，甚至便溺都在其中。冬则寒风砭骨，夏则炽热如炉。而且当时上海臭虫繁殖，一些无家可归者住在办公室里，往往受到终夜骚扰，难于安眠。为了让这个朝夕相处的地方雅致一些，主笔们请钱塘吴鞠谭先生写了《尊闻阁》三个大字，做

成匾额挂在编辑室的墙上，钱昕伯为尊闻阁主，其用意是尊重新闻事业。其实，这是聊以自慰。可以想见，当时新闻事业并不受到社会重视，生活待遇微薄清苦。但也不是清廷官员和某些新闻史著作中所形容的那样，当时报人都是所谓“落拓文人”。

这些知识分子生活在靠近上海江浙一带，比居住在内地的人能较多地接触到西学东渐以来的近代文明，呼吸到南风北吹的新鲜空气。除了蒋芷湘后来高捷南宫之外，大部分中断科举，脱离仕途，在上海这个开放城市长期住了下来。他们凭借洋人兴办的传播机构得天独厚的条件，扩大见闻，了解时势以及各阶层对社会急剧变化的反应。所以，这部分人可以说是清末时期沿海开放城市出现的新士绅群中脱离封建士大夫阵营、逐渐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化中的一部分。他们接受西方文明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感到中国的落后，产生了希望改变面貌的迫切要求，从事宣传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报纸创办之初，在发展近代新闻事业方面，他们撰写发表《邸报别于新报》、《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新闻纸之有益》等文章，评述近代新闻事业与国家兴旺、精神文明的关系。政治上，他们在报纸上介绍西方议会制度，说明议会制度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关系，强调中国朝廷欲长治久安，应当应天而顺人，借鉴西方的民主制度。何桂笙在论及将来的发展，认为民主是世界潮流，预见百年之后，各国都会实行民主制。这些，都是他们多少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的反映。

报纸创刊后这个时期，正值同治中兴，洋务运动处于全盛时期。这些年《申报》的主笔们主张吸收西方文明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包括政治、经济上有利于改革中国封建制度的东西以振兴中华。他们发表《地球说》、《医论》等文章，介绍科学知识外，着重提倡兴办工业，发展经济，以推进中国的近代化和上海城市的现代化。从兴办轮船、铁路、开发矿产到发展电灯、电话、自来水、煤气等城市公用事业。一篇《开矿论》的评论中说：“去年从西洋

进口之货，锡六千五百担，计银十三万两；铅一万担，计银五万两。中国若开矿，则“每岁购买西洋锡、铅诸物之银不会西洋取去，而且中国所出之货物，中国不必尽用，并可卖与各国，必能令出洋之银日减，进口之银日增。”^①他们认为门户既已开放，应当把生意做得更大，在上海通商大埠兴办世界博览会和物品交易会，“以集天下之土产，穷万民之心力，皆贡献于一隅之地。来玩者彼此相互仿效，沿习成风，其利源无量”^②。他们提倡民间办工商业，鼓励民间从事进出口贸易，不仅让外国人来上海，而中国人也应该出洋开阔眼界，与世界各国交往，做大生意。他们看到上海有英、美、法等国家的领事馆之类的机构，对联络和保护洋商起作用。因而发表评论，建议中国政府在美国的旧金山等商埠或其他国家首都设置派出机构，以联络和保护华工和华商。

洋务运动兴起，制兵船、造枪炮成为发展工业的一个重点，这是当时报纸报道评论的一个主题。在《炮局议》的评论中，主张政府应当设置军械制造局。造船制炮既要外国人的帮助，但又要设在内地外国人看不到的地方，以保守军事机密。

对于借鉴西方，振兴中华，主笔们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在一篇《中国崇尚西法》的文章中，回顾了效行西法十年历程之后，指出务其名，不务其实，不求其精的弊端。因之不能一切仰赖西方，而应当吸取西方的精华之所在。“外国之强不在船炮，其强在本于风俗之厚、法度之严”。无论官商兵将“欲效外国之强，岂不能揣其本，而齐其末。即使中土遍地金银，遍海船炮，而兵心不能如彼之固，将略不精，虽有利器，何能用乎？”^③尤其在一篇《时势论》的评论中，说明当前中国处在西方几个强国包围之中，如果不求自强，恐怕后患无穷。何况中国地大物博，才智不穷，

① 1872年5月18日《申报》。

② 《论中国宜开赛珍会》，1883年5月5日《申报》。

③ 1873年9月27日《申报》。

只要研究、吸收西方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中国也会强盛起来的。这些今天看起来似乎都是很平常的道理，但早在一百几十年前，中国还处昏昏欲睡之中，物质条件上还没有电灯电话、火车汽车。在经济不发达的时候，这些舆论是具有远见的，对当时中国近代化运动，上海城市现代化起着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

主笔们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受到王韬的启发和影响。王韬认为“富强即治国之本”，学习西方富强之术首先着重求富，求富必须兴利，兴利要广贸易，开矿藏，兴铁路，兴织造，造轮船，发展新式的商业，民间自办公司等等。王韬与钱昕伯在香港商讨了《申报》的编辑方针后，继续在报纸上倡导近代化思想传给钱昕伯和其他主笔们。

随着门户的开放，西方殖民者进一步把鸦片强加给了中国人民。19世纪50年代末，英美驻上海使节与清政府签订通商条约，准许鸦片进口，从而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实际是通过商品形式加强经济掠夺。当《申报》创办的这一年春，上海城乡的烟馆已多达1700多家^①。在烟馆还招揽“女堂倌”，加剧了娼妓的蔓延。此外，赌博、淫戏、黄色书画泛滥，拐卖妇女、贩卖人口等等罪恶活动也随之出现。《申报》对于门户开放以后带来的这些伤风败俗、毒害人民的東西深恶痛绝。他们发表《戒鸦片烟论》、《禁娼说》、《查禁淫戏》、《伤风化论》等等评论文章，从舆论上大声疾呼。后来烟馆设女堂倌一事政府明令禁止。由于殖民主义的掠夺侵略，封建制度根深蒂固，社会风气继续恶化。但报纸的舆论对当时留心世事变化的人们来说，还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一些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美查对这批卓有学识的秀才是一信任的。他委托钱昕伯去香港考察报业，为报纸的创办奠定了基础。当钱昕伯主持笔政时，也是由主笔们决定报纸的评论和报纸

① 1872年5月25日《申报》。

内容。据后来的总主笔黄协坝回忆：钱昕伯编纂稿件，举笔点缀之，有传奇小说者，一一淘汰之。美查亦能事事听其裁夺。美查之所以把笔政交付给中国的秀才，首先是为了要把《申报》办成适合中国人看的报纸。这就要适应中国的国情，按照中国的文化习俗，兴趣爱好来办。作为外国人，即是像美查这样来中国已有十多年的外国人也无法主持这样的文字工作，办好报纸。所以在《申报》来说，是洋人出钱，秀才办报。这是当时门户开放，上海租界特殊环境中的一种办报形式。在读者提问时报纸曾经回答：“本馆虽西人开设，而秉笔者则华人，其报系中西人所共成者。”^①这里所说的“中西共成”，也就是西人出资经营，中国秀才主持笔政，带有中外合办的意思。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报纸也是一种商品，但它毕竟反映时局进展和社会变迁，有一定政治倾向性。所以，它又是具有一定的立场观点的人操作之下的精神文化产品，报纸的导向和内容决定于主持笔政的人。几十年实践证明，《申报》的这些秀才们是具有爱国思想的。他们经济上为洋人谋利服务，但政治上并不是无能为力。他们在对待英国的侵略政策的评论上有过错误，但在几十年帝国主义侵略，包括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中，他们怀着对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唤起民众，自强救国，表现了可贵的爱国精神，对新闻的传播和舆论导向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一代秀才主笔对报纸的影响，基本上持续到维新变法和清朝灭亡为止。

^① 《主客问答》，1875年1月28日《申报》。

二、早期社会新闻与新闻纠葛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凡地方风土人情，道德风尚，民间纠纷等，是《申报》经常刊登的社会新闻。其中涉及到诉讼、审判的司法案件，又往往成为暴露宫廷腐败、社会黑暗的一个重要内容。当时社会上流传很广的清末的四大奇案中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申报》的报道连篇累牍，持续达数年之久，在上海以至江南一带轰动一时。由于《申报》刊登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读者爱看，报纸深入城乡，人们一提到报纸或新闻，就指《申报》。把申报纸作为新闻纸的代名词，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这个案件本来并不复杂，只是由于地方官吏贪赃枉法、官官相护和宫廷势力集团内外矛盾，勾心斗角，遂成为绵延几年曲折离奇的奇案。而《申报》新闻传播，论说评议，尤其对宫廷的激烈的揭露和抨击，和浙江地方绅士谏诉最后引起朝廷统治者慈禧的关注，终于使冤案得到平反。创刊未久的报纸，在初次发挥的舆论监督能起如此作用，是主笔们起始未曾预料到的。

1873年冬，当杨月楼案件还在审理尚未结案之时，浙江余杭县发生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杨乃武是余杭的秀才，他家的住房宽敞，把多余的房屋租给经营豆腐作坊的葛品连居住，邻居两家时有往来。葛品连的妻子葛毕氏因姿容俏丽，又经常穿绿色的衣服，被附近的人们称呼为“小白菜”。余杭知县刘锡彤的门丁沈彩泉对小白菜垂涎已久，曾通过葛品连的母亲冯许氏企图占有，

而遭到小白菜的拒绝。沈彩泉因而怀疑小白菜与杨乃武暗中来往，瞧不起他这个县太爷的门丁。有几次来到小白菜的家里发泄不满，任意辱骂，甚至对葛品连拳打脚踢。葛品连原来已经有病，在多次受到沈彩泉的打骂侮辱之后忍气吞声，病情加重，不幸身亡。知县刘锡彤的儿子刘翰本来就有强占小白菜的意图，他把这次葛品连之死看成占有小白菜加害杨乃武的机会。他和沈彩泉同谋向葛品连的母亲冯许氏告说葛品连之死，是因为杨乃武与小白菜通奸，怕奸情败露用砒霜将葛品连毒死。葛品连母亲在沈彩泉多次策动游说之下信以为真，向余杭知县刘锡彤告发。

刘锡彤原先是余杭县城外一处税卡的九品小吏，经常利用职权敲诈勒索，收受贿赂。有一次杨乃武去杭州押运修桥铺路用的建筑材料，因不满刘锡彤税卡盘剥，通过他在杭州知府作官的老师，告了他一状，使刘锡彤丢了官。刘锡彤不甘心丢官，花了2000两银子买通了京城中的关系，竟然弄到了余杭知县一职。这次葛品连母亲状告杨乃武，促使刘锡彤旧恨勃发，在门丁沈彩泉对小白菜威胁唆使之下，让小白菜伪供承认与杨乃武通奸，杨乃武怕东窗事发毒死了葛品连。

杨乃武被捕入狱之时，也正是他新科中举的这几天。按清朝刑律，必先由知府褫夺了他的功名之后才能逮拘归案。刘锡彤凭着他在朝身居学士的乡试同年宝盖的介绍，去找了杭州的知府陈鲁密商，陈鲁才革去了杨乃武的功名，批准把他拘捕。在审讯中，刘锡彤对杨乃武滥施酷刑，杨乃武在极端痛苦几近昏迷之时屈打成招，伪供将葛品连毒死，陈鲁又命幕僚朱伦香威胁利诱余杭药店的老板钱宝生提供给杨乃武砒霜的假证。从而判处小白菜葛毕氏凌迟，杨乃武死刑。

开始《申报》对这个案件作为一般社会新闻报道。至1874年10月间，因民间议论纷纷说这是一个冤案，主笔们才公开对案件提出了怀疑。按一般社会风俗，自来的淫妇无不维护她的奸夫，暗

中惦念他的恩谊，不肯遽害他的性命。而小白菜一上县堂，不待刑讯，即行招供；而杨乃武长跪拷打，死不承认，即加以大杖一千数百下，死而复苏，才不得不屈打成招。报纸指出：这个案件只听了一面之词，令有功名者蒙羞，而真正的凶犯漏网。

杨乃武屈打成招，心里不服。他得知民间已经流传关于他的冤屈，《申报》也为他鸣不平，决心上诉申冤。他得到了狱卒的谅解，在牢里铺纸磨墨为自己书写诉状，再说服了他妻子杨詹氏和姐姐杨淑贞上京告御状。都察院收到杨乃武家属上诉后，向皇上写了奏稿，并刊登于京报，当《申报》转载时，发现御状中详细的冤情已被删去。为了揭露案情真相，在见不到御状原文的条件下，《申报》派了专人去余杭县杨乃武家里，向杨的家属要了底稿，全文在报上发表，并在按语中说明御状中被删之处关系到杨乃武案件的冤情，“要求都察院奏闻清旨，提交刑部严行根究，庶几沉冤可雪”。如果“漫无黑白，吾愿质之皋陶矣！”^①这就使这一案件在上海滩上轰动起来。

都察院接杨乃武家属御状，着令浙江巡抚杨昌濬另委湖州知府锡光等会审。湖州知府锡光发现了余杭药店老板卖毒药给杨乃武这一事实，是一个假供。葛毕氏（小白菜）也吐露真情，说以前招供杨乃武下毒是知县刘锡彤胁迫下的假供。因此，锡光认为这是一个疑案，不能维持原判结案。但是杨昌濬为了包庇刘锡彤，对锡光的结论不作深究，维持原判。对此，《申报》以《天道可畏》为题，揭露和抨击复审中官官相护。杨乃武家属在《申报》的揭露与抨击中受到了启发和鼓舞，再度上北京向都察院控告，而且将浙江地方官官官相护的事实列于状纸。这次引起了西太后的注意，她接奏后特派浙江学政胡瑞澜再度复审，此时《申报》告诫胡瑞澜应当破除同僚情面，“将案内弊窦和盘托出”。但浙江学政胡瑞澜

^① 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月廿九日《申报》。皋陶，系虞舜时掌管刑法的官吏，以正直无私著称。

和前次复审的浙江督抚杨昌濬是至交，他们一样官官相护，仍然维持了刘锡彤的原判。

都察院给事(官名，与御史同为谏官)边宝泉认为地方官的两次复审都没有澄清原案真相，要求刑部详讯复审。这时浙江绅士汪树屏等 18 人，在《申报》为民请命舆论的鼓励下，联名向都察院呈控，控告胡瑞澜“改招供后，回护原籍”。特别是掌四川道监察御史的王昕递了一个奏本，指出：“胡瑞澜、杨昌濬所以敢于为此者，盖以两皇太后垂帘听政，皇上冲龄践祚，大政未及亲裁，所以藐法欺君，肆无忌惮”。这一下激怒了慈禧。这时，《申报》接二连三地对地方官吏审理的揭露和抨击，在京城、上海以至江南一带引起了广泛的响应，杨乃武和小白菜一案几乎成了社会上人们议论的中心。朝野上下在报纸舆论的压力之下，1877 年 4 月慈禧下了第六道上谕，将杨案全部人犯交朝廷刑部公开审讯，并将葛品连尸身解京检验。《申报》在报道当时刑部大堂审讯的情状时写道：当“棺盖揭去群见尸身尚不尽腐烂，皮肉初具，周身以丝棉缠裹，是初验时形状，则足见复审时未经检验也。将骨殖取出，尚有残腐败血，故亦无须蒸洗。查其应受毒处之骨节，则皆洁白，无丝毫黑痕，直省件作与浙省原件作同称无毒，声喊确凿。两旁观者欢声雷动，叫‘青天有眼’者不绝”。在场的杨乃武之妻“杨詹氏忿激之气溢于眉宇，亲执利刃欲刺刘令(即刘锡彤)之腹，为旁人劝阻始止”。报纸对关系到案情关键性的事实，报道详实，生动而有力。为此，案情终于大白，刑部宣布平反冤案，杨乃武和小白菜无罪。判决余杭县令刘锡彤革职，发往黑龙江劳动赎罪，不准收赎。杨昌濬、胡瑞澜、陈鲁等二十多个地方官革职。唯一没有受到处分的是湖州知府锡光，正是他发现并断定杨乃武的原判是一个疑案。但贪官当道，他也无力平反。

在报道过程中，尤其当冤案情节逐渐明朗之时，报纸对封建的刑讯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评。封建时代法庭审判允许用

刑，贪官污吏利用刑讯以逼取口供，以此来取得伪供或诬供，制造冤案，迫害人民。杨乃武家属上京告御状，京廷改派浙江学政胡瑞澜再度复审，当夹棍、铁链、天平架等刑具摆到杨乃武面前，杨乃武多次受刑，六次昏绝，死去活来，再也经受不起酷刑之时，急得哭诉道：乃武读书之人，非比江湖大盗惯能熬受严刑。大人命取刑具之前，乃武已肝胆俱裂。既已如此，请大人着刑房开出供词，某当然供认画押；即蒙皇上圣鉴，再派大员来杭，某当照今日开下供词承认，断不敢图申冤枉添受活时痛苦也。在揭露这样的酷刑逼供之后，主笔附言写道：“在上者若能静思此言，其深有仁心，并怀公道者，岂肯刑讯之弊犹行于中国乎！刑讯之弊，本报自开设以来，屡次力陈其非。盖民为邦本，本固邦兴，岂有听任日残其邦本，犹能望其邦之兴旺乎！”在这里，主笔是动了感情的。他们怀着人道主义的情理，批评法庭不能再滥施刑讯，而致人于死神边缘。通过杨乃武一案的审理，对法庭的审判方式也提出了异议。评论说：“因此案(指杨乃武案)不禁有感于西法也。西国之讯案有陪审多人，有代审之状师，有听审之报馆，有看审之万民。使讯此案之时亦皆如此。中国立法，为何不着各官听讼公堂。公堂者大堂也。应欲百姓周知，不至全民有冤耳”^①。

报纸主张吸取西方国家的审判方式，以改革封建腐败的刑讯，并且提出“平日慎选诸官，应为重视民生”。可是，清皇朝日暮西山，任何修修补补已不能挽救全局，在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之后制造的冤案又何止百千。所以主笔在这篇评论中也只能慨叹：“世风日下，竟至如此耶”！

在这延续三年的冤案中，《申报》发表的新闻、评论不下六十多篇，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攻势，得到了社会广泛的响应，引起了慈禧的重视，促进了冤案的平反。这无疑是中国近代报纸最早发

^① 光绪二年(1876年)一月十七日《申报》。

挥舆论监督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清朝末年，“杨乃武与小白菜”作为清末的四大奇案之一，搬上了戏剧舞台。当时，上海滩上演这个戏的不只一家。杨乃武从余杭来上海时也曾观看这个戏。他认为有的地方不符合他的原型。这当然是经过剧作者的艺术加工，难免有不符原型之处。当时，此剧称之为“时装戏”，精彩之处得到观众满堂喝彩。《申报》评之为“醒世人之新剧”^①。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南北戏曲，直至电影银幕，演出的剧种更多，此为社会家喻户晓、人们喜闻乐见、发人思索的传奇故事。

与《汇报》的争论

当报纸逐渐扩大报道范围，增加评论，对社会上发生的种种问题发表意见的时候，多少引起了官廷的指责和其他报纸的批评。对此，报纸早有预言，也为主笔们所预料：“本馆自知繁篇之内未免遇事有失检之处。往往有报中之事，无论官场或民间为本人所见，而将与本报为难者”。

对于洋人凭借租界特权的殖民主义行为，报纸时有不满，大至海关报关全由西人把持，华洋贸易商行因纠纷引起诉讼，租界当局庇护洋商，处置不公；小至劳工苦力遭到洋人的任意侮辱殴打，违法问罪，洋人可以逍遥法外等等。报纸发表新闻评论，甚至进行抨击。主笔认为：租界属于中国疆土，除照签约条款外都应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和惯例行事。关于华商晋源商行与洋商福星货栈的两次诉讼报道中，报纸批评英国领事馆法官判决不当，偏袒洋商而压制华商。《字林西报》指责《申报》站在华商一边，一起反对英国领事馆的判决。《申报》未有示弱，曾发表《本报证诬》

^① “戏剧广告”，1911年2月17日《申报》。

加以解释和批驳。

门户开放后，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不断深入内地。有的借口传教，强行干预中国内政，对此《申报》深为反感。有的地方因当地人民与传教士发生冲突，甚至发生拆毁教堂事件。报纸认为：让“传教士束装归国”，是解决冲突事端的最好办法。1873年1月间，《申报》发表署名执权居士《论西教的盛衰》一文，曾引起某些传教士的不满，西文报纸也乘机掀风作浪，指责《申报》站在中国一边，维护华人。报纸发表文章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报纸“不维护华人，则华人将服其议论之公乎，使不推美华人，则华人将喜其纪叙之善乎！西人之于日报意亦犹是，而专此责备本馆，是亦不思之甚矣！”^①

不只是外国人办的报纸，即使是中国人办的报纸也有与《申报》相争的。尤其是与《汇报》在1874年至1875年之间相争达数月之久。

《汇报》为中国留学归国的容闳发起于1874年6月创办。容闳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美国的耶鲁大学，怀着希望祖国独立富强的愿望回国，他曾建议曾国藩派留学生出国，向西方学习。他又主张办报，但那时他没有能力和条件独立办报，还是由招商局总办唐景星、上海知县叶廷眷参股，聘英人葛理为总主笔。九月因报道苏州省城的消息失实，被上宪谕令停刊。由葛理承顶，易名为《彙报》出版，聘管叔才为主笔。起初《申报》对《汇报》的创办表示欢迎，认为上海一埠，如果只有独家日报，未免孤陋寡闻，故而多了一家报纸，则是新闻事业的进步。

1873年6月《申报》报道京剧名伶杨月楼案。杨月楼是京剧小生，因唱功演技极佳而风靡上海滩。是年春节演出“梵皇宫”一剧时，有广东人韦家母女同在观看，其女儿对杨的表演赞赏不已，

^① 《论西字新报屡驳〈申报〉事》，1872年12月13日《申报》。

产生了对杨的爱慕之情，写信给杨并附生辰八字，希望结为良缘。但杨月楼因感到自己伶人的地位低下，多时未敢表示。韦家女儿思杨过度，饭菜不进至卧床不起。韦母为了成全女儿，托媒求婚。但此事为韦母夫弟得知，认为有辱门户，强令退婚。杨月楼以已有媒妁、婚书和聘礼为由不同意退婚。为了免生不测，预先告知韦母采取了以民间抢亲方式与韦女成婚。于此，韦母夫弟状告杨月楼诱拐良家妇女，上海县署将杨月楼拘捕入狱，判充军罪解往松江府。《申报》认为杨月楼不属诱拐妇女，上海县署对杨判罪太重。并引用一例确属诱拐妇女之瞿茂和案县署以笞一百交保释放。报纸指出：“前日之断，孰是孰非？大清律例，何随意重轻”。报纸还发表了读者“附来信札”，表达社会各界对杨月楼的同情和声援，并且揭发早在同治六七年间上海知县任南汇县令时，审理案件以刑讯用槌打人胫骨，用天平架吊手指，引起社会不满。杨月楼一案经报道后，上海满城风雨，连英国伦敦《泰晤士报》也刊登消息，说是有人贿赂官署，欲将杨月楼处死等等。

《申报》对杨月楼冤案，以及后来对杨乃武冤案的报道，是清末近代中文报纸对官廷的公开批评，在此之前还没有报纸批评官方的先例。为此上海县令十分恼怒，贴出告示，诬指《申报》抨击官厅是受了杨月楼的贿赂，扬言要对《申报》进行报复。此时报纸继杨月楼案之后，接着对杨乃武案连篇累牍地进行报道，批评官署对人犯所施的酷刑，是有违公理和人道的。《汇报》就在此事站出来指责《申报》，说是官署放任美查攻击中国的司法制度。其实，《申报》为杨月楼、杨乃武的屈打成招鸣冤叫屈，揭露两个案件中清朝官廷施行残忍的刑讯迫供，完全出自中国主笔秀才之手。即使美查同意报纸的批评，以西方资产阶级司法观点评论中国封建的刑讯制度也并无怀有恶意。为此《申报》批评《汇报》站在官廷一边为刑讯辩护：“本馆指陈刑讯之惨，以故地方官怒而另设一报，以谋抗我。惨刑讯于先，已属害民，又欲将民间所能直言之日报

代以官之新报，是属侵民于后。”^①《申报》报道杨月楼案和杨乃武案，是冒了清朝地方官吏欲对报纸进行干预的风险。《汇报》正是在杨月楼案闹得满城风雨之际创办，带着地方官吏的口吻和姿态对《申报》施加压力。《汇报》渗有官股，《申报》指责《汇报》借官报以势压人。此种说法虽未必确切，但《申报》对《汇报》的几次批评，不只是在对杨月楼案件的处理，而是站在民众立场上维护初次尝试的新闻舆论监督和为平反冤案所表达的呼声。

《汇报》还指责《申报》追随英国，帮助西人。《申报》曾为此作过多方解说。《申报》主张中国购买外国机器以供织布匹之用，《汇报》遂斥为帮助西人，损害中国人。《申报》认为：“殊不知英国之欲中国订立通商和约，其中用意是欲使英国布匹行销中国，而华人布匹既是手工织造，便难以抵制英布。若华人亦用机器织布。中国可以免用大量金钱购买英布，以减英人之利。买一织布机器，能费几何？较之年年买布之钱，孰多孰少，不待知者而后知。本报用意在此，反而说本报助英，是有利乎。”^②对提倡中国开发矿产会破了风水，引起当地人民变乱之说，也作了种种批驳。

《汇报》以及改名为《彙报》、《益报》之后，对《申报》的批评指责未有中止，甚至发展到了恣意攻击的程度。《申报》报道广东某商人自美国旧金山带回银票（相当于钱庄所开的支票），回香港时被外国银行倒账，资本丧失。报纸议论劝说商人今后要注意防范。《益报》詈骂《申报》外，又说该商人前生作恶，今生宜受此报。《申报》报道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长达三年之久，直到冤案平反，《汇报》、《彙报》说《申报》对此案的报道之如此积极，是报馆内有案犯的“同党”。为了怕人不知《申报》主笔钱昕伯与王韬有亲戚关系，《益报》指称王韬是原来清廷捉拿的逃犯，是“悖逆”。王韬主编的香港《循环日报》与《申报》在舆论上的呼应，是翁婿两人“同

① 《书墨痴生来信后》，1874年11月21日《申报》。

② 《论新报体裁》，1875年10月8日《申报》。

恶相济”。这样的指责，已经超出了报纸之间在某一问题上不同见解展开的论战，而几近于人身攻击。《申报》为此劝说：“两报互相辩论，原属有益之事。望息詈骂而作正经议论。”由于《汇报》内部存在的混乱和矛盾，虽然两度更名仍办不下去，于1875年底终于停刊。

《申报》早期的报道和评论中，涉及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中国的土地上推行殖民主义政策这个要害问题，确有唯英国的利益是从的表现，在这一点上报纸越是辩解，越是暴露了它为英国辩护的错误立场。

19世纪中叶，正是英国在世界各地推行殖民主义之际，鸦片战争使中国丧权辱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可是《申报》在自己的评论中，却为英国掠夺殖民地辩护，如说：“英国昔年属国繁多，为天下向来所未见。乃英国人近年多以为虑，恐鞭长莫及，故并无扩大之谋”。“英国在我国南边，曾经据守广东省城，仍然退兵，除一香港小岛，以便集船屯兵护卫贸易，并无土地之覬覦也”^①。至于英国派军舰到中国，认为是英国的惯例，“英国四隅各处，无不派兵船以往，岂仅中国一处而已”。从这种以英国利益为重，为英国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政策辩护的态度，在“马嘉利”事件中暴露得更为明显。

英国占领印度、缅甸后，继续扩张企图侵占我国西南边境地区，多次派出探路队进入云南边境探察地形。1875年2月21日，一支由英、印、缅160多名军人组成的探路队在英国军官白郎指挥下，从中缅边界进入云南山区，在永昌地区行凶，受到当地人民的反击，翻译官马嘉利被打死。5月间，《申报》发表了引自《字林西报》有关这一事件的消息。7月间正当英国向中国交涉时，《申报》发表了“马嘉利的被打死是中国背义，其能否挽回惟于中

^① 《书汇报中外时势论后》，1874年12月19日《申报》。

国朝廷能否相让”^①的评论为英助威。

之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清政府提出交涉，要求赔款，惩办“肇事”人员，遭到拒绝后，威妥玛中断谈判，离京来到上海。英国舰只游弋吴淞、长江口海面进行威吓。这时，《申报》刊载《晋源西报论中英大局》一文，并且评论说：“中国目下新疆未平，需饷已多。又加北省苦旱，南省苦水，饥民载道，觅食无由，若再加以防海之用，诚恐点金乏术”。因之，还是尽早谈判了事。

《申报》在租界华洋关系上，重视维护华人的利益，不顾“笔墨之灾”、“结文字之怨”，发表了不少报道和评论，但在英国殖民者侵犯和掠夺中国领土问题上，则为英国殖民者辩解，这也许是主笔们屈从了英国而犯的一种错误。从报纸这一错误观点上看，《汇报》在这个问题上指责《申报》助英，不是没有一点根据的。

涉及郭嵩焘的一场纠纷

光绪四年(1878年)六月廿日《申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星使驻英近事》的通讯。报道最近在英国的一个画展上，展出中国清朝驻英公使郭嵩焘的一幅画像。英国报纸言及郭嵩焘请英国画师绘画时每涉诙谐。通讯以英国画师古德曼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画像的经过：当郭嵩焘到达画室略坐片刻之后，开始摆布画像的姿态。郭大使说：画像的两耳必须一起露出，若只有一耳，观像人岂不要说一只耳被人割去了？又说，帽上翎顶也必须画入。画师以为人处于正面姿势，翎顶为帽沿所蔽，翎枝又在脑后，不能画入。郭大使听后，即俯首至膝问道：如今见到翎枝否？画师答说：大人的翎顶虽然可见，而大人的面目则见不到了！彼此相顾大笑。因此大使愿意脱帽科头箕坐，将帽放在一旁另画。画师又提请大

^① 《论滇省近事》，1875年7月13日《申报》。

使穿起朝服,大使说:若穿朝服,恐贵国国民入见泥首(磕头)矣!于是才不穿朝服。画像既成,郭嵩焘感到画得惟妙惟肖,欲请画师再为其夫人画像云云。

在国外,当时《申报》已有少量发行,刊登这篇通讯这一天的报纸传至英国,当时郭嵩焘适在法国巴黎。回伦敦看到后十分恼火,斥报纸捏造他画像时的举止言行。郭嵩焘在伦敦时请画师画像确有其事,但并没有《申报》通讯所描绘与画师言谈那样的情节。事情经过是:有一天郭嵩焘偕副使刘锡鸿参观伦敦的一次画展,看到一幅天主圣母像,他赞扬画得很好,也想画一幅自己的像,但请画展中的人画恐怕价钱太贵。于是请使馆的英国翻译马格里找了一个名叫古德曼的画师。画像也并非由郭嵩焘到古德曼画室,而是事先照好相由古德曼按照片临摹。拍照时,郭向摄影师提出所戴帽子帽顶的珠子必须露出,否则外人不知道所戴的是什么帽子。脸不可太正,也不可过偏。画像都是按照片画的,并无郭嵩焘与古德曼在画室中一段诙谐的对话。这篇通讯可能是作者将郭嵩焘照相时所摆布的姿势和言谈移至画室,还添加了若干情节。这在西方的报纸来说,只不过是诙谐之作的游戏文章,而郭嵩焘则认为有意侮辱,决心要追究到底。

在追究过程中,郭嵩焘首先写信责问画师,何以出此妄言。古德曼回信说明,《申报》所登都是无中生有之事,不但有损大使声誉,即对画师的形象也有损害,为此,他也要求追究。于是郭嵩焘一次再次地致电上海的《申报》,但都没有回音。第三次去电时,并将复电的电报费一并汇去,申明如果不再作复则将诉诸法庭。至9月初终于接到申报馆的复电,说通讯系转载本年4月某日英国的《欧卧兰美报》。郭嵩焘要翻译查阅报纸,发觉这一天休刊,并无报纸出版。马格里将几个月的报纸买来查阅,也找不到这篇报道的踪影。郭嵩焘只得将追究新闻来源的事暂时搁置起来,改由马格里出面致函伦敦各报纸和上海《申报》,申明画师为

钦差画像,完全是以照片为蓝本,并无报纸所载在画室里与画师诙谐说笑的情节。之后,郭嵩焘的怒气才悄悄平息。但他还是要在以后寻找机会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光绪五年三月,郭嵩焘离任回国,在上海住了廿多天。这期间,他会见、拜访地方官员和外国驻沪领事,以及亲朋好友,忙了一阵。《申报》美查得知郭嵩焘在沪,通过英国领事馆员向他转达歉意,希望对属于西方报纸笑谈之作不必过分追究。原来,《申报》的这则报道是从《字林西报》上转译的,而《字林西报》又是从伦敦的《每日电讯报》上转载。通讯作者是画师古德曼在《每日电讯报》担任记者的弟弟古丹。古丹从他哥哥的言谈写稿,《字林西报》刊载时编造了一些情节。《申报》承认转译刊登此文“误听谣传,语多失实”。郭嵩焘见事情已经查清,《申报》也已承认错误,遂不再深究。《申报》也从这一新闻纠葛中接受了处理中外官员和刊载外报新闻的教训。

据后来透露,郭嵩焘为了澄清事实,来往电讯费花了3000多元,这在当时来说不能不说已是一笔巨款。郭之所以肯如此花费,还为了防止随他一起去英国的副星使刘锡鸿乘机散布流言。因为刘锡鸿曾对郭嵩焘在英的言行经常挑刺,而且密报朝廷。为此而不惜重金,来搞清这一事件真相。

三、新闻业务的进步与发展

近代传播工具的运用

《申报》初创时期，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还处在萌芽状态。作为报纸，而且每日发行的日报，最主要的任务是传播新闻。可是，19世纪70年代的上海传播手段还很落后，不但没有电报电话，甚至没有用于全民的邮政。至80年代，尤其进入90年代新闻传播事业才发展起来。这一方面由于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侵略的扩展，边疆危机加剧，人们对国事日益关心。另一方面随着门户的不断开放，经济的迅速发展，上海与全国各地的联系愈来愈频繁，上海引起全国许多地区的注意。为了与各地发展经济贸易，上海也需要更多地了解外地。这一切，都为新闻传播提出了新要求。申报馆原来已在北京、南京以及浙江、江苏等临近地区设有采访员和分销处，此时又在天津、济南、汉口、武昌、成都、重庆、广州、昆明、桂林、兰州、西安、太原、开封等城市以及东北地区广招采访人员，至1887年有采访员的城市已达到三十二处。以“使十八省民风、土俗、轶事、奇文均可罗列报中”。新闻来源的增多也随之扩大版面，消息、文章占了三个版，行情、广告也比过去增多。后因广告继续增多，怕挤占了新闻的版面，将京城转来的邸抄和本市告白、启事、行情、广告另外编排成附张，随报附送，使正张的新闻、评论篇幅不致减少。“广告与新闻两不相侵，使阅者可以纵观为快”。

中国电讯事业的创设，为加快新闻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1881年底1882年初，中国开通了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路。“中国开设电报，以天津为总局，以临清、济宁、靖江、镇江、苏州、上海等处为分局，计程二千八百里”^①。这条线路“经官方施用，情况良好。今后凡使用的照章收费，不论官、商均可传递信息”。原来上海至北京，南北相距3000华里，将京报或京城的消息传到上海，以骑马传送要二十多天甚至一个月。骑马至天津，再由天津的轮船带到上海，最快也要一周左右。《申报》把这条电报线路的架设成功，看作是加快传递新闻的最好机会，报馆通知京、津采访员，今后利用电报传递新闻。1882年1月16日从天津电传的到上海第一条新闻，是清廷查办一名渎职官员，即云南按察使。这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次运用电报传递新闻。自后以《本报电音》为题头，传递朝廷谕旨、奏折和京津要闻。当时文人学士看重科举，每逢殿试发榜都翘首京城。有了电报线路传递消息后，每逢一年一度的殿试在北京长安街公布，《申报》采访员抄录后派人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地将金榜送到天津，再用电报发到上海在报纸上发表，上海与江浙邻近地区为之轰动。

80年代后中国处于多事之秋，发生了数次战争，读者特别关注军事消息。对此，报纸采取更为灵活的方式和途径进行传播。1882年朝鲜发生兵变。美查派了原来驻在日本和山东烟台的两个采访员前去采访，9月9日刊登了他们发回的《戡定高丽纪略》，报道清朝北洋水师在仁川观察到的情况。1882年5月法国侵略军进占越南河内，并且继续北犯，把战火烧到中国西南边境，引起中国人民极大的关注和义愤。报纸为适应这一新形势，把报道的注意力迅速转移到战事这方面来。开始，法军进占河内的消息是引自香港报纸，之后除了继续利用这个窗口外，还以海员目击口述、商社讯息和私人家书等多种信息来源和线索报道战况。主笔们估

^① 1882年1月16日《申报》。

计上海离西南边境路途遥远，而越南又在云南、广西边关之外，从那里传来一则消息，费时二十天到一个月，登在报上已是昨日黄花。鉴于西方世界两国交战允许新闻机构可以派人采访的惯例，美查聘用了一个俄国人担任采访员前往越南前线。这是我国第一次派往国外的军事记者。当时，越南的电报由西贡发出，而海防电讯局由法国人经营，法国人不喜欢报道法国军情，尤其不愿意张扬法国失利的消息。对记者的电传多方限制。这位俄国人在海防活动了3天，写成了海防见闻，搜集了黑旗军刘永福与法军作战取得大胜的消息，以电报发到香港，经厦门传到上海，在《申报》《越南军报》栏内刊登。第二年3月间，法国军舰进犯浙江镇海，仍由这位俄国人采访，报道了浙江提督欧阳利在镇海招宝山击伤三艘法舰，法国海军向海外狼狈逃窜的消息。这些都大大振奋了中国人民。

《申报》的《点石斋画报》，也是在中法战争之际创办的。早在1877年9月（光绪三年），美查把英国出版的《瀛寰画报》介绍到上海发售。为了让中国读者看懂，还由主笔、画家蔡尔康在文字上加以中文注解。由于读者对画报的欢迎，美查受到了启发，于1884年5月创办了自己的画报。他从西方买来新式石印机器，由新成立的点石斋印刷，故名《点石斋画报》，由吴友如主编，每十日刊行一次。报馆“特请善画名手选择新闻中可惊可喜之事，绘制成图，并附事略”；“以画报上所绘之事，亦即日报所载之新闻。官商有不欲外传之事，经报纸刊载之后，又在画报上刊登，使其事愈形明瞭，使其早夜警惕，不敢有所非为”^①。法国人在越南战场上使用的气球、水雷、巨炮等都见之于画报。主笔把画报的宗旨称之为“画新闻”，而且是为了“广天下人知识”。起初，外地来稿较少，报馆于6月间刊登启事，招请各处名手画新闻。过去

^① 1884年6月19日《申报》。

申报馆刊用的来稿不发稿费，这次刊登后发给稿费。《申报》对来稿刊用后发给稿费的制度从此开始。

1884年，王韬通过丁日昌的疏通和帮助，在李鸿章默许之下结束香港的流亡生活回到上海。他不满当时新闻界无论中文报纸还是外文报纸，主办人都操在外人手里的局面，主张提倡中国各省城都应由中国自己办报^①。他还主张，在中国土地上的外文报，不能让外人独占。中国自己也应办外文报纸，以加强对外宣传。这次回上海后，他原来是主张办报的，但与他有联系的洋务派官员不敢支持他，限于当时的条件与环境，他办报的主张未有实现，在传教士傅雅兰推荐之下担任了格致书院院长，他与《申报》主笔们是老相识，创刊时他曾与钱昕伯共同商讨报纸的方针和体例，创刊之初几年中《申报》一系列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强国富民，改革中国的经济、政治等主张，正是在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启发下发表的。《申报》当时提出的“邸报作成于上，新报作成于下”，新报要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也正是王韬所主张的“君主于上，民主于下，上下交固”的思想的反映。经过十多年来蒋芷湘、钱昕伯和何桂笙等主笔的努力，《申报》新闻、评论都有很大的进步。王韬回沪后没有直接加入《申报》，如人说的担任总编纂的职务，但与报纸保持密切的关系，与何桂笙经常在报上发表诗文唱和。当王韬花甲之年，报纸热情地发表赞誉王韬思想进步、才华横溢的诗篇。特别是王韬保持了在香港为《循环日报》写政论文章的传统，几乎每月为《申报》撰写四篇文章或评论。他的政论进一步感染了主笔秀才，使《申报》进入80年代后，不仅在新闻传播上有很大改进，即使在评论上也有显著改善。报纸所表现的政治色彩，突破了商办报纸单纯重视经济的框框。王韬从香港回到上海的时候，正是中法战争之际，王韬的变法自强

^① 王韬在香港《循环日报》发表的《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一文，《申报》曾加以转载。

的爱国思想，对《申报》在中法战争中主张反抗侵略起了积极的影响。

中法战争报道的政治色彩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由于这场战争波及到我国东南沿海的福建、浙江一带，在离上海仅一个钱塘湾之隔的镇海进行炮战。法国侵略军司令孤拔在海战中被清军炮弹击伤，后来在澎湖病死，遗体运到上海法租界安葬。战争更引起了上海及东南沿海一带人们的极大关注和震惊。《申报》对这次战争进行了连续性的报道。

早在六七十年代，法国侵略者就对中国和邻邦越南怀有侵略野心，中法战争前法国侵占了越南南部的领土，并继续向北进犯，于1883年3月从红河三角洲向驻在中越边境的清军和黑旗军进攻。《申报》的这次战争的报道是从黑旗军与越南人民共同抗击法国侵略军开始的。黑旗军的领袖刘永福，是广西上思人，1857年参加郑三为首的反清斗争，随后又加入广西天地会反清起义军。在太平天国被镇压后，刘永福组织残部，退守在广西云南边境，因采用七星黑旗为号，故称为黑旗军。部队开荒耕牧，通商往来，与越南边境人民和睦友好。1883年法国侵略军入侵越南时，刘永福应越南政府之召请，对法国占领下的河内发动攻势，大败法军，击毙法军头目安邨。越南政府为表彰他的功绩，授给刘永福“三宣副提督”官职。对这次战斗，《申报》主笔以热情赞誉的口吻写道：

观黑旗军之用兵，颇与古兵法之合。实者虚之，虚者实之，阳开阴阖，倏往忽来，其驰骋若雷霆，其飘忽若风雨。

刘自焉于越南全局土崩瓦解、败坏决裂之后，起而振之，传檄四境，义布于遐尔，同仇敌忾，理直词严，其牛酒哲师，

急越之难也^①。

报纸又先后发表了《黑旗军檄文》和《刘军述略》，详细介绍了1867年刘永福部进入滇越边境的经过和本意。檄文指出：法国“为其悔过退师，仍申旧好，则永福为民惜命，抑有何求。倘犹怙过不悛，负固罔服，则永福誓不两立，定当力翦仇讐”。读者从报纸上看到黑旗军在河内大败法军之后，又读了檄文，了解刘永福决不是草莽之辈，而是一个讲求道义、有理有节的爱国将领。

1884年8月，法国侵略者在我国东南沿海燃起战火，海军舰队侵入福州海面，突然向驻守在那里的中国舰队猛烈炮击。因猝不及防，我方多艘舰船被击沉，唯有“扬武”号等几艘舰船自卫抗击。当法国水雷舰急急驶近，正当施放水雷的片刻，“扬武”号先发制人，发炮还击，击中了法海军旗舰伏尔泰号，正在瞭望台上指挥作战的海军中将孤拔差一点被击中，他身旁的引港员被打死。“扬武”号最后因孤舰无援，壮烈沉入海底。《申报》依据怡和洋行所属大沽轮海员的目睹，描述了这次海战实况。“扬武”号战舰上有早年留学回国的詹天佑、薛有成、容良等学员，他们在海战中表现了中国海军抗法战争中决一死战的无畏气概。次年2月报纸对“扬武”号官兵的英勇善战，寄予悠悠深情，发表了题为《马江哀》追怀海战的诗篇：

敌舰往来久阴凯，
战书骤下炮旋轰；
仓卒之间苦无备，
血飞肉舞声如沸。
千百水师中诡计，
君不见鬼域潜伏芭蕉山，^②
是时击之无一还。

① 《论黑旗军刘义越南之捷》，1883年6月9日《申报》。

② 芭蕉山为闽江口外的一个小岛。

诗虽不是出于名家手笔,但充满着爱国主义的激情,与《申报》创刊初几年中风花雪月、墨客唱和之作迥然不同。

在进犯中越边境和中国东部沿海口岸和台湾的过程中,法国侵略军在外交上施展了种种诡辩手段和欺蒙的花招。对此,《申报》通过获得的中国驻法大使曾吉刚(即曾纪泽)同法国政府交涉的往来信件加以揭露。这些信件是西方某大报主编获准进入外交档案馆见到的。文件透露了1882年3月至5月间,曾吉刚同法国政府首相多次交涉的内情。法相起初辩说法国之进占河内,并无损害中国之意。继之说法国之进占河内,是法军在越境自行其事,不是出于总统的旨意。在受到曾吉刚严词驳斥之后,法相露出侵略野心,说河内之役是按1874年法越所订《西贡条约》行事,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要求曾吉刚以“局外人”态度,“视之可耳,不劳下问”。曾吉刚对此当然不能听而不问。他在致法相信中,说明历史上中越之间的关系与中越相处的地理位置,指出法相玩弄手腕,不讲信义。报纸在公布《钦使问答》之后,在按语中说:“观上所载,则法人行不履约,动施其诈,轻藐中华至矣!华之文忠武勇者,其能一展谋略,犹为杜侮之举哉。”^①

外国报纸对中法战争的报道不实,或为法国侵略辩解、袒护。当《申报》据实报道黑旗军和清军主动退出北宁,法军得一无城时,上海《字林西报》在刊登这一消息时则说,“得此信息者必然快慰”。对此《申报》提出了批评:

此言殊为可怪。夫中西通商,各安孰睦。在中国之各西人,固不与法国为仇,亦未与中国有怨。北宁失守炮台之信,不但华人闻之心怀不满,即西人闻之亦未见其心有所快。而该报乃以为闻此信者必然快慰,或该报馆主笔人见以为快,而随之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②。

① 《钦使问答》按语,1883年8月9日《申报》。

② 《驳字林西报论北宁失炮台事》,1884年3月15日《申报》。

而英国的报纸也以英相居间排解中法战争,一时议和未成,说成为中国“弃好寻仇”,而且言之有无限惋惜。《申报》在指出法国侵略越南危及中国边疆安全,又在我国台湾和福州、宁波东南沿海进犯的可能后批评英报说:“中国此时屈计每月军饷需用二百万,各处商务因而大坏,彼英报安得不以和议之不成为中国惜乎!”^①

在中法战争时中法交涉常常被西方报纸歪曲报道的情况下,《申报》认为外界舆论也不能只有一家之言,提出中国人应当自己办外文报纸,报社要设在上海,因上海熟悉西文西语者为数不少,主笔应当由精于西文的自己人来当。但这一主张未能实现。

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对法国侵略越南,进而进犯中国的和战意见不一,举棋不定。以左宗棠、曾吉刚、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促朝廷抗法,但掌握政府外交、军事实权的李鸿章却一意主和,采取妥协政策。《申报》看到法国侵略越南图谋,积极主张援越抗法,面对清政府的妥协退让,报纸认为:法人之攻安南,非攻在安南,其目的是以安南为驻足地,侵蚀中国滇、粤,以图将来得寸而寸,得尺而尺,此为法人攻安南之本心。“为中国计,不如此时即与之战。若与之战,则不可战于海,当与之战于陆。法人若移兵以扰中国之边,黑旗必且锐以蹶法兵之后,国内若有前后夹攻,法军是要失败的”^②。1884年4、5月间,法国侵略者看准清廷虚弱本质,乘机诱和,勒索大量赔款,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申报》认为法国欲索赔之兵费合计七千万元,竭中国之税赋所入,四五年中尚不足以贍其欲而其求,此朝廷断不能允者。“铤而走险,穷则思变,不与战势必倾其国之所有,即与战,亦不过倾其国之

① 《书英报译要后》1885年1月26日《申报》。

② 《说战》,1883年6月25日《申报》。

所有，权其轻重，而战之计决矣”^①！对法国侵略者这一讹诈行为，报纸还在8月22日发行号外予以揭露。

《申报》主战的言论，代表了当时主战派的意见，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要求坚决抗击法国侵略者的爱国热情。但在李鸿章主和派当政控制之下，是不可能采纳的。这种战和之间的斗争，《申报》在报道和评论中，都透露了出来，表现在中国驻法公使曾吉刚与李鸿章之间争论上尤为明显。曾吉刚在中法交涉中对法侵略决不退让，而他的主张处处遭到李鸿章的反对和阻拦。1882年曾吉刚曾为进行中法交涉向清政府提出七条建议，遭到了李鸿章的阻挠，致使外交斗争遭到失败。1884年中法交涉到了最紧张阶段，李鸿章答应法国方面的要求将曾吉刚调为英俄钦差，另外派了淮系洋务员李丹崖兼驻法公使，为妥协议和准备条件。此时，《申报》全文发表了《曾袭侯致李中堂书》^②，书中曾吉刚分析了中法战争以来的形势，我方有利条件，敌方不利条件，提出强硬的外交措施。他说：“法人之性，欺软怕硬。虽夸大而喜功，实躁急而畏难。轻于发端，怠于持久。吾华备战愈显，则了事愈易。”他又说：“法之本国，朋党相竞，政出多门，非各党同心，断难成大功于数万里之外。”当曾吉刚与李鸿章外交上的分歧和曾吉刚的主张在报上公之于众之后，许多关心国事的人士，都为曾吉刚义正词严、深谋远虑普遍称好。《申报》主笔在按语中说：“曾侯久秉使节，熟悉外洋人情，其于法人之心思计较，不啻瞭如指掌。故其所言，无不确切明著。”当时正是朝廷中和战纷争、莫衷一是的时候，《申报》在按语中明确地提出：“苟知严备战务，即为易于成和。古人云：能守而后能战，能战而后能和，其序不可紊，其理不可易也。”这些话，无疑是准对李鸿章的。

1885年3月清军冯子材部在广西镇南关一战大败法军，我军

① 《论中国目下情形准有一战》，1884年7月17日《申报》。

② 1884年5月11日《申报》。

乘胜收复谅山。败讯传至巴黎，法国内阁舆论哗然，当议院中有议员斐礼提出筹兵饷250兆法朗，增兵五万再犯中国时，受到多数票的反对，终于导致茹费理内阁的倒台。这是不出曾吉刚所意料的。可是，镇南关大捷之后，在英人赫德调停之下，中法停战撤兵，清廷与法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条约》。《申报》为此发表评论说，去年谕旨，嗣后如有以与法人议和请者，交刑部治罪。可是事隔未久，朝廷竟与法国议和，而法国所提条件，都是中国所不肯允者。评论接着写道：

今以法国图取越南之故，而今中国废其朝贡之礼，以改为馈赠之文，尚得谓之不损威望体面乎！法人之图越南，自始至终不过藉口于越南非中国之属。持和议于今日，天下人心愿闻者大半，若再有损中国之威望体面，而重贻隐患于将来，则唾骂随之矣^①！

这则评论迂回曲折，带有讽喻意味，说明了法国未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结局令人失望而惋惜。人民对清廷屈辱于法国侵略者面前是十分不满的。

中法战争前后，中国既在中越边境受到法国侵略者的攻击，又在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和台湾海战中受到法海军的攻击。这个时期，日本阴谋侵占朝鲜，派伊藤博文来华胁迫李鸿章签订中国撤兵朝鲜的条约。国内因军费支出浩大，屡屡向西商告贷，外患内忧，难于对付。《申报》对上述状况作了充分的反映，报纸表现的政治倾向是创刊以来所未有的。与1875年云南发生的“马嘉利”事件中所发表带有亲英的调和言论，更不可同日而语。《申报》在中法战争中内容翔实的报道，立场鲜明的评论，反映了清政府在取得镇南关大捷后“乘胜而收”与法国和议签约，使得中国“不败而败”的原因正是清政府长期来妥协政策所造成的恶果。至于今天

① 《论评约与草约之异同》，1885年6月13日《申报》。

有的史学研究者认为清政府“乘胜而收”是根据当时形势所能选择的上策。^①这种新议过去也曾有人提过，这是史学工作者研究的问题，而《申报》已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客观而详实的纪述。

美查回国

美查经营《申报》达17年，在新闻出版事业上他同一般外国人办中文报纸不同之处，是发行报纸之外，利用报馆印刷设备，出版书刊。报纸创刊之后，作者来稿日渐增多，因篇幅有限，不敷刊载，于1872年11月创办了《瀛寰琐记》月刊，第一期的目录为：开辟讨论源，意思是发表和讨论各种见解的栏目；地震附见，日星地月各球总论，海外见闻杂记，花史及诗词等。这是我国最早的由报馆出版的综合性月刊。月刊除了介绍有关西方的天文地理知识、海外地域风土人情以及文学小说外，还有当时文人雅士投寄的杂记、散文和诗词。本来作者向《申报》投寄诗词之类的稿件如果发表，像刊登广告一样要收费。《瀛寰琐记》发行后，刊登在刊物上的文艺诗作不收费，这样那些文人们为了显露自己的文才乐意投稿。

清朝同治末年，我国的科学文化还十分落后，文盲很多。美查来中国多年，对中国的文化发展状况有所了解。他以为当时《申报》上的文字还相当古奥，也没有标点符号，一般文化较低的人难于看懂。为此，在1876年4月间创办了通俗性的《民报》，用浅显易懂的文字，首创标点符号，分明句读，刊载新闻和评论，使粗通文字的人能看懂。在《申报》《劝看民报》的启事中说：务使措词尽量通俗，论事宜显而弗晦，俾女流童稚以及贩夫工匠辈，皆得随时循阅，以广知识，而增见闻。《民报》所起的通俗化作用，

^① 《学术界》，1991年第四期。

当时《字林西报》曾加以介绍和推荐。

美查在接触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对中国历年来浩瀚如海的新旧图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虽然看不懂这些书，但从一批秀才主笔的介绍言谈中了解到这些书籍的重要。他先后将报馆附属的申昌书局、点石斋书局、上海图书集成局三个书刊印刷机构加以调整充实，经营印刷图书。1873年3月起，多次在《申报》上刊登《搜书》、《觅书》的启事，征求孤本珍版书籍。1875年12月，从日本购得中国已经绝版的孤本《快心篇》计16册，以上、中、下三册翻印出版。此书原来是中国流传到日本的。1876年7月间又绘制印刷了《亚细亚洲东部舆地全图》。全图有中国十八行省，东三省、蒙古及朝鲜、日本。地图采用西法铜版印刷，显得山河江海精美而清楚。这是我国第一次出版的亚洲地图。清朝统治时期闭关锁国，不少人除中国之外，不知道世界其他各国的形状，这幅地图的出版。为人们扩大眼界，增长了地理知识。1877年4月征得善本，印刷《后水浒》一书。《申报》书讯广告说明《水浒传》一书是两个人分著，前七十回是施耐庵所作，后五十回是其他人所作。在一百多年前，已对《水浒传》的120回本、100回本以及70回本不同的作者，提出了新见解。

《申报》出版的图书，最重要的还在袖珍本《聚珍版丛书》和《古今图书集成》。中国旧有用铜活字、木活字和泥活字排印的书，而以清代《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为最著名。全书一百四十余种，内容以笔记、杂录和游记居多，也有章回小说。其中记述了不少古代、近代历史有价值的资料。美查翻印的旧书和刊行的新著中，袖珍本《聚珍版丛书》以铅活字排印，开创我国印刷业用铅活字风气之先，其版本可与武英殿聚珍本媲美。

《古今图书集成》是康熙年间由朝廷诸臣经五年编写始有初稿，雍正年间又经多次修改才告完成，皇上赐名为《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共一万卷，分订为1628册，“上自万象，下至方洲以

及明论、博物、理学、经济，靡不毕备”，是现存的一部规模最大、体例最善、用处最广、查找康熙以前各种资料的工具书，比《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完备得多。西方称之为《康熙字典》。可是因时隔百年，纸张剥蚀，流传渐少，恐怕会绝版了。为了保存这一重要典籍，美查与报馆经理决定由活字版印刷这部巨书。从1885年起经过四年努力终于完成。这次印本为我国古籍出版史上1934年前的第四次印本中的第二次印本。大英博物馆收藏了这部书，被西方称为《康熙字典》（美查版）。

到了这个时期，《申报》馆已经发展成以出版报纸为主的新闻文化出版企业。企业经营有方，有利可图，从中也为中国保存了图书典籍。美查来中国已接近三十多个年头，感到年老力衰，萌生了回归故国的念头。他同朋友们商量之后，决定把自己所经办的事业，包括工厂企业、申报馆、申昌书局、集成书局、点石斋书局等一起，改组为美查股份有限公司，总计资产为白银30万两。改组时招收了外股，共计为6000股，美查兄弟收回了本利，于1889年航海回国，从此他再也没有过问报馆和其他企业的事务。

1908年3月28日，报馆接到了美查在英国故乡因病逝世的消息。第二天，《申报》刊出了公告和悼词。其中说：“名著史册者，岂仅立德立言之士云哉，亦在识事务、开风气、振兴实业为己任，不仅区区为一己之利益而已也。”报纸这样的评价，也许就是对美查初创报纸时说过的办报纸“不能利而忘义”的一种解释。鸦片战争后，许多西方殖民者、传教士和商人，他们在上海滩上进行过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掠夺和侵略，攫取了一定的利润，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在开书馆、办学校、创办报纸的一些传教士或商人当中，在他们获利的同时，是不是在传播近代文化、新闻事业中做了一些好事？这恐怕也是客观存在的。美查属于其中之一。

美查遗下的美查股份有限公司由董事四人组成：即埃皮诺脱（E.O.Abuthnot）履泰洋行经理，麦边（Geo.Mebin）麦边洋行

经理，麦根治（Robert Macbemie）隆茂洋行经理和中国人梁金池。董事会负责人是埃皮诺脱（也译作阿柏舒）。因四个董事中一个是中国人，名义上报馆产权由英商独资变为华洋合股，报纸的经营业务由当时担任会计（相当于经理职务）的席子佩主持。这样的经营机构一直持续到1909年辛亥革命前夕。

甲午战争中坚持主战

1894年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当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日本侵略者蓄谋清政府出兵帮助朝鲜戡“匪”之机，发动了大规模的侵朝战争，6月10日占领了汉城。日本侵略者阴谋在侵占朝鲜之后，对中国的东北与辽东、山东沿海进行蚕食。

在这种情势之下，中国国内舆论和中国驻朝鲜将领纷纷要求清政府增兵备战，遏制日本的侵略。这时，年已二十岁的光绪皇帝在西太后“撤帘归政”之后开始“亲政”。光绪帝是满洲皇族中较能够接受新思想的青年皇帝，他在最亲信的汉文师傅翁同龢的影响下，竭力主张支持朝鲜抵抗日本，进一步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申报》是当时的主战论者。当日本侵占汉城之后，就提出“保朝鲜以固东围”的主张^①，在回顾“中国与法国开仗时，武备尚未整，军实尚未充，而已可与颀颀。迄今已历多年，武备愈整，军气愈充，正可出而一试，藉以励士气而振国威”。报纸指出：侵略者进犯友好邻邦，必然要影响到中国的安全。

日本侵略者9月下旬占领平壤，接着战火燃烧到中国境内。《申报》还是乐观地估计中日双方财力之对比，“以中国之力与日本相较，过之不啻十倍。日本财力已穷，罗雀掘鼠，仅足为一时敷

^① 《必保朝鲜以固东围》，1894年6月17日《申报》。

衍之计。若相持愈久，万万不能支持，若非兵变于外，即不免民乱于内。而中国则财力充盈，可以源源接济，即持之以十年之久，亦不匮乏”^①。

1894年11月22日，日本侵略军占领旅顺。这座李鸿章经营13年、花了几千万两银子建成的海军要塞陷入敌手。战火进一步扩展到山东半岛，日本侵略军遭到了清军从海上、陆上的抵抗。经过8个月的战争，日本的人力、财力和武器大量消耗。在国际上，西方列强见到日本侵入朝中的势头如此之猛，都想乘机扩大本国在华势力，为避免列强间的矛盾激化，日本政府急于想结束战争。清政府始终没有放弃求和的活动，主和派的声浪也随之高涨。这时《申报》根据自己访员搜集到的与西方报纸、通讯社传播的议和传闻，陆续发表在报纸上。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都是清政府议和活动的真实。在这过程中，《申报》的主战言论没有中止，仅就1月10日至15日，连续发表《议和仍不能废战》、《议和有十要》、《议和须占便宜说》等等评论。

几个月来的战争，清军中虽有爱国之士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整个战局中，清军节节败退，丧师失地。当日本军队在东北战场上击败了清军主力，进而占领辽东半岛，清政府派李鸿章去日本议和谈判，将签约的时候，议和成了全国人民的议论中心。《申报》在回顾了几个月来中日战局的教训时，发表了《战和专策》、《善后刍议》等评论。认为中国之所以失败：是“一误于畏缩不前，再误于威武不振，三误于蒙蔽军情，四误于粉饰战事，五误于器械羸敝，六误于粮饷克扣，七误于不遵调遣，八误于各相推诿，九误于畏死贪生，十误于忘辜负义”^②。这十误归结到一点，是误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终于把中国的台湾及附属的岛屿和

^① 《论中日之战宜战不宜和》，1894年12月6日《申报》。

^② 《宜及时修省论》，1895年2月25日《申报》。

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使台湾人民沦为亡国奴。这引起了全国人民对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等人的强烈不满。尤其是台湾人民与留守的军队坚决不愿割让台湾，他们传闻中日议和谈判前，全权大臣请示皇上，皇上没有这个割台的“训条”，只是说“以便宜行事”。将台湾割让日本并不是朝廷的主意，“而是全权大臣之卑也”。因此，发出了“台民于朝廷不敢抗，岂全权大臣亦不敢抗乎”？“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的强烈呼声^①。随之台湾人民开始了持续数月的抗日武装斗争。原在中法战争中屡立战功的黑旗军刘永福部，清政府为与法议和阻止刘永福坚持抗法，把他与他的余部调到台湾。当人民起来反对台湾割让时，刘永福发扬了抗法战争中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与上岸的日本侵略军作战，最后台南终于不守。《申报》一连发表了评论，盛赞刘永福艰难困苦条件下的抗日精神：“渊师旧部不过数千人，且无饷可筹，无粮可运；身居绝地，远作孤臣，致相持数月之久，日人始得占领，不可谓渊师之尽力竭力矣！”当一些主和派把刘永福“必欲与已经和好之日本复动干戈”，诽谤为“叛臣”时，《申报》评论批驳，斥之为谬论，称誉“刘大将军固系古今忠义薄云天之伟人”，“为人所共仰者”。

在甲午战争中，报纸除了详尽战争新闻报道外，又加强了对战争，战局和政局发展的评论，发展了中法战争中报纸的政治色彩。在主战抗日派和主和投降派的斗争中，报纸站在主战抗日这一边。可是主战派本身缺乏实力，也没有多少实权，只能利用皇帝的上谕和士大夫的清议，督促李鸿章出战，或令维新派的大臣斥责李鸿章，要“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甲午年（光绪二十年）正是慈禧六十寿辰之际，准备广收贡献，举行万寿庆典。当时战争激烈进行，慈禧太后只想从速求和了事，免得耽误做寿。在这

^① 《论公民义愤》，1895年5月19日《申报》。

种情况下，李鸿章种种求和退让措施，必然是为慈禧所认可。所以，《申报》一系列主战言论与战局的发展和结果相背离。言论的调子很高，战争的失败很惨。主战派多数是空谈“尊王攘夷”的书生，《申报》的一些主笔们多少也是这些书生中的一部分。他们对后党的顽固腐败和伺机复辟准备不足，对洋务运动中充实的军事实力估计过高，因而他们的主战言论虽赢得人民的赞许，但不可能为朝廷所接受。

1895年2月，清政府的和谈代表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及其随员到达日本广岛，将同日本进行和谈时，《申报》连续三天发表了《和倭统策》三十条，其中说：“速停战以便开议也，厚兵力以壮声势也，禁暴虐以安民商也，必正名以存国体也，坚主意以绝希冀也，忍小愤以求大谋也，求自强以图雪耻也”等等。当七日完稿之时，据外国朋友告知，张荫桓、邵友濂两位和谈代表已至长崎，不日可回上海。这内幕是日本按照预谋，借口所谓张、邵的代表“委任权”不完全，拒绝谈判，而将张、邵两个代表驱逐出境。而实际是要清政府派恭亲王奕訢或李鸿章前去谈判。而主笔们当时还不了解这个背景，以为和议即将完成，在《和倭统策》稿末加了附语，说“是则条条俱成虚语，然而两国交兵，总必归于和好，此时纵未及实施，他日或仍堪采择，慎勿笑画饼不可以充饥也”。

时不过两个月，李鸿章为代表的乞求日方早日谈判的和议终于成功，签订了《马关条约》，使中国进一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申报》和《倭统策》中的诸条当然未能采择实现，画饼毕竟还是画饼，是不能充饥的。但《申报》主战的言论，种种为国家，为民族自强雪耻的设想还是显示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爱国精神。

四、维新运动冲击之下

主笔们掷笔三叹

当甲午战争行将结束之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向清廷提出了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公车上书”，后来受到年轻的光绪皇帝的赏识和支持，把维新变法运动推向高潮。一时间，社会上、报纸上鼓吹变法自强，痛陈国事危艰，以至批评时弊之风极盛，维新救国的热情日益高涨。《申报》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一运动，但还是热情地赞誉康梁，发表文章和评论支持变法，与正在兴起的维新运动相呼应。

1895年5月10日之后，报纸以北京来电，连续报道康有为在松筠庵集会三日，联合当时在京的全国18省1300多名举人“公车上书”的大请愿。两月之后，报纸刊出了出售报馆印行的《石印公车上书记》告白。说明中日和约（甲午战争和约）十二款由全权大臣传至北京，举国哗然，内之郎曹，外之疆吏，咸有疏争，而声势最盛，言论最激烈者，莫如联名十八省公车上书。还说明此书是粤东康长素先生主稿，洋洋洒洒，为八千余言。皆力言目前战守之方、他日自强之道。美驻华公使已将此书翻译寄去美国。《新闻报》也按日转载，但都未得全貌，不及十分之一，凡迁都、练兵、交通新法诸说皆缺。《申报》馆觅得全稿石印出版，以使广大关心国事的人一读为快。直至1896年底，报纸转载了《事务报》的告白，推广《康工部四上书记》，特别称赞康有为的上书：“贯彻中西，剔抉利弊，本末兼赅，条理精密。”

主笔们从正在兴起的维新运动中受到鼓舞。但同时，也从甲午战败、甲午战争中报纸主战言论未能切合时弊，击中时弊得到了沉重的教训。他们感到，当前中国的事情，依靠洋务，购置战船，兴修船政，不过宽怀自嘲。内忧外患的继续加剧，国势已岌岌可危。“时局既变，而中国政教禁令不与时局俱变，墨守旧章，拘执成法”。这种状况是再也不能长此下去了。1896年1月至2月，报纸以显著的首论地位，连续七次刊登《述西友论中国之弊》，对于洋务运动暴露出来的弱点、清政府之腐败，进行了长篇的分析论述和抨击，说“中国以官为重，不问人之才与不才，但能纳捐即可握篆。人皆视官为谋利之途，几忘有教民、富民之事。”最后一篇特意申明此篇非主笔假托西友之名写的，评论说：“现在中国人无不欲讲究洋务，无不欲仿行西法”，但是“不求精意之所在”。中国“土地之大，人民之众，高出于列国，反而见屈于列国，是皆不知变法以自强者也”。中国过去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变，但变得未有抓住要害，变得未有实际效果。“盖继知变其器之制而不知变所以用其器之人；继知变其物之用，而不知变所以精其物之法。互市（五口通商）五十年来，所以敌国外患交起，民贫国病而独承其蔽也。易经有之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数十年中，备遭挫衄，可谓穷矣，然则变而通之，孰有急于今日者哉”^①。

这些评论中所反映的观点，代表了当时《申报》大部分主笔急切要求变革的心情，也是王韬多年来所提倡的主张。王韬是洋务派营垒中分化出来的早期改革派。甲午战争失败后，在民族危机的激励下，他转而批评洋务派只知船坚炮利，徒袭西方之皮毛。他要求抵抗外来强敌，革除内部弊政。这个时期，《申报》上的一些评论，有的就出于王韬之手。这时康有为已几次上书光绪，朝廷正在统筹变法的条规和政策，《申报》主张变法的舆论对维新变

^① 《自强首宜变法论》，1896年2月3日《申报》。

法的出台，起了促进作用。可是时不过半年，报纸发表了《变新法不如复古制说》的评论。评论认为：欲变新法不如复古制。法莫重于得人，制艺取士之法当所变也，则不如复乡举里选，此与西方国家选举近似。其次莫要于重农、限田、还田之法，则不如复阡陌井疆之古制。孝悌力田别为一科，似西方国家农务学堂近之。他若地方官听讼，宜复古时五听之制（周礼：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中国古制与西国之制有不同，也有同。评论结论是：“苟能取古制而复之，自不难于变今法，而亦无异于效西法”^①。

这种“变新法不如复古制”评论的发表，反映了报纸主笔层中因循守旧的保守思想抬起头来。王韬预感到了这一点，他在这一年的7月31日，也就是这篇评论发表之后二十多天，于《申报》刊登《天南逐叟告白》，申明因年事已高（七十岁），近来迁入城中，杜门谢客。幸勿冒用贱名，钱舌诬人。从此，他宣布搁笔，走下论坛。自后《申报》上再未有王韬的评论文章，也再听不到他过问《申报》笔政。

甲午战争前后、维新运动兴起这段期间，也是《申报》主持笔政主要成员变动较多的时期。自第一任总主笔蒋芷湘1884年考中进士后离开了报馆，总主笔由钱昕伯继任。在蒋芷湘主持笔政期间，钱昕伯实际上已帮助总主笔襄理笔政。自担负总主笔后，编务繁忙，又因体弱多病，不能经常到报馆主持日常工作，总主笔的编务由何桂笙代理。正当甲午战争激烈之际，何桂笙不意偶患病疾，未及医治而逝世，当时年仅54岁。何桂笙的去世，是《申报》的一大损失，而且加重了钱昕伯的负担。他只得负病坚持工作，实在难于对付时，主笔黄协坝起而协助。至1897年底1898年初，时届严冬，钱昕伯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再也坚持不了繁忙的笔政，辞去了总主笔职务。“昕伯谢事，以不才承其乏”^②。由黄协

^① 1896年7月1日《申报》。

^② 黄协坝：《本报最初时代之经过》，载《〈申报〉最近之五十年》。

坝接任了总主笔。

自此之后，正是中国的时势更加艰危之际，俄、英、德、法和日本等国在中国夺地索款、攫取筑路开矿、设置海港的种种特权。而清政府则让地、赔款无所不从，竟如洞门大开，放任各个殖民者长驱直入。《申报》惊呼：中国孱弱至此极矣！欲图振作又若不能，往者中东之役，中国人民有激于血性愤满不平者，今者漠然，并无人激昂而起，而殆人心涣散乎！1898年初，报纸连续发表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消息：南自英索九龙，借用广州湾，山东以北强占胶州湾，继占辽东半岛、旅顺大连。东南沿海英国兵舰在中国海面日增，侵略势力深入长江流域。主笔在发表以上消息的编者按中写道：“中国幅员虽广，何堪如此蚕食。时事艰危，不禁掷笔三叹！”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使主笔们的心境蒙上了一层甲午战败、危机重重的悲观阴影。

主笔层人事的变动，标志着《申报》第一代主笔秀才主持的笔政告一段落。他们从初创时期把报纸引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在社会各个领域开始发挥了报纸传播媒介和民间喉舌的作用，摆脱了商办报纸单纯谋利的局限性。尤其他们力图自强振奋，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中表现了强烈爱国精神。但在社会急剧变化、国内外政治形势激烈变动的时刻，主笔们没有能把王韬的原先积极影响《申报》的民主、进步思想加以发展，跟随时代的脚步前进，有的甚至逆潮流而动，站在维新变法的对立面去了。新任总主笔黄协坝正是这种思想的代表。

黄协坝批康批梁

黄协坝是继钱昕伯、何桂笙之后《申报》第四任总主笔。他是南汇县人，字式权，获清朝廪生（这是当时州县设立的学府中，供给膳食、以示奖励学业的名称）。《申报》初创时他就进报馆，虽服

务报社，仍念念不忘功名之未就。光绪十四年去金陵参加秋试，未有录取仍回报馆工作，自叹怀才不遇而郁郁不得志。此次接任总主笔，他是把这看成出人头地、走上仕途的机会。主持笔政后，他对皇上十分尊敬。在新闻或评论的文字中凡遇皇上、皇太后的称呼必须空一格，双抬或三抬，以表示皇帝的至高无上。他写的评论或文章，经常以“恭读某月某日懿旨或上渝注其后”为题，以表示他对皇上的尊敬。1898年6月1日光绪皇帝采纳康有为维新变法的建议，发布《明定国事》。黄协坝在报上称颂光绪的渝旨“如日月之照临，实有神武善明，非外人所能测度者”！

光绪皇帝短暂执政的几个月中，推出新政，允许自由组织学会，鼓励创办报纸，对于维新报纸的出现是赞许的。他曾经要康有为参考西洋各国情况，制订报律。还指出：“报馆之设，义在发明国是，宣达民情。一切学校、农、商、兵、刑、财赋均准陈利弊，藉为木铎之助，兼可翻译各国报道，裨益非浅”。光绪这个制定报律的指导思想，旨在鼓励和支持当时中国人自办报纸。正因为如此，国内“风气遂开，报馆林立，香港、广东、福建、上海、天津、汉口等处各有日报馆开设风行海内，亦既桀然可观矣”^①。

黄协坝借制订报律，写了《整顿报纸刍议》。这是他上任后撰写的第一篇评论。他在文中，对光绪皇帝提出制订报律“真勤求治理，巨细靡遗”加以称赞。但他真的意图是借机发难，把矛头指向当时批评政府腐败误国、鼓吹变法的维新报纸。“数载内，亦或巧肆词锋，心存叵测，于朝野上下之弊病和盘托出。而问其何病以药，弊以何除？谓宜效法东西洋。噫！是直欲驱中国四百兆人民，尽变为东西洋黎庶而后已，试问将朝廷置之何地？！”他认为应当对这些维新报纸的主笔加以限制和惩处，“务须定律时，严

^① 《与西友论报纸体例》，1897年10月17日申报。

定罪名，以昭炯戒。若夫妄议国政，煽惑人心，尤为法所难宽，不得不以罚款下狱了其事”^①。这不仅扼杀正当的新闻自由，而且还要对“妄议国政”者开杀戒。这样的报纸言论，似乎是借整顿报纸之名离间和加剧维新派和守旧派之间的矛盾，为即将到来的戊戌政变，以及慈禧复政后，缉拿维新报纸主笔，借康梁将报馆一网打尽准备舆论。

光绪的《明定国事》不过三个多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一举把光绪宣布的变法和康梁致力的维新运动打了下去。《申报》以《述国事要闻》为题，连续报道袁世凯告密，光绪帝被软禁，康梁出逃，戊戌六君子被害，一批同情新政的官员被革职或流放等重大事件的过程。其中还连续刊载康有为对《德臣西报》记者的长篇谈话。这是康有为被贬之后唯一能见之报端的自述，有助于读者了解宫廷矛盾、官场腐败、政变内情和康有为逃出北京的详情，不失为一篇比较客观的报道。但引起读者特别注意的是编者说明：凡所“有涉及皇太后之语，概节而不登”。这里表明了当时的《申报》为维护慈禧的尊严，戊戌政变中不利慈禧的一言一语不加透露。黄协坝竭力使清廷满意，在文字上严格把关，加倍审慎，“稍触忌讳者则一一删去”。他在报上将光绪与慈禧在维新变法上的矛盾，解释为此地无银三百两：“两官嫌隙，出自谣传，而何尝有其事。”把慈禧发动政变，废黜光绪自己重新垂帘听政，说成是光绪皇帝觉察了康有为密纠邪党，阴谋逆叛，因而请慈禧训政。这是“圣母慈禧”转危为安、挽救大清的壮举。

康有为逃出北京，乘太古公司的重庆号轮船，从天津经上海逃到香港，以后又转赴日本。经天津、上海都得到英国人的庇护，康有为的广东同乡见康幸免于难，写信给英商《字林西报》表示感谢。对此黄协坝借《申报》之名斥责这个广东同乡，说康有为是叛

^① 1898年8月24日《申报》。

道离经、搞乱天下的逃犯，有什么值得同情，斥英国等国应将康梁引渡回中国治罪。

这时的《申报》，已进行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原来的同情和赞扬维新，客观报道运动的进展转变到批判，鞭鞑康梁。许多批判文章都是黄协坝亲手执笔，以“仆”或“余”姿态和口吻发表。他把不久前报纸上客观报道康梁的维新变法一笔抹去，解释中国何尝不欲行新法，只是康梁“只保中国，不保大清，遂有改君主民主之计”，才受到《申报》的反对。

《翼教丛书》，是湖南苏舆在戊戌前几年为抵制湘中新学而编辑的一部文集，里面收入了张之洞、王先谦与康有为、梁启超论战的文章。戊戌政变后黄协坝交点石斋重印，并且加了自己写的《石印翼教丛书序》，说明重印此书是为了遏异学之横流，使之圣教昌明，皇威弥畅。他特意指出：“若鄙人，则人微言轻，既不敢大声疾呼，冀动大人先生之聪听。仅于日报中微嘲隐讽，阴刺其（康梁）辩言乱政之非”。为了防范康梁之东山再起，他主张“所患康梁之徒，匿迹瀛东，未伸天讨，万一逆谋未息，依然簧鼓人心，或则潜返宗邦，封疆大吏不乏思深远虑之才，当必有杜渐防微，不使彼萌孽之潜滋暗长者。草茅下士不烦杞人之忧天也。鄙人庸陋无文，更不必如骈技之赘矣！”

上海是当年维新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戊戌政变后，租界内清廷的政令不能全部涉及，不少绅士和知识分子不以康梁为非，维新变法的影响在继续扩大。谭嗣同的遗著《红学》照常出版。梁启超在日本把这场亲身经历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写成《戊戌政变记》一书，不久也流传到上海。在一些主笔争辩之下，《申报》刊出了商务印书馆寄售此书的告白。主笔只能在告白中客观地加以介绍：“戊戌之变，对中国存亡的关系极大，惟其事之本末层累曲折，知之者少。全书共分九卷，记载详尽。议论精明，将中国未来之局，言之瞭如指掌，有心人不可不阅之书也。”黄协坝认为此

书是对“我圣母慈禧的谤激”。认为光绪皇帝之禁闭瀛台，是因为瀛台是一个水木清华的地方，皇上宿恙未愈，让他在这里静心消遣。他感到去年发表的《石印翼教丛书序》，还不足以肃清康梁的流毒，为此，继续写了《梦逆书议》一文，对《戊戌政变记》加以批判。他说：“忆去秋康梁二逆脱逃之后，鄙人曾署为论说，署其罪状刊印成书，由出使大臣分发给海外诸华商，使明于二逆之途，免被康梁所煽诱。今者罪状未竟重播，而康逆已潜回香港，梁逆更肆无忌惮，署此逆书。不严以禁之，恐天下无识之流，皆将信其簧蛊，谣言之起，此后当更无已时矣！”^①

黄协坝主持笔政之下的《申报》，当时鞭达康梁的一个重点是保卫慈禧，力主和维护太后归政。康梁流亡日本期间，不但著书立说，而且创办了《清议报》。当时日本常有轮船来上海，报纸也随船流传到上海。康梁主张“清议”的内容之一，是抨击西太后、荣禄统治下的黑暗朝政，力主归政光绪。《申报》在这个问题上与《清议报》进行论战。梁启超在《尊皇论》一文中，称光绪维新变法为“今日之变，为数千年来所未有，皇上之圣亦为数千年来所未有”。颂扬光绪是一位拯救诸夏的天生圣人。黄协坝则称颂慈禧是圣母，“皇太后为皇上之母，亦天下之母也。而康梁谋乱举兵围之，且逼勒之，天下无父无君，孰有甚于此者乎！”^②在这个论战中两者都是尊皇，康梁尊的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光绪皇帝。维新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光绪的前所未有壮举为历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尽管这一页的时间十分短暂。而黄协坝尊的是一个昏聩腐败专制的慈禧太后。黄协坝的尊皇，不以其政治主张是否正确，治国是否清明为标准，而是以是否在位、掌权为转移，两者存着原则性的区别。当时的不少报纸有识之士和读者也是清楚的。

就在《申报》连续批判康梁的时候，读者议论纷纷，社会上也

^① 1899年11月13日《申报》。

^② 《论〈清议报〉诬上之罪》，1899年12月28日《申报》。

有传言说《申报》总主笔黄协坝之所以在报纸上如此大骂康梁，是受到了顽固分子的贿赂。由日本人田野桔次为经理、与唐才常友好的《同文沪报》，鼓吹维新运动是适应时代潮流的改革，看不惯《申报》的守旧态度，连续十天刊登了针对《申报》的《普天同愤》的告白。又有广学会牧师季理斐投书《申报》^①，指责《申报》是“旧物”，屡斥康有为的不是，而且时常恐吓新党的人，是由于姓黄的主笔受贿旧党三百元的缘故。黄协坝反驳这种匿名告白，“凭证全无，岂能全信”。直至1902年底，黄协坝还接连发表《客论文太守》、《君权平权议》、《自由论》等等文章，对康梁继续大批判，引起了《徐家汇汇报》的不满，发表了《论报纸宗旨篇》，对黄协坝的批判进行反击，讽刺《申报》“报牌之老，纸贵洛阳，即使守旧不利，亦能自立一帜”。黄协坝对此更加恼羞成怒，发表了对《汇报的答复》，自以为有先见之明；说康梁逆迹未萌时，鉴之者有人，尊之者有人，信崇效法者又有人。而仆已窥之于微，早就觉察到了。到了康梁事情败露逃遁，才“逐日其罪状”。到了现在凡遇康梁而窃附于康梁之党，时以平权，自由、革命、流血诸谬说煽惑愚民者仍不悛大声疾呼，暴其谬妄。盖邪与正不相合，公与私不相谋，顺与逆适相反。仆惟知斥其邪，破其私，诛其逆而已。

从黄协坝许多批康批梁的评论文章中可以看到，他虽然谦称自己是“草茅下士”、“鼻陋无文”，而实际他是处处居高临下自以为是。他一面欲置康梁于死地而后快，一面向朝廷献计献策。当时一些有识之士都感到黄协坝之所以大批康梁，开口闭口“圣母慈禧”，是念念不忘他自己的功名未就，意图邀取朝廷慈禧的青睐和赏识。至于受贿三百元者，只不过是人们对黄协坝不满的一种讽喻而已。

^① 1900年2月2日《申报》。

1905年的改革

在黄协坝连篇累牍地批康批梁的那些日子里，报馆主笔层之间的思想和要求也并不完全一致。以金剑华、雷瑛、赵孟遴等为代表的主笔，对黄协坝批判康梁“不以为然”，但由于“权限所在，力争勿得，亦无如何”^①。他们的思想状态虽然没有达到维新派的高度，但对清朝的封建腐朽统治已经失去信心。他们感到甲午战后，中国的内忧外患更加深重，清政府对外来侵略束手无策，对丧权辱国、失地赔款的条约俯首是从。对内则竭力搜刮民财，几乎无物不税，无捐不增，以补其内库的空虚。一些主笔对列强侵略忧心忡忡，对宫廷官吏的腐败心怀不满，对苦难中挣扎的人民寄予同情。他们的这种心情和感受通过编发的新闻和文章不断流露出来。

过去，报纸对于封建暴政和腐败，大多通过社会新闻，尤其是司法案件审理揭露官吏的营私舞弊，贪赃枉法。而这时的揭露不少是指向统治阶层中重臣高官，围绕慈禧周围的皇公贵族，如荣禄、刚毅、徐桐等等。这些人正是“祖宗之法不能变”，阻碍维新和革命的顽固分子。

庆亲王荣禄私邸在禁城之北，京员欲补官职晋阶者，无不奔走其门，“庆门如市”成为民间谚语。凡官吏往见，非献金不得入。载泽取副都统之女为室，迎娶前一天，过妆的队伍自女家门起进东安门，走北池子迤迤出地安门，沿东皇根至泽公府，长达数里，计妆三百余台，箱柜桌张、床帐铺垫、古玩钟表、珍奇杂物，罔不精工。而李莲英受贿数万金，其家产3800亿元，现银居三分之一。“如此巨额家产，恐尽括中国朝野上下也不足此数”。直隶、

^① 雷瑛：《申报过去状况》，1922年申报《最近之五十年》特刊。

河南、山东诸省，无不阡陌云连。当时有的报纸，慑于官威，揭露抨击不敢提这些高官贵族的姓名，而《申报》借租界洋老板的势头，一一加以揭露。

1899年冬，因旱灾已成定局，朝臣诏诸臣“各抒谏论，冀连和甘”，以挽救和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这时，翰林院沈鹏写了两份“直言折劾”。《申报》京城访员得到折劾，寄到上海在报上发表^①。“直言折劾”指今日“三凶在朝”，已经搞得全国上下民怨沸腾。沈鹏指责的三凶是荣禄、刚毅和太监李莲英。荣禄“今则内掌枢机，外握兵权。自古及今，内外之权不相侵，将相之柄不兼授，诚以防主弱臣强，祸生不测”。刚毅则指良士为汉奸，实为“率国人而叛皇”。李莲英则是“官禁之隐患”。沈鹏希望“分荣禄之权，惩刚毅之暴，除李莲英之毒”。可是，翰林院书生们的“直言”触到了朝廷专制腐败的要害和慈禧的亲信，不可能提醒已经腐朽的朝政。也许由于报纸的渲染激怒了慈禧。她对身居租界的《申报》难于直接干预，而这时黄协坝也正在批康批梁，为慈禧唱赞歌。因之在盛怒之下她将沈鹏撤职并永远监禁。这是翰林院的编修们始所未及，也是《申报》主笔们难以预料的。

这个时期《申报》上批康批梁几乎为黄协坝一手包办。而其他方面的评论文章还由主笔们轮流撰写，论题各人自选。金剑华、王仲麒等感到国家已经到了倾覆的边缘，朝政专制的腐败也难以挽救，他们已顾不得朝廷的尊严，进而隐隐约约地批评起皇上来

了：
“今政教不修，纪纲失坠，上下蒙蔽，官吏贪贱，民情涣然，相率解体。而强暴者以君之不足载，乃聚而结党拜会。夫结党拜会不必其尽为匪，不必尽其作战也，亦只以君之不能卫而思自卫也。此即不足为国之大患，而人心离之，则已

^① 1899年12月9日《申报》。

于此可见矣！至今人心日离，则外患未有不乘之而起，内讧未有不因之而兴。吾故谓：国家之亡，不忘外患，不忘于内讧，而实之于自弃其民。”^①

文章虽然没有摆脱“君不能视其子”这样的封建伦理观念，但这是《申报》三十多年来抨击封建皇朝最为激烈的言论之一。这种批判态度比几个前主笔们对国势垂危而掷笔三叹更积极得多。且愈到后来，愈感到，“吾国紊乱至今已达极点，其所以致此者，全由于人人不能自治，使众人受治于一人，众人未有丝毫主动也。概自欧风东渐，风潮日起，莽莽神州有沉落之患，应当让国民合大群，结团体，以御外侮，而保权利。”^②

在维新变法运动推进下，近代中国出现了一个中国人自己创办报刊的高潮，全国新办的报纸不下五十余种，尤其是政治派系政党型的报刊迅速萌生发展。上海是维新派的活动中心，维新派人士先后在上海办报，由黄遵宪、汪康年共同筹备的《时务报》于1896年8月创刊。他们把梁启超从北京请到上海主持笔政。创始期间梁启超连续发表了十几篇维新变法的文章，畅论必须变法和如何变法，中下层知识分子读了之后“如饮狂泉”，大为赞赏。一时间《时务报》风靡海内外，成为我国最早的具有全国影响的政论报纸。汪康年在创办《时务报》之后，于1898年5月又创办了《时务日报》，以后改名为《中外日报》，其影响虽不及《时务报》，但介绍中外时事，评论时局，文句一律加点，分档编排，是日报的一种创新。他意图冲破上海只有商办日报的局面，要在传播新闻、评论时势上与《申报》竞争。

《苏报》被封后，又有《国民日报》等革命派的报纸创刊。这些报纸在知识阶层、部分官绅和市民中产生影响，不仅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而且推进时代的潮流向前发展，使资产阶级民

① 《论国家自弃其民之害》，1903年8月23日《申报》。

② 《自强必先自治说》，1905年5月23日《申报》。

主革命的影响不断扩大。

《申报》的一些主笔们虽在揭露和抨击封建腐败的朝政、鼓吹民主精神上作了一些努力，但终究改变不了黄协坝大批康梁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与新兴报纸比较起来，则陈旧保守，落后于时代。1907年《申报》的主笔伍特公后来回忆当时的《申报》时说：“沪上各报之主义亦随风气而变易。独本报（申报）则固步自封，力排新学。犹忆余在校课余入阅览室时，各报辄一纸而数人聚阅，独《申报》常被闲置案上，苟有因老同学，辄以顽固、腐败等名词诋之。”^①黄协坝对报纸在读者中的影响视而不见，对读者尖锐批评和责难心里不甘。当报纸创办已达二十五年，适逢发行一万号之际，报纸发表了一篇纪念性的文章，在回顾创刊至今的曲折过程之后，申明在此发行一万号之中：无日不言朝廷之政令，而除旧去害，未闻有更张也；无日不言官吏之职务，而徇私容情而闻有更作也；无日不言邻国之举动，而鹰瞵虎视，未闻其审机戒备也，等等十几个无日不言。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本报所望于中国者，乃至一万号颓然不能自振，是岂始创刊时所意料者”^②。

这十几个“无日不言”是在新兴的进步报纸和读者批评之下发表的，其用意是自我辩白，意在表明二十五年来报纸为民族自强，国家振兴作过努力，只是“中国以昏昏如睡之故，本报大声疾呼而不知醒”。这个时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兴起，人民开始觉醒。而黄协坝看不到这股新的力量，竟然还把革命派比之为流寇。他写道：“仆以为洪杨（指洪秀全，杨秀清太平天国将领）诸逆势甚剽悍，又值国家治平日久不知兵，故能风卷残云，顷刻举事。若孙文者则草寇耳！”因此，尽管报纸苦心孤诣地自我表白，但是只要在对待维新和革命的态度上未有改变，就难于取得读者的谅解。果然，几年中报纸发行量不断下降，从过去最盛时的近万份下跌

① 《墨衡实录》，载《申报最近之五十年》纪念册。

② 《本报一万号记》，1901年2月4日《申报》。

到六七千份。美查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埃皮斯脱感到如此下去将威胁营业收入，认为改革已迫不及待了。但他并不像美查那样比较熟悉报纸和中国的情况，因之，由主笔们公推的金剑华主持改革。

1904年底报馆休假，金剑华主持召开了主笔、编务和管理人员的全体会议。会上一些主笔们认为，报纸的改革首先必须要改变原来落后于社会发展的不合时宜的守旧思想。维新变法失败后，报纸的方向背离了当时人心所向，报纸的发行数急剧下降，读者和某些报纸批评指责《申报》的原因也在这里。主笔雷瑨后来曾对当时报纸落后于时势的原因作过回顾，他说：“中国倡行新政始于康梁。戊戌政变后康梁遁逃海外，清慈禧太后怒之甚深，政府诸公因求媚慈禧之故，不得不将顺其意。主笔政者因迎合政府诸公之故，更不得不附和其词。”^①雷瑨是当时的改革派之一。限其当时的环境，他的言谈虽没有后来回顾中那样彻底，但主张改革的基本观点他明确地表达了。全体会议开了两天两夜，一致通过了改革方案。在主笔们批评之下，黄协坝自感几年中主持报纸不识事务而辞去了总主笔职务。会上公推金剑华为总主笔。之后金剑华聘请了刚从日本考察教育回国的张默（蕴和）为主笔，以后又聘请了刘师培、王钟麒等几个秀才担任主笔，撰写评论。他们虽然是旧学家，但从提倡国粹中感到民族压迫的惨痛，思想激进。如刘师培，1902年中举，次年结识章炳麟，赞成光复，撰写编印《中国民族志》、《攘书》等反清小册子。1904年曾任《警钟日报》撰述，加入光复会。他们进报馆后在撰述中经常流露反清的革命情绪。

1905年春节过后，报纸于2月7日在第一版发表了《本馆报务举例》。在回顾创刊三十多年的历程之后说：“本馆既深喜同志

^① 雷瑨：《申报过去状况》，1922年《最近之五十年》特刊。

之多，而又愿为各报馆之先路，乃亟思改良，渐求进步”。今后决心以“世界进化，理想日新，无不袭故蹈常，不敢饰邪熒众”为更新宗旨。又列举扩充篇幅，改良形式，广译东西洋各报，敦请特别访员，广延各省访事，广采本地要事等十二项从刊式到内容的改革措施。宣布改革的第二天又发表了题为《述东瀛度岁之感以励中国前途》，开宗明义地引用了饮冰室主人的话，为康梁平反，表示与以前视康梁为叛徒逆党的态度划清界线。

改革后的报纸，首先给人的印象是耳目一新。把原来报纸的章、页改称为版，并且扩充了版面。原来版面上无论是新闻还是评论文章，文字标题一样大小，看上去黑压压的一片，题文不易分清。现在，标题用大号字排印，题文清晰，一目了然。过去不论工、农、商、文和社会新闻都混在一起，现在则分为外交、政界、学界、军界和实业界等门类排列。我国近代新闻史上报纸样式从章、页演进到版，新闻文字从不用标题到采用大字标题，从编排的书刊式，进化到现代新闻纸式的过程，经历了三十多年。这个演变过程主要也是1905年《申报》的改革完成的。

报纸在2月8日的一版招登“论前广告”。这种广告的地位是排列在一版评论前面或重要新闻前面，收费比刊登在其他版面地位的广告要高得多。这类广告相当于现在台、港、澳和国外中文报纸排在一版最重要地位的商业性广告，相当于内地报纸报眼或第一版地位的广告，以争取有较多的营利收入。“论前广告”也是《申报》改革中的一项发明。而过去有些人对此常常侧目而视，单纯地斥之为“商业谋利”。

报纸改革不久，清政府于1906年6月宣布预备立宪。上海方面，张謇、汤寿潜两江总督岑春煊支持下联络部分官绅和商界、学界成立预备立宪公会。《申报》的主笔们开始对立宪能拯救中国抱有希望，报馆联合了《沪报》、《中外日报》、《时报》、《南方日报》等报纸举行庆祝立宪大会，在报上开辟资政院、宪政馆、资

议局专栏，为立宪进行鼓吹。

立宪之初，清政府把改革官制、振肃官吏作为推行立宪的一项重要举措。过去《申报》对清廷官场腐败的观察较为深刻，在这方面进行过许多揭露和抨击，反映了对官吏鱼肉人民的强烈不满。清政府既然把振肃官吏作为立宪的举措，报纸关于这方面的批评和揭露也就加强起来。当时的上海、苏州和南京等城市已十分繁荣，而这些城市竟然成为官员们享乐沉沦之地。《申报》曾就这方面的情形加以描述：^① 苏宁两省地处繁荣，楚馆秦楼，鳞次栉比，听鼓人员于此又麻将吃花酒，非特藉以消遣闲情，且可为联络上宪幕友官亲之捷径。许多官员往往藉公赴沪，任意浪游。已故江南某军门每至申必赴其妓院又一千元底之麻将。现署常镇道陶森甲到沪时，必至著名总会碰和，输赢极巨，是皆昭昭在人耳。报纸形容政界真正主张变革的人极少，因为政界人士多数是残废老弱之辈，冥顽无知之徒。所以，半年过去一点也没有改进的迹象，改革官制只是一种表面文章而已：“各省官制，犹为道旁之筑室。振作之业未举，腐败之志愈增，外人冷嘲热骂形诸报章。国民灰心丧气将有甚于往日。”^② 这个时候湖南民众组织德育会，醴陵一带会党揭竿而起，众民四应，政府企图举兵镇压。《申报》告诫政府，苟各省尽效湖南之所为，政府奈之何？政府固不乐小民为乱，小民亦乐自为乱耶！政府把山西矿山攘于外人，学生出于爱国之心，竭力争之，政府听任外人攘而不许学生争。《申报》认为：始则学生认外人为公敌，继则人将认政府为公敌。各省人民因天灾人祸愈演愈烈，人民起而集会抗议，而政府出动兵警大加压制。暂时压制人民之抗击，但不足以遏制人民的心志。“旁观之士，见官吏之肆行压力，亦将疑政府之立宪不过是为粉饰人民之工具，

^① 《论近日官场沾染嗜好之深》，1906年3月16日《申报》。

^② 《论今日时局之危》，1906年12月6日《申报》。

实则仍保其专制政体”^①。报纸将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来的所作所为揭露得淋漓尽致，昭示了所谓立宪只不过是缓和革命运动和人民不满而采取的一种虚伪的手段而已。

面对各地报刊和上海《申报》愈来愈激烈的舆论，清廷恐惧不安。据《申报》当时京城的访员透露：清朝宫廷时常密派近侍购买京外各种报纸作为参考。京城官员如那琴轩相国、陆风石太宰、陈雨苍尚书等，逐日购阅各地出版的报纸，密切注意动向，遇有涉及本署利弊必密委详察，发现揭露和抨击清廷朝政即指令官署查办。

为了遏制报刊的舆论批评，清政府1906年制订《大清印刷物专律》之后，于1908年又参照日本的《新闻纸条例》修改《专律》，制定了《大清报律》，对报纸的创刊、文字、印刷、发行等违反报律的罚款、治罪等等作了规定。特别是报纸发行前必须送当地官署审查。官署在审查时，发现有不利清廷的新闻或言论，可以扣押、禁止其出版，或停止邮递。这无异于随时可以扼杀报纸的出版发行，更谈不到还有正常的新闻言论自由。因而引起全国许多报刊的强烈不满，凡遇到受阻遭禁时，互相起来声援，共同对抗清廷的残酷扼制。自1906年10月之后一个时期内，《申报》发表有关报律的评论、文章多达三十多篇。尤其是当清政府完善的报律一时制订不出来，巡警部迫不及待地先行颁布《报章应守规则》，有不得诋毁宫廷、妄议朝政等等九条时，《申报》在刊登这个规则之后加了一个按语，指出：“九条”中除妨害治安、败坏风俗、泄露机密及报道失实应予更正，为报馆应当遵守的外，其余与立宪国家的言论自由大相刺谬。接着依据立宪的原理，对所谓“诋毁宫廷”发表评论^②；指责这实际上与民间新闻舆论“均有献议之权”相违背。如以宫廷之事记载论例，而加以诋毁之名，岂非穆勒所

^① 《论今日宜痛改专制之政》，1906年12月25日《申报》。

^② 《论警部颁发应禁报律》，1906年10月14日《申报》。

谓无对不诤，而以至诚之上帝自居乎？至于无对不诤而以上帝自居，其反背乎预备立宪之原理？

又所谓“妄议朝政”。按此条禁例，无非是制国大臣的态度，而不知报馆事业与政治有至大之关系。现观记者职业观察国事于其方针及行动，得表明其反对与赞成之意，发挥舆论，评议国是而后已。“报馆岂政府之臣属，而可以禁之而不可议政耶？且安知在上之所以斥为妄者，非即国人所认为正确之理乎！又安知今日所斥为妄者，非即他时之日为恰当之论乎！”

所谓“庇护犯人”。按此条尤为含混，如以为刑事犯耶，则全国报馆或有无耻者虱于其间，亦断无对罪犯甘心庇护之理。如政治犯耶，则政治犯因公获罪，大半为贤者之过，故逃往国外，外国皆有保护之例。他国对于政治犯且情以保护之，而吾同业恐其牵连反袖手而冷视之，世间有乎公道之论乎。

黄协坝主持报纸期间，他为了有朝一日能得到慈禧和皇上的一个官位，把自己这个总主笔看成是皇上的“臣属”，因而经常以“恭读××日谕旨于后”，为慈禧太后歌功颂德，为执行西太后的谕旨而批康批梁。而这次报纸评论提出“报馆岂政府之臣属，而可以禁之而不可议政耶”的观点，这是主笔们摆脱臣属地位的反映。在这时的主笔们看来，官报主笔为朝廷所派，完全为朝廷的喜好和政治需要服务，也许就是皇上的臣属。而作为一张民间报纸，主笔们既不受政府派遣，也不吃朝廷的皇粮，这就不是皇上的臣属了。这是《申报》在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影响下办报思想的一次升华。清政府查禁革命报刊，曾欲置章太炎、邹容于死地，制造《苏报》案时，江督端方致电赵凤昌，要求他运动《申报》，为《苏报》诸人摆脱租界审理，或引渡清政府，直接归清廷治罪制造舆论。《申报》并没有受命照办，而且还对章太炎为自己无罪进行辩护作客观报道。

这个时期报纸多次评论中，对于评议朝政或有言行失误者，

则主张加以同情和保护，反对治罪，则是对查禁报纸、制造冤狱的声援。当1908年清政府颁布《大清报律》时，《申报》认为对报纸的压制更为苛刻，斥之为是“剥夺言论自由的官符”。这许多在报纸上一系列的评论，实际上是作为革命派同盟军地位，从另一方面向清政府发动的一次勇猛的舆论冲击。

改革之后的不少评论出于刘师培、王钟麒之手。引起了江督端方的注意，他向报馆施加压力，言下之意不能继续让他们两人放肆地发表反清排满的言论。为了保全报纸，金剑华又不得不劝说刘师培、王钟麒讲求策略。未久，两人自动离报馆而去。

五、辛亥革命风暴到来前后

报纸产权转归国人

清廷的势力范围难于完全涉及租界，报律也难于全面推行到租界，其主要原因是租界不少报纸为外人所办。据《申报》京城访员所了解的民法两部向清政府联合奏折透露：租界“开报馆者洋店居十之六七，即一二自办者，亦有洋人支持其间”。这是清廷历来心腹之患，尤其是上海这个地方，报纸特别多，洋人势力大。为此，江督在1908年9月底提出在上海推行报律时，要《申报》、《新闻报》等报馆辞退外国人的股份，未经辞尽的要呈明注册，以后新办报纸不应再招外股，否则要以禁止上海地区之外邮递等办法处置。这时，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已广泛兴起，人民的反清情绪不断高涨。《申报》主笔们从报道各地发生的要求从外国人手中收回矿山、路权的斗争中得到启发，美查股份有限公司虽然只顾获利，董事长对中国的政情隔膜，一般不干预中国秀才的笔政，但主笔们感到报纸毕竟是舆论机关，几十年实践证明，《申报》已经不是单纯的商办报纸。清政府江督企图将报律推行到租界，辞退报纸外股的意图，在客观上促进了主笔们主张收买报纸外股，完全由中国人自己来经营的思想。

当时，《申报》的中国经理（当时的职务称为会计，实际工作是主持经营）是席子佩，他是青浦县人，在《申报》担任经营会计已有多数。原来担任报馆经营的是他的兄弟席子眉。1897年12月席子眉病故，经营会计的工作由席子佩继任。当江督提出《申报》应

辞退外股之后，总主笔金剑华和主笔雷瑯等乘机促进席子佩与英国大班阿柏舒谈判。《申报》改组为股份公司之后，产权实际上全为洋人所有，因之，不是辞退外股，而是以买卖方式转交给中方的问题。在商谈中，阿柏舒感到几年的政治风浪中报馆动荡不安，获利已不如他经营的江苏药水厂等企业，于是他在公司董事会上提出不如将股权出售，去经营其他企业，得到了董事们的赞成。几经商谈，决定以7.5万元的代价出售与席子佩。自1909年5月起，外人经营达37年之久《申报》产权终于归国人所有。但席子佩仍聘早年在报馆的翻译毕礼纳为洋经理，以便应付对外交涉的事务，而且名义上仍挂上“洋旗”。这之后，金剑华、雷瑯离开了报馆，报纸总笔政由1905年改革时从日本留学考察回国进报馆的张默接任。产权的转归国人所有是《申报》历史上一个重大转折。

1910年我国成立了报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组织《报界俱进会》，《申报》列为会员之一。而《新闻报》当时还为外国人所办，未能列为会员。

当清政府感到自己统治已摇摇欲坠，再也经不起报纸的揭露和舆论抨击的时候，除借报律查禁压制报刊之外，对自己势力范围难于涉及的地区还采取了金钱渗透和收买办法来达到控制，上海正是清政府施用这一手段的重要地区。1908年8月间，外务部指使上海道蔡乃煌收买了汪康年的《中外日报》。蔡乃煌乘席子佩从美查公司手中收归产权之机，与席子佩谈判，要求以个人名义参股。席子佩才经营半年，已感财力不济，同意以一半的股份让与蔡乃煌，实行官商合办。席子佩看到蔡乃煌收买《中外日报》之后，派上海道官员沈仲赫等进报馆监督，引起编辑部不少人员不满而纷纷离去。因此，席子佩不同意蔡乃煌干预笔政，只同意派一个会计襄理报馆经营。

1910年3、4月间，上海发生了一场涉及蔡乃煌的金融风波。由于股票市场受到麦边洋行的操纵，影响橡皮股票狂跌，波及到

正元、谦余等几十家钱庄倒闭。官廷指责蔡乃煌挪用开浚黄浦江的公款购买橡皮股票，并说蔡乃煌名义上奉借洋债、转票救市，实际上是假公济私、投机谋利。蔡乃煌受到两江总督宣谕参劾，被清廷革去了上海道职务。蔡乃煌遭此打击，将《申报》的股权也就退出。报纸仍由席子佩独资经营。前后为时不过半年，官廷控制《申报》的图谋终于未能实现。

1911年8月间，报纸进行了1905年以来的又一次改革，声称：“本报素以详尽取胜者也，然近时人心每喜简便。夫就简便则不能详尽，就详尽则不能简便，两者不可兼得者也。今本报改革之本意，则欲并两者而兼之。”^①席子佩聘请张叔通，协助张默撰写评论，以改进和加强评论。文章强调生动活泼，短小精悍。新闻报道强调开门见山，一目了然，并在北京等城市聘请特别访员以广见闻。

1911年8月24日《申报》综合性副刊《自由谈》创刊。席子佩聘请了自己的青浦同乡王钝根出任编辑。在编辑方针上《自由谈》特别强调报纸要“丰富多彩、饶有趣味”。“纪载必有趣味，方能入目而不倦。近日报纸所载，非刀兵之惨祸，即水旱之荒灾，只益悲辛，何有趣味。”所以，当时《自由谈》的内容偏重趣味性，文字带有消遣性，版面设有游戏文章、海外奇谈、岂有此理、博君一粲等栏目。也有不少文章有倾向性，多为揭露社会黑暗、抨击和讽刺清廷的腐败没落、官场舞弊和丑闻。

王钝根早年在青浦家乡创办《自治旬刊》，1910年又主编中国商会的《研究月刊》。他主编的《自由谈》把文艺写作形式引进报纸，开创了报纸定期的运用文艺形式综合性副刊的先例。他在编辑副刊期间集结了一批作者，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礼拜天”

^① 《本报改革要言》，1911年8月24日《申报》。

派的成员。

举袁是“以暴易暴”，会使革命夭折

席子佩经营《申报》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的浪潮已汹涌中国南方大地，一场革命风暴即将爆发。如何对待这场政治风暴，是摆在主笔们面前的当务之急。几年来，报纸对于革命进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如徐锡麟在安徽刺杀巡抚恩铭，绍兴秋瑾受徐锡麟株连英勇就义等等，都作了报道。对于秋瑾就义，报纸还揭露官署为了迫害秋瑾而假造供词，刊登秋瑾生前呕心沥血为办《中国女报》的演说和满怀革命志向激昂慷慨的遗诗。这些事件本来就是革命高潮到来的象征。然而主笔们并没有把它与革命运动的发展相联系。他们虽然看到清皇朝的专制统治再也继续不下去，但对必须推翻这个统治、由谁来推翻这个统治的问题认识不足。他们否定革命政党的作用，对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革命党的兴起估计不足，报道中误传较多，时有前后矛盾的现象，偶尔，还出现前任总主笔黄协坝那样把革命党称之为粤匪、乱党之词。这些都是报纸继维新变法后发生的又一个错误，也是这一代主笔秀才思想的局限性。

武昌起义爆发，各地纷纷响应，主笔们看到资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已经积聚到足以推翻清政府的地步，清皇朝覆灭已指日可待，报纸的政治态度迅速地转移到革命这方面来。就在清廷即将倾覆这几天，清政府妄图封锁各地革命起义的消息。1911年10月间民政部伤警厅发出禁令，不准各地报纸传播“鄂省乱事”的消息。但《申报》不顾这个禁令，大量报道武昌起义和各地起义的活动，称赞武昌起义“为革命党举事以来最为成功之事”。10月11日还以半个版的地位，刊登革命军队荷枪荷炮、列队前进的照片，有的照片反映革命军进军途中对人民秋毫无犯，进入上海县城，市内

营业照常、秩序井然的情景。11月17日发表《当今人物评》，称赞孙中山是拯救中华的革命领袖。数十年来专心一致以谋中国革命，以革命言彼固有首创之大功也。武昌起义后，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的孙中山动身回国，途经日本时，曾向爱国华侨志士发表演说。《申报》在11月23日刊登了题为《孙逸仙之言》的演说全文。此文是针对当时社会上的君主立宪思潮，以及对中国的革命尚有怀疑的一些人而发的。

当这个风云骤变的时刻，清政府重新启用了袁世凯，企图通过他挽救朝廷的灭亡，维持支离破碎的残局。袁世凯原来是清末清政府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8年光绪、慈禧相继去世，清朝覆亡已经临近，隆裕太后的清政府鉴于袁世凯的权势日盛，难以驾驭，以他患足疾，不能胜任为由，罢了他的官职，让他回河南老家养病。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时，湖广总督瑞澂弃城逃走，清政府重新启用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世凯见官位不大，借故拖延应命，直至革命军节节进攻，清廷危在旦夕的时候，为了抵御革命军的北上，才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继为内阁总理。这时，袁世凯应命复出，进京晋谒隆裕太后，誓言效忠清室。《申报》评论认为“这是意想之外的时局”。隆裕太后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不惜启用“以前政府视之为野心家”的人。

袁世凯经过一番筹措，组成了自己的军事力量。之后，他一面举兵南下，一边派了刘承恩、蔡春霖到汉口，与各省都督代表组成的黎元洪军政府谈判，请求议和。《申报》报道袁世凯致黎元洪的信中，开列了实行立宪、资政院内满人不操纵大权、革命士兵和革命领袖一律“赦罪”等企图保留清廷的四条。在当时革命处于高涨的情况下，军政府不同意袁世凯的条件。黎元洪阅后把信丢在地上，对前来谈判的代表大笑说：答复袁世凯：俟我军直抵北京后与公议和未迟。依据当时的情势，清廷的统治已经难以继。可是革命阵营中如黄兴等一部分人对袁世凯抱有幻想，他们

认为袁世凯如能率部反戈一击，取河南、河北，可不失为都督，将来民国成立选举总统时或能当选。《申报》主笔们对袁世凯的过去深有所知，对革命阵营中的上述说法表示不满，以袁世凯的《八大罪恶》为题发表文章^①，对他在历次政治风云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两面三刀的用心进行了尽情的揭露。

在一些评论中，《申报》对袁世凯醉心于帝制的根源揭露尤为深刻，认为袁世凯非没有什么民主精神，即使是君主立宪，“亦不可因时势所趋而粉饰以瞞一时之人心”，其实他的真实意图是以非实行专制不可。其所以有此，是他出身系累代官家之后，从小种下专制之根。入世以后，又在宦官之途受专制之毒，蟠固既深，不能铲拔。报纸说：“清廷之立宪是伪立宪，若袁世凯得志，则伪立宪而真专制矣！”所以，袁世凯“自始至终，不过一反复小人，若民国举为总统，则是以暴易暴”，换汤不换药^②。《申报》在这篇评论文章的最后，还希望革命派的领袖“尚祈熟察”。可是，同盟会因内部政见分歧，组织趋于分崩瓦解之中，革命派各集团各派系亦矛盾重重，议和妥协已不可逆转。《申报》主笔们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的建议不可能被接纳。

袁世凯见清政府的谈判代表和议未成而返，决定向革命军施加压力。他亲自奔赴湖北孝感，督调清军冯国璋部向已为革命军解放的汉阳发起猛攻，11月27日汉阳被占领，使革命军的锐气一时受挫。武汉三镇是当时的革命中心，由于袁世凯的反扑可能出现形势的反复，为引起人们的注意，《申报》如实地刊出了汉阳失守的消息。谁知消息发表的当天九时左右，一些血气方刚的青少年来到报馆门前，指责报纸刊登这则消息是造谣惑众。报馆同人婉言解释消息虽译自外报，然今天报馆也收到了武汉记者拍来的新闻电讯，并出示讯稿，说明这是事实，人们才逐渐离去。第二天，

^① 1911年11月25日《申报·自由谈》。

^② 《袁世凯的历史》，1911年11月《申报·自由谈》。

社会上有人散发传单，说这几天袁世凯将派员携巨款来上海，联合雷世译、张菊生、夏粹芳等运动《申报》，为袁世凯主张立宪制造舆论。《申报》“捏造”汉阳失守的消息也是为袁世凯的立宪服务的。对此，《申报》申明，袁世凯派孟庸生到上海运动立宪，这个事实还是《申报》揭露，“岂有揭露此阴谋的人，而自身正是受阴谋运动的人”。经报纸连续三天刊登《特别宣言》，并将发自武汉的汉阳失守的电讯稿制成铜板，附登在报上。读者的疑虑和误解才完全消除。对于这次风波，主笔张默（蕴和）一直念念不忘。他在后来《六十年来之申报》的回顾文章中说：“当时仇满民气之激昂，已达极点，又加上报纸之尽力鼓吹，故革命成功得如此之速。《申报》追随各报之后，亦甚努力”。民国前后，上海的报馆大多集中在望平街（今汉口路一带）一带。一当早晨报纸出版，人们纷纷涌向这里贴报栏，争相阅读，人们把这里的新闻传播称之为“共和声”。《申报》在辛亥革命之初，对革命的态度不够明显，觉悟是迟了一些，这对这次风波中读者之所以产生疑虑也有影响。但当革命到来之际，报纸还是积极支持革命。尤其在揭露袁世凯妄想保持和复辟帝制的图谋，指出举袁是“以暴易暴”是有远见的。五六年之后，袁世凯果然称帝复辟，经过蔡锷讨袁，他的皇帝梦才未能做得下去。

中华民国诞生，1912年元旦的《申报》以显著地位刊登庆祝标语和祝词。标语字把民国的“国”改写为“囯”，以表示四境之内改“王”为民。在《共和国大总统履任祝词》中说：“共和之幸福永远为吾中华民国纪念之一日也。今何幸以夙持三民主义之孙中山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之选。祝今日大总统履任之典，以为他年我四万万同胞出水火而登任席之左券”。过了几天又发表评论，提出了措置北伐事宜、草定宪法大纲、釐定任官法制、明定教育方针四点《对于新政府之希望》^①。评论最后指出：北虏狡狴，和议难

^① 1912年1月10日《申报》。

成，北伐之师，势不可缓，希望把革命进行到底，决不可把中国的统一大业半途而废。

当南北议和、清帝准备逊位时，袁世凯待机居位。觉醒了的南方军民斗志昂扬，要求革命军挥戈北上，统一全国。当时，南京临时政府也是作此准备的。《申报》转引《字林西报》1月13日的南京专电，孙中山宣言如议和无效，彼将亲率大军北上。21日又报道了临时政府对袁世凯要求的复电，其中有清帝必须退位，临时政府不得设在北京，还有袁世凯非俟列强承认共和政府及民国建设完全之后，不得预问共和临时政府政务的条件。然而，后来的局势的发展，并没有实现以上所提的条件。孙中山内受妥协势力包围，外受帝国主义压迫，经济拮据，兵饷难继，自感孤军奋斗，大局难于掌握，被迫对袁世凯作政治上、军事上重大让步。自认为应当功成身退，辞去临时大总统，把职位让给袁世凯，以换得表面上的和平和统一。在这个问题上，《申报》坚持几年中所表示的袁世凯是一个野心家的观点，主张对袁世凯必须保持警惕，防止他采取两面手法乘机居位，取而代之。报纸京城特别访员，从监国（即摄政王载沣）邀集奕劻、载涛等32个皇族成员在邸内举行的秘密会议透露：因贵族们意见纷纷，载沣面诘奕劻，谓值此时局危迫，诸皇帝皆有与时局共存之关系，现袁世凯承认召集国会，公决改政体，已暗向民军默认民主之意。然袁世凯系公力保，此实袁世凯误事之咎。且彼对民军要求并不辩驳，而将此项难题，命我们自为酌夺，其用心之险恶已可概见。袁世凯口中保皇室，腹内阴助民党，外迫内援，势与篡夺无异^①。这是报纸从清皇族这一方面暴露了袁世凯妄图篡权的用心。正当清帝尚未正式宣布退位，革命军扬言将要北进，“以言议和，则迁延复迁延；以言停战，则展期复展期之际”，《申报》更明确地指出：袁世凯

^① 《满洲贵族反对和局之秘密会议》，1912年1月农历十一月初八。

“一方面貌托维持清帝之尊荣，以为得位乘时之计；一方面则借恫吓清廷之微功，以为要挟民军之代价。观大势之所极，定一身之趋向，沉机应变亦有年矣！”^①

孙中山为对袁世凯有所制约，曾提过定都南京的条件。而袁世凯主张舍南就北，各执一词。《申报》发表过定都武昌的建议，认为鄂乃为天下之中心，由京汉以控制朔北，由粤汉以驾馭两粤，西接巴蜀，东连江淮，轮轨交通，水陆便利，是建都的好地方。^②（后来上海日报公会曾有建在北京的提议）袁世凯不愿脱离老巢，坚持要把京都设在北京。他曾电复孙中山，一面说孙的意见“极为正确”，而实际是“舍北就南，则有无穷窒碍”。如果实在非要他任职的话，惟有南京政府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后，“世凯立即退归田里，为共和之国民”^③。对于袁世凯这种虚伪而可笑的表现，《申报》如实报道，公之于众。副刊《自由谈》编辑王钝根还以《俗谚考证》为题，借题讽谕袁世凯是“老鼠跳在秤盘里，自称自卖”。

正当南京临时政府孙大总统致电上海伍廷芳及各报馆，公布清帝退位，临时大总统即日辞职之时，《申报》驻南京访员于2月7日进见孙总统。孙总统对访员说：“一俟袁世凯宣布共和，即将辞任，且将呈南京政府参议选举袁为总统”。以上消息发表后，舆论哗然，工商学界中许多人不相信这是事实。在申报馆门前，又发生了如同当年刊登汉阳失守的消息那样，人们纷纷前来责问《申报》。认为如此报道，等于承认袁世凯窃位的合法性，更有人认为这无异是引狼入室，毁了新生的民主共和国。对此，报馆只好进行解释，说明这件事情“非本报臆造，也不是本报所鼓吹。孙总统之所以宣言让位，无非是渴望共和之成立，南北之联合耳！”^④

① 《北方军队将领联名电请清帝退位感言》，1912年1月31日《申报》。

② 《新都杂评》，1912年2月12日《申报》。

③ 《袁世凯复孙总统电》，1912年2月21日《申报》。

④ 《答读者诘问》，1912年2月8日《申报》。

可是，还有许多读者仍然难于理解这一事件的内因和实质。有一些人甚至以“漫骂之词，罗织之语”写信怪罪报纸。《申报》主笔只得回复这些读者：“如君不以举袁为然，不妨电话孙总统何以倡此说？”孙中山之举袁，是迫于时局发展的压力，正是他自己所说的“不能不委曲以从众议”。过了若干年之后，孙中山承认这“是一次巨大的政治错误”。可是，在当时工商学界中的不少人，并不能了解或理解时局发展的曲折和反复，他们的不满通过报纸所遇到的风波反映了出来。

这个时期的《申报》，明显的站在拥护孙中山临时政府的立场，大量报道新生的民主共和国。在言论上，虽然没有清末时期那样长篇大论，但却以短小精悍的时评、清谈以及《自由谈》上的杂文，热情赞扬革命成功，评论当时的时弊。除了对于袁世凯的种种阴谋活动进行深刻而激烈的抨击外，对杨度等鼓吹君主立宪的活动也进行了揭露和批评。这个时期对报纸的约束很少，也能使《申报》对议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辞任、举袁、关于清帝退位后优待皇室、定都以及制订和后来又取消新闻法等等时局进展和急剧变化都作如实的客观公正的报道。从这许多报道中可以看到，当清朝统治被推翻，广大人民对新生的中华民国怀着希望，心想从此可以摆脱贫穷落后，走上安定富强的道路。但美好的期望不但未能实现，而且后来的结果与愿望相差甚远。正如《申报》评论中所说的：“吾人仰望之中山，而事后追思事前之希望，果相侔乎？抑不相侔乎？此又足以系今日之怀思而惹全国之注目矣！”^①报道和评论反映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是最早见诸于当时报章，对辛亥革命成功与失误的评论。

① 1912年9月9日《申报》。

六、报业发展的新时期

史量才接办《申报》

1912年秋，辛亥革命风雷激荡，南北之间矛盾出现，正需要报纸更好地发挥新闻舆论作用的时候，席子佩因经营不善，资金周转发生困难。自一度渗入的官股抽走之后，经济陷入困境。在难以为继的状况之下，席子佩决定将《申报》资产转让他人。是年十月，史量才开始参与了接办《申报》。但是，这张由英国人出钱、中国秀才主持笔政、在清朝发行了40年的报纸，完全转到史量才的手里，还是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

史量才，字家修，1880年出生于江苏江宁扬板桥一个商人家庭。7岁那年，史量才父亲离开家乡到松江泗泾开设史泰和堂中药店，史量才亦随父迁居到泗泾读书，学业优秀。光绪二十五年（1898年）松江乡试，史量才一举中了秀才。因史量才原籍江宁，按当时规定非本地人不可易地投考，故被冒籍论处降为附生。史量才愤而抛弃科举，与松江雷奋（继兴）等学习钻研理化应用科学。1901年秋考入当时称之为杭州四大书院的蚕桑学馆，毕业后到上海创办女子蚕桑学堂。后又在苏州等地创办蚕桑事业。在维新运动影响下，1904年狄楚青创办《时报》，聘雷继兴、陈景韩（冷）为主笔，史量才亦被邀当编辑。狄楚青为了让报馆同人和外界朋友有一个议事的地方，专门辟出一个房间，取名为“息楼”，除报馆同人，常有教育界、金融界及同盟会人士来作客，共同议论国事、科学、教育、商业经济等等，史量才是当时积极参与者，这也为他

后来从事新闻事业奠定了基础。史量才受到清末维新运动的影响，在西方科学文化的启蒙下，对资产阶级的民主科学有所向往，他在“息楼”的谈论中，认为救国救民之道，除了政治清明、兴办实业外，在于兴教育、办报纸，把“启迪民众”作为报纸的重要任务。

清末这几年，史量才开始与一些民族资本家接触交往，加入他们兴办实业、参与政事的活动。为抵制清廷借英款修筑苏浙铁路，与汤振先、张謇、王丹揆等提倡民间集资自筹办铁路。史是奔走最力者之一。后来商办铁路公司成立，被选为董事。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史量才参加江苏方面的革命活动，经常与程雪楼、张謇、应季中、张元济等商讨参与革命的对策。武昌起义前后，各省的代表人物汇集上海，开会地点就在后来《申报》的大股东之一赵凤昌（竹君）南阳路住宅“惜阴堂”，史量才是“惜阴堂”的常客之一。张謇是一个实业家，又是清末立宪派的首领，1909年时曾是江苏咨议局的议长。辛亥革命发生，南北议和，双方代表秘密接触或公开谈判在上海进行，张謇也参与其事。在他撮合下，唐绍仪和黄兴共同约定了一个条件，只要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就可以推奉他为共和国的第一任大总统。当南北双方约定之后，张謇立即发了一个密电给袁世凯，告诉他：“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望他“奋起英略，旦夕间勘定大局”。据此，张謇后来得到了袁世凯的赏识，1912年2月间北京政府成立时张謇获得了实业卿的官位（孙中山临时政府成立时，张也被任命为实业部总长）。1913年又改任农工商兼水利局总裁。但是张謇在北京时并不感到满意，北京政府对他并不重用。同时亲眼看到袁世凯的独断专行，排斥异己，甚至不惜采取阴险手段实现他称帝的野心。为了不被卷入矛盾起见，从亲袁变为疏袁，悄然离开北京回到上海。一时闲着无事，经常与赵凤昌等议论时局和报纸舆论，张謇与程德全组织统一党，政治斗争需要运用报纸的舆论。就在这时他得知席子佩将要转让《申报》产权，正中他

意，于是筹措资金，物色人才，组织班底。他感到《申报》是一张历史悠久的报纸，本人不会办报，必须物色一个既能办报又懂经营的人才。起先张打算请江苏都督的顾问章士铤（行严），出来主持并担任总主笔，但章不愿意和他们合作，张才约请史量才。史量才在辛亥革命之前就与张謇、赵凤昌等有交往。对张謇到袁世凯那里做官并不赞同。但看到他现在既然已经离开北京政府，而且为了对付政治集团和社会势力的干涉，感到张謇、赵凤昌等有资本又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于是他欣然同意筹组接办《申报》。当时的合作者除张謇外，还有赵凤昌、应季中、陈景韩三人。由于史量才当时还没有经办实业，他与陈景韩两个都是文人，无资金可以合股，只得采取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的办法，由张、赵、应三人共出资12万元，于1912年9月3日与席子佩签约，购得申报馆产权，史任总经理，主持经营。史量才还以重金聘请在《时报》任职的陈景韩为总主笔，原在报馆的张蕴和仍为主笔。席子佩还留任为经理。至1913年冬席子佩离开，由张竹平续任经理。为避免军阀的无理干涉，当时名义上仍托名外商所有，报馆门口一度挂过德国旗。

正当史量才兢兢业业筹划振兴报业之际，其时欧战已经爆发，席子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突然向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控告，其意思是1912年10月转让的只是申报馆产权，而报纸还有版权，因之，整个售价太低，失算较多；而且报馆未能按约付款，又拖欠席子佩一笔款子未有归还。结果租界公廨偏袒席子佩一方，申报馆败诉，判决赔偿席子佩25万5千两银子。这时，张、赵、应均因政治上郁郁不得志，心灰意懒，无意再合作经办报纸，更不愿意出这笔钱。同时史量才与张謇政治观点上的不尽一致也逐渐暴露出来，张謇立宪派观点和统一党主张与史量才的反对帝制、无党无偏的观点时有矛盾。因之，张、赵、应三人相继脱离，这场与席子佩的债权官司只得由总经理史量才一人来承担。主笔张

默在后来《六十年来之申报》的回顾中，称这一事件是“意外之诉讼案，天外飞来之奇祸”。这在当时尚无足够财力的史量才来说压力十分沉重，几欲抛弃三年来的苦心草创，从此不干。后来觉得弃之可惜，任何事情总是开头难，决心把报纸办下去。财力上得到上海工商界巨头徐静仁的支持。1912年1月间徐静仁在两淮盐政局任职，史量才主持过松江盐局，与徐相识。后来，徐到上海经营纺织业，任傅益纱厂总经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进口货减少，中国的纺织工业得到发展，傅益纱厂营业大增，徐静仁成为上海一大实业家。《申报》偿还席子佩的赔款，由徐静仁担保分期付款给，一场诉讼官司才算了结。

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北京建立军阀政权后，对民国后发展起来的新闻事业采取了既摧残压制、又重金收买的两手政策。1914年4月和12月先后颁布了《报纸条例》和《出版法》，规定所有报刊出版后必须送一份到当地警察机关备案，规定不准登载“妨害政体”的新闻和言论。袁政府对所谓“危害政体”的报纸发行人和编辑记者进行迫害，至1916年6月全国有二十多个新闻记者遭暗杀，好多家报纸被封。另一方面，袁世凯以巨额金钱收买报纸，为实行他的专制统治，做皇帝制造舆论。在北洋军阀的威慑高压之下，一些原来宣扬民主的报刊有的难以生存，或因政见分歧矛盾激化而自行解体，有的屈服于军阀的压力之下而随波逐流。

上海是全国的大商埠，东南沿海的政治文化中心，又是历年来革命派活动的重要基地，这里的新闻舆论，向全国传播，对局势变化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袁世凯称帝心切，他想借上海的报纸为他鼓吹。1915年8月间，派北京《亚细亚报》总经理薛大可到上海，收买报纸。薛大可是一个仰人鼻息、依附帝制的御用记者。他在袁世凯面前把自己称之为“臣记者”，给袁世凯写的报告称为“呈文”。他的这副奴才相在全国新闻界传为笑柄。薛大可到上海

后，在报馆集中的望平街设立《亚细亚报》上海版分社，明确地宣称以“赞助帝制为宗旨”。但由于不得人心，连连受到炸弹的袭击，宣传上也收效甚微。于是在收买了《大共日报》、《时事新报》之后，还想收买历史悠久的《申报》。当时《申报》已发行到一万多份，有全国影响，如能作为袁政府的传声筒，实行帝制的影响就会扩大，这是求之不得的。为此，薛大可通通过申报馆担任秘书工作的赵凤昌的儿子赵叔雍求见史量才。薛大可告诉史量才：只要《申报》归附袁世凯，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要做什么官就做什么官，一切都可以照办。史量才听了十分气愤，严词拒绝，还把薛大可痛骂一顿，薛大可只得灰溜溜地离去。这件事还未明朗之时，读者怕《申报》被收买成功，放心不下，写信给报馆要求了解真情。《申报》于9月2日启事中说：本馆同仁，自民国二年十二月接办后，以至今日，所有股东，营业盈余外，办事人员及主笔等除薪水、分红外，从未受过他种机关或个人分文津贴、分文运动。此次来人，为必终守此志。4日又刊登一则声明反对筹安会变更国体的启事：“本报宗旨，以维持多数人当时的切实幸福为主。不事理论，不尚新奇，故每遇一事发生，必察真正人民之利害。秉良心以立论，始终如一。虽少数激烈之谈，亦无反复之调”。

所谓“筹安会”是袁世凯的一些爪牙策划的，以伪装民意，变更国体，拥戴袁世凯做皇帝。梁启超深刻而尖锐地揭露这个“筹安会”的图谋，在《大中华杂志》(月刊)发表了《异者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事前，袁世凯从密探那里得知梁启超写了这篇文章，曾贿以二十万元，要求他不在报刊上发表，为梁启超所拒绝。《申报》发行量大，又是日报，为扩大影响，于九月中旬予以全文连载，报纸还推荐说：“当此国体问题纷扰之际，有心国事者，不能不读其文，俾恍然于今日之中国，因不起无谓之纷争，以自趋于灭亡。”^①自此之后，报纸连续发表反对筹安会、抨击复辟帝制时

^① 《介绍大中华杂志》，1915年9月15日《申报》。

评，杂评达79篇。

经过了北京政府御用机构参议院宣布所谓“国民之公意”，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和薛大可每天把伪造的《顺天时报》给袁世凯看，以说明全国“确实”都在推戴他做皇帝。于是袁世凯终于决定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申报》指出：这是“凡前此君主时代所有者，今特皆力搜索，以铺张其旧店，重开门面”^①。

不顾人民和舆论的反对，袁世凯一意孤行，于1916年1月1日粉墨登场，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通令全国各报馆照登这个年号。

《申报》接到通告后，史量才与上海日报公会的各报代表们共商对策。代表们感到上海报纸虽有租界庇护，可少受袁政府的直接干涉。但考虑袁世凯这个窃国大盗，阴险毒辣，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时事新报》因后来改弦更张，力持公论，拥护共和，反对帝制，被袁政府下令取消邮递挂号，以致不能在外埠销售，营业上受到很大打击。因之，日报公会一致决议，报头下仍表以公历纪年，再在公历纪年下面另用活体字排上“洪宪元年”四个字。《申报》按照决议办理，还把“洪宪元年”刻得特别小。至3月15日将“洪宪元年”四个字中“宪”字故意漏刻，后来又把四个字刻得或印得模糊不清。袁世凯在四面楚歌声中被迫于3月27日宣布撤销帝制，报纸的报头年号也就恢复了中华民国五年的纪年。

在反动统治之下，作为一张民间报纸，如果要坚持办下去，求生存是第一位的，如果不能生存，就从根本上丧失了新闻舆论阵地，不要说激烈的舆论，没有刊登的余地，即使温和的言谈也无法见之报纸。因之，适度的妥协，讲究策略，成为民办报纸求生存的一种策略和哲理。但这又不以放弃大原则为前提。在反对袁世凯称帝中，《申报》就是按照这一哲理行事。这也可以说是

^① 张默：《帝制新历》，1915年9月24日《申报》。

史量才接办《申报》后抵制反动统治所取得的一次胜利。

致力于报业现代化

史量才接办《申报》初期，虽然抵制袁世凯的收买，摆脱了政治集团对报纸的影响，但在经济上还处于困难的境地。为了报纸的生存，不仅要偿还债务，而且要力求经营取得盈余，为今后发展创造条件。经过以后几年苦心经营开始出现转机。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来自欧洲的海上运输中断，原来印报纸所用的瑞典、加拿大卷筒纸不能运来中国，而日本乘这个机会抢占市场，将卷筒纸源源不断地运来上海，而且价格要比瑞典、加拿大纸低得多。这几年，《申报》发行量逐年增长，纸张的需求也相应增加，在欧洲纸供应中断的情况下也只得使用日本纸，结果使印刷成本大为减低。纸张来源的变更，成了解困的一个机遇。

经理张竹平兼营业部主任，他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对报业经营素有研究，他看到现代报纸的广告，不仅是商品的媒介，广告费的收入还是报纸报费之外的重要经济来源。为了求得《申报》的发展，他首先对广告经营进行改革。原来广告的征集是坐等客户上门。这在市场经济还不十分发达，工商界不习惯于报纸刊登广告的情况下，广告的来源受到限制。针对这种状况，张竹平在经理部之下，设立了以招揽广告为业务的广告推销科，科内设外勤和广告设计，外勤人员专事外出活动，向中外工商企业宣传广告对于促进商品销售的作用，并说明《申报》读者面广、发行数量大、刊登广告的特殊效力。当时国内还没有专业广告公司，《申报》则聘用了广告设计人员，按照商品的性质与客户的意向和要求，设计引人注目的文字说明和图案。使许多公司、工厂、商店和洋行都乐意在《申报》刊登广告，以扩大自己的商品在市场上的销路。至1915年4月，报纸的广告版面超过了新闻、副刊的版

面，业务收入也随之增加。广告的收入与发行量的增加是相辅相成的，为此，在改革广告业务的同时，张竹平重视报纸的发行。由于《申报》在全国各地有影响，除了发展本埠订户外，设法扩展外埠订户，凡火车、汽车和轮船能当天到达的上海邻近地区，都通过邮局尽量当天送达，使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读者能尽早看到报纸。远的地方，则通过邮局或代办处发展机关、团体、工厂、商店和个人订户。经过几年的努力，发行量不断上升，1914年比1912年增加1倍，1916年总发行达到2万份。纸张成本降低，报纸发行和广告收入增加，使报纸盈利增加。起初，一年的盈利一二万元，以后每年盈利10万元以上，最多的一年达到30万元。盈利的增加，史量才不仅偿还了赔席子佩的款，而且把原来张睿、赵凤昌和应季中所投的资金也如数还清，《申报》完全成为史量才一人独资经营。这为他后来发展成为一个有实力的报业资本家奠定了经济基础。

至民国初年，《申报》发行已有四十多年，而且已是全国性的一张大报，但馆址一直在汉口路礼拜堂对面一幢两层楼房里，设备简陋，场地狭小，编辑记者及其他工作人员都挤在几个房间里，难于施展。清末期间主笔们请钱塘吴鞠谭写的“尊闻阁”匾额仍挂在会议室里，几十年来报社简陋的房屋设施没有得到改善。随着报纸面目的更新，业务的扩展，旧屋已不适应使用，便迁到望平街一幢三层楼房里，可是仍不应用。限于房屋场地，印刷条件也难以改善。当盈利增加之后，史量才从长远考虑，决心筹款建屋。他请了上海第一流的建筑师，设计了一幢五层楼大厦，在汉口路山东路口的一块土地上动工兴建，花了70余万两银子，终于在1918年建成，十月迁入新居。大楼按报纸工作流程设计建造，是一座编辑业务、营业广告和排字浇铸、照相制版、机器印刷以及生活卫生设施一应俱全的现代化新闻大厦，底层还有印刷厂。这在当时的上海以至全国新闻界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直至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申报》停刊,大楼为人民接管,《解放日报》在这里出版,一直沿用了几十年。

要办现代化的报纸,还要有现代化的传播工具。报馆初创时的印刷设备,最初是手摇机,每小时仅印几百张,只能单面印刷。后来改用大英架单滚筒机,用活字版,每小时也只能印一千份。在席子佩经营时期发行量没有超过七千份,还能勉强应付。当史量才接办,发行量迅速上升,每份报纸的版面扩大增加到三大张,旧机器已无法再用,改用美国双滚筒印刷机,每小时印2000张。1914年欧战爆发,发行量又直线上升,美国双滚筒式机器也不再适应。而且一张向全国发行的报纸,必须讲求新闻的时效性。为了等待本市和外地发来的最后消息,截稿时间不能过早,但又要在截稿后拂晓前这一段时间内争取印完,赶上早班的火车、长途汽车或轮船发往外地,这就非有高速度印报机不可。史量才不惜高价,于1918年向美国购置了最新式的何氏32卷筒轮转机。把它装置在新大楼的底层。这种印报机,分上下三层,同时可以印48页,两旁出报,并附有切纸机、折叠机,每小时可印4.8万份。这样,报纸在增加到5万份时,也可以应付自如了。至于其他如铸字、铅版,制作铜版、锌版的设备也一一加以更新。1921年1月起,报纸文字编排开始采用标点符号、新闻采用逗点,评论用句点,《自由谈》等副刊文字用双句点。这样的标点符号虽然还比较简单,可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中国有近代报纸以来文字编排上的一次革新。从此读者可以顺畅地阅读报纸上的文字,大大提高了报纸的使用价值。这时,《申报》已成为全国报界设备新型完善、印刷精良、版面清晰的一张报纸,在报业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史量才从国内外新闻界人士接触中,了解到现代报业的趋势是重视报纸的新闻传播,强调报纸首先是新闻纸,如果报纸新闻贫乏,就丧失了报纸的生命。他看到民国后时局的变化很快,只

有迅速、翔实的新闻报道才能跟得上时局的变化和发展,赢得更多的读者。民国后上海出版的报纸多达数十种,报馆大多设在靠近外滩的望平街一带,一当出版的时间,人们纷纷涌向望平街的贴报栏,争相阅读最新消息,这里曾经有“共和声”之美称。随着时局的变化,后来这种盛况少了一些。但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人们希望从报纸获知消息的渴望有增无减。当时的政党色彩的政论报纸趋向衰落,有的读者对一些政党报纸的言论不大相信,宁愿从新闻报道的客观事实中作出自己的判断。为此,要使报纸从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一步,在有了报业大楼、印刷设备的物质基础之后,还得在传播新闻上下功夫。

史量才办报纸经营上的助手是经理张竹平,新闻业务上的重要助手是总主笔陈景韩。陈景韩又名陈冷,1877年生于松江,清末秀才。他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正值《时报》创刊,受聘为主笔。史量才为了办好《申报》,特地以高薪从《时报》把他挖来,曾引起报纸主持人狄楚青的不快。后来史量才同意陈景韩到《申报》后仍关心《时报》的工作,才得到狄楚青的谅解。陈景韩对于办报纸有他独到的见解。到《申报》后,继续发展《时报》时积累起来的新闻观点,主张现代报纸要加强新闻,但对于新闻,他又主张去芜存菁,要短而精。1922年5月2日《申报》刊登的一条只有六个字《溥仪昨剃辮子》的新闻,就是他新闻思想的杰作。他比喻报纸不能像伙食公司橱窗内陈列的生菜那样,而必须由名菜馆供应熟食,并且每日总有几条新闻编写得很出色,如菜馆特别为吃客烧的,味道鲜美,以招徕读者。他主张写新闻要客观,报道要忠实,反对有闻必录,也反对“流水帐式”和起居式的写法。他归纳新闻采访写作:一曰确,二曰速,三曰博。这个新闻“三字经”成为当时《申报》记者编辑的守则,也曾经一时为报界的记者所仿效。随着报纸上新闻大量增加,对评论也进行改革。科举时代半途出家的秀才文人,所写的论说不免带有八股味,维新思潮起来之后,

这样的八股文章渐渐使人乏味。陈景韩看到这一危机,开始在《时报》时就提倡写时评,配合时事,抒发议论,使言论由“论”进入“评”的阶段。他写时评通常是一边写,一边发排,等他写完,版子也就拼出来了。他的言简意赅、尖锐泼辣的文风,在当时的新闻界受到不小影响。他当了《申报》总主笔之后,继续提倡和发扬他时评的特色。由于他又名陈冷,把自己写的评论署名为“冷”或“冷血”。胡适先生曾经是他忠实的读者。

辛亥革命后,随着形势和政局的急剧变化,传播政局的变化成为报纸新闻的一个重点。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清末期间,《申报》起先在北京设有访员。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申报》于1914年聘请黄远生为驻北京记者。黄远生在清时科举中成绩卓著,自19岁之后的三年中,他从秀才、举人,而一跃为进士。他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他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采访深入,而且不少场景自己亲身目击或探视。因此,他的新闻和通讯生动具体,真实可信。他担任驻京记者时,采写了大量政局变化、政治黑暗、军阀腐败和社会弊端的通讯,增强报纸新闻的广度和深度,为我国报界最早把通讯这种新形式大量运用到报纸。黄远生在北京时曾一度被薛大可任命为《亚细亚报》的总撰述,当他发觉这个职务不妥后,离京至沪。1915年9月先后在《申报》连登三个启事,声明反对帝制,辞去袁系报纸的约聘,未久他远去美国,不幸在旧金山上海楼菜馆被刺杀身亡。《申报》失去了这一位驻京记者之后,1916年再聘邵飘萍(振青)为驻京特派员,他每天发沪的新闻电讯和通讯,在数量上比黄远生几乎增加一倍。他的通讯内容丰富,文字生动,每晨一当报纸出版,读者争相购阅,以先睹为快。当时的《新闻报》也重视北京方面的消息,聘张季鸾为驻京特派员,但竞争不过《申报》。这个时期的《申报》,对民国以后政局变化,各政治派别所持的观点和他们之间的争斗,袁世凯、张勋复辟帝制的阴谋、经过,最终导致失败的报道都十分详尽。

“过激主义”在新闻中的渗入

报纸现代化的进展,新闻传播范围的扩大,与国际新闻界的交往接触,使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下的编辑记者们眼界开阔起来,对国际形势和外部世界的了解也日益加深。继中国人民推翻了封建皇朝的统治之后,不过五年,俄国人民也于1917年推翻了沙皇统治。对于未来的世界大势虽然作不出具体的估算,但从史量才等持有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观点出发,认为:“今后世界有两件事可以预料:对内,必日离专制而趋共和;对外必离强权而重公理。”^①尤其苏联十月革命胜利,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青年学生运动的兴起,使《申报》不断受到新思潮的冲击,报道中开始渗入了新内容,“过激主义将传入中国”这样的新闻也在报上出现。起初,这纯粹客观报道,没有进行任何的评说。刊登这类新的政治消息时,编辑们也不免带有某些疑惧心理。随着社会新思潮蓬勃兴起,这类报道增多,当局还来不及责难查究,编辑们的疑惧心理随之消除。

传播苏联十月革命消息的报刊当时为数甚少。而《申报》在1917年11月10日,即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不几天即发表了消息。还刊登了列宁关于政权归苏维埃、土地归农民的著名演说。以往我国近代史,都以为我国报刊第一次报道苏联十月革命消息只是《民国日报》一家。其实传播这一消息的是《申报》与《民国日报》两家报纸。几年后列宁逝世,《申报》发表上海《列宁追悼会记》;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及各区分部、中共上海执行部、社会主义青年团等30余团体的代表。会议主席胡汉民说:列宁不仅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亦为世界被压迫民族奋斗之先锋。其功

^① 时评《俄国革命与战争》,1917年3月18日《申报》。

勋之大，有史以来无人及之。其组织苏维埃政府指导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奋斗之途径，功尤不可没。瞿秋白报告了列宁史略。大会最后高呼列宁万岁^①！第三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共产主义运动波及到东欧和亚洲。《申报》在报道中透露共产主义开始传入中国也有通过在俄华人组织联合会为媒介，说这个联合会当时已有会员六万人，他们鼓吹革命，宣传过激主义^②。又说共产主义革命活动之能够传入中国，并为一些人所接受，其原因之一，是人民疾首痛恨军阀，受压制之民众，怨愤尤深。因之，易受过激主义的影响。1919年4月间，几次报道淞沪警察厅接国务院电，有华人二千多人投入俄境过激党中，有三百多人将回国，“要切实防范”。卢军使（卢永祥）与租界当局研究防止俄国过激党入境办法。22日还报道了驻沪稽查的密报，说有张某、戴某发起组织共产主义社，已开始成立，并附发宣言。当时，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活动都是半公开或在秘密状况下进行，《申报》无法获知确切详尽消息，只能在当局查禁活动中加以透露。《申报》发行量大，报道与透露革命活动的消息，对于倾向进步、暗中摸索、寻求真理和解放的人们来说，无不从中看到希望而受到鼓舞。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申报》于5月6日从北京来电发表了北京学生天安门集会游行，受到军警镇压的消息。8日又报道事件经过详情及北京进步舆论对学生运动的支持。报纸的消息激起了正在筹备召开国民大会的各界人士的义愤，立即提出在次日大会上和通电中增加要求北京政府正确对待学生青年的内容。

在“五·四”运动发生这几天，《申报》接连发表赞扬学生爱国热情、反对北京政府对学生施行高压的评论：“哀莫大于心死。国亡能生存世界与否，全视此人心之死与未死而已。全国人心之死，

^① 1924年3月10日《申报》。

^② 据陈独秀解释，“过激主义”一词，是日本对布尔什维克的译称。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三十一期。

则虽国家庞大之躯壳而终必亡；全国人心尚在，则虽弱无可弱而必兴。今北京学生争青岛，为学界人心未死之表示。各省团体争北京学生被捕事，又为各界人心未死之表示。我国将来救国负担，全赖此一线未死之人心。”^① 评论提出“国人共奋”。“万众一心，尚何国事不可挽救者”。

5月7日，是当年日本政府就“二十一条”向军阀政府下最后通牒的国耻纪念日。上海国民大会在西门外如期召开，参加大会的三千多人，会议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撤销借款，收回青岛，释放北京被捕的学生。《申报》在发表以上消息时，同时刊出了上海出版的《卖国贼章宗祥》一书的广告介绍，指斥他是一个具有奴性的外交家，在处理山东问题上为虎作伥，丧权辱国，久著劣名。15日《申报》联合上海其他报纸不再刊登日商广告，以抵制日货。让永安、先施公司刊登广告，声明向日本企业停止订货，现存日货清点入库，不再出售。外界传说南洋烟草公司为日商投资。《申报》让该公司刊登大字广告，声明公司全部股金均是华人投资，所用烟草制品均为国货并“敬请各界查验”。在报纸宣传鼓动下，北京学生掀起的“五·四”运动已波及工商界，受到上海市民的广泛响应。

当陈独秀、李大钊举起新文化文学革命的旗帜，反对封建主义，传播新思潮之时，北京大学气象一新。《申报》评论赞扬说：北京大学文科在陈独秀学长主持下有生气。“五·四”运动后陈独秀被捕，北京《益世报》被封。《申报》抨击北京制造文字狱。“此次学潮之汹涌，震动全国，而利用黑暗势力，摧毁学术思想自由，为其原因之一。今学潮平静有望，而北京当局又扬煽其波，激之使动，树欲静而风又来，是何诚心耶！”^②

“五·四”运动后，继续报道全国各地学生反帝、反军阀的群

^① 《人心未死》，1919年5月7日《申报》。

^② 《北京文字狱》，1919年6月17日《申报》。

众运动。1920年2月天津学生联合会为抵制日货，公推周恩来、易守康为总指挥，组织五千余人向省署请愿，遭到天津军警镇压，北京一万多学生游行支持天津学生。四月间，报道上海全国学生总会发动反对北京当局屈从于日本提出不平等条约的全国性罢课。

这个时期，《申报》更加重视国际事态的发展。这也由于过去国内对国际事务消息闭塞所受到的教训而引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1月帝国主义国家间举行分赃战果的巴黎和会。中国作为一个参战国，由北京政府派有陆徵祥参加会议，中国代表在和会上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归还山东、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等。4月间，巴黎和会上各帝国主义国家不顾中国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让与日本，而帝国主义间的密谋策划中国人知道很少，其中的内幕未在报上报道或透露，这也就成了后来爆发“五·四”运动的导火线。从这里，《申报》感到“各国的一举一动，无不与我国息息相关。能具有世界之常识，而后可为世界之国民。从世界知识灌输于一般国民，固报纸之天职也”。为此，《申报》加强了国际消息的报道，同时还仿效美国《纽约时报》的《星期日特刊》，于1919年8月31日，出版《星期增刊》。内容主要是专译世界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工商、学术等方面的新闻和文章，及一周间国内外大事。增刊主编为项远邨和康通一，他们两个是国际问题的专家。他们除翻译外稿外经常把国际上发生的最重要事件、事态和新知识，写成文章在增刊上发表。1921年后，又先后在伦敦、华盛顿、巴黎、日内瓦、罗马、柏林和东京派设了特约记者和通讯员。报纸的发行也扩大到世界各国的一些主要城市。报社还派出记者参加日内瓦国际联盟首次会议和华盛顿会议，刊出了记者少屏的华盛顿通讯，王光祈的德国特约通讯，以及欧洲各国经济现状的报道数十篇。从中国看世界，这对普及和增长人们的国际知识，让读者关心中国与国际间的关系起了促

进作用。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共产党人的活动，《申报》也多次报道。1921年4月15日陈独秀应邀在武昌文华大学发表演说，提出将来实行社会主义的四项主张。报道说，陈独秀的演说大受听众欢迎，但“官厅大骇”，本来继续在汉口举行的演讲会被取消。7月间中共成立期间，陈独秀在广东。《申报》报道了他在广东的活动。广东省的一些议员把陈独秀视为“异端”，害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议要把陈独秀驱逐出境，后来得到陈炯明的维护，才遭罢议^①。一些议员们又不敢同陈独秀当面评论，而是躲在背后造谣惑众，说什么陈独秀主张“仇孝、讨父、公妻”等等。对此，陈独秀写了一篇文章进行批驳，刊登在《民国日报》上。但仍有一二家报章刊载种种无稽之言。10月22日《申报》为陈独秀刊登《启事》，陈独秀对无稽之言进行驳斥外，申明“今后各处倘有印刷物公然传播此项谣言者，即认为有意损害鄙人名誉，立即诉诸法庭，以儆邪僻”。

随着学生运动的开展，工人组织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工人运动兴起。报纸报道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并成为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次年刊登了召开全国劳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庆祝劳动节的消息。1922年7月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在上海遭封闭，总部迁至北京。9月7日又发表总部在北京大学礼堂招待两院议员的报道，会上，书记部总务主任邓中夏发表劳动者在社会上应有的地位与权利的演说。报道是一篇发自北京的生动具体的通讯。通讯报道邓中夏的话说：“劳动者在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每日所得甚微，致有饿死道旁者，以言公理，岂得谓乎”。为此，邓中夏提出了劳动者应有集会、结社、出版、言论自由权，同盟罢工权，团体的契约缔结权等八条权利的要求。又有南口工业研究所，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正太铁

^① 1921年3月10日《申报》。

路工业研究所，洛阳、开封工会代表要求工人应得到应有权利的发言。“京汉路及洛阳工会两代表，皆短衣窄袖，而能为痛快淋漓之演说，足见近年工界之进步”。会上有议员支持，认为“工界代表的要求极为正当，应定在宪法上”。议员刘冠三还对来会的议员和记者较少表示不满，他说：“大家对于总统府、国务院请客，纷纷前往，踊跃异常。今日招待劳动界，到者寥寥，平等之何谓，民权之何谓，故鄙人非常悲观，只劝劳动者坚忍下去，想自决之方法”。措辞激烈异常，会上鼓掌声大起。

对于越来越激烈的工潮和劳资之间的矛盾冲突，报纸主张采取照顾双方利益，以互让互惜的态度缓和矛盾。近日工潮激荡，“推其本，类皆阶级利益制横其间”。“在资本家徒利，工资低廉，不知劳动家生计而已；同一商情之困苦，劳动家较资本家尤甚。然资本家只知商战之苦，不暇及劳工生活，日以督促勤作为得计，利其工资之低廉，或能稍稍补商战之损失。不知积压愈深，反动愈力，于是劳工辈互结力日坚，疾视资本家之心乃益烈”。“然平静而论，资本家与劳动家，变相为用，宜取互让之精神，互惜之主义”^①。

当京汉铁路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遭禁止之后，全线工人以总罢工表示抗议，遭到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血腥镇压，杀害了共产党员林祥谦、施洋等五十余人，制造了“二七”惨案。报纸除了详尽报道惨案外，还报道三月间，施洋夫人郭继烈到达上海，抗议军阀镇压工人运动，受到上海各界的支持，报纸刊登《施洋夫人致律师公会函》，责问政府：民国不幸，军阀肆虐，亡夫何罪？

1923年3月间，上海、北京及山东等地人民群众，展开了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及收回旅顺、大连租界地反日游行集会。《申

^① 杂评：《汉上工潮感言》，1923年1月16日《申报》。

报》在3月21日用特大号木刻字体刊出上海对日外交市民大会的口号，声明“今天是旅顺、大连租界期满，按约当由我国收回，望全体国民注意！”。报纸在声势浩大、群情激昂《国民对日游行大会纪实》中，列举大中华纱厂职工救国团的传单，说：列位！日本人残酷无理的要求“二十一条”，民国4年5月7日凌厉无比的最后通牒。列位还记得么？日本趁着欧战方酣和袁世凯想做皇帝的时机，无端向我国提出种种要挟，彼时我朝野人士一致严词拒绝，初诉予巴黎，再拒于华会，举国力争，终不能遏止强暴的侵略。我们今天结队游行，无非是想将我们为正义而斗争的民主，显给扰乱世界和平的日人看看。热心国事的同胞！不甘作亡国奴的同胞！赶忙团结起来，完成我们独立国民人格的精神。

当广大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占掠夺，要求收回被侵占的权利而游行抗议，誓为政府向外进行交涉作后盾的时候，《申报》评论指出：“自以为地位安固，无其他可置念之事。”“而此国家攸关之交涉，更足以倾覆政府而有余，见其小而不见其大，谋其近而不谋其远。政府中人之见识如此。不特国家未见有此政府，即政府亦若未有此政府也。”此篇1923年3月28日题为《无人政府》的时评，当时不少读者议论为一举而击中要害。5月，津浦路发生土匪劫车案时，车上有十多个外国客人被掳为人质，长时间得不到解救。为此，孙中山也曾批评当时的北京政府是形同“无人政府”的。

总主笔陈冷新闻要确、速、博的“三字经”对当时《申报》新闻的正确、快捷和丰富多彩起了积极作用。但就其新闻本义来说，它还必须强调另一个基本要素，这就是新闻要新。在这一点上周瘦鹃作了补充。1920年他应史量才邀请主编《申报·自由谈》。他从研究了西方新闻学和提出改进报纸的新闻。他说：英国新闻界的北岩爵士上次来到上海，我们曾同他交谈和交流经验，他有一句很微妙的话，狗咬人算不得新闻，因为是常有的事，除非人咬狗才称得新闻。这很耐人咀嚼。我们新闻界的同业啊！快各去搜寻些人咬

狗的材料吧！在这种新闻的思想下，《申报》上也时而出现在一些奇闻怪事，使原来的社会新闻更加充实。1920年6月，《申报》曾连续报道毕业于震旦大学、担任过法语翻译的阎瑞生贪心于妓女莲英的价值六七千金的珠宝、钻石和首饰，而将她骗至徐家汇西的田野中谋害致死。这个案件，短时间内沪山戏剧界曾把报道的案情编成《枪毙严瑞生》的剧目上演，上海滩一时为之轰动。其报道的影响不亚于清末期间杨乃武与小白菜。

1922年7月6日刊登的《溥仪胡适谈新学》也使人感到兴趣。报道说：“溥仪日前在琉璃厂买书，偕行者有庄斯敦等。溥仪喜读胡适文集，并于翌日打电话约胡适入宫。胡适要求免跪拜，溥仪自接电话，谓君为新学泰斗，当然不能跪拜。胡适遂入谈甚久。溥欲延胡为师，胡允为友。”未久，星期增刊登出一篇《人瑞阮国长》的报道：现住奉天宽甸县小芦沟的老人阮国长，清乾隆二十五年四月二十日丑时生，现年已163岁，并附刊一张半身照片。报道说阮国长精神语言甚为清楚，记忆力亦尚强健，可能是中国近现代最长寿的人。

1923年11月6日和8日，本埠版刊登《钟耐成夫妇投江》的新闻：“平江志士钟耐成与其新婚未满月之夫人陈妙贞女士，愤世疾俗，相偕投钱塘江而死。遗书称：此次自杀，非为金钱，非为债务，非为情恋。实不愿迁延复迁延，永居此贪污恶浊之世界，祸国事实非，而目击贿选成功，战祸弥漫耳！”一周之后，报道，大世界新剧场主任顾元为已将此事排演成剧，名之为《愤贿选，夫妇投江》。愤世疾俗而投江自杀是消极的，但当时北京政府国会议员的选票可以卖钱，要做官进行贿选。而政府则是祸国殃民的卖国政府。有的人虽心怀祖国，但无以为报而走上绝路。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黑暗中一部分人难以自救的精神状态。这比清末期间只供人们茶余酒后助谈的某些社会新闻要进步得多了。

史量才接办《申报》十年，是报纸开始兴旺发达的十年，在改

革、进步和发展上获得的成就，是创刊半个世纪来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申报》曾把自己的发展与这个时期上海其他一些报纸的改革与发展共同称之为“中国新闻界开一新纪元，与英美新闻界互相照耀于全球”。它在1922年的元旦增刊中说：往日为政府附属物之新闻事业，今后将为经济独立，指导民意之明星；往日为骚人墨客卖弄笔头之新闻事业，今后将为宣传民意，促进大同之使者；往日坐守斗室能知天下事之新闻事业，今后将为遍游各地、身历其境之证人；往日无聊敲诈之新闻记者，今后将为代表舆论之利器；往日为武人政客作家谱之新闻事业，今后将为发展工商实业之先声。凡拘泥不改之新闻，私利作弊之新闻，皆将依次而受淘汰矣！这种评说对当时新闻事业改革和发展面貌可能估计得高了一些，但对《申报》十年来所取得进展的描述，还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

《最近之五十年》

20年代，《申报》在革新设备、改革和加强新闻传播、振兴评论、实行报纸企业化、现代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广延名流俊彦，起用优秀人才方面也大大超越了任何一个时期。在陈冷、张默、张竹平等之后，又有黄任之（炎培）、赵君豪、秦理斋、周瘦鹃、葛豫夫、瞿绍伊、谢福生等等，都应邀参加了报馆工作。他们有的长期在报刊任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的还是新闻学家，富有学识和创见。因之，史量才接办《申报》之后这十年，也是史量才的新闻观点逐渐形成和完善的时期。

史量才把报纸看成为现代的史记。认为今日的新闻明日将成为历史。为此，他主张报纸的记载要真实、客观和公正。总主编陈冷新闻“三字经”中的新闻要博，又补充了新闻记载还要丰富多彩。编辑葛豫夫在阐述史量才的这一新闻观点时说：“报纸为现代

史记。史记之精神鉴既往、示未来，报纸之精神亦然。故天下之新理论、新主义介绍于国民，使之习熟而不骇异，然后人之知识程度乃达于进步。”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申报》除了关心世界和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之外，对于国内政治、经济、科学、教育、文化艺术无不涉及。如在经济、贸易方面，币制变动，物价的涨落，进出口货物数量，外国资本的输入，民族工业兴衰，人口发展，农村因灾害荒歉和地主剥削而造成的生活悲惨等等，无不有详细的记载。如1922年5月6日，记载世界汽车的数量，总计是12588949辆，其中美国最多占80%，中国仅只8150辆。10月10日记载民国以来上海人口发展状况，1912年为65.1万人，1914年至1918年增加到100万人，1918至1921年增加到150万人。类似的统计几乎每年都有。这也是《申报》历来的传统。至于形势时局的发展记载则更为详尽。就在1921年至1923年期间，孙中山接受民国初年的教训，重振中华民国，他来往奔忙于广州与上海之间，重建了广州国民政府。当选为大总统之后，莫斯科劳农政府（当时苏维埃政府的称呼）与广州国民政府签订相互尊重的同盟条约，以及后来“孙中山越飞宣言”，为联俄、联共、国共第一次合作、准备北伐创造了条件。这些民主进程中的重大事件，《申报》都有详细记载。1922年3月30日韩国革命党人李诚龙、金益相，为反对日本侵略，在上海黄浦江边新关码头谋刺由吉林到沪的日本田中大将未果也作了报道。这是鲜为人知的。长时期来《申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记载，为人们学习和研究近现代史，从中以史为鉴吸取教训，留下了大量史料。

然而，凡遇战乱，时局动荡，社会动乱，报馆的工作受到影响，史量才总感记载的中断与残缺。为此借1922年《申报》发行50周年之际，以回顾过去五十年的形式，编纂一部大型纪念册，以补报纸记载之不足。该纪念册定名为《最近之五十年》，由黄炎培担任主编，向海内外学者专家征求意见和组稿，从订例、征文、

编辑、印刷，花了一年多时间，于1922年2月完成，达数百万字，可称为《最近五十年》百科全书式的年鉴。

全册分为三编。第一编为五十年来之世界，有徐则陵的世界进化概论、胡适的世界哲学、张嘉森严复输入之四大哲学家学说及西洋哲学界最近之变迁、任鸿隽的世界科学、戴练江的恩斯坦学说之浅译、江亢虎的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李守常的1871年的巴黎“康妙恩”，以及马寅初、钱桐等世界农业、航空、卫生、金融、军备等等论著。

第二编为五十年来之中国。其中有梁启超的中国进化概论、蔡元培的中国哲学、张准的中国科学、胡适的中国文学、孙文的中国革命、沈恩孚的中国政体改革之经过，以及江庸、蒋方震军事变迁史，以及廖世承、杨铨等教育、工业、矿产、对外贸易、交通、商业等等论著。

第一、二两编的有关文章之后，附有世界大事表、彩色世界变迁大势图、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图表。

第三编为五十年来之新闻事业。其中有谢福生、秦理斋、伍特公、熊少豪、周瘦鹃等世界和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和进化，以及黄协埙、陈冷等的回顾《申报》五十年来之变化发展及新闻业务方面的文章。

纪念册由张謇、章炳麟、史量才作序。全册文章本着百家争鸣、兼收并蓄的方针，由各学者专家、知名人士根据自己的见解撰写。孙文（孙中山）是当时的革命领袖，他的《中国之革命》一文，论述了他倡导的三民主义、从事立党、宣传、起义、革命活动以及辛亥之役、讨袁之役和护法之役的经过，总结民国以来从事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也在《最近之五十年》中得到反映。徐则陵的《五十年世界进化概论》，论述了世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兴起之后，随着劳工运动的日趋激烈的状况，介

绍了“劳动潮流之精神，出于马克思强悍社会主义，劳动潮流之成为世界潮流也是马氏所激起”。

江亢虎的《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介绍了近今五十年，是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由发育时代而入于成熟时代”，新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之趋势。他认为：“俄国共产革命四年，乃复采用国家资本主义，是外观世界、内审国情的结果。”他介绍：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资产公有、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和教养普及。资产公有“实施时，可发行债票，估价买收、分期还本而不给利。外人资产亦同此例，惟依国债惯例行之。至私人或社会金钱、房屋、物品等不用以生利者，仍得享有之。盖社会主义之精髓，在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禁止私人掠夺他人劳动所得”。江亢虎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也未有经历过社会主义的实践，但早在十月革命后的四年，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还处于幼稚时期，而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是发人深思的。

《申报》五十周年之际，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二年。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也应《申报》史量才、黄炎培之约撰写《五十年来世界劳工运动》。李大钊感到这个题目太大，因之缩小范围改作《五十年来世界工人的国际运动》，后因工作太忙，没有按题写成，撰写了《1871年的巴黎“康妙恩”》。文章详尽地介绍和论述巴黎公社发生的背景、经过和伟大意义。最后，他满怀希望和信心写道：巴黎公社是社会革命的先声。在这悲剧中多少社会主义者横罹惨杀，社会主义一时受了重伤。谁知五十年巴黎公社的种子，又在伏尔加河流域放出灿烂的鲜花，得到了光荣的胜利。

以上这些文章，对于国内外形势，社会发展以及共产主义思潮的评论和介绍，可能会有某些偏颇或不足之处，但对当时主张不偏不倚的《申报》来说，还是难能可贵的，对广大读者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史量才怀着坚定的信念，估价报纸的作用说：当“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和社会新思潮兴起，《申报》“举天下之新理

论、新主义于国民”。让“暮鼓晨钟，发人清醒”。“中国现在为过渡时代，皇帝的偶像打破，统一的宗教又无，莘莘青年，深苦无指导者”。“拟先使青年第一步信敝报，然后由敝报介绍一切政教于读者，使之第一步之信仰，唯报纸的记载者是从^①”。

办一张作为民众喉舌的民办的报纸，史量才认为必须有独立自主精神。这种精神表现为经济上独立，政治上的自主。而经济上的独立，又是报纸生存与发展的基业。梁启超曾经说过：吾侪从事报业者，其第一难关，则在经济不易独立。报馆恃广告费以维持生命，此为天下通义。在产业幼稚之中国，欲恃广告收入以供一种完善的报纸设备，在势已不可能，而后起之报尤甚。质言之，则凡办报者，非营业收入以外，别求不可告人之收入，则报馆不能自存。本报（指《时事新报》）七余年间，盖无一日不受此种痛苦^②。对史量才来说，这种痛苦已经成为过去。他正是在中国工商业比较发达的上海这个最大城市里，靠了广告和多种经营的收入，促进了报业的发展和现代化，实行经济上的独立，同时不听命于官方或任何一个政治集团而实行政治上的自主。在史量才看来，经济独立和政治自主，两者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经济上的独立可以影响政治自主，为了政治自主想方设法实现经济收入转而巩固政治上的自主。

史量才的这种独立自主办报观念的形成，有其一定的政治环境和历史原因。在他从事新闻事业的民国前后，中国出现过不少政党和政治集团性质的报纸。这些报纸中，有的在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中起过作用。但民国成立后，他们不是真正为“主义”而宣传，而是为本集团的利益，为在政府议会中争权夺利而互相倾轧。有的为袁世凯政府所收买利用，成为复辟帝制或君主立宪的传声筒，终于政治上堕落最后自行解体。也有一些报纸在时局变

① 在欢迎美国新闻学家格兰士座谈会上的讲话，《申报·最近之五十年》纪念册。

② 《时事新报》，1921年5千号纪念。

动中摇摆不定，所论消息，未必多属虚构，但都带有一定的政治偏见，即不免为一党所利用。当某一党派得势，报纸得到经济上的资助，而当这个党派失势，则经济来源断绝，报馆也就处于风雨飘荡之中，难于生存。也有些政党派别表面上打着国家、民族的旗号，但实际行动上则是另一回事。史量才对这种现象十分不满，他主张自己的报纸应当是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无党无偏”，不带色彩的。也只有这样的报纸，才能客观公正，成为民众的喉舌。

陈冷主张报纸为公共利益服务：“报纸者天下之公器，苟涉于私，则其行不远。然欲不涉于私，不为一种人所利用，则其至要之根本，在报纸之独自生活”。他承认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惟同一不自由，毋宁于屈服威力，而不可自行贩卖。不屈服于威力外虽束缚，而心尚自如，若自行贩卖，则并一己之意思而丧失之矣！”^①张默是清末至民国《申报》的老主笔，他也是主张“独立生存之报纸，向不与任何党派任何方面有关系”。他们的主张与史量才的观点一致，在报馆同人中也是基本一致的。

1920年前后，上海报界与西方新闻界的联系与交往日益增多，由于《申报》在报业现代化方面的显著成就，往往作为上海报界的代表与西方新闻界人士接触，西方新闻界人士到上海也必到申报馆访问参观。在参观访问中，他们对《申报》报业大楼和完善设施十分称赞，“认为不特在中国堪称第一大报，即于世界似贵报之规模殊不多见。”由此，当1919年10月世界报业大会在檀香山举行，我国新闻界推选史量才和黄宪昭等人为代表参加。史量才因父亲去世不克前往，由黄宪昭等六人代表参加。世界报业大会鉴于《申报》在国际上的影响，推选史量才为世界报业大会副会长，《申报》具有了一定国际声誉。

^① 《二十年来记者生涯之回顾》，《申报·最近之五十年》纪念册。

当时参观访问上海并到《申报》馆的，1921年有英国《泰晤士报》主持人北岩勋爵、美国新闻学家、新闻出版协会会长格拉士；1922年有美国新闻学家麦柯森、美国联合报社社长诺彝士等。他们在访问中介绍西方新闻观念，其中最主要的观点也就是独立自主。史量才与报馆同人感到与自己所持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当他们听了美国诺彝士的演讲之后，在第二天即1922年11月28日发表评论，对独立自主、不党不偏能保持新闻的客观公正加以阐述和发挥。评论说：贵乎日报者，为能不党不偏也。唯不党不偏，故其新闻常忠实，而不施色彩。如是，则事之真，是非不致混淆，而阅报之人阅一字即得一字之益矣！西方报人和新闻学家在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新闻观念的同时，赞扬史量才的办报精神。英国《泰晤士报》的北岩爵士说：“世界幸福之所赖，莫如有完全独立的报纸，贵报与敝报差足与选。”在格拉士谈及“列邦报纸多能有独立精神”时，史量才介绍了接办《申报》以来的体会。“虽七年来政潮澎湃，敝馆宗旨，迄未遇迁。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与顷者格拉士君所谓：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敝馆宗旨似亦隐相符合。且鄙人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此志一年也。”^①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到，在西方资产阶级新闻观念影响下，史量才办报必须有独立自主精神的思想更为坚定。

史量才和《申报》的无党无偏、不带色彩的独立精神，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政治观点，只是这种观点是不以一个政党或集团的利益出发，而是以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出发。上一代《申报》的主笔秀才如钱昕伯、何桂笙以及后来的金剑华、张默，曾以报纸为阵地启迪民智，唤起民众，为国富民强作过努力。但他们的努力，是在承认封建皇帝的统治之下进行的，有的评论带有对宫廷的批评色彩，这又以不触犯皇上为原则，连报纸创办人英国美查也曾告诫

^① 《申报·最近之五十年》纪念册。

主笔们：对评论时事和人物要慎重，以免“纓当世之怒，取禁止之耻”。直到甲午战后，维新运动兴起，主笔们的“皇朝”观念才开始动摇，对皇朝宫廷的抨击有时表现得十分激烈。当民国成立，认为举袁世凯为总统是“以暴易暴”，则是主笔们在反封建帝制观念上之一大进步。但这已是清朝覆亡的时日了。正如史量才所说：《申报》生活帝制威权之下，踟躇而不能舒展者三十九年。民国肇始，我与申报偶然合作，时民气方振，舆论界精神为之一振，《申报》亦奋其老马千里之志，愿为民国驰驱。”^①

史量才、陈冷等《申报》的主笔们，是清朝末年科举中最后一批秀才中的几个秀才，他们比之上世代的主笔秀才则前进了一步，他们同样以报纸为阵地，为结束帝制，反对帝制复辟，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建设新生的中华民国进行了艰苦的努力。编辑葛豫夫在《祝本报五十周年系之以论》一文中指出，办《申报》的宗旨在“倡民权，迪民智，振民气，历国耻，启发国家思想，而明政治之善恶也”。说明了今后任务是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为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幸福，必须反对这两个共同的敌人，而这正是区分政治善恶的标准。《申报》的新闻报道、舆论评说也正是从这里为基本出发点。

史量才与报纸同人的这种人民民主主义的办报思想，是以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为依据，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随着时代潮流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新型政党的出现，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这种观点显得不相适应。在统治当局加强新闻控制和多方责难之下，这样的报纸越来越感到既不能自主，也难于自由，有时连生存也受到严重的威胁。

^① 《申报·最近之五十年》纪念册序。

七、在风波频繁的年月

康通一临城遇险

民国之后，中国政局南北对峙，新旧军阀割据，战争连年不断，整个国家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由于战乱兵变频繁，盗匪横行无忌，治安状况恶化，又使交通经常中断，报纸的发行受阻，记者的采访活动受到限制，甚至生命受到威胁。记者谢福生因采访中冒犯了军阀孙传芳而遭到绑架，由于《申报》地处租界，孙传芳慑于洋人的威势而不得不悄悄释放。而1923年5月临城发生的旅客列车被劫持案，使记者康通一一度遇险。

1923年5月6日《申报》记者康通一乘坐京沪快车去济南采访。同车旅客中有英、美、法、意大利等国家的外侨三十余人，大多数是应亚洲建业公司的邀请，专程赴济南参观官家坝河堤工程。其中外籍新闻记者有英文《大陆报》记者李白斯（译音），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威尔等等。当火车沿津浦路北上行至山东临城以南时，枪声大作，遇到了一股七八百余名匪徒的突然袭击。轨道被拆去一段，一二节车厢倾倒，列车被迫中止运行。匪徒们蜂拥而上，头二等车厢中一百多个中外旅客的银钱饰物都被搜去。匪徒们恐怕官军赶来，让被抢的旅客们携老扶幼，跋涉奔波，翻越了五六个山头，分道进入隐避的山沟。康通一与头二等车的中外旅客为一队，至中午到达黄牛岭山头的抱犊岗。这里荒无人烟，但有石头堆积成类似的城楼。匪徒们将旅客稍事安顿后，分发用麂皮制成食物和水，要他们静候处理。

这股匪徒原系张敬尧旧部，匪首叫孙美瑶，年纪还轻，不过二十七八岁。他眼见这么多据为人质的“肉票”，而且还有三十多个洋人，想从中发一笔洋财。但他也感到如果长时间困守山寨，不主动与外界联系，没有人来赎取人质，甚至官军攻击、动刀动枪的话事情更糟。这时，他发觉康通一与鲍威尔等洋人交谈自如，知道他可能是个吃过洋饭的人。孙美瑶就找他征询有无与外界联系的办法。康通一当记者前曾就读海关学校，毕业后又在海关工作，精通英语，办理过内外交涉事务，对今天一批人质的情况也较为熟悉。为了解救人质和自身的安全，康通一考虑之后提出了三条建议：一、处理要速战速决，不能旷日持久；二、赶忙准备信函，叫人送下山去，让官方考虑；三、对于已上山的人质要好好安排照顾，免得与官方接触谈判时横生枝节，增加麻烦。孙美瑶感到康通一的建议很合适，于是由自己口授，请康通一代写了一封给官方的信。他感到康通一办事能干，还请他下山去临城送信联系。康通一想到如果自己急急下山会引起寨主对他产生借机脱险的怀疑，于是推说腰酸背痛，疲劳已极，躺下休息。而孙美瑶见他迟迟不走，心里发急，催他赶快下山。并希望他告诉临城官方不要动武，围攻抱犊岗，否则被掳的中外旅客性命难保。在孙美瑶的急迫催促之下，康通一脱离匪窟，带信到了临城找到官方胡使领，然后迅速搭车到达北京。他在案发后的第二天就从北京向上海申报馆拍发新闻电报，报道了临城劫车案详情。

临城劫车案发生后，各国驻北京的外交使团对直、鲁、皖、苏四省边境养兵30余万，连对一条铁沿线的安全也不能保证，甚表遗憾。他们质问北京当局临城事件的责任，要求限期释放被掳人员，并保证今后在华外人的安全。国务院表示决定照办。北京政府口头上说要查究惩办，解救人质，但实际上无人负责，无人执行。《申报》评论追问：此弥天大案，谁当负责任者？当地文武官吏也，本省督军省长也，本区巡阅使也，本路局长与其所属主管

人员也，乃至陆军总长、交通总长与国务总理也，谁当究此责任而依法处理者？政府与各省当局，营营于争权夺利，其他国家之事、地方之事不问也。

各国外交使团因中国政府当局处置责任不明、营救人质不力，决定由英、法、美、意、比、葡等使馆人员组成一个营救人质的代表团向北京政府加紧交涉。北京政府外交部派人会同山东当局和峰县士绅组成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临城，康通一再度到达临城，引导营救者进黄牛岭抱犊岗。山东当局为了解救人质，调集了两个团的兵力，在抱犊岗山下形成一个攻击形的阵势作为后盾。在谈判中孙美瑶提出要求当局改编他的土匪部队，并同时保留他的老巢抱犊岗。又提出围困抱犊岗周围的官兵必须远撤，否则将带全部人质转移到深山老林。官方则以他所提的条件难以全部接受，先就剿与抚的问题，与政府和军人间进行磋商。孙美瑶感到外国使团的来头不小，势不可侮，首先释放了两名外国人质，以表示愿意早日和解。经过讨价还价的反复谈判磋商，孙美瑶终于应军方的招抚，由陆军处授以上校军衔，并加任为团长。至6月释放了全部人质。临城劫车案才告结束。

临城劫案中康通一的境遇是传奇性的。他是一个受害者，但又是中间人之一，他能审时度势、机警干练地脱离匪窟，促进谈判，了结劫案。他在当时身临其境，可说是掌握第一手材料的新闻记者。他发自北京、临城的新闻电讯，记载确切翔实，内容具体生动，精彩之处紧扣读者心弦，不愧为一个随机应变、足智多谋的新闻记者。

20年代前后的中国，不少地方军阀与土匪已分不清界限。像临城这样的匪徒数达六七百人，已经不是什么零星散乱的小股，而是一支不小的土匪部队。其实，也是军阀部队散乱或哗变而成的。所以，史量才形容当时的社会变乱是“军阀割据将一变而为土匪割据”，土匪问题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问题。临城这样一个震

动中外的案件，在内外压力之下，山东的兖州地方当局对当事者和津浦路局的人员作了一些惩处，但只是隔靴搔痒，不解决问题。为此，《申报》写道：人以为生，一失所恃，弱者必流为丐，强者必流为匪。强于脑者为上等之匪，假官绅面目以强夺财物者，是谓之官匪，强于力者，为下等之匪，假盗贼面目以强夺财物也，是谓之土匪。严治土匪，必须严治官匪始。“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①。这篇评论一针见血，击中了当时社会动乱中无穷匪患的要害。

临城劫车事件新闻报道的事实材料，大部分是记者的亲身经历。这虽然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但从这一事件的报道中，史量才、陈冷等感到记者亲临现场采访重大事件的优越性，报纸能依据事态的进展配合评论也比较及时。《申报》已在全国一些省市设有访员和通讯员，但仍感数量不足，难于对付频繁的战乱和突发事件，甚至有些本市发生的事件也未能及时派人采访。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几年中先后招聘了一批记者，连同原来的记者组成了一个采访部，由康通一担任部主任。记者中有金亭华、詹天慰、张君汉、章旦华、王怡庵、顾严、叶秋原等。其中大多数受过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专业教育，有的还精通以英语为主的多种外语。他们分别担任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工潮、治安、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采访任务。当时《申报》在上海的竞争对手有《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和《民国日报》等等。为了知己知彼，采访部每天把这几家报纸上的新闻、通讯，包括采用通讯社的消息，都分门别类地加以剪贴和比较，看看有没有遗漏重要新闻，供采访部主任康通一评判考核。他们与上海一些外文报纸的编辑记者交往比较多，经过临城劫车事件中共过患难，康通一同他们也更加熟悉。这样几乎每天下午四时左右都有外文

^① 时论：《说匪》，1923年5月18日《申报》。

报馆的客人来访，其中有《字林西报》的华籍记者周番萍、日本东方通讯社记者龙岗和波多博等，《密勒氏评论报》主笔美国人鲍威尔则是常客。他们在一起议论国内外大事，交流采访情况。由于他们不是《申报》的竞争对手，乐于提供信息或透露新闻线索，从而也增加了《申报》的新闻来源，使报纸新闻采访大有起色。

《诚言》引起的风波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英、日等外国资本家开设了不少工厂，残酷地榨取工人血汗，引起广大工人的严重不满。1925年5月间，日商纱厂工人因要求改善待遇而罢工遭到日方镇压，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被枪杀。这一事件激起全市工人、大学生的义愤，爆发了大规模工人、学生游行示威。5月30日，当游行队伍行至租界老闸捕房附近时，英捕开枪镇压，南洋、同济、上海大学四五十名学生伤亡，造成了上海开埠以来租界中最大的惨剧“五卅惨案”。

每当上海市内发生涉及租界当局的重大纠纷事件时，新闻界往往首当其冲，面临读者的考验，人们要看看报纸的态度如何，是屈服于租界威势，还是公正地为中国人民说话。上海的报纸大多开设在公共租界，中国的官厅一般难于直接管束，所以报纸对揭露官厅的黑幕、抨击官场腐败顾虑较少，有时甚至借租界的特殊条件来抵制中国官厅的种种非难与压制。但置身租界又不得不受洋人的制约。明明是侵犯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敢怒而不敢言，偶有触犯还会受到处罚。报界就是处于这种“不怕官、只怕管”的境遇中。

“五卅惨案”发生前后，租界当局对报纸的压制更为严厉。2月间，《民国日报》因内外棉工厂工人举行同盟罢工而刊登了《泣告同胞书》，遭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向公廨起诉，指控违反出版法，

以扰乱治安罪判主笔邵力子罚款 330 元。《商报》主笔陈布雷、《中华新报》主笔张竞吾也被控受罚。《申报》在“五四”运动发生时,对北京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表示同情支持,作过报道和抨击,为学生说话。“五卅惨案”发生前后,报道了工人、学生游行抗议行动和全市人民的支援,20万市民为顾正红举行的追悼会。但评论的态度不坚决,缺乏义正辞严的反帝的决心,只是说:南京路惨案,是大可痛心之事,学生游行演讲非暴力事,学生无拳无勇,纵有冲突,亦非无他法可防御者。希望外交当局据公理与租界负责人交涉,力求达此伸张公理之目的。显然,《申报》在谈了一通痛苦、痛心之后,只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避免得罪租界当局。

为破坏压制工人的抗议活动,公共租界当局印制了一种名之为《诚言》的宣传品,有时采取第三者的口气以混淆视听。他们把这种印刷物到处寄送或张贴于街市之间,受到不少市民群众的抵制而加以撕碎。公部局为了扩大反动舆论的影响,通过洋商克劳公司把有关“五卅惨案”的一则《诚言》送给了《申报》,要求作为广告刊登。其内容是英国外交总长张伯伦在回答下议员质询造成发生上海“五卅惨案”的原因时,不但完全否认工党议员提出的外商资本家残酷剥削虐待中国工人的事实,而且说什么:惟在乱时,不能不施弹压。因聚众游行以致乱,暴徒拟攻捕房、劫枪械,故尔则以枪击散乱党,此乃是杀一儆百。这完全是帝国主义者一派胡言,也根本不是什么“广告”,而是交付给报纸强令刊登的一篇侵略性言论。

面对这篇《诚言》,《申报》知道这是租界当局通过克劳公司送来的,来势不小;另一方面又认为,广告者是客户出钱,报馆出让报纸版面,致于内容既不代表报馆的观点,也可以不负任何责任。于是7月11日在报上刊出(《新闻报》也同时刊登)。谁知报纸发行到市区,立即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强烈反感,一早就有数百人

拥至报馆门前提出抗议,一些怒气冲冲的青年激动得打破了报馆门窗,要与编辑人员对质。在家的史量才接到报馆电话,感到事态严重,急急忙忙赶到报馆,分头向抗议者婉言解释致歉,表示在编辑部内进行反省。

当时上海的革命和进步报刊是“五卅”运动的耳闻目睹者,他们对申、新两报刊出《诚言》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上海学生联合会出版部主编的《血潮日刊》在揭露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后,指责《申报》为帝国主义做宣传很有成绩,尤其在这次“五卅”运动中异常出力。日刊还斥责申、新两报是全国为虎作伥的两报。《中国青年》在发表批评文章时,提议组织“铲除妖报团”。上海工商学联合会还决定在租界之外的地区扣留两报,不让发行。要求两报刊登启事,向全国人民道歉,并刊登“辟诚言”的评论和广告。学生联合会感到“五卅”惨案中工人群众遭受帝国主义摧残而受到的损失和苦难,提出要申新两报拿出十万银币给以支援。上海报界在“五卅”运动中软弱的表现引起中共中央的关注,中央在一篇告民众书中指出:“在这如火如荼大反抗运动中,上海上流社会和各报新闻记者已多少暴露其调和妥协和‘速了’的倾向。纵然上流社会现在还是反抗运动中的要素,然而这种倾向若不停止,实大有害于全民族的利益。”^①

史量才、陈冷和张默等经过一周左右的检讨反省,感到这次事件中《申报》犯的错误严重,决心接受批评。首先在17日刊出了道歉启事,承认各界对刊登《诚言》的责备是“崇言宏论,不胜钦佩”,“因表歉意,希谅苦衷”。并在原来刊登《诚言》的地位,发表了《辟诚言》一文。文章指出外商工厂中工人的不平等地位,尤其是童工所遭受的惨酷遭遇,从而激起工人抗议、社会公愤,这完全是外国资本家一手造成的。华盛顿会议所谓的各国彼此不许

^① 1925年6月5日《中共中央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

攘夺中国的权利等等，一项也未能实行。各国帝国主义国家仍然在勾结中国的军阀，资助军火，制造中国的内乱。《辟诚言》特别批驳了《诚言》借口根本不存在的游行群众袭击捕房、劫枪械的事实，捕房开枪屠杀工人学生，是当局蓄意制造的。《辟诚言》敬告张伯伦：吾华人非尽无耳目，尽无脑筋，可以为君等隔离事实一万八千里之狡辩所掩饰。君等果实抱睦华宗旨，君等应停止所谓的《诚言》，而以诚心与吾争自救自决之华人相见。

当天，还发表了《诚意与诚言》的时评。指出：有诚意后有诚言，先有诚意后有诚言。意和言与行三者必相符合，而后其诚乃见。古人有言，听其言，观其行。

《申报》在发表上述启事、《辟诚言》和评论之外，还同意向工人群众支援银币，并声明这是自愿捐献。

上海工商学联合会鉴于《申报》改正错误，停止对英帝国主义的妥协，公开痛斥《诚言》，感到问题已经解决。为了团结一致对外，迅速解除了阻挠报纸的外埠发行。至此，一场《诚言》引起的风波才告平息。

《诚言》引起的风波和《申报》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暴露了史量才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末坚定地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同帝国主义作斗争；要末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威势和压力，进行妥协，要“不偏不颇”是做不到的。当中国人民义正辞严、气壮山河地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帝国主义也是理屈词穷不敢逞凶霸道的，《申报》转变态度发表《辟诚言》进行痛斥就是如此。五十多年来，《申报》并不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壓力，对日本、法国等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进行过揭露和抨击，态度也相当坚决。但在对待英国帝国主义的态度有时则不一样，甚至为他们的行径作辩护，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马嘉利事件就是如此，“五卅”运动可以说是重蹈复辙。当然这一次错误后来是改正过来了，但也从中受到了惨痛的教训。

左右为难的“局外人”

历史在前进，随着北伐战争的发展，急剧变化的时局又向避免卷入政治旋涡的《申报》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1927年春天，北伐军从浙江推进到上海近郊，上海工人配合北伐军进军上海，在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等组织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发动了总罢工，随即转为武装起义。在闸北等地经过三十多小时战斗，占领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区。这是大革命时期工人阶级显示自己力量的伟大壮举。可是，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江浙军阀的支持下，发动“四一二”政变，向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之后，又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把一场轰轰烈烈为从军阀手中解放上海的工人斗争打了下去。由孙中山倡议发起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也宣告破裂。

在这一场民主与进步、团结和分裂、革命与反革命尖锐激烈的斗争面前，历尽沧桑的《申报》是如何对待呢？有的研究现代史或新闻史的学者，曾经有过一种说法，认为《申报》对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解放上海的伟大意义，不仅毫无认识，而且在革命风暴的冲击下几乎麻木不仁，无动于衷。所作的新闻报道，也完全不能如实的反映情况，甚至有的报道是道听途说，歪曲事实。可是，看了这个时期《申报》的一些报道，这样的说法并不实事求是。

当1927年3月中旬北伐军占领杭州、继续向上海方向推进时，3月20日上海防守司令部贴出了“凡煽惑罢工，扰乱地方者，一律格杀勿论”的布告。就在同一天，《申报》报道全沪工人奉总工会命令举行总同盟罢工的新闻，宣言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消灭军阀黑暗统治，建立真正保护人民利益的政府等十七条。新闻

还报道当时参加罢工的人数已达50万人。之后几天，上海工人举行震动国内外的第三次武装起义，配合北伐军占领了上海。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和一些报纸对工人武装起义的事实真相加以歪曲并造谣诬蔑。在这种情况下，《申报》在来件栏刊登了《上海市总工会对于最近报载此次革命事实之更正》，更正说：“自北伐军进抵江西，孙贼传芳自九江败归后，本会即率领全沪工友，并号召各界民众，起而响应北伐军，与军阀抗斗，以求人民之解放。迄今已阅半载，中间虽屡经挫折，并牺牲许多战士，然我全沪工友，仍秉不屈不挠之精神，继续与军阀恶战。事实俱在，久为各界民众所认识。此次上海革命暴动之成功，更完全为本会所领导之上海八十万工友，三千余武装纠察队，有组织有计划之响应北伐军的革命运动。乃近日报载，关于此次运动经过情形，为反动派所诬造，与事实不符者甚多，详细情形，本会现当革命紧张时期，无暇叙述，改日当有系统的报告，公布于世，郑重纠正。”26日又刊登了《总工会告上海人民书》。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已经觉察到国民党反动派企图镇压革命的阴谋，在告人民书中指出：如“反动派想坐由工人及其他革命战士用性命换来的太平江山，盘踞上海政权，或破坏我们市民代表的政府，我即与他们决死战”。当不肖之徒正因激化中外矛盾，散播总工会有率领纠察队和群众攻击租界捕房谣言时，《申报》为总工会刊出了告上海中外居民的辟谣声明：“对于收回租界，本所主张，但无须用武力解决，务祈中外各界人士安居乐业，切勿轻听谣言”。

当蒋介石3月27日到达上海，策划布置“四一二”大屠杀的时候，《申报》派记者访问蒋介石，刊出记者问总司令（蒋介石是当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关于对总工会武装纠察队的处置时，蒋介石回答：按照党义，可以自卫武装。唯在此军事时期，应受军事当局节制。29日又刊登了蒋介石与总工会代表赵之敬的谈话，赵询及外传有将撤会纠察队缴械的消息。蒋介石回答：“纠察本应武

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赵之敬又说：恐有流氓乘机捣乱纠察队及总工会事。蒋介石答：此事当由余制止，尽可放心。蒋介石还给上海总工会赠送“共同奋斗”的锦旗，以表示对上海革命工人的“敬意”。

蒋介石对《申报》记者和总工会代表谈话的刊登，揭露了蒋介石以两面手法，欺骗人民的险恶用心。果然，当他部署停当，于4月9日离沪赴宁，坐镇南京指挥上海的镇压行动。临行留下他的心腹杨虎，直接监督实施他的阴谋计划。终于在4月12日发动了对上海人民的大屠杀。第二天，《申报》报道了蒋介石血腥屠杀工人，缴械工人纠察队，工人游行示威进行抗争时与警察发生武装冲突，遭到国民党反动军警镇压的详情。记者的报道中还反映了六七千工人聚集于青路草地集会，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反动派，交还工人武装的愤激之情。在报道中，记者对“四一二”当天深夜至13日凌晨国民党反动派军队以威胁、欺骗的手段缴械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的过程，记述具体而详细，报道说：十时左右形势更形严重，断绝行人，军队往来梭巡。至晨四时，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顾顺章突闻湖州会馆总工会处发生枪声，即偕卫队、军医等往总工会所视察情形。约过二十分钟，枪声复作，有六十余便衣军，臂缠白布，黑“工”字徽章，正向会所内放枪。门前纠察队二十余人，亦向之抵御。未及十分钟，又有大批二十六军开到，当有五团长邢霆向纠察队谓：“请你们不要还击，我们来为你们缴他们（指便衣军）的械。”说毕，即将所有便衣队枪械完全缴下，并用绳索捆绑。纠察队见状，即请党军入内吃茶及香烟。邢团长即对顾谓：“既有今夜这件事发生，请你同我们到二师司令部见我们师长，商议解决办法。”顾即不疑，偕六位纠察队员前往。迨行至半途，邢团长忽变色谓：“他们的枪既已被缴了，可是你们的枪械也应该缴下才好。”顾答“不可。他们流氓是捣乱的；我们工人纠察队是革命的，如何能够缴械。”然而二十六军将机枪对准湖州会

馆，致使纠察队无能为力，党军即入内占据，该会办事员亦全部退出。几天之后，上海总工会致电蒋介石，提出：交还工人纠察队枪械及所抢衣物银钱文件，保护总工会，惩办下令攻击纠察队的军事长官，惩办流氓，肃清一切反动派等五项要求。

《申报》对于国共合作、北伐进军、工人响应北伐起义，从而中国可能出现的新局面怀着希望，但对蒋介石突如其来的“四一二”政变没有思想准备，感到惶惶然不可理解。但即使在这种状况下，当北伐军进军上海时，报纸在3月下旬起连续报道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蒋介石发动镇压，采取威胁和欺骗手段对付工人纠察队，以及工人的斗争决心和抗争等方面的新闻报道不下数十篇，有些是上海总工会的启事通告和声明。以事实说明“四一二”事变的真相，证明革命的正义是在上海工人这一边。

除了大量的新闻报道之外，《申报》还刊登政治广告。这是中国报刊史上前所未见的。既有进步的革命内容的广告，也有倒退的反革命内容的广告。尤其在“四一二”政变前夕，革命力量遭到镇压，反革命势力气焰高涨的时刻，报纸以显著地位，整版篇幅，以来件、声明、启事、通告、布告的形式刊登，有的甚至是特大字号的政治口号。如4月1日至6日，以第一版或第四版二分之一的版面，刊登了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发布的建设革命的新上海，打倒帝国主义，肃清奉系军阀，铲除封建势力，一切权力属于党等口号。这个总政治部是邓演达、郭沫若领导的，是正确的革命口号。蒋介石下令封闭总政治部，逮捕办事人员，并由白崇禧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取代中央军委的总政治部后，该政治部主持人陈群奉蒋介石的命令，不准上海各报发表武汉发来的电报、函件，以及总政治部的宣传广告。这之后，从六日起《申报》在第三版或第四版以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版面，刊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反三民主义即为反革命，打倒篡窃党权的阴谋分子，工友们不应该盲从少数投机分子来妨碍我们前线的

军事，把持你们的工会等口号。这些都是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反三民主义，欺骗工人离间工人阶级内部团结的反动口号。除此，也还有杨杏佛涉及清党，李公朴涉及跨党的辟谣启事。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攻击共产党，敌视总工会的启事等。

当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第一次国共合作由于蒋介石的叛变，已濒临破裂的边缘。国民党内部革命派与反动派之间，北伐军与军阀之间，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都存在种种矛盾，政治形势错综复杂。《申报》对“四一二”政变前后的事实作了客观报道，表露了对广大工人群众一定的同情和支持，有的报道和刊登的申明、启事，还为被迫害、被屠杀的工人群众澄清是非，申张正义。在“四一二”政变同时，蒋介石对原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市政府进行改组，上海总工会被取缔，代之以反动派掌握的上海工联总会。紧接着，大批工人、革命群众和共产党员遭捕杀，上海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对新闻舆论的控制更为严厉。4月初，总工会的机关报《平民日报》被封闭，工作人员张静茂被捕。国民党的左派报纸被改组，有些进步报纸站不住脚，搬到了当时国民党左派势力占优势的武汉。1927年前后，蒋介石收买《商报》主笔陈布雷，又让他当自己的秘书。之后，又收买《大公报》总主笔张季鸾为蒋介石小骂大帮忙。国民党反动派对发行量最大的申、新两报当然也不会放过，企图派人参加编辑部，以控制报纸。《新闻报》曾一度派进了国民党人陈德征、徐天放，并出版了拥蒋反共的《学海》副刊。蒋介石企图拉陈冷下水，彻底改变《申报》的立场。但陈冷保持了不为人所利用的态度，继续与蒋介石朋友往来，但保持距离，不随波逐流，支持史量才抵制国民党派人进《申报》。可是在强大的压力之下，报纸也不得不发表一些为国民党反动派张目的新闻报道，以政治广告形式刊登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口号。

在以上矛盾尖锐、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申报》对时局演变、事态发展的态度，也可以在一篇时评中找到一些回答。时评写道：

局外人的眼光，不可挟以成见，挟以成见，即有所偏；不可以加以推测，加以推测，即不得其实；局外人之眼光不能率及本事以外之事，率及本事以外之事，则必周折而无所归。故局外人之眼光，在势只能及于表面，而其事亦只能就事表面以论事也^①。

这篇时评，公开地表示《申报》自己是一个“局外人”。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未能有知，未能洞察，因此只能对局势做一些表面文章，如果要加评论，冒犯了当时满脸杀气的蒋介石，那末大祸临头，报纸的生存也就会有危险。用这种“局外人”的态度来避免介入尖锐复杂的政治纷争，正是《申报》所抱的“不偏不倚”的态度的一种表现。然而，《申报》当时已是发行到十余万份的大报，有全国影响，各种政治势力和政治集团，包括一些社会势力都寄望于它的表态，都要求为他们的利益说话，甚至左右舆论。

4月间，大量政治广告的出现，《申报》似乎是为各种政党、集团、社团、社会势力提供了一个表演的舞台，让他们各自登台亮相，申述各自的观点和主张，以至发展到双方激烈论战，进行政治屠杀。而这些，都是当事人自己的事情，我“局外人”不得而知，也不担当任何责任。这样“不偏不倚”貌似中间的立场，虽然也说过一些公道话，报道过某些事实的真相，但毕竟是混淆了政治是非，湮没了真理，有时甚至站到国民党反动派一边去了。

十余年的艰难处境

经历了1925年以来连续战乱和多次政治运动之后，《申报》营

^① 时评：《局外人之眼光》，1927年4月13日《申报》。

业上继续有所发展，但由于国民党当局对新闻舆论界的压迫和控制没有丝毫放松，致使报纸的处境日益艰难。

1928年北伐军占领北京、天津，奉系军阀退出华北，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这样，国民党政权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宣称北伐胜利，暂时取得了形式上的统一，蒋介石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为了巩固它的统治，蒋介石发布了训政时期的政府纲领，进一步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压制人民的反抗斗争，甚至人们在茶余酒后议论国事也属非法。当时，上海市公安局派出警察经常到茶坊酒肆巡查，发现有“妄谈国事”者即行拘查。民间装有无无线电收音机者，也要到交通部无线电管理局登记，否则以私设论处。南京政府实施新闻检查，使新闻记者利用长途电讯拍发新闻的电报也受检查。1929年1月，在新闻界强烈反对之下，暂时终止新闻检查，但上海的新闻检查仍照常进行。仅1930年2月至10月，《申报》在当局新闻检查时，被临时挖掉印刷铅版，报纸版面上开天窗达九次，连所谓“违禁”广告也不得刊登。

在此种情况下，报纸对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工农红军的成长发展，以及江西苏区的建立都不能报道。《申报》以采用通讯社电讯稿或地方通讯的方式加以透露或从侧面报道，使留心国事者能从中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已开始改变策略，从城市转到乡村。《申报》陆续反映工人、学生和民主进步人士对北伐的失望和对国民党当局压制人民民主运动的不满。1928年8月间，报纸发表上海学联致蔡元培先生信中说：昔日侮蔑孙先生者，今日纷纷投机钻入党内，以言地位，则有高官厚禄；以言家室，则有娇妻美妾；以言经验，则有压迫民众之经验。革命之结果，除少数不耕而获者得以升官发财外，大多数民众未被解放。1928年2月间，发表倾向进步的国民党部分地方党部及海外支部等团体代表要求解除停止民众运动向国民党二届

四中全会的请愿书。1929年3月间，发表上海工人代表为成立上海总工会（“四一二”政变中被反动派取消）晋京请愿的宣言。宣言重申：上海工人阶级在北线战争中与直鲁军阀血战，从而解放上海的英勇业绩，等等。这些，也许是漏过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而登出的。这个时期报纸的评论，每况愈下，回避谈论国事，有时论远不论近，只谈一些国际事件。总主笔陈冷曾经是报纸短评的提倡者。当年他在《时报》上写的时评，文笔犀利，切中时弊。到《申报》后，在反对帝制复辟，军阀混战，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等方面，写过不少击中时弊的时评。但是随着政局的变迁，他感到“独立的报纸而又欲求营业发达，言论方面则长期处在朝秦暮楚，无所适从的苦楚中”。副总主笔张默1905年《申报》革新时从日本回国受聘进报馆，不少抨击清廷封建专制的评论出于他的手笔，而这些年也只能写一些不激不随，不痛不痒的东西。过去陈冷、张默两人的时评，具名为“冷”和“默”，这时为了避免麻烦不再具名，真正是做到又冷又默，很少有“独立”的声音了。张默在回顾20年代末期报纸的艰难处境时说：因政治不上轨道之故，党与非党，凡占有一部分势力者，无不利用报纸，以图伸张其势力，苟不如意，则叫嚣狂跳，声势汹汹，应付尤为困难。

由于《申报》在20年代中逐渐兴旺发达，史量才对报业的经营雄心勃勃。英国报业托拉斯的创始人，同时经办《每日邮报》和《每日镜报》两报的北岩勋爵参观访问《申报》，曾称誉《申报》为中国的《泰晤士报》。这时，史量才产生过组织报业集团的念头，在后来他从美国人福开森手里收购《新闻报》股权之后，又曾经有过一人经办两报的抱负。但他的愿望未能实现。

《新闻报》创刊于1893年，要比《申报》晚21年，为中外商人合办。自1899年福开森购得占65%的股份之后，成了报馆的大老板，1916年改组为美国报业公司。福开森与《申报》美查虽然都是外国人，但美查纯系商人，他既不参与政治活动，也不干预报纸笔政。

而福开森则不然，他参与中国的政治事务，曾任满清政府的顾问。清朝被推翻，他又任袁世凯的顾问。他经常南来北往，除控制《新闻报》之外，又兼任南京金陵大学校长。上海租界当局曾因他参与政事有功把今为武康路的马路命名为福开森路。因此，《新闻报》在福开森支持下对反帝反封建的态度就不坚决。1927年北伐之后，北洋军阀瓦解，汉口、九江的租界相继收回，上海工人、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岌岌可危，福开森预感到洋人占统治地位的时日已经不长，他想出让《新闻报》的股权，告老返国。

福开森把自己的打算通过与他交往甚密的《密勒氏评论报》驻津特派员董显光和《申报》经理张竹平告知了史量才。史量才认为这是从外国人手中收回报权的一种机遇，又符合他曾经有过的组建报业集团的设想。于是决定请董显光为全权代表与福开森协商，以十倍于票面的价格收购了福开森的全部股份，取代福开森成了《新闻报》的业主。他又按公司条例规定委派董显光为《新闻报》监督，以统揽大权。可是，当董显光前去《新闻报》上任的时候，受到总经理汪伯奇为首的一些职工的抵制，馆内张贴“反对报业托拉斯”，“反对军阀走狗董显光”等标语，迫使董显光难于上任，只得退出报馆。接着，汪伯奇等还联合上海商会虞洽卿、全国总商会冯少山等，以他们的名义在《新闻报》刊登巨幅广告，以反对垄断报业为由，反对组织报业托拉斯，并且推选严独鹤等为职工代表与史量才交涉，再经虞和德、陈德征等出面调解。史量才迫于形势，只得撤回董显光的任命，同意仍由汪伯奇担任总经理，将《新闻报》改组成华商有限公司。史将一部分股份转让给上海工商界人士叶咏堂、钱新之、吴蕴斋等人，并由吴蕴斋任董事长。史量才的股份虽然仍占50%以上，但他豁达大度，既不自己担任董事长，也不干预报馆事务，所有职工原封不动，工作一律照旧。于是，风波也就此很快平息。

史量才这次收购《新闻报》股权，组织报业集团的意图之所以受挫，除汪伯奇恐总经理的大权旁落，鼓动报馆职工联合虞洽卿等反对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国民党从中离间、破坏。当时国民党在上海只有一家党报，即《民国日报》，由于党气太重，毫无生气，读者很少，不能与《申报》的影响相比。因此，企图运用新闻检查的大棒来控制申新两报，包括上海的舆论。而史量才抵制新闻检查的态度坚决，不像《新闻报》那样容易就范。一当他们得知史量才在股权问题上受到《新闻报》及其他一些人的反对时，国民党上海特别指导委员会一方面警告《新闻报》不要出卖股份，一方面报请国民党中央建议由国民党来收买福开森所有股份。国民党中央终于采取行动，1929年1月14日《新闻报》一版显著地位发表了国民党致《新闻报》公开信，信中说：查该报馆现有大批股票为反动分子齐燮元、顾维钧、梁士诒等之羽党所收买。据确切报告，谓该反动分子等胆敢监视报馆，肆其阴谋，公然操纵。信中规定两星期内将该项落于反动分子手中的股票悉数收回。若“故意违抗，本党将严厉处置”。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此时也发动舆论攻势，连日刊登报道和文章。国民党上海社会局局长陈德征撰文，说收买《新闻报》股权是不合潮流的举动，声言要给予严厉的制裁。明明是史量才收买福开森《新闻报》股权，何来什么反动分子？明眼人看出这是国民党故意假造旧军阀羽党收买股票的谣言，以此来制造混乱，借机恫吓，以达到他们自己控制的目的，其真正的意图是对史量才的。原本，蒋介石确有打算国民党政府直接出面干涉，强迫史量才退股，由政府收买。后来，史量才派了与蒋介石有过交往的总主笔陈冷前往南京联络，向国民党人士说明收买《新闻报》股权全由史量才一人出资，并无别人参加。又有谙知上海报界内情的邵力子劝说蒋介石，政府不宜直接插手民间报业的股权纠纷，蒋介石接受了邵力子的建议，才派国民党元老，当时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叶楚伦从南京赶到上海，会见史量才，促成了

谈判。在国民党的压力之下史量才被迫后退。当史量才还在犹疑之时，陈冷曾经光临史公馆，对史量才说：你如果坚持下去恐怕要两败俱伤，危及根本（指危及《申报》），真个应了“兔卢相逐，田父收功”的话了！陈冷的话对史量才最有影响，所以史量才在《新闻报》股权上原来激流勇进的姿态，突然变得激流勇退、迅速收兵，不能不是史量才报业活动中的一次挫折。从这次股权风波中，史量才感到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民营报业的发展前景暗淡，他开始感受到蒋介石对他暗中的注意，随时都可以对他借机发难。

就在《新闻报》股权纠纷前后，报馆内部发生了一件不愉快事件。经理兼营业部主任张竹平原来在《申报》业务经营上做得颇有成效，但他感到自己如能另立门户，单独创业可能会财源大发。这样的打算如果堂堂正正地公开进行，也无不可，然而他暗地里购买了《时事新报》资产，同时又处处利用《申报》的信誉和方便为《时事新报》发展广告业务和报纸发行，对外又说《时事新报》为史量才购得，是史量才组建报业集团的一部分。当史量才获悉张竹平这一不正当活动后，十分气愤，感到张竹平的这些活动不但使《申报》的财源流失，更重要的是败坏了《申报》的声誉。为此，他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于1929年将张竹平在《申报》担任的职务解除。1930年之后，张竹平因《时事新报》营业不振，难于维持，接受了国民党官方的巨额津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张竹平自任总经理，陈布雷当了报馆总主笔，《时事新报》终于成了国民党控制之下的报纸。

在激烈的社会矛盾冲突之中，陈冷感到《申报》似乎处在三夹板之中，他的理想越来越萎缩，办事越来越谨慎。原来他已淡于参加社交活动，这时更少涉足。至1930年5月，他终于辞去了当了16年的《申报》总主笔，到浙江财阀投资的中兴煤矿公司当董事兼总经理。从此，他离开了从事20多年的新闻界，去做一个超脱尘世，视社会变乱如浮云的“局外人”了。陈冷离去，张默继任总

主笔，他更加小心谨慎地与各方周旋，尽力避免发生政治事故和外界纠纷。

史量才是报馆的总经理，是报纸的直接责任者。他对当时处境的感受比之陈冷、张默更为深刻。十多年来，《申报》建了报业大厦，采用了国外进口的先进印刷设备。报纸的新闻量大，经济信息多，社会新闻面广，专刊副刊形式各异，发行量上升至14.8万多份，其影响已经遍及沿海地区和全国各主要城市。人们普遍把《申报》叫作“申报纸”，将此作为一般新闻纸的代名词。这些都是史量才和报馆职工苦心经营的结果，也为新闻舆论界和社会公众所承认。但是，事业的发达，并不一切尽如人意。多年来战乱不息，造成工业衰败，商业凋敝。每发生一次战乱，往往使交通、电讯中断一次，不仅造成消息阻塞，发行难于畅达，更影响到进一步发展计划的实现。各个时期的执政者，都想把报纸作为自己的舆论工具，用重金收买，以高官引诱，强令派人到报馆进行控制等等。当局这种种手段的使用没有使史量才屈服。可是，在国民党政府当局的舆论控制和新闻检查之下，身上好比捆扎了一条紧紧的绳索，有时甚至连一点自由都没有，而且多方责难，处事维艰，怎么能够独立自主地办报呢？史量才说：“吾思服务《申报》十六年，实为十年公共老罪犯，盖无一日不受人指责，无一日不在法令制裁之中。吾志力薄弱，学业荒芜，不能使《申报》发扬光而大之。”从这些话当中可以想见，史量才对受到的限制和束缚内心十分不满，对未来忧心忡忡。过去，他没有寻求过任何政党和政治集团的庇护，对此他一贯忌讳，但又缺乏抵制当局和各方指责的力量。他希望历史不再朝着一条老路上走下去，“当此民空财尽，又安得历久不变沉沦终古乎！况治乱之转移，不过一转眼之间耳。如果人心悔祸，不难变则通。”^①后来的事实证明，前途虽然艰难，但终于逐渐从困境中走了出来。

^① 史量才：《申报发行2万号纪念》，1928年11月19日《申报》。

八、历史性的转折

新的起点

30年代初，是我国内忧外患发展到了最为深重的时期。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实现吞并中国、把中国变成它殖民地的阴谋，于1931年9月18日深夜，突然向我东北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几天之内占领了沈阳、长春等20多座城市。不到4个月的时间，东北三省沦于敌手。全国的惨祸迫在眉睫，中华民族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不去对付当前大敌，反而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把“剿共”作为训政时期的基本方针，1930年12月开始对江西中央苏区红军发动围剿。就在这个内忧外患的深重时刻，广大人民抗日爱国热情高涨，对国民党政府实行的独裁统治和不抵抗主义十分不满，上海、南京、北平等城市的学生、工人和市民发动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群众运动。

国难当头，大敌当前，亡国惨祸的紧迫，使民族矛盾迅速上升到了主要地位，除了学生、工人和市民，即使是工商业主、民族资本家也感到只有奋起抗战才有出路。知识界的许多民主、进步、爱国人士更是义不容辞地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的行列中来。这时，史量才的思想发生了积极的变化。过去十多年艰难的途程中，报纸保存了下来，业务和经营上取得了不少的进展，但精神上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他说“人心悔祸”，实际上包含了自责在内。他意识到社会进步与倒退冲突剧烈的时候，坚守不偏不倚，保守中立终究不是明智的举措，对于新兴政党和政治集团的主张

和行动也要放到时代潮流中来衡量，不能一概排斥。他决心借《申报》创刊 60 周年之际，进行改革和振兴。他的愿望和计划得到了爱国、民主、进步人士黄炎培、陶行知和戈公振的支持，尤其是陶行知的引导和影响，使《申报》的改革和振兴达到了一个新的思想高度。

黄炎培已经是史量才的老相识，前后几度参加《申报》工作，1922年《申报》创刊五十周年时，大型纪念册《最近之五十年》是他主编。黄炎培是上海浦东川沙县人，字任之，早年求学于上海南洋公学，15岁时考中秀才，1902年乡试中举，曾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1917年去美国考察，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理事长，史量才也是该社董事。1931年黄炎培东游日本，将考察《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之所得介绍给史量才，建议他运用20年报业发展的收获和所处的地位，振兴报纸，为社会多做一些工作。这时，一度去日避难的陶行知潜返上海，匿居北四川路，为商务印书馆翻译世界文学名著，经黄炎培的联络和介绍，史量才与陶行知取得了联系，共同讨论《申报》的振兴和改革。

陶行知是安徽歙县人，原名文濬。1909年考入南京汇文书院预科，后书院并入金陵大学，陶行知直接升入文科。他刻苦钻研，学习勤奋，在国文、法文、数学诸学科成绩优异，课余研究王阳明学识，受知行合一的启发，故改名为知行。他的认识进一步发展，感到王阳明的观点有不足之处，完整的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应当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故他又把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陶行知早年抱有教育救国思想，“五四”运动后热心科学、民主，反对传统教育与洋化教育，从事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和普及教育运动。他从1927年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创设之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开始，得到冯玉祥的赞赏和支持，创办了著名的南京晓庄师范。这是一所培养有真才实学的改造乡村社会和培养小学及

幼儿教育师资的学校。学生们打赤脚，穿草鞋，既学习，又劳动，立志于乡村教育革命，对当时处于黑暗统治下的进步青年具有启蒙作用和感召力量。1927年至1928年时，浙江临海县中学生郭风诏，青田县中学生叶刚，江苏如皋中学学生刘焕宗（即刘季平）、石俊、汤藻、马名驹等相继来到晓庄师范学习。他们当中有的曾在家乡进行过反土豪恶霸斗争，有的还在原学校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以后又有许多进步青年来到学校，其中有的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1928年夏天在中共南京市委领导下正式成立了晓庄师范党支部和团支部。党的活动是秘密的，陶行知虽然不完全知道，但这些学生在课余办的如中心小学、民众学校、晓庄剧社等，他是知道的，有的也自己参加。因师范地处南京郊区，为防止和对付散兵游勇和土匪的侵扰，学校组织联防自卫团，陶行知兼团长，刘季平担任副团长。有些活动他虽没有参加，但也不反对。所以，师院的革命活动以进步面目出现，受到陶行知的掩护和关怀。晓庄师范的业绩引起了浙江、湖南、河南、四川以及甘肃等地教育界人士的重视，纷纷派代表前来观摩，有的请陶行知前去讲学。晓庄师范逐渐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1929年秋，蒋介石亲自陪着夫人宋美龄前往参观，蒋介石对师范各个部门都仔细察看，联防自卫团的旧枪支的取得是经过内政部的领照都注意到了。

1930年3月下旬，日本的18艘舰只闯入长江，在南京、镇江附近江面停留挑衅。国民党南京政府鸣枪表示欢迎，激起了南京人民的强烈反对，晓庄师范的学生刘焕宗（当时任中共地下组织南京市委宣传部长）联络南京各校学生发起了反帝反蒋的游行抗议，队伍冲出城门，与曾因罢工受到镇压的英商下关一家工厂工人汇合，向停留在江面上的日舰示威，高呼：日本军舰滚出中国的长江去！这一事件使蒋介石大为震惊，他认定这是晓庄师范的共产党组织发动的。他命孙科、谷正伦威胁陶行知交出共产党员

名单，并要他开除这批所谓“闹事”的学生，遭到了陶行知的断然拒绝。4月8日蒋介石命令晓庄师范停办，学校在陶行知和全体师生的抗议声中遭到封闭。第二天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查有密布党羽翼图暴动情事”等罪名，对陶行知发出了通缉令。紧接着晓庄师范的学生叶刚、袁咨桐、姚爱兰、石俊（曾任晓庄地下支部书记）等十多名进步学生、学生党员、共青团员遭逮捕枪杀。陶行知已难于在晓庄停留，被迫潜往上海，匿居静安寺附近一个友人家中。当特务的追踪加紧，又移居至虹口内山书店，继而得到该店经理内山完造的帮助东渡日本避难。

史量才对陶行知从事平民教育和晓庄师范早有听闻，对他热心社会事业的精神甚为感动，但直接接触不多。1915年陶行知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时曾是杜威的学生，与胡适同学。1919年5月杜威应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的邀请来华讲学，途经上海时，由陶行知陪同访问申报馆，开始与史量才结识。之后，1924年6月，陶行知在从事平民教育活动中创办《平民周刊》，史量才感到这个周刊既有科学知识，又灌注着爱国精神，吸收为《申报》的一个增刊，随报发行，扩大影响，成为平民学生的自学读物。这次，经黄炎培的联络介绍，史量才对陶行知的危难处境，十分同情，对他的不屈不挠追求民主、进步的爱国主义精神感到佩服。当时，陶行知为了把科学普及到工农大众中去，在上海办了一个“自然学园”，并成立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编辑儿童科学书籍。史量才拿出十万元给以资助，作为这一公益事业的开办费和基金。同时聘请陶行知为《申报》顾问。考虑到当时陶行知还是国民党政府的通缉对象，为掩人耳目，未将陶行知列入《申报》职员名册，不到报馆办公，顾问名义也不对外公布，商讨工作则均在史量才同仁路的家里，大多数又在晚上，未往都由经理马荫良联络。史量才特别关照马荫良要注意陶行知的安全，来往大多由马荫良开汽车接送。有时也乘电车。在车上，陶行知和马荫良都装作互不

相识，一下车才互相点头致意。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为了办报纸和抗日救国，他们的活动竟像白色恐怖中做地下工作似的。

戈公振1930年参加了《申报》工作，他是江苏东台人。1913年到上海参加《时报》工作前后达15年，从校对编辑到担任总编辑，在编辑工作之余从事新闻学研究。1927年出国考察欧美新闻事业，到英、法、德、意、瑞士、美国和日本参加国际劳工会议、第一次世界经济大会和第一次世界报纸博览会等重要国际会议，于1928年底回国。应史量才邀请，离开《时报》参加《申报》工作。他认为《申报》的历史悠久，有全国影响，又有完备的传播设备。在报纸内容、报纸发行都有改进的地方。在建立报馆资料室方面，他更创立一套完整的资料收集、分类、保管方法。在他的倡议和主持下，1930年5月出版了大张影写版的星期画刊，内容丰富，印刷精良，可与当时《纽约时报》的星期画刊相媲美。戈公振参加《申报》工作之后，他白天在报馆工作，晚上经常到邹韬奋家里，与邹韬奋、胡愈之、杜重远、李公朴等讨论时局和抗日救亡活动，同时商谈邹韬奋创办《生活日报》的设想。参加筹办《生活日报》的有杜重远、李公朴、毕新生、戈公振、陈彬和、吴颂皋和邹韬奋七人，其中四个都是当时《申报》骨干。戈公振是主要编辑，陈彬和是评论主要执笔，吴颂皋是特约评论撰述，李公朴正在筹备申报流通图书馆。本来，史量才不主张申报馆的职工在外兼职，在黄炎培的劝说之下，经过邹韬奋的力争和商讨，史量才才特许戈公振等兼任《生活日报》工作。也由于这个缘故，使《申报》与邹韬奋、胡愈之等进步文化人士的联系密切起来，爱国、民主、进步思想进一步渗入到《申报》中来。后来，《生活日报》遭国民党压迫停办，他们也就集中精力到《申报》的改革中来了。

为了让改革和振兴收到切实的效果，1931年1月史量才成立了《申报》总管理处，统辖一切馆务。史量才是总经理兼总务部主任，经理马荫良兼副主任。总管理处下设设计部，黄炎培为主任，

戈公振为副主任。陶行知则是不公开对外的总管理处顾问。

在商谈报纸工作的时候，陶行知多次谈到当此国家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候《申报》应起的作用，他认为“五四”运动已过去十多年了，但民主和科学两大任务并没有真正实现。这次秘密返沪，仍然想和朋友们一起实现这两大任务。要老百姓讲民主，就是要反对专制；讲科学，要反对迷信，把民主与科学结合起来，中国就有希望。《申报》在这方面应该起的作用，一是言论：言论应有自己显明的政治主张，对时局的发展变化有所赞同、有所反对，有冷有热，不能温吞水。二是读者来信：鼓励读者在报纸上对政治民主进行讨论，让大家发表意见，表示自己的主张和要求，使报纸真正成为人民的喉舌。在多次商谈的基础上，制订了一个加强新闻和评论、创办《申报月刊》、成立社会服务部、申报流通图书馆等改革计划。史量才决定将报纸今后努力的方向公诸于社会，以取得社会公众和读者的响应和支持，使报纸的改革和振兴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于2月1日发表《申报六十周年纪念宣言》，报纸写道：

回溯以往，皆为陈迹，历史上之新页，正待以后陆续依次展开。《申报》为国内新闻纸中成立较早者，在过去六十年历史演进之洪流中，是否曾尽一分推进之力，为功为罪，非同人今日所愿计及。唯独在今后继续开展之新史页中，如何肩荷此社会先驱、推进时代之重责，如何使社会进入合理常轨，如何使我民族臻于兴盛与繁荣则是今天所特别关注的。

《申报》还在纪念宣言中，宣布今后办报方针：“一、认识到科学为人类探索幸福之钥匙，当尽力宣扬；二、文化为社会上层之建筑，其基础为经济，当努力陈述世界之经济形势；三、从社会问题矛盾现象中探求诸问题之症结；四、以极挚诚的态度，对政府、对国民尽舆论贡献之责任；五、愿与青年作诚意之商讨，愿为青年探路之良友，相携以共进于健全、纯洁、勇敢、进取、奋

斗之坦途；六、近年“到边疆去”之呼声常盈，当探讨移民屯边之实施计划与方案，并力加鼓吹促其实行；七、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枷锁，而跻我国家民族于自由平等之地位。”

正当全社同人决心振兴《申报》之际，在《申报六十周年纪念宣言》发表后的第17天，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践踏东北国土，“九一八”事变发生，国难当头，举国忧愤，全国人民都要求集中力量抗御当前大敌。《申报》只好把改革计划不急需的部分暂时搁置，留待以后实施，把报纸的新闻报道、舆论力量集中到当前抗日爱国运动中来，以激励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

激进的抗日救国舆论

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那些日子里，为了发挥报纸在抗日救亡中的作用，尤其是舆论作用，史量才每到夜晚，就与陶行知、黄炎培商谈，有时还约见杨杏佛、胡愈之，并访见宋庆龄，共同讨论坚决抗日，反对投降的报纸言论意向。言论的观点，十之七八为陶行知所提出，重要的言论陶行知还进行具体指导和修改。评论的选材大部涉及国人息息相关的重大事件，切中时政，内容精辟，笔锋犀利。

事变前的1931年8月间，潜入我国东北兴安岭刺探军情的日本军官中村雨太郎失踪，日本借此向中国东北当局提出交涉，一面集中关东军进迫沈阳，《申报》指出这一事件的真实背景，是日本传统的侵占中国的大陆政策，首先在侵占东北三省，进而进军华北。所以抵抗日本侵略成为当前的急务。当日本侵略军大举入侵东北，报纸大量报道马占山将军的部队坚决抵抗的英勇战迹，一面揭露蒋介石实行的不抵抗政策。当时，蒋介石怕冒犯日本，严禁张学良东北军士兵持枪出营，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静候中村事件的所谓“国际裁判”。当时一些还没有识破蒋介石不抵抗主

义的人，纷纷责难张学良，使张学良有口难言。有一次，北平各界抗日救国大会的代表会见张学良，代表们纷纷提问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逼得张学良忍着隐痛向代表们表态：“我姓张的如有卖国之事，请你们将我打死无怨，我张学良诸事均愿自己去干，如有卖国行为，你们将我杀死，将我头颅割下，我也愿意。”报纸于7月28日发表这个专电、为张学良向人民倾诉和表白内心隐痛，伸张正义。

报纸大声疾呼：外患当前，内争亟应泯灭，共赴国难，万不可再豆箕自煎，陷国家民族万劫不复之地。报纸要求国民党当局“党附于国，故须先救国；党其为民，尤应先救民。今国危民困，而犹断断于党见之争，放弃其当前重大救国工作，以为党见误国，以国殉党见。国为我全体民众所共有，民众决不能坐视其沉沦，如有危害国脉者，我全国民众当起而共弃之”^①。这是国内报刊最早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重要评论之一。10月10日，报纸借中华民国的国庆日，提出了抗日救国六大主张：提高民权，建设廉洁政府，武装民众，实行实业计划，改进教育，复兴灾区。其中，对于提高民权，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专制独裁，践踏民意，进行激烈的批评。报纸写道：“民权高于一切。在民主国家中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无权之民，即为变形之奴隶，即失去民主国家之真正意义。真正之革命政党，必立基于广大民众，为民众利益而奋斗之党。近年来，党权超越民权，镇压民权，浸且形成或为党权与民权之争。民众企望和平，而和平迄难实现；民众抗强御暴，而政府仍无抵抗。只有扶植民权之伸张，以符天下为公之真义。”

在加强报纸评论的同时，副刊《自由谈》不断以议论文章提倡抗日救国精神，每篇二三百字的小专栏《痛心的话》，刊登读者因大片国土被日本侵占而感到沉痛的心头话，连续发表黎锦晖创作

^① 时评：《一致对外究待何时》，1931年10月5日《申报》。

的抗日歌曲。开辟《玳梁忆语》专栏，说明这是为了追忆“甲午以前东邻早抱鲸吞之志，记之以见遗祸不自今日始”。史量才约请陶行知多写文章。副刊《自由谈》设置《斋夫·自由谈》专栏，刊登陶行知以“不除庭草斋夫”笔名的短文。陶行知感到国难时期国民党的党政官员不但不严于律己，而且越来越腐败。他文章中说：“政府官多，长字号也多，官众长多自然忙，忙了还必须玩。扑克玩玩，麻将玩玩，堂子玩玩，跳舞厅里玩玩，西湖玩玩，庐山玩玩，上海玩玩。什么都忘，党也忘，国也忘，人民也忘。”^①“中国有不怕死的兵，所痛心的是怕死的武官太多！中国的武官为什么怕死？中国许多武官不但‘金满身’，而且是三妻四妾，日夜沉醉在温柔的梦乡里不能自拔，如何舍得死？这种败类不除，如何能成？和日本打起仗来，这些人当中有的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有的会把金银存在外国银行里，带了妻妾到租界上养老去了。”^②

对于国民党政府实行内战的卖国政策，陶行知文章中指名道姓地批驳蒋介石，说中国的国事是弄颠倒了。“这国事的颠倒是由于逻辑的颠倒。蒋君介石说：攘外必须安内，孙君哲生说，救国必先救党。我的见解恰恰与蒋孙两君相反：安内必先御外，救党必先救国。”^③

何应钦演讲提到中国国民革命到如今算是打倒了军阀，完成了革命的第一阶段。对此，陶行知又有不同看法，他问何应钦：哪几个军阀已打倒？哪几个军阀复活了？哪几个革命军人变为军阀？要想对这个问题给一个水落石出的答案，必先说明军阀是什么？他说：且让我下一个定义吧！压倒主人自作主，挥霍兵饷如粪土，强盗进门不抵抗，主人赶贼他不许。这是一面检验军阀的镜子，每一个军人只要拿这面镜子把自己的行动比一比，便知道

^① 1931年11月2日《自由谈》。

^② 《战神前的对话》，1931年11月《自由谈》。

^③ 《颠倒的逻辑》，1932年1月8日《自由谈》。

谁是军阀^①。

至1932年1月,《申报·自由谈》一共发表了陶行知写的短文共104篇,内容涉及政治、哲学、经济、军事、历史、科学、文教等方面,主要针对当前的时弊。熟悉陶行知的人对《不除庭草斋夫》的笔名不甚理解,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蒋介石杀人如割草,仅就晓庄师范一个学校就杀了不少师生。我不除草留生意,不是弄僵了吗?晓庄师范被封,斋主做不成,何妨做个斋夫。我生来不变色,一样为人民说话做事,一本初衷为革命保留生机啊!人问他为什么短短时间内向《自由谈》投那么多稿?他说:我就是爱那“自由”两个字。我见到了《自由谈》便想到儿童的自由,妇女的自由,被压迫民族的自由,世界弱小民族的自由。我在这里开自由之炮,破奴隶之域,缴奴隶主之械,解奴隶之镣,不使人间再有奴隶,人人都成为自由人。

为了扩大短文的影响,《申报》将全部文章汇集编印,取名为《斋夫·自由谈》,于1931年4月间出版,还请93岁的老人马相伯题写书名。国民党政府在1931年1月31日制定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原则》,以危害民国为目的活动要处以死刑。《斋夫·自由谈》揭露、抨击新军阀的腐败和实行不抵抗主义,尤其是指名道姓“蒋君、何君”地进行辩论,其尖锐的程度令国民党人士看了坐卧不安,但恰恰得到广大爱国进步人士和读者的好评。时当人民抗日热情高涨,国民党还摸不着这个“斋夫”到底是谁,一时难于扣上《危害民国罪》的帽子,只得以后留待机会进行报复。

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主义,引起了广大人民的不满,国民党在南京举行一次中央全会的时候,蒋介石大唱“抗日亡国”的论调。他说:“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

^① 1932年1月12日《自由谈》。

就亡国了。”蒋介石既然这样说,何应钦、汪精卫也就更加放肆。何应钦说:“日本有多少烟囱,日本人有多少工厂,我们如何能比,不抵抗还可以支持几天”^①。汪精卫也是这种主张不抵抗的论调。会上也有主张抗日的,但他们的主张不占上风。据说投降派把这种不抵抗甘当亡国奴的论调告诉了日本人,因之日本的侵略气焰更加高涨,也大大加速了侵占中国国土的步伐。《申报》以及其他报纸不断将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种种迹象公之于众,而且进行激烈的批评。人民群众从报纸传播和国民党军队步步后撤的行动中看到了事实真相,激起了抗日爱国不愿做亡国奴的热情。上海、南京和北平等城市发生了学生、工人和市民的游行请愿,要求蒋介石国民政府改变投降政策,坚决抵抗日本侵略,对此,《申报》以显著地位进行报道。10月30日还发表了上海市150多个工会组织,代表80多万工人,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的新闻,联合会通电中央政府,要求组织义勇军,誓为政府起来抗日的后盾。报纸还刊登了上海、汉口、天津等地商号抵制日货,要求“实行对日经济绝交”。报纸的大量报道,反映了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坚决抗日的愿望和勇敢前进的壮丽场景。

11月上旬,日军已侵占东北的辽宁、吉林两省,正利用内蒙边督张海鹏部继续向黑龙江大举进犯。守军马占山识破日本侵略者的野心,率部英勇抵抗,击退来犯日军。这个消息在全国人民中引起强烈反响。《申报》连续发表时评,称:忠勇哉!悲壮哉!马将军。赞扬马占山精神,是足以动天地泣鬼神的精神,足为二百万军队之模范。当马占山部在日军飞机大炮狂炸猛攻之下弹尽援绝之时,报纸在《吾人能坐视马占山孤军抗暴乎!》的时评中,提议人民勒令原黑龙江省主席万国宾缴回卷逃的省库,支援马占山将军。

马占山的英勇抗日还激起了上海学生的抗日热情,11月下旬

^① 冯玉祥:《我们认识的蒋介石》,文化供应社1949年6月再版。

2000多大学生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援助马占山。学生们要等蒋介石的亲自答应，否则就不返回学校。11月9日，上海各大学抗日团体举行的集会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国民党上海市执行委员陶百川与市公安局局长陈希曾串通，唆使王福生等人绑架北京大学前来支援集会的学生代表许秀岑，殴打中山大学学生代表江学乾致伤。下午，进一步激起各校学生代表五千多人请愿，在学生们强烈要求之下，市长答应三天内处理以上事件，将公安局局长陈希曾停职查办，市党部陶百川通缉拘捕。但事后两犯逃之夭夭。《申报》为上海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刊登了悬赏缉拿启事。启事说：三天期限已过，市府尚未将两犯交出。据称逃匿无踪，无从拘获。为此，除函请临时法庭公告缉捉外，还希望各界爱国人士一致协助捉拿。倘将陶、陈两犯缉拿送到者，酬洋五千元；拿获两犯中其中一犯者，酬洋三千元。国民党市党部害怕报纸的宣传会造成事态继续扩大，12月10日命令邮务管理局扣留《申报》及其他刊登九日事件的上海各报，不准运寄外埠。以限制消息的扩散。史量才是公推的上海日报公会会长，他与各报会员商议后，以上海日报公会的名义向当局提出抗议，提出报纸乃社会公器、人民的耳目喉舌，过去遭非法摧残已经含垢忍辱，今天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现今大难当头，举国上下而知舆论之重要，各报同人自当追随时彦之后。为此声明：为保护报纸的尊严，决定即日起绝对不受任何检查，绝对不受任何干涉。13日，《申报》发表《再论自由之真义》，反对国民党当局扣发上海各报。

12月18日以后的连续三天，南京学生大示威，包围了国民党党部，捣毁造谣生事的《中央日报》。在全国人民一片抗议呼声中，又在广东“国民政府”汪精卫、孙科等要挟之下，蒋介石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宣布下野，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辞去了国民政府主席及行政院院长职务。学生、工人、市民和新闻界的抗议浪才暂时平息下去。

发表《宋庆龄为邓演达被害宣言》

蒋介石下野，广州市民游行放鞭炮以示庆贺，上海的学生、工人、市民和新闻界一致感到高兴，也想买炮竹放个痛快。然而识事务的劝告人们还是慢点高兴。《斋夫·自由谈》发表《且慢》一文^①，劝告人们慢一点快乐，留下炮竹等到被灾的同胞得到了温饱，东三省主权得到完全恢复，全国人民实实在在做了中华民国的主人翁，世界一切被压迫的人都翻身做了自由人，到那时才有兴味放炮竹。

《且慢》的话不是没有道理。蒋介石下野前后，一起暗害邓演达的事件突然发生。

邓演达是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早年参加同盟会，1926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北伐军武昌攻城司令。1927年3月与宋庆龄、何香凝、吴玉章等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定，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以后又任中央农工部长兼武汉军事政治学校、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负责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蒋介石通缉，流亡苏联、德国。11月宋庆龄等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的宣言》，提倡继承孙中山遗志，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1930年回国后，领导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任总干事，进行反对蒋介石新军阀的斗争。1931年8月17日当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对政治部干训班讲话时，遭到蒋介石特工的逮捕。在连年军阀混战过程中，国民党南京政府内部变幻离合，

^① 1931年12月20日《申报·自由谈》。

右派强化对左派的压制。尤其在全国人民抗日呼声高涨，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强烈不满，国民党左派和民主进步人士对蒋介石的独裁专断的反感加剧的时候。蒋介石虽然被迫下野，但他老谋深算，以退为进。他想到自己下野后，最有可能上台的是邓演达，邓在国民党的地位、声望和影响并不亚于蒋介石。为了解除将来的威胁，蒋介石不惜下了毒手，指使他的侍卫长王世和于11月29日将邓演达秘密杀害于南京汤山。

罪恶的行径是封不住的，邓演达被害一事终于逐渐暴露。当消息传到上海时，国民党内和民主进步人士十分震惊，住在上海的宋庆龄更为愤慨，她决心公开谴责蒋介石。她起草了谴责蒋介石杀害邓演达的宣言稿，派人送到史量才家里，希望《申报》发表。史量才即刻找陶行知、马荫良商量，都认为宋庆龄的宣言义正词严，应当发表。考虑到如果上海各报同时发表影响就会更大。史量才是当时公推的上海日报公会会长，他以会长的身份连夜召开会议，要求各日报第二天同时刊登。他在会上说：“这是孙夫人亲自签名要求发表的，不是报纸造谣，我们没有不登的道理。”为避免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防止可能出现的麻烦，决定不送检查。出于宋庆龄一贯来坚持正义事业和她的威望，经过史量才的动员说服，除《民国日报》外，上海日报都在12月20日以显著地位发表了《宋庆龄为邓演达被害宣言》。

《宣言》开头指出：“中国国民党早已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日已成为不可掩盖之事实。亡国民党者，非其党外之敌人而为其党内之领袖。”接着回顾：“十六年的宁汉分裂，因蒋介石个人之独裁与军阀官僚之争长，党与民众，日益背道而驰，借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阴狠险毒，贪污欺骗，无所不用其极。在中央则各据要津，营私固位；在地方则鱼肉乡里，作威作福。投机残余军阀，可跃而为党国中坚；忠实革命人材，必设法置之死地。最近，如艰苦卓绝、忠勇奋发之邓演达终遭惨杀，即其一例。”

《宣言》在分析宁粤对峙的原因和实质之后，说明党之堕落，国之陵夷，皆为离开工农之结果，惟有以工农为革命中坚才可以防止革命势力之堕落。为此，她深信真正以民众为基础，为民众而奋斗之革命势力，可以消灭军阀官僚，铲除帝国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同时，深信中国真正革命者。不必因反动势力之恐怖而消极畏缩，且将因环境之压迫，民众之呼号，而益坚其牺牲奋斗之志，共进于革命之大道。

宋庆龄的宣言在各日报发表之后，在上海以至全国社会各界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宋庆龄是国民党中杰出的左派，早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革命失败之后，她已看清并指出国民党违背了孙中山的革命原则。这次，她宣言中的论断，使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爱国民主人士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史量才也从中加深了对大局的认识，他在和报馆同人马荫良等人的言谈中曾经说过：“孙夫人（当时民主人士对宋庆龄的尊称）和我都从斗争中认识了国民党。但她的斗争历史长，经验丰富，站得高，看得远，认识深刻，见解透彻，政治主张明确、坚定。”^①从此，史量才对国民党的本质认识更为深刻，表现在报纸上的进步立场也进一步坚定和显明。

《申报》和上海日报发表宋庆龄关于邓演达被害的宣言，直接揭露和批评了国民党，实际上是指蒋介石。但这一次国民党政府默不作声，一方面慑于宋庆龄的威望，如果出来干涉《申报》和各日报，等于是干涉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另一方面许多国民党中的左派、中间派和民主爱国人士对蒋介石的杀害邓演达已强烈不满，就在宋庆龄宣言发表的同一天，《申报》刊登了《发起筹备邓演达追悼会启事》，具名的发起人有胡汉民、孙科、冯玉祥、李济深、李烈钧、程潜、唐生智、黄绍竑、张发奎等，声势和阵容可

^① 马荫良：《在上海政协、新闻界史量才殉难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1984年11月。

谓不小，蒋介石也无奈于他们。

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北之后，侵略野心继续扩张。1932年1月28日晚，日本海军及其陆战队突然从长江口登陆，向上海吴淞、闸北一带进犯。事先，日本通过他们驻上海领事提出上海军民不准抵抗的无理要求，上海当局表示屈服，下令取消了上海市人民组织的抗日联合会、国民党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不顾政府不抵抗的“训令”，率十九路军英勇抵抗，使日军侵略锋芒受到挫折。在“一二八”事件发生的第二天，《申报》在时评中指出：上海之战，不只是上海之战，而是全民族生死之战。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不顾政府训令，率领十九路军及上海义勇军向日本海军陆战队应战，便含有这种新服从之重大意义。报纸并呼吁全国军队起来踏着十九路军的血迹，收复已失去的国土。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敌得到全市人民热烈响应和支持，为适应读者了解战况的要求，《申报》增加晨刊或夕刊，以加强战争新闻报道。《申报》摄影记者王小亭化装成菲律宾汽车司机，驾车通过日军的岗哨，至前线拍摄战地新闻照片，读者更加明了前线战况。

这个时期，史量才已不只是一个报业工作者，而且还是一个积极参与抗日救国的社会活动家。当战火燃烧到上海的时候，他除了运用手里的武器，强化抗日战争的宣传外，进一步介入到抗日爱国的社会活动。为了支持前方的军队作战，防止日本侵略军进犯时可能出现的无政府状态和社会混乱，他征得宋庆龄、陶行知等爱国进步人士的共识，与虞洽卿、王晓籁、杜月笙、张公权、钱新之等金融界、实业界头面人物和社会闻人一起组织成立地方维持会，史量才被推选为会长，黄炎培为秘书长。维持会应付地方事件外，发动各行各业组织义勇军，协同十九路军作战。动员上海各界、国外侨胞捐献支援军队给养。史量才自己以身作则，他顾不得二十多年来积聚起来的财富，准备毁家纾难。当杨杏佛陪同宋庆龄去同史量才商谈十九路军军饷时，他慷慨解囊，

将存在英商汇丰银行《申报》准备购置纸张的七万美元（当时约合二十余万银元），兑成银元捐献给维持会，以供战时的急需。他这种为了抗日的奉献精神，使工商界人士深受感动，促进了不少爱国捐献。当时，上海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高昂斗志，为上海反帝斗争史上所少见。

当日军进犯市区闸北等地受挫，四次更换司令官，继续增派四个师团，三十余艘军舰，总计兵力在10万人以上，几乎倾其全国海陆常备军的三分之一，于三月间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在浏河一带大规模登陆。宋庆龄、杨杏佛和史量才研究当时战争形势，估计到日军可能继续在长江口岸和沿海登陆，曾请人绘制了苏浙两省沿海和长江下流形势地图，由史量才当面交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转国民党政府当局，希望引起南京方面的警别和重视。但是蒋介石不但不增兵筑防，反而命令国民党海军与日本海军“维持友谊”，甚至让他的部下与日军司令野村同坐汽车参观各地战壕。蒋介石媚日到了这种地步，是史量才难以预料的，他总希望当局在形势危急关头有所举动。当蒋光鼐、蔡廷锴把从“一二八”事变到六月撤兵这段时间内，蒋介石不抵抗的手令、何应钦训令全部交史量才阅看时，这才使史量才恍然大悟，了解到蒋介石勾结日寇，实行不抵抗主义，已经是无可挽回，感到上海宋庆龄、杨杏佛和自己的一片好心都是枉然。其实，当《申报》发表救国主张和“一二八”之后的抗日报道和评论，以及史量才组织成立地方维持会支持十九路军的等等行动，吴铁城已向蒋介石告密，说“史量才支持抗日活动是阴谋上海脱离国民党统治，不可不防”。为此，蒋介石早已怀恨在心，对于他和宋庆龄、杨杏佛抵抗日军的建议也更加不会理会了。

上海之战，是孤军之战，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最后十九路军被迫后撤，离开抗战前线。国民党当局议和心切，不多天即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以便集中力量去围剿红军。这几

乎同中国近代史曾经有过的打了胜仗反而签订丧权辱国的卖国协定一样。1932年4月30日，正逢《申报》创刊六十周年的日子，编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写道：

六十年中殆无一日非国难，六十年来之本报可谓一部国难实录，一部鞭痕层叠、血泪交织的丧礼日志。回首曩昔，诚令人叹息感喟，今日已临到最后之生死线上，我民族其终为酣梦之睡狮，以坐待宰割乎，抑其奋然而起步，陈死新生之坦途乎！

在六十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报纸以一个半版的篇幅刊登了纪念文章。在文章右侧版面上，还以特大号字体分两行写着：“媚外苟安，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者，罪浮于汉奸”的警句。读者们看了，对矛头所指心领神会。

刊登《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

当蒋介石军队围剿江西工农红军的同时，加紧了对上海中共地下组织的破坏，一些党的重要干部遭逮捕。1931年4月下旬，协助分管党的保卫工作、掌中央核心机密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去武汉时被捕叛变，国民党当局企图乘机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将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干部一网打尽。事发前，这个阴谋被我地下党员及时获悉，迅速告知了中央。周恩来在陈云等同志协助下对顾顺章留下的破坏后果采取了断然措施，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避免了一场大破坏。国民党当局原来的阴谋未能实现，遂悬赏缉拿周恩来，但这时周恩来已离开上海去江西苏区。国民党缉拿无着，遂指使特工机关和顾顺章策划制造了在报上刊登伪造《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的破坏活动。

1932年2月15日，《申报》广告门市部收到这则《伍豪启事》（《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之简称），来人要求作为

广告在报上刊登。广告的担保者是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上海商会理事王延松有密切关系的一个钱庄，盖有钱庄的印鉴，按照刊登广告的规定，手续完备。“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或曾用名，他在国外用过。为从事地下活动的方便，周恩来还用过周少山、周翔宇等名字。广告部对这则不同寻常的《伍豪启事》进行研究，感到启事中脱离共产党的人有243名，但没有这些人的具名，单单只具“伍豪”一个人，怀疑其中必有问题。当史量才得到经理马荫良的汇报之后，感到这是涉及到共产党声誉和国共两党关系的大事，从过去刊登政治广告中吸取教训，处理得特别慎重，他与陶行知商量之后，告知广告部与聘用职员兼律师黄品堂，决定暂不刊登。

这则《伍豪启事》的广告，也同时送给了《时报》、《新闻报》和《时事新报》。《时报》于16日、17日连登两天，《新闻报》也在18日刊出。就在《新闻报》刊出启事的这天上午，有人又向《申报》广告部送了一则《伍豪声明》，要求作为广告在报上刊登，其内容是否认《时报》、《新闻报》所载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这一事实。报馆考虑到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之下，周恩来在上海坚持党中央的地下斗争，享有崇高的威望，刊登这个《伍豪声明》对维护周恩来的威望、避免共产党内和进步力量之间的混乱是必要的。但是《申报》的广告部考虑自己的处境和苦衷，为了避免引起争执，由黄品堂律师向送登广告的来人解释，因《申报》没有刊登《伍豪启事》，故也不便刊登《伍豪声明》。

当时《申报》的发行量比《时报》、《新闻报》大，社会影响也大，拒登《伍豪启事》终于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19日国民党上海新闻检查处派员到报馆质问，为何其他两家报纸都登，而《申报》独独不登，于是强令必须补登。广告部迫于国民党的压力，又鉴于《时报》、《新闻报》均已刊出，不得不在2月20日刊出。

刊出后，连续两天有人前来交涉说，既然《申报》现在已补登

《伍豪启事》，那末也应该刊登《伍豪声明》，才能证明《申报》是客观公正的。黄品堂告诉他经过核对，因铺保福昌床公司否认作保，手续不全，这则声明难于刊出。来人认为广告部的回答口说无凭，要求作出书面答复。对于手续不全不登的广告，过去广告部从来不作书面答复，经与经理商量，这次只好破例，以广告部名义用书面说明不登的原因。谁知第二天这个人又来交涉，再三要求将昨天广告部给的复信作为广告在报纸上公开登出。显然，当敌人利用报纸对共产党进行破坏的时候，而来人也借用报纸进行合法斗争，向敌人反击。这个所谓来人无疑是共产党地下组织派来的，如果报馆报告警方，国民党勾结租界当局，马上就可以把他抓起来，事情可以就此了结。但申报馆没有这样作。事关重大，经理马荫良、设计部副主任戈公振和史量才商量，又得到陶行知的支持，于22日刊出了这则《申报》广告部复信，内容谓：“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声明一则（即伍豪否认报纸上登的脱离共产党启事的声明——作者），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

从这则复信中，明眼人一看，就可以发现16、17和18日，《时报》、《新闻报》刊登《伍豪启事》以及《时事新报》也刊登的这几天，另一个“伍豪”见到了“启事”而写了辟谣“声明”，要求《申报》发表。这个声明虽然没有刊登，但报馆已用回答伍豪的方式，间接地说明了伍豪有一个否认国民党制造的谣言的声明留在申报馆。这个事实清楚地告诉人们，事实上有两个“伍豪”；一个是假的，另一个是真的；《伍豪启事》是假，《伍豪声明》是真。《申报》刊登给伍豪先生的复信起了去伪返真辟谣作用。

发生这一政治事件的时候，当时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潘汉年正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他曾就这一事件主持起草《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在党的地下报刊《实话》（第十一期）上刊登。但因为是在地下刊物，发行量少，影响也小。为此，决定

设法要在上海最大的《申报》上辟谣，以进一步澄清全部事实的真相。他们通过法租界巡捕房的律师陈志皋，物色和委托巴和律师来承担。巴和律师是法国人，也是申报馆聘请的常年法律顾问。他曾任法租界公董局董事，在租界有一定地位和声望。他为人正直，有正义感，《申报》同他接触中感到他主张民主自由，对国民党当局实行独裁、压制人民也有不满。他为租界服务外，也能为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主持公道。上海的租界内华洋杂处，情况复杂，加以军阀、政客、买办、财阀、流氓、帮会聚集一地，经常利用报纸互相攻击、造谣中伤，或受国民党利用对报纸施加各种压力。《申报》不得不聘请外籍律师作为顾问，排忧解难，开展合法斗争，以保护自身利益。处理《伍豪启事》这样的政治事件，中国律师慑于国民党的权势，一般不敢过问，而巴和律师敢于承担这个风险。于是，以周恩来另一个别名出面的一则《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送到申报馆广告部，报纸于4月4日全文发表，内容是：兹据周少山君来本律师事务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两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是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产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这个紧要启事的文字尖锐，语句坚定而明确，清楚有力地说明了2月间报纸上刊登的那个《伍豪启事》是完全伪造的。一场国民党制造谣言诬陷周恩来的阴谋，也就被彻底粉碎了。

在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之下，为了去《申报》联系交涉，都是由潘汉年和李一氓组织指导下进行的。申报馆按照刊登广告的手续照章行事，这是为了预防和对付国民党可能带来的不测。因此，报馆根本不去过问来人的底细，实际上彼此心照不宣。对史量才、陶行知说来，这是有利于革命工作的一部分。这种特殊现

象，形成了党的秘密工作和新闻媒介的公开报道的巧妙结合，是近代史、新闻史上极为少见的。

三论“剿匪”与“造匪”

蒋介石辞去了国民政府主席及行政院长职务之后，仍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他借了掌握的党权修改了《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长“均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国民政府主席不负实际政治责任，五院院长“各自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1932年1月，在帝国主义的撮合下，蒋介石与汪精卫经过杭州密谈，蒋汪重新合作，蒋还当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也就是国民党政坛称蒋介石为“蒋委员长”的由来。蒋介石大权在握，加紧了1930年以来对江西工农红军的进攻和围剿。

当“一二八”上海之战激烈之时，江西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日宣战的通电。国民党军队也有爱国之士要求共同对敌、一致对外，“剿共”前线的三十多个将领由朱绍良领衔打电报请缨上前线抗日，江西人民请熊式辉援沪，湖南请何键援沪，广东促四集团军援沪，徐州方面请缨抗日的通电达数十通。他们的行动，得到上海人民的拥护，《申报》曾给予连续报道。可是，蒋介石不但置之不理，反而在六月间于庐山召开了军事会议，经过精心策划，决定集中三十万兵力，由他亲自担任剿共总司令，对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这个阴险的大动作引起了上海的宋庆龄、杨杏佛、史量才、黄炎培和陶行知的密切注意。这时候，在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国民党政府被迫由教育部出面，“训令”发还被封闭的晓庄师范。对陶行知的通缉令虽未明令取消，但蒋介石说这是“胡汉民的主张”，不是他要这样做的，实际上解除了对陶行知的通缉。于是，匿居了两年之久的陶行知光明正大、理直

气壮地恢复了公开活动，能有更多的机会参加《申报》的工作。经过史量才和陶行知、黄炎培、杨杏佛共同多次商谈，认为应该运用报纸的舆论来揭露和反对蒋介石这个围剿的阴谋。由陶行知出主意，经过大家讨论修改，撰写了《剿匪与造匪》的时评，于1932年6月30日起连续在《申报》发表。

首论《剿匪与造匪》指出：今日之“匪”皆黑暗政治造成，政治上既一面“造匪”，政府更一面“剿匪”。匪既不能剿而绝，或且以剿而势日以张大。抑且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枪口不对外，而以剿杀因政治经济双重压迫铤而走险之人民。

7月2日发表《再论剿匪与造匪》，除继续就政治黑暗、经济压迫、造成“匪”患蔓延全国外，指出了真正应剿灭的对象是谁：所谓匪者，即扰害地方、鱼肉良民之意，是则今日勒种鸦片、公卖鸦片、勒收苛捐、搜刮民财者，其所为无一不积极造匪。匪而应剿，则此辈造匪者，固独不应先为剿灭乎？！

七月四日继续发表《三论剿匪与造匪》，更进一步揭露和激烈抨击今日政治黑暗和纷乱之最大症结为贪官污吏，为产生贪官污吏的反动统治。时评写道：吾人但看今日一入官门者，即成富翁，官愈肥而民愈瘦，一家笑而万家哭。此种黑暗，殆为旷古所罕见。评论引述了蒋介石剿共要实行所谓“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既然讲政治，则要澄清政治，其最先之要着即为彻底肃清贪官污吏。杀一贪官污吏，实胜于动员一师剿匪军队，整饬一师之军纪，严加训练，使其不匪化，又胜于动员十万剿匪大军。盖今日之事，与其积极不剿匪，毋宁消极不造匪。

《申报》《斋夫·自由谈》的文章，对国民党蒋介石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官场腐败、不可救药不断进行尖锐的、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抨击，引起国民党官员极大的不满。此次，《三论剿匪与造匪》的发表，更加引起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仇视和恐慌，他们急忙

电告南京国民党中央。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查询上海市党部后，亲自写信给在江西庐山的蒋介石，报告《申报》发表《三论剿匪与造匪》的动机、背景和操纵者。朱家骅之所以对此事如此积极，除了他是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外，还由于他对《申报》怀恨在心。朱家骅是国民党右派领导人之一，原来是中山大学校长，1932年初他官运亨通，改任教育部长，可是，在他任职两年之间，学校经费和教职员工的薪金积欠半年之久，而跟随他离去的教职员倒发了薪金，这笔钱又是朱家骅从水灾捐款中挪用的。这些事透露后引起中山大学学生不满，写信检举揭发。对此《申报》发表评论指出：“国家每年可费国币百分之八十以上养二百万之军队，政府可任意将巨款赠贻个人；亦可巨款治主席之官邸，独对此不容少之教育经费长年欠发，使学校日虞停闭。故我国事实上已无教育。政治不上规道，则教育一日无法整顿，而学潮无由止息。”^①当中山大学校长长时间虚悬不能再悬之时，行政院任命教育部次长段锡朋兼校长，学生认为段锡朋是一个政客，不符校长人选。当他乘汽车到校接事时，受到学生的阻拦，双方引起冲突。段锡朋摆起官僚架子，申斥学生并动手去捉拿学生，遭到学生殴打，长衫被撕破。为此事，行政院着令解散中山大学，逮捕学生六十余人。《申报》对这一事件都作了详尽的报道，并在7月3日《中山大学学潮评议》的评论中，批评教育之日益败坏，原因之一是官僚主义之侵入，教育为专门事业，段锡朋何能兼任中山大学校长。段锡朋也自认不敢当此重任，而是朱家骅强要他当的。这篇评论是《再论剿匪与造匪》发表后的第二天刊登的。国民党官方感到《申报》的抨击之猛烈，把报道学潮的《申报》教育记者钱芝生指为煽动学潮的恶劣分子，而遭到警备司令部的逮捕。以上这些都是朱家骅怀恨《申报》的直接原因，也是他给蒋介石写

^① 《政治纷乱与学潮》，1932年6月15日。

信的重要内容。他还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诬称史量才是报阀，利用他手中的舆论工具，专做危害党国的事，甚至想称霸一方，图谋上海方面独立。

在庐山的蒋介石接到朱家骅的报告和信件之同时，已准备好对工农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时《申报》公然三论“剿匪与造匪”，指名道姓地指责蒋委员长。连同《申报》过去发表的种种揭露和批评国民党的文章和评论，以及宋庆龄为邓演达被害发表的宣言，蒋介石愤怒已极，立即在朱家骅的信上批示：“申报禁止邮递”。指令上海警备司令部派员驻上海邮政总局监督执行。《申报》办在租界里，本埠报纸由报馆派车直接送达，外埠报纸因远在全国各城市，报馆没有专设送报机构，靠邮局递送，其数量要占到很大一部分。自遭邮禁之后，自7月16日起，发往南京以北、杭州以南等地的报纸都被弃置于邮政总局地下室，每隔一天的深夜运到龙华焚毁。在邮局工作的几个读者看了心痛，7月20日写信告诉报馆。史量才得知这一情况，嘱业务部向上海警备司令部询问，警备司令部诡称不知道。史量才气愤之中，打算将这一事件在报纸上公之于众。地方协会（由“一二八”时成立的地方维持会改名）副会长杜月笙、钱新之获悉此事之后，都认为“和为贵”，劝说史量才保持耐心。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黄炎培等要求摸清情况及国民党当局的意图后再作决定，因为当时对造成报纸被扣的直接原因还不清楚。于是，史量才与《申报》南京办事处采访主任、驻南京特派员秦墨晒商量，请他去了解情况，查明原因，再设法找南京国民党中央方面进行疏通。

秦墨晒过去是《申报》驻北平特派员，驻南京后采访消息时在官场走动较多，结识了不少显要人物，如蒋介石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就是他熟悉的要员之一。秦在南京稍事活动后先去求见陈立夫，陈立夫感到这事必定为最高层所为，他立即为秦墨晒写了两封信，一封介绍他直接去求见蒋介石；另一封介绍他到武汉活动，去见

汉口公安局长陈希曾，因陈立夫知道蒋介石即将去武汉。时届盛夏，秦墨晒汗流浹背匆匆地赶到庐山，但这一天蒋介石正下山，要乘飞机去汉口。秦墨晒见机不可失，立即向蒋介石递上陈立夫的信。蒋介石已坐进轿子，对这位驻京记者的求见倒还留了拆信的面子。但他因急于下山，已来不及详谈，要秦墨晒乘船到汉口去谈。秦墨晒又急匆匆地从九江乘船赶到汉口，首先去见杨永泰，告诉他来汉口的目的。杨永泰听完之后随即拿出了留在他那里朱家骅给蒋介石的信和潘公展的报告，秦墨晒一看之后，这才了解了事件的内幕，并见到了蒋介石用红笔在朱家骅信上批的“申报禁止邮递”六个大字。事已惊动了“最高统帅”，感到了问题的严重程度，报纸邮禁的原因也搞清楚了。他立即向上海的史量才作了汇报。

几经周旋谈判，蒋介石指定他的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按照他的意见处置，提出了恢复《申报》邮递的三个条件：一、《申报》评论的态度必须改变；二、撤换总编辑陈彬龢（因三论《剿匪与造匪》的评论有“彬”的署名，国民党官方认为是陈彬龢所为），并要陶行知、黄炎培离开报馆；三、国民党中宣部派员到报馆指导工作和发行。秦墨晒通过电报将以上三条向史量才汇报、磋商，再通过杨永泰报告蒋介石。这时，国民党的特务情报机关显然已了解陶行知和《申报》的关系，以及报馆的不少内情。史量才与陶行知、黄炎培等商量后，再听取宋庆龄的意见。共同认为为了保存继续斗争的报纸阵地，不得不作妥协和让步。史量才通过杨永泰向蒋介石表示：评论的态度可以缓和，陈彬龢自愿去职，总编辑仍可由张默接替，黄炎培是自己的老朋友，不担任实职，由于生计，按月送一点钱，实际不到报馆办公，陶行知并不是报馆人员，他的文章是投稿性质，任由编辑选择取舍；但坚决不允许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员来报馆。他认为《申报》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报纸，从来没有拿过任何政党和政府的津贴，因之也不能派人来报

馆。倘若政府真要派人，宁可报纸不办。对此，蒋介石感到无可奈何，只得一面允许恢复邮递，一面待机再议。看来，一年之后蒋介石对史量才的杀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最后下定了的。

8月21日报纸终于恢复了对外埠的邮递，前后被禁达35天。在这些日子里，发行部千方百计地化整为零，将报纸分散寄出，或是将整捆报纸以图书形式包装，分头运至沪宁、沪杭线的长途汽车站或长江航线的一些口岸分散发出。当时《申报》外埠发行约有八九万份，一段时间的停止邮递，使报馆受到不小的经济损失。

《申报》在政治上受到这一次沉重打击之后，对于蒋介石“攘外必须安内”反动政策的斗争并没有止息，只是在形式上有所改变，语气有所缓和。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攻占山海关，准备进占热河，大举进攻华北之际，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声明愿在蒋军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权利和武装民众等三个条件的基础上，与国民党停止战争，枪口对外，共同对敌。而蒋介石则不顾日军进犯和工农红军停战抗日的呼吁，亲自坐镇南昌，集中50万兵力，分三路继续向红军围攻。《申报》鉴于这种危急的情势，连续发表《当前的抗日问题》、《攘外与安内孰先》、《热河失陷之危机》等评论，大声疾呼：当此民族危机之时，还不能集中成民族之全力，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必死的战争，而徒孜孜于努力安内，是适为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得到满足而已。继而指出：热河之失陷，将使华北屏障既撤，东北义勇军后援断绝。吾人共赴国难，其结果如斯？我民族诚无以自解于世界，而我军队亦无以自解于世界，无以自解于我全国人民！报纸编辑们对于当时国难深重之忧虑和要求抵抗外来侵略之激情，与上个世纪甲午战争后主笔秀才们忧患国家和民族前途是一样的。

九、新闻文化与副刊革新

《申报月刊》与申报流通图书馆

当报业发达兴旺起来之后，把报纸作为基地，从事新闻文化事业，是《申报》历来的传统。清末期间，美查和主笔秀才们对此已经创办了不少事业。史量才接办之后，在20年代他已经办这方面的事业。到了30年代初，由于陶行知“多关心社会工作”的促进，借报纸创刊60周年的机会制订的全面改革计划中包含了这部分事业，后因“九一八”事变发生而暂时搁置。但当新闻报道和报纸舆论加强之后，就把原来搁置的计划提到了议事日程，包括副刊《自由谈》的革新。

首先是《申报月刊》于1932年7月创刊。这是一份阐述国内外形势和社会发展、介绍学术思想、政治时事性的期刊。在黄炎培的筹划之下，聘请了俞颂华、张梓生、黄幼雄为月刊编辑，俞颂华担任主编。他们三人原在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工作，因“一二八”时商务印书馆毁于战火，职员裁减，他们借机转移到《申报月刊》。创刊号发表了胡愈之的《动荡中的世界政治》，巴金的《沙丁》，茅盾的《林家铺子》等进步作品。接着，为反映东北抗日战争的烽火，发表了声援绥远抗战的文章和通讯，连载翁照垣的《淞沪血战回忆录》等等，在舆论上给抗日前线的将士和人民很大支持。月刊还为鲁迅等作家提供发表文章的机会，使它成为《自由谈》之外又一进步舆论阵地。1933年6月起，鲁迅以“洛文”的笔名先后发表《关于女人》、《真假堂吉歌德》、《谣言世家》等十多

篇杂文。鲁迅在给台静农的信中说：因《自由谈》投稿受到限制，“申报月刊尚能发表，盖当局对于出版的交情，非对我的宽典。但执笔之际，避实求虚，顾彼忌此，实在气闷，早欲不作，而与编者相识，情商理喻，遂至今写出少许。”信中所说的与编者相识，是指“五四”运动时，鲁迅与俞颂华的相交。俞颂华主编《申报月刊》时，为办好刊物曾邀鲁迅等人至南京路新雅酒楼商量，鲁迅为办好刊物提供了意见。月刊后来成为与中华书局《新中华》，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共为上海三大杂志，而《申报月刊》由于取材严谨，内容充实，发行量大，影响最广。

《申报月刊丛书》。共出十一种，除第一种为翁照垣将军所著的《淞沪血战回忆录》外，有苏联研究、中国经济概况、赣皖湘鄂视察记等。1933年起，还陆续编辑出版《申报丛书》，内容大都属于国际情势和世界知识方面，其中以介绍日本、苏联的为最多。

出版《申报年鉴》。这是按照史量才“以史为鉴”的主张创办，是1922年年鉴式《最近之五十年》的继续。年鉴将一年来国内政治、经济及社会重要问题的新闻报道、评论文章等等作系统的编辑，附以各项统计资料，成为了解我国国情的编年史。

出版地图集。丁文江倡议，经史量才赞许支持，由地理学家、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三人一起统计绘编，1932年出版，有中华民国新地图，中国分省新地图两种。地图正确清晰，尤其在印制上以颜色的不同和深浅来区分不同的地形，使人一看就能区分山河湖海和各区域的地形地貌，在我国地图印制中还有一种创举。

按照史量才与黄炎培、陶行知当时的共同商议，《申报》应当关心社会文化公共事业。1932年创办了《申报》流通图书馆，在市内巡回展阅。图书馆由李公朴主持，中共党员柳湜是图书馆主要职员。为了帮助读者解决书本上的疑难，1934年图书馆创设读书

指导部，负责回答读者时事、哲学、社会科学及生活上的问题。并在《申报》开辟《读书指导》、《读书问答》专栏，选择读者共同性的问题加以解答；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传播科学知识。读书指导和问答由艾思奇负责哲学，夏征农负责文学，柳湜负责社会科学并担任指导部的主任。

申报流通图书馆主要服务对象是店员、学徒、工友和学生或失学青年。史量才创办这个图书馆不图个人或报馆得到什么经济利益，完全是为了社会大众谋福利。“因为史先生也是没有钱的人出身，他深知道没有钱的人读书的困难，以及具有热烈的求知欲而不能达到的痛苦，他便创办了这个图书馆，做一点帮助求学的工作。图书馆开始筹备的时候，曾有人向史先生提议，想用“量才”两个字做图书馆的名称，他深觉不以为然，后来经决定用了现在的名称”^①。

申报流通图书馆的读者最多时达九千人之多，其中大多数是家庭贫困幼年失学或读书不多的青年。一个借书证编号为6394名为王嘉芳的读者写信给图书馆，说他是一个贫家子弟，幼年的时候苦吃饭也难饱，无力读书，只在小学中关了年余就去学商，自觅其食。因此，一切知识便毫无所有。幸而店中订有一份《申报》，他就在工余的时候不间断的来阅读，所得的知识就不少。后再加入申报流通图书馆，现在比较过去进步得多了。另一个编号为9262号的读者陈安智，他原来迷恋于陈腐的古文，以为什么报纸都不值得一读。以后他加入了读书指导部，把读书计划寄去，得到了图书馆的指导和修正，摆脱了古文的影响。指导部又介绍了许多新的读物，他望着新开的一本一本書名不禁自叹起来。试想，这么多的书一个当学徒的人那儿有钱买呢？陈安智是外地人，流通图书馆也实行外埠读者邮借，他好不容易得了这个机会加入

^① 李公朴：《在史量才遇难追悼会上的致辞》。

邮借部，成为申报流通图书馆的一个读者。陈安智情不自禁地写信给图书馆说：“我决意勇往直前，向那自学的途中迈进。自后读的书固然归图书馆供给，这样不但可省笔苦劳的金钱，就是遇到一切的疑问，尽可求解答于读书指导部，自学还愁什么困难呢？我不能不喊是我的幸福啊！失学人的幸福啊！”从这些例子中可以想见申报流通图书馆在广大店员、工友、学徒和青年中的影响，以及在李公朴、柳湜、艾思奇和夏征农等人的努力下，普及教育、科学知识所起的作用。

1933年1月和3月，报馆创办了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申报妇女补习学校和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补习学校除了正常的课程之外，按照史量才“一方面要发扬旧文化，同时还要研究各国文化”的精神，学校附设有英文、日文、德文、俄文等外国文研究班，以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中有用的东西。学校对入学者收取适量的学费，但对经济困难的给以减免。一个叫洛基的青年立志加入新闻函授学校，可是迫于经济困难，只能瞧着招生广告叹息。到了1934年秋季，他下决心写了一封信给史量才，允许他免费或零缴学费入学。过了一个星期，他终于收到了学校的回信，认为他写的信文字明白简练，有相当学识，可以学费暂欠，待考取后酌量通融办理，或酌量免去若干。后来洛基终于考取，减缴学费，免缴讲义费及邮费，实现了平生的志愿。三个补习学校每学期得益学生二三千人。1934年史量才被害后，按照他的遗愿捐献16万元作为补习学校的奖学金，以后又设立基金团，补助清寒高中学生升入大学，对大学毕业出国留学或学业特别优秀者给以奖励。

史量才素有普及和提高青少年教育、教育救国的思想。在国难深重、需要恢复加强国力、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时候，他借《申报》的事业不断发展之机，运用报纸来辅助教育事业。同时，由于陶行知平民教育思想的启发也促进了史量才的这一补习教育事业，并收了广泛的社会效益。

黎烈文改革《自由谈》

《自由谈》是《申报》历史悠久的综合性副刊，创刊于清朝末年。当报纸产权由美查公司转入国人之手，对报纸的内容和形式进行改革，尤其受到正在兴起的文艺性小报的影响。为求得报纸内容的丰富、形式的活泼清新，于1911年8月24日创办副刊，定名为《自由谈》，第一任主编王钝根。版面设有游戏文章、海外奇谈、慷慨悲歌（诗词）、心直口快（讽刺性絮语）等栏目，有一些为娱乐性的消遣文章，也有暴露藏垢纳污的社会黑暗、军阀横暴、专制婚姻方面作品。但限于当时时代的局限性，消极的揭露较多，缺乏积极斗争精神。1914年6月王钝根为中华图书馆创办文艺周刊《礼拜天》，感到难于身兼两职，辞去了《自由谈》职务。1915年3月改由吴觉迷主编，他曾一度征求刊登军人词文，开辟爱国丛谈专栏，以激发国民的尚武精神。未几，又改由姚鹓雏主编。姚是南社成员，因而发表了不少南社成员的诗词。

1916年10月起，《自由谈》改由天虚我生（陈蝶仙）主编，在拥护民国和孙中山、抨击讽谕军阀专横发表过不少作品。他担任过监狱工艺所的指导员，又加以平常注意工业科学的研究，积累了这方面的科学知识，所以在刊登小品、散文外，还经常发表科学生活、工业知识、家庭常识之类的文章，这在当时社会上科学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很受读者欢迎。他在实业救国、抵制日货的思想影响下，在老西门自己家里办起了家庭工业社，制造取名为“无敌牌”的牙粉，与进口的东洋货竞争，居然还占过上风。他感到家庭工业社有发展前途，索性下海，1918年10月辞去《自由谈》主编职务，从事他的实业救国去了。《自由谈》主编曾空缺了一年多，暂时由总主笔陈景韩兼任。直到1920年4月，才由周瘦鹃主持。

周瘦鹃原来是一个小说家，在写小说之余，曾应约为《自由谈》写稿。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廿一条”的时候，他深感国势险危，“瘦鹃虽未能执戈以卫社稷，然而吾笔未髦，必为祖国稍尽绵力”。辑录欧美爱国丛谈十余篇，在《自由谈》连载。周瘦鹃主编《自由谈》之后，设置闲话、杂录、所闻拾遗、游记、剧谈等，在这些栏目中有揭露社会丑恶现象或紧凑时局之作，如1924年7月11日一幅《当前理财政策》漫画，揭示一个财政部官员捧着一个大元宝献给军阀。军阀脚下是两个大包袱，一个是税收，一个是债，两个小民在包袱下被压得透不过气来。1930年在国民党政府新闻压制下新闻版多次开天窗的气氛之下，《自由谈》刊登《赣北老茶商》，叙述玉山一个老茶商携款到红军方志敏地区采办新茶，赚到了钱，受到红军保护的情景。8月间刊登《豫民惨况之一斑》，反映民国以来，由于连年战乱不断，百姓无一日安宁。凡一批军队过境停留，必委任自己亲信之县长以暴敛横征。一个时期之内竟同时委任有四个县长。某县虽土地肥沃，但也不够四个县长搜刮，人民苦不敢言。当时的《自由谈》辟《文艺俱乐部》一栏，每周刊登周瘦鹃、天虚我生、程瞻庐、朱鸳雏、陈小蝶、徐半梅、程小青、张碧梧、陆忱绿等所写的社会、家庭、教育、理想、哀情、滑稽、侦探、艳情之类短篇小说，也有长篇章回小说连载。这对当时言情文学的发展起过一些作用，但内容大多有儿女情长、情网蛛丝、缠绵悱恻的鸳鸯蝴蝶派气息，有些文章的写作方法庸俗而古怪。例如连载集体创作的所谓“点将”小说。今天由作家倚虹写一段，末尾一句“远望太湖，真是碧波万顷”。“碧波”是另一小说家的名字：今天点到他，明天他接下去写上一段。此种被当时文化界人士称之为“百依纳”的作品，只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家之间的一种游戏之作，不受广大爱好文学青年的欢迎。“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学的新鲜空气很少渗透到副刊中来，与“九一八”事变之后广大人民不断高涨的爱国热情，热血沸腾的时代潮流很不协调，

长此下去很难赢得广大读者。当报纸因《三论剿匪与造匪》的评论受到国民党官方沉重打击,报纸在新闻舆论受到较多的限制之时,史量才想多找几个阵地,迎用副刊形式使报纸舆论继续有所发挥,为此聘用黎烈文担任《自由谈》编辑。

之后,上海文坛上鸳鸯蝴蝶派的影响逐渐缩小,《礼拜六》之类的刊物先后停办,但在报纸副刊上的影响还相当大,像《自由谈》这样的著名副刊也发表不少鸳鸯蝴蝶派的作品,要周瘦鹃离开他主持了20年的《自由谈》,他很不愿意。他曾找老主笔张默,希望支持他留任。但史量才改革《自由谈》的态度十分坚决。考虑到与周瘦鹃相处较久,不忘旧情,如果能换一个阵地,也许能够有所发挥,于1933年1月另外创刊一个综合性副刊,名之为《春秋》,由周瘦鹃编辑。在《自由谈》改革的促进下,周瘦鹃的编辑思想也有改进,《春秋》的内容新旧兼有,图文并茂,讲求有意义的趣味性,辟有新发明、小常识、小园艺、人物志、风物小志、世界珍闻、游踪所至等等栏目。张恨水的《东北四连长》,秦瘦鸥编译的《御香缥缈录》等小说都曾在《春秋》连载。副刊美工方面,还有当时著名画家方雪鸥担任设计。形成了《申报》六十周年报纸副刊专刊改进的另一特色。

新起用的《自由谈》主编黎烈文,是一个年仅28岁不知名的青年。他是湖南人,1922年到上海进商务印书馆当助理编辑。1926年前往日本留学,后来转到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文学。1932年春天回国,曾在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编译新闻。这时,他已对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艺术有较深的修养,他写的小说,感情真挚,文字明洁,还翻译过莫泊桑、梅里美的作品,被一时称为名作的佳译。当史量才物色《自由谈》的新主编时,由黎烈文在报馆任职的妹夫黄子健介绍。史量才多次与黎烈文谈论改进报纸副刊,感到他颇有不少新的见解,留欧时专攻文学,又未曾参加过任何党派,于是认为他是编辑和改进《自由谈》的合适人才。

黎烈文有比较强烈的民主进步思想,他在《自由谈》编者话中说:“我们认定世界上的一切都在进步中。我们对于进步和近代化立足点都是要牢牢站定的。”同时也不愿离开观点太远,“自敲锣鼓自唱戏,只在台里喝彩”^①。正当兴致勃勃开始工作之时,他临产住院的妻子为沪西医院美国庸医所误患产褥热去世。他怀着悲痛的心情发愤工作,在1月20日刊登的启事说:“惟思悲苦,难言奋斗。甚望海内外贤达,时惠佳作,俾本刊内容日益充实,岂惟本刊之幸,实亦如中国文化前途之幸也。”他的事业精神得到许多人的同情和支持。在一次如何办好《自由谈》的座谈会上,二十多位文化界人士参加座谈。其中有陈望道、丁玲、胡愈之,也有林语堂、谢六逸、张资平。黎烈文主张依靠更多的人办《自由谈》。在周瘦鹃主持的时候,因他家住苏州,通常在苏州家里编组好稿件,几天一次来上海报馆发稿。他对陌生的作者或无名小卒的稿子往往不屑一顾,因之,所刊登的文章作者,总是他熟悉的马夹袋里的几个人物,作者队伍不广。黎烈文编辑后,只要稿件合用,不问厚密亲疏,不论名家或一般作者一律公平对待。因之,在较短的时间内,聚集起了一支庞大的作者队伍,其中有叶圣陶、赵家璧、傅东华、老舍、杨幸之、许杰、曹聚仁、钱歌川、施蛰存、王任叔、张天翼、廖沫沙、周扬、谢冰莹、胡风、沈从文、唐弢、郑振铎、艾芜、姚雪垠等等。章太炎和吴稚晖,他们本来是多年夙敌“老死不相往来”,而这一次他们终于在《自由谈》一起发表文章,如章太炎的《庐山志》和吴稚晖的《大众语万岁》等。连一度消沉的创造社健将郁达夫,也振作起精神向《自由谈》投稿。对于一般青年,《自由谈》也有不小的吸引力,他们除了喜欢阅读,也勇于投稿,抒发自己的心声。徐懋庸当时还不过是一个20来岁的青年,因为家乡无法立足,只身漂流到上海,没有工作。他在阅

^① 《幕前致词》,1932年12月1日《申报》。

读《自由谈》上鲁迅笔名何家干的文章后受到启发，怀着侥幸的心理投寄了两篇文章，竟被录用，还受到黎烈文的来信鼓励。徐懋庸回忆自己就是这样走上了创作道路。

《自由谈》设置杂文、随笔、读书笔记、短篇译文和连载小说。内容五光十色，绚丽多彩，主要内容则是与时代脉搏紧密相连、反映社会精神生活的作品，尤其是具有高度思想性的社会批评。这与鲁迅的支持有很大关系。报纸副刊的产生是文艺介入开始的，但副刊单纯文艺性的摆脱，则是报纸副刊的一次升华。这也是黎烈文对《申报·自由谈》所作的革新。

鲁迅、茅盾投枪式杂文

《自由谈》的杂文最受到读者欢迎，一般每期一篇，鲁迅和茅盾是发表杂文最多的作者。此外还有郁达夫、叶圣陶、徐懋庸、廖沫沙、徐梵澄、周木斋等。

鲁迅自1931年回到上海后，从来没有为日报写过文章，也不大注意《申报·自由谈》。1932年底郁达夫告诉他，《申报·自由谈》的编辑换了黎烈文，黎才从法国回来，人地生疏，怕一时组织不到稿子，希望他和鲁迅投稿。从此，鲁迅开始阅读起《自由谈》来。他静静地观察了一个月，感到《申报》的进步倾向确实明显。黎烈文也有改革的决心和胆识，《自由谈》办得有起色。不久，又听人告诉他，黎烈文因忙于编务，连自己妻子临产都顾不及，住在医院里患产褥热去世了。几天之后，又看到《自由谈》上的一篇文章，说的是婴儿每天看看放在自己身边的一张遗照，知道曾有孕育他的母亲。这就想起了郁达夫的话，对黎烈文十分同情，萌发起投稿的激情。他在《自由谈》发表了第一篇杂文《“逃”的合理化》，用的是何家干的笔名。刊出时，编者还加了按语，说这是特约撰稿，希望读者不要因为名字生疏的缘故，错过了奇文共赏的

机会。茅盾看出这篇杂文的笔调是鲁迅的，内容与文字都十分尖锐。过了两天他们相遇谈论，鲁迅认为茅盾的两篇批评国民党政府镇压爱国学生的杂文也相当尖锐。黎烈文都敢登出来。他们都认为黎烈文倒有点勇气。史量才主持的《申报》近来大有进步，都主张积极支持。鲁迅把自己在《自由谈》发表的杂文称为“短评”，意思是针对当时形势和社会时弊。他几乎平均三四天发表一篇，文章的“意思极其平常，说话也往往晦涩。但出于对时代的刺戟”。^①在国民党制造白色恐怖之下，被压制的作者常常以笔名投稿，在《自由谈》鲁迅除了用何家干这一笔名外，还经常变换笔名达十个之多。茅盾也用玄、仲方等笔名，同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官员“捉迷藏”。鲁迅战斗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写杂文，自1933年至1934年11月近两年的时间里，《自由谈》发表他的杂文143篇，最多的一个月发表15篇，平均两天一篇。这个时期可以说是鲁迅杂文最兴旺的时期。这些杂文后来收入《伪自由书》、《准风月谈》等鲁迅文集。

在鲁迅带动下，一些从来不写杂文的年轻作者也写起杂文来。当时文学界的左翼联盟已经形成，许多左翼作家被吸引到《自由谈》来。一时间写杂文蔚然成风，引来了杂文的全盛时期，形成了1931至1932年《申报》改革的一大特色。30年代初瞿秋白在上海过着党的地下生活，与鲁迅交往甚密，也为《自由谈》撰稿。1933年2月上旬，瞿秋白第二次住到鲁迅家里避难，有一个月的时间。他和鲁迅言谈时把想好的腹稿讲给鲁迅听，交换意见，牺牲午睡时间把文章写好给鲁迅看。文章都是通过鲁迅交给《自由谈》，有的篇章也有用了何家干的笔名，其中如《出卖灵魂的秘密》、《最艺术的国家》等等，有的收入了鲁迅文集。

这个时期《自由谈》不少文章似乎舞文弄墨、隐晦曲折，正如

^① 鲁迅《伪自由书前记》。

鲁迅所说“说话也往往晦涩”，但则紧紧地与时局发展相结合，与当时的新闻报道相呼应。1933年春上海人民广泛议论中的“热汤”^①，就是一例。

1933年1月8日，日本侵略军进占山海关，把城关魁星楼上《天下第一关》木匾取下，运往东京陈列，以炫耀日本侵略者的武功。日本侵略军继续向承德、赤峰进袭，热河省主席兼军队司令汤玉麟不战而退，弃城南逃，承德于3月3日陷于敌手。《申报》对弃城逃跑的汤玉麟进行了尽情的揭露和鞭挞。

《热河失守目击谈》一文叙说：热河军队两年来未发饷，士卒怨愤，军无斗志，地方人民被敲骨吸髓，呼吁无门。凌源、赤峰失守后，汤玉麟仓惶失措，将运送子弹给养给义勇军翁照垣的汽车一律扣留，席卷家中细软，率其骄妻艳妾，由卫队二千余人蜂拥出逃。汤行前曾接见某外国记者，正谈话间，汤托辞更衣一去而不复返。该记者坐待良久惘然所失，莫明究竟。报纸又报道电影界张冲慧为摄取义勇军抗日影片，正在热河，据他实地所见，上海各报刊载承德3日“失守”，其实承德于2日午夜后“放弃”。报载侵入承德三百余名日军，并非由正面驰入，而是预先匿于附近，待汤玉麟走后出现，日军从未派飞机轰炸承德。这个事实说明汤玉麟是不战而走的。消息还报道张学良得悉汤玉麟弃城南逃，特派兵堵塞古北口，非特许之人不得过关。当得知汤玉麟逃走，征用的车辆系运载供给义勇军翁照垣的炮弹和给养时，又加派宪兵400名，驰往古北口拦截。汤玉麟见古北口难于通过，转道术宁县，到达鞍区屯。汤割须改容，化装成农民，渗入难民队伍混过古北口，再乘汽车到达天津郊外，步行进入法租界，因风声紧又转入英租界。这时他弃城时南逃的车队也由他的儿子护送到达天津，连同七个姨太太及母子均已到达。法工部局派警探前往查

^① “热汤”是指热河省主席汤玉麟。

抄，竟搜出鸦片烟一万多两。

《申报》对汤玉麟弃城卷逃的揭露报道生动具体，淋漓尽致，一时间，“热汤”成为人们普通议论的话题和指斥的目标。上海人民愤慨之极，纷纷要求政府当局对汤玉麟加以严惩。一篇《死有余辜的热汤》中说，汤玉麟将他的家财细软和鸦片装载了200余辆汽车，他儿子辅仁在北京匿藏20箱钞票于东交民巷，此外还有三分之二的财产扣在沈阳。这些无数的资财，莫非刮我小民之热血而来。对这样吸尽苍生骨髓、临变误尽国家的人，当此众怒之下，还无法把他搏杀掉，不知政府将何为解释于天下。另一篇《致蒋委员长》的时评中，指出了热河之失，非兵不肯战，非一般将领不敢战，其咎惟身负指挥全责之高级将领。这些报道都再次证明了《申报》《三论剿匪和造匪》评论中“贪官污吏造成了国家的危亡”的论断是千真万确的。

在人民指责和声讨中，国民党当局感到再不处置难以平息众怒，乃明令将汤玉麟撤职查办，张学良引咎辞职。蒋介石、何应钦亲自主持华北军务。这样的处置当然不彻底，也不涉及事情的实质。所以茅盾写的一篇有讽刺意味的《哀汤玉麟》^①的文章，指出了汤玉麟弃城逃跑根子在不抵抗主义。作者认为：假如汤玉麟之撤职查办是在热河失守之前，是因为苛捐杂税、勒种鸦片、制贩红丸吗啡海洛因，那末大家是要拍掌称快的。然而他的撤职查办都是因为热河失守、弃城潜逃之后，那末却是冤枉的。东三省陷落谁负责，锦州、榆关陷落又是谁负责，为什么独独要把汤玉麟撤职查办。他的罪不在“不抵抗”和“弃城潜逃”，而在于不善于运用“抵抗的策略”。作者接着写道：“我们为汤主席打算，他的全盘计划应该是这样的：先通电全国，表示决心抵抗；再一面交涉，一面对日提出严重抗议；三是在外交上电诉国际及华盛顿，

^① 1933年3月11日《自由谈》。

请求主持公道；四是如日军迫近，通电求援；五是避免重大牺牲，退守第×道防线；最后便是捆绑子女玉帛，退至北平，通电全国准备长期抵抗。假如按照这样的抵抗计划去抵抗，我们的汤主席怕不马上成为民族英雄吗？”文章的矛头，显然不只是对执行不抵抗主义的人，而是针对了制定不抵抗主义的蒋介石和其他高级将领。

汤玉麟事件引起了鲁迅、老舍等作家的关注，他们与人民站在一起，讨伐汤玉麟这个败类。何家干《曲的解放》^①文说：词的解放已经有过专号，曲为什么不能解放，也来混帐混帐。他写道：

（先上）：连台好戏不寻常，攘外期间安内忙。只恨热汤滚得快，未敲锣鼓已收场。

（短杆天净纱）唱：热汤混帐——逃亡：

装腔抵抗——何妨？

模仿中央榜样；

——整装西望，

商量奔向咸阳。

接着老舍发表《空城计》^②一诗：

日本小鬼吓一跳，

怎么这里静悄悄。

莫非空城之计连琴也不弹，

伏兵四起脑袋纷纷掉？

登高一望笑哈哈，

原来走将精勤练赛跑。

大车小车齐向南，

^① 1933年3月12日《自由谈》，笔名何家干。据许广平《鲁迅回忆录》：这篇文章是瞿秋白写的，用的是鲁迅笔名。

^② 1933年3月13日《自由谈》。

黄沙滚滚风浩浩。

千箱万箱行李多，

悲壮激昂私囊饱。

失城丧地谁管他，

反正没人把老子怎样了！

鞭挞“热汤”，似乎还带有游戏文章的味道，不应当认真对待，但国民党新闻检查官已记录在案。因为当时上海人民把文章的内容传播到街头巷尾，而且一致痛斥，把国民党政府不准人民议论国事的禁令抛到九霄云外，国民党官员对此是十分恼怒的。

腰斩张资平和“挥泪斩马谕”

黎烈文主编《自由谈》之初，还保留了原来的小说连载，以描写三角恋爱为题材的张资平的长篇小说《时代与爱的歧路》，是从1932年12月1日黎烈文主编《自由谈》开始时连载的。因为当时黎烈文刚从法国回来不久，对上海文坛和张资平的作品不甚了解。这一连载一直载到1933年4月之后，读者致信编辑部，对《时代与爱的歧路》表示厌倦，而且认为与当时抗日救国的气氛很不协调。于是从4月22日起，黎烈文决定加以停载。小说没有完就停载了，成了当时报界和文坛议论一时的所谓“腰斩张资平事件”。

从此张资平对《自由谈》和黎烈文十分不满，他在《时事新报》刊登了一个启事，气势汹汹、含沙射影地说：“我不但无资本家的出版者为我后援，又无姊妹嫁给大商人为妾，以谋得一编辑以自豪。”再咒骂说：“今后凡有利用以资本家为背景之刊物对我诬毁者，我只当作狗吠。”对于张资平的指桑骂槐、恶意诬蔑，黎烈文十分气愤，在《时事新报·青光》上刊出启事：说明自己去年从法国回来，因《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系世系长辈，史先生以自己未曾加入任何党派，且留欧时专治文学，而受聘入申报馆，编辑《自

由谈》。近两月来，有三角恋爱小说商张资平因烈文停载其长篇小说，怀恨入骨进行造谣污蔑。他特别在启事中指出：

昨日张氏在《青光》栏上含沙射影，其中有“无姊妹嫁给大商人为妾”一语，不知何指？张氏启事既系对《自由谈》而发，而烈文现为《自由谈》编辑人，自不得不有所表白，以释群疑。烈文只胞妹两人，长应元未嫁早夭死，次友元现在长沙某校读书，亦未嫁人，均未出过湖南一步。且烈文所知湘潭黎氏同胞姊妹中不论亲疏远近，既无一人嫁人为妾，亦无一人得与“大商人”结婚。张氏之言，或系一种由衷的遗憾（没有姊妹嫁大商人为妾的遗憾）或另有所指，或系一种病的发作，有如疯犬之狂吠，则非烈文所知耳。

鲁迅在当天就看到启事，感到黎烈文已气不可遏。第二天写信给黎烈文说：漂聚上海者古怪文人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若当然。对于此类切戒愤怒，犯不着为他们生气，能修炼这样的地步，则为编辑不觉苦矣！黎烈文感到自己对人、对事业一片诚心，结果反招致诽谤，感到中国社会太黑暗，上海旧文坛太复杂了，不免有点心灰意冷。在鲁迅、茅盾等慰劝、鼓励之下终于鼓起勇气干了下去。张资平含沙射影的所谓的“以资本家出版商为后援，姊妹嫁大商人为妾”，实际是以谣言诬指黎烈文之所以能编辑《自由谈》，全靠的是他姊妹嫁给了史量才做小老婆。黎烈文这个以事实为依据的有力的批驳，使得张资平和当时一些小报的造谣破产，“腰斩”的风波也就平息下去。

《自由谈》的革新，好多进步作家对社会陋俗和旧文坛旧习气的批评，受到了当时一些小报杂志和旧文人的攻击，其中如《社会新闻》、《微言》等等。他们曾经趁《自由谈》停载《时代和爱的歧路》的机会兴风作浪，说什么过去“挤走周瘦鹃”，今日“腰斩张资平”。甚至说鲁迅率“喽罗们”包办了《自由谈》，建立了“清一色”的左联天下，把《自由谈》描绘为“赤色王国”，而鲁迅就是这个“王

国的暴君”。他们的这种说法当然是没有什么事实依据的，其目的无非是以一些小道消息来煽惑人心，兜售自己的报刊。更恶劣的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意图得到官方的邀赏，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注目，从而对《自由谈》施加压力。本来，《自由谈》迂回曲折又尖锐泼辣地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与社会时弊，已使国民党反动阵营中的一些人坐卧不安，对上海新闻界、文化界的压制也不断加紧，《自由谈》成了反动当局注目的中心。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企图以拉拢、软化的手法，改变《自由谈》的面貌，陈立夫、吴醒亚曾出面邀请黎烈文吃饭，黎烈文没有赴宴。之后，吴醒亚等人联名写信给史量才，介绍章依萍来更换黎烈文。史量才直截了当地加以拒绝，并答复说：感谢诸公惠临施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成不自由谈吧。他们感到拉拢、软化、商量和交涉未见效果，就祭起报纸图书杂志审查这根大棒。原来对报纸只进行新闻检查，现在则连副刊的文章也要检查，加以扣压、删削、增添改动原稿，什么都作。凡涉及到议论时局，如鲁迅、茅盾的文章就更加难发。黎烈文写信给鲁迅，叙述稿件被扣的情况，鲁迅回信建议版面上的文章能否改得更委婉、含蓄一些。并说：“近来作文，避忌已甚，有时如骨梗在喉，不得不吐，遂不免为人所憎”。但无论如何，“仆倘有言谈，仍当写寄，决不以一偶不登而放笔也”。他4月29日一篇题为《安内与攘外》的文章说的是“安内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这是大有汉奸嫌疑了。这样的题目和说法是逃不了国民党的新闻检查的，三论《剿匪和造匪》已吃尽苦头，于是把《安内与攘外》的题目改为《文章和题目》发表，在文字上也加以改动。再有一些比较尖锐的文章，鲁迅觉得《自由谈》可能难发，就转移到《申报月刊》，以分散国民党的对《自由谈》的注意力。

史量才办报纸一贯以“不偏不倚”为宗旨，几年来，在进步与反动、民主与独裁的激烈的斗争中，尤其在中国共产党的坚持民

主进步，与国民党反动派坚持独裁统治的斗争中，他已经越出了原来的观念而倾向进步。但对于说他的《自由谈》是什么“赤色王国”，宣传“赤化”这样的帽子他还有点怕戴。所以，他除责成总编室加强对稿件的审阅外，不得已告诫黎烈文要注意文章的语意，不可过于尖锐激烈，以“遮人耳目”，平息国民党官员的怒气。黎烈文接受史量才的意见，刊登了一个《黎烈文启事》^①，说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这并不是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实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呼吁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若议论长论短，妄谈大事，塞之字箴既有所不忍，布之报端又有所不能，陷编辑于两难之境，未免有失恕道”。于是，还是希望作者们莫谈国事，识时务者为俊杰。

对《自由谈》受到的注意和当时的处境，鲁迅了解得最清楚。这是“因为时正值禁谈时事，而我的短论却时有对于时局的愤言。也并非压迫《自由谈》，这时的压迫，凡非官方的刊物，所受之程度大概是一样的”^②。但许多富于正义感的作者“本性难移”，谢冰莹、唐弢、徐懋庸、李俊民等就以谈风月为名，借题发挥，继续在《自由谈》发表文章。谢冰莹在文中说：“现在中国人的厄运到了，国事不但不能参与，连谈一谈也不可能，那么有什么可写呢？风花雪月、自杀爱情一类的文字既不会写，也不愿写，那么，还有什么可写呢？记得黎烈文先生刚刚接编《自由谈》的时候，就曾起劲地写了几天东西，我想乐得来自由谈一下，可是现在呢？自由谈上要加一个‘不’字了。”唐弢在文中说：“文人生活在这年头儿。如果不是聋哑瞎，对着现状不免要多几句嘴。然而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搔着痒处的时候少，碰着痛处的时候多’。于是说现实话的难处就来了。话里碰到别人的痒处，岂不有背忠恕之道，大有‘明知故犯’之嫌。如果从今以后，文人真能紧闭尊口，

① 1933年5月25日《申报·自由谈》。

② 鲁迅：《伪自由书后记》。

一齐放下钢笔、毛笔、铅笔、自来水笔，不再说类似谎话的实话，使莅临者如入无人之境，则河清海宴，党国升平，万岁无疆！”徐懋庸在文中说：“近来文人容易失踪，而且一失踪便成‘大团圆’。这样的世界，实在有讲究苟延性命之法的必要。其法还是古人所云‘上士闭心、中士闭口、下士闭门’。”另境（孔另境）在文中说：“民国十三四年的新文化运动，居然产生了二百多种定期刊物，谁能说‘五四’运动没有成绩。有人说中国言论不自由，但这堂堂二百多种刊期，何尝不是言论自由的证明呢？自然不能说，这些都是指挥刀下的文化，但有一点可以断言的，即指挥刀常在你面前摇晃，是迟早要注销你的自由的。”

《自由谈》“多谈风月，少发牢骚”的所谓改变方针，实际上成了改变作文的一种手法。《自由谈》的投枪仍然不断。过了几个月，正如孔另境所说的指挥刀终于晃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又一次向史量才提出，要把黎烈文撤换。史量才深知黎烈文在《自由谈》的革新对《申报》六十周年报纸改革所起的作用，但在国民党暗示封门的压力下，为了保全《申报》他不得不“挥泪斩马谡”，让张梓生来代替黎烈文担任《自由谈》编辑。史量才不忍当面同他谈，由经理马荫良通过黎烈文的堂妹夫黄子健出面，请他“暂时避一避”，并转交500元钱，以安抚他比较艰苦的生活。离职前的一个晚上，黎烈文在南京路新雅酒楼宴请一些相熟的作者，鲁迅、茅盾也参加了。大家对黎烈文进行了一番安慰和鼓励。鲁迅与张梓生也是熟人，出于对黎烈文被迫离职的义愤，鲁迅、茅盾等表示支持《自由谈》，继续战斗下去。1934年5月9日，黎烈文以“因事忙无暇兼顾”为由刊登了辞职启事。在启事下面还刊登了一首题为《你逃》的诗，语意之中前景阴森，魔影憧憧，唯有提起勇气走路！没过多少天，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杨杏佛遭暗杀，丁玲被捕，前景确是险恶。

在当时反动统治的年代，举凡要办一些正义的事业，坚持民

主进步的主张十分艰难。既有无聊文人的攻击诽谤，更有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在以后一年多的时期中，反动当局没有放松对《自由谈》的压迫，最后提出要派人接办。《申报》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态度，不得不在1935年11月1日起宣布暂时停刊。国民党派人接办的阴谋当然也落空了。

史量才遭特务暗杀

20多年来，以报纸为中心的新闻文化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史量才在报业经营和社会活动中的负担也十分繁重，尤其当新闻舆论触犯了国民党政府当局，受到干预的时候，他得耗费很大的心机和精力去缓解矛盾，排忧解难，设法消除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障碍，有时感到疲劳已极。为了有一个休闲的机会，他选择了早年曾经办过蚕桑学校的杭州，在孤山对面西子湖旁，修筑了一座二层三间的小楼，取名为秋水山庄。这称不上是什么豪华的别墅，但在当时说来也算是比较舒适的休闲地了。他忙里偷闲，每年或隔年到这里作两周时间的小住，他在这里操琴、击剑、赋诗，静静地休养，以恢复他长期紧张工作而失去的精力。几年来除了处理报务，他还担任上海市参议会议长等社会公职，社会活动频繁。1934年10月的深秋时节，他因胃病复发来到秋水山庄。这次住了一个多月。他力图少想那艰难曲折而又惊心动魄的过去，让自己从紧张中摆脱出来，过上一段清静的日子，他赋诗道：

晴光旷渺绝尘埃，丽日封窗晓梦回；
禽语泉声通性命，湖光岚翠绕楼台。
山中岁月无古今，世外风烟空往来；
案上横琴温旧课，卷帘人对牡丹开。

可是，就在这忙里偷闲，似乎是超脱尘世的时刻，悲剧从天而降，这一诗篇竟成了他最后的绝唱。

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乘坐自备汽车返回上海，同车有他夫人沈秋水，儿子史泳赓，儿子的同学邓祖询和内侄女沈丽娟，连同驾驶员共六人。汽车沿着沪杭公路进入海宁县境，当行经博爱镇翁家埠附近时，发现一辆牌照为京字72号的汽车停在公路当中。当司机减低车速即将靠近“72”号汽车这一瞬间，突然从路旁窜出六个身穿黑色短衣的大汉示意来车靠边，随即举枪向史量才的汽车连续猛击。先将汽车轮胎击坏，迫使汽车不能启动，将司机和坐在司机旁边的邓祖询打死，史量才帽子被枪弹穿洞。这时，史量才扶着夫人和史泳赓开启车门向田野奔逃，杀手们紧紧尾随追击。史量才慌忙中进入闸口里一家姓沈的茅屋。杀手追近时，史从后门逃出，因不识路径避匿在一个干涸的水塘内，被站在路边的另一个杀手发现，连连开枪，两弹击中头部，血流如注，当场身亡。杀手们见目的已经达到，急忙爬上汽车扬长而去。在杀手们枪击时，内侄女沈丽娟受轻伤，史泳赓和史夫人未被击中，但史夫人回到杭州后受惊过度，口吐鲜血，精神不支。

事发后，邻近海宁的杭县县长叶风虎奉浙江省民政厅厅长之命，带着法官、担架，乘警备车往出事地点，察看汽车和尸体，传询邻近农民。正在处理时，叶风虎接到上海《申报》馆通过浙江建设厅秘书打来长途电话，说上海方面得知史量才被害，已派出大车前来接运遗体，回沪大殓，希望叶风虎不必把史量才遗体运往杭州。叶风虎考虑到如果让上海方面将史量才遗体接回去，他就难以向浙江民政厅交差。趁上海派出的车辆未到之前，将遗体抢运到杭州，停放在清波门以北的一座山庄。14日由申报馆马荫良和任之、汪英宾等从杭州运回上海。

史量才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暗杀，举国为之震惊。就在史案发生的第二天，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特电令苏浙沪杭缉凶。蒋介石特电浙江省主席鲁涤平：“严缉凶犯、负责根究为要”。18日再次电令鲁涤平，“此案在浙境发生，实属骇人听闻”，必须“限期破案，

否则各级负责当局，必当严加惩处不贷”。浙省主席通令省内各机关分途追缉凶犯。悬赏一万元，限十日之内破案。上海举哀期间，市政府各机关一律下半旗志哀。市参议会、市商会、日报公会、地方协会等81个公共团体为史量才举行追悼会。参加的有市长吴铁城、警备司令部陶百川、保安处长杨虎及潘公展、钱新之、黄任之、徐佩璜、杜月笙、王晓籁、俞佐庭、朱学范、陆京士、贝淞荪、林康侯、刘鸿生、江亢虎、江闻渔、朱少屏等各界代表五千余人。申报流通图书馆、业余补习学校、妇女补习学校的职员、学生在李公朴主持下举行了追悼会。许多民主进步爱国人士和广大读者为史量才的遇难深为痛惜，有的人讲话时流下泪来。

上海有关各界和社会人士，对史量才的突然遇害在震惊之余对死因感到令人费解，社会上也有多种揣测和说法。上海报纸为悼念史量才而发表的评论中认为死因决非寻常。11月14日《新闻报》的评论，认为暗杀之风，年时甚盛，然事虽奇突，无不有蛛丝马迹可寻，若恫恍不可捉摸者，殆莫如此案。昨初传此讯者谓系绑票案，然绑票案目的在金钱，据后所闻，则阻击者所乘之车，迎面而至，立即发枪，似非绑票行为。又暗杀者何以能知史氏是必经此地，而预设路遇之机，凶手既未就获，此疑团殆无从解释！11月15日《晨报》评论，认为暴徒早有暗杀意志与计划，则亦已有事实为之证明：史氏车经翁家埠，暴徒如无事前之闻知不能有临时阻击。而暴徒事前能闻知史氏之行踪，即为暴徒伺已久之证据。此其一也。暴徒人数有五六人之多，足证暴徒实有较大之决心。此其二也。暴徒见史氏及其家属，即行开枪，无劫掠财物或绑架勒索之意，而有必置死地，即又可见暴徒预定之计划，在取史氏之生命，而不在财富。此其三也。《新闻报》和《晨报》的评论，实际上已经指明了这是政治性的谋杀事件，原凶是谁，是过了若干年之后才揭露出来的。原来蒋介石几次指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严缉凶犯，并为史量才遇难向上海发来唁电，慰问家属等等，

完全是官场堂皇的故作姿态，真正杀害史量才的原凶正是蒋介石，而且是蓄谋已久的特务行径。

早在1931年，史量才动员上海各报发表宋庆龄因邓演达被害宣言，蒋介石受到宋庆龄义正词严的一顿痛斥，怀恨在心，但慑于宋庆龄的威望，对《申报》亦无可奈何。1932年又发生了《申报》准对国民党的三论《剿匪与造匪》的评论，蒋介石更为恼怒，决心要打击报复，怀上杀机。接着1932年又发生了上海临时参议会参议员集体辞职事件。上海市参议会，是国民党为了敷衍上海人民争民主权利和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参议政事而成立的，史量才是议长。当时市政府发行复兴公债五百万元，实得只有四百万元。而用于复兴市政，整理闸北下水道只五万元。另外为了满足日本运兵来沪的需要，用几十万元修筑虬江码头，根本不是什么复兴事业，其他的钱大部分不知去向。市长吴铁城私下谈话中透露这大笔钱已提去作“剿共”经费。当参议会议员为此事提出质询时，吴铁城则无言以答。于是引起全体议员致电行政院提出全体辞职。经张群等人多方劝解疏通，参议会的群愤才暂时平息。这使蒋介石对史量才怀恨到了极点，下定决心非除掉不可。

行动之前一个期间，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制造了一系列所谓史量才罪行。说是史量才同情和支持共产党，曾经接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活动经费。例如把1932年史量才拿出十万元资助陶行知办普及科学到工农大众的“自然学园”说是支持共产党。可是陶行知既非共产党员，他的事业也是一种社会公益事业，与共产党无关。又说史量才“一二八”之后担任上海市地方维持会、地方协会、市临时参议会会长后，曾想搞上海的独立运动，还说史量才搞独立运动得到日本人的支持，是一种叛卖祖国民族利益的行为等等更是无稽之谈。总之，制造了一种非杀不可的内部舆论。最后指使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执行暗杀计划。戴笠受命后，精心筹组暗杀行动。原先准备在上海租界内动手，一度在《申报》馆和史量才同

仁路住宅附近寻找房子埋伏，伺机动手。但迟迟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后来，行动组的人通过史量才的汽车司机了解到史量才十月间将去杭州秋水山庄小憩。戴笠决定趁史量才去杭州之际进行阻击。又考虑到如果将史量才暗杀在杭州市区，人们一定会指责省会警察局的安全保卫工作，并要负责破案。而警察局长赵文龙是军统特务，警察局也控制在军统手中，因之，如果在市区下手，会自找麻烦。最后决定动手的地点选择在海宁县翁家埠附近。

参加这一暗杀的军统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副组长王克全，其他有组员、司机共六人。当从史家汽车司机那里得知史量才将于11月14日下午从杭州返回上海时，赵理君事先亲自察看了行动地点。动用了军统总部的一辆汽车，由南京开到杭州停在浙江省警官学校。这个学校当时已为戴笠接管，是军统在浙江的大本营。为了掩人耳目，为汽车准备了两张临时牌照，一张是京字72号，这是伪造南京盐业银行的汽车牌照，另一张是杭州警察局的试车牌照。预计到史量才乘坐的可能是保险汽车，特务杀手们都施用洞穿力很强的驳壳枪和强力手枪。经过如此周密的策划准备之后，一场惊心动魄的暗杀行动，终于在14日下午海宁翁家埠五里许的地方如期实现。

参加军统特务组织的沈醉，在抗战期间就对史量才被暗杀的原因及其经过作了详细的了解。那时，他为了在军统特务训练班写讲义，搜集材料，调阅档案。而史案发生当天，奉命去现场收尸，处置善后的杭县县长叶风虎也知道这个案件的底细。他在史案发生后第二天去见浙江省保安处司法科、谍报股股长张晓崧，张告诉他史案是由当时浙江省警官学校的幕后主持人戴笠亲自主持部署的，并告诉他现场指挥者及其行动经过。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与民政厅长吕宓筹为了向上海方面和社会公众交代，坚持要破案。但张晓崧劝告叶风虎此事来头不小，还是心中有数，少问为

佳，识相为好。吕宓筹与叶风虎谈到史案时，认为尽管内幕如此，但此案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且又是发生在省会邻近的沪杭公路上，一点不动声色就此了结，浙江省政府还有什么面子。于是口头上还是讲要一定破案。半个月后，鲁涤平与吕宓筹将史案发生地的海宁县长江恢阅、公安局翁家埠派出所所长撤职，有关人员记过。并且悬赏一万元，通缉暗杀史量才的凶手。但在蒋家王朝统治之下，案情全由主事者军统把持，浙江省的以上惩凶措施也只能是表面文章，例行公事而已。

然而暗杀史量才过程中，特务杀手们和他们的车辆从杭州市内和警官学校进进出出，招摇过市，他们怕露出马脚，行车途中把伪制的车辆牌照丢弃在西湖苏堤旁边，路人皆知。人们把史量才被杀与弃置的车辆牌照联系起来，议论纷纷，要求追究杀人凶犯。过了一个月，蒋介石为了以防后患，将鲁涤平的浙江省政府改组，任命黄绍竑接替省主席。这样，浙江境内要求追索史案，查究杀人凶手的议论也就逐渐淡化了。

史量才遇难后，申报馆以及家属一直要求国民党当局查究案情，追拿凶犯，申明在没有查清前不举行安葬，灵柩暂放在上海殡仪馆。但是，直至1935年5月，追拿凶犯之事如石沉大海，报馆同人和家属只得将灵柩运往杭州秋水山庄暂放。至翌年，国难危急，破案已经绝望，遂将灵柩安葬在天马山吉庆山麓。这里风景秀丽，只好让史量才去过曾经幻想的“案上横琴，世外风烟”的山中岁月了。在史量才的墓碑上，章太炎题写了《墓志铭》：“史氏之直，肇自子鱼；子承其流，奋笔不纾”。章太炎认为史量才经营才干卓越，事业本来还有更大的发展，但由于继承春秋史官子鱼的精神，奋笔敢言，才遭到了杀身之祸。在这里，章太炎充分理解史量才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强大压力，是具有高昂的反抗精神的。

十、抗日战争中的进步倾向

从犹疑持重中走出来

史量才的殉难，使《申报》失去了一位总的主持人，而且突如其来，人们对此都没有预感和思想准备，对全报馆来说，是20多年来最重大的打击。有的人感到今后的处境可能会更加艰难，想就此离走，另谋他途。但又感到报纸历史悠久，实力雄厚，几十年来走过的道路虽有风波和曲折，但总的趋向是正义的、爱国的，为此不少人也有自豪感，觉得走之可惜。于是人们的情绪逐渐安定下来，而且决心按照马荫良、俞颂华代表职工发出的誓言：誓以至诚，继史总经理的遗志，积极奋斗。将史量才创办的业余补习学校更名为量才补习学校。史量才生前，他不愿意用“量才”自尊的。现在为了纪念他用了这个校名，并且按史量才遗愿捐赠的十六万元，作为量才奖学金，学校设立基金团董事会，补助贫寒学生升学，以表示史量才虽已离去，但他的爱国精神仍然长存。

申报馆系史量才独资经营的产业，史量才殉难后，报馆产业由其子史泳虞继承，总经理的工作由原来经理马荫良继任。马荫良是江苏松江县人，1929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同年8月进申报馆担任秘书，1930年任经理，过去他一直是史量才的助手。业务上由原来的总主笔张蕴和负责。他是清末时期《申报》1905年改革时进报馆的老报人，处事稳重谨慎，对史量才突然遇难后报馆的稳定起了一定作用。但他这时年事已高，体弱多病，难于主持日常工作，笔政由原来副总主笔周梦熊代理。周梦熊浙江山

阴人。原是《新闻报》的主要编辑，善于发现和使用报业人才，严独鹤投考新闻报馆，就是周梦熊阅卷入选的。但不久，周梦熊另谋他途而辞职，报纸编辑部的领导工作由俞颂华、伍特公和张叔通三人代理。他们三人都是长期在《申报》担任编辑、撰写评论的重要骨干。伍特公又是路透社电讯翻译的国内创始者。他译电时一手持路透社电讯原稿，一手执铁笔刻蜡纸，从不起草稿。张叔通早在1902年进申报馆，1905年改革后，襄理当时的总主笔金剑华主持过笔政，并撰写评论。鉴于当时形势多变、环境复杂，报纸违禁时国民党反动当局要追究报纸当事人的麻烦。在领导成员中一般不再以公开名义公布总主笔、总编辑的职务。但内部还必须要有一手统览报纸的总编。这时，实际主持笔政者为俞颂华。

俞颂华江苏太仓人，1893年生于上海，青少年时代在上海求学，1915年赴日本留学，1918年毕业于东京政法大学。在日本时开始阅读研究马克思著作，1919年回国后立志从事进步新闻事业。曾主编《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并参与编撰介绍“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西方各种新思潮的《解放与改造》杂志。1920年在梁启超、张东荪的支持下，以《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特派员的身份，赴苏联采访。当时还是北京俄文专修馆学生的瞿秋白和李仲武也以记者身份同他一起访苏。在莫斯科期间，会见了列宁、莫洛托夫等革命领袖，发表了《苏俄见闻记》，他们是十月革命后最早访苏的一批中国记者。俞颂华访苏后仍以记者身份在德国三年，研究哲学、伦理学和马列著作，回国后再参与主编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1932年经黄炎培向史量才、马荫良推荐进申报馆工作，于7月创办主编《申报月刊》。这是《自由谈》受到国民党的压制而开辟的第二战场，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的文章有许多发表在这里。

在史量才遇害后的一二年间，国民党政府对新闻统治并没有丝毫放松，对1930年11月制订的出版法多次加以修订，一次

比一次严厉。1935年7月的一次修订，除保留中央对新闻界干预的权力外，补充地方有干涉新闻出版和先行扣压出版物的权力，而且连广告的刊登也要预审。这一年的5月，上海杜重远的《新生周刊》刊登了一篇《闲话皇帝》的文章，文中对日本天皇制度进行了一般性议论。驻上海日本领事馆以有辱于神圣的日本天皇为由，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以诽谤罪判处主编杜重远徒刑一年零两个月，《新生周刊》遭封闭。其实，这篇《闲话皇帝》的文章，事前是经过国民党政府新闻机构审查，并发给了准刊证件的。国民党对日本侵略者是如此之害怕，对自己的新闻工作者的压迫却愈来愈甚。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申报》原来所具有的那种反抗精神有所缓退。《申报》1932年遭到邮禁，史量才答应今后的态度可以缓和作为解禁的条件之一，这是指在重大政治事件上一般不再同国民党发生正面冲撞。而这时，不但态度缓和持重，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所表示的观点已没有过去那样明确，有时又变得模棱两可。

1935年一年中，报纸一共发表349篇评论，其中国际问题占三分之一，救亡图存有不少，反对新闻压制的也有一些，但只是要求国民党在规定范围内给予舆论自由，希望政府“拜大舜乐取于人”，注意“舆论之殷切，以广采博资”。像前几年那样明确反对国民党“剿匪”，反对不抵抗主义的言论已不再有了。这一年，石西民因察北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回到上海，从事左翼文化活动。他向《申报》投稿。为俞颂华赏识，被吸收进申报馆工作。当时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上海各界响应举行了盛大的反日爱国游行。石西民加入了游行队伍，站在两个受伤青年中间，振臂高呼抗日口号。这个情景为《申报》记者所摄取，照片刊登在1936年1月新出版的《申报周刊》封里。俞颂华见了感到吃惊，他认为石西民太激烈，早知如此，就不敢请他进《申报》。不过，俞颂华只是对石西民作了一些劝告，还是让他在《申报周刊》当编辑。这

件事说明了史量才遭特务杀害后，申报馆主持人员所持的稳重态度。反映在新闻和评论上也同样。“一二九”运动爆发第二天发表的《学生运动之复兴》的评论，认为学生提出的口号：“曰保障华北安全，曰维护国家权利，实为我国最低限度之要求”，他们的行动“足以激起民气”，但又说：“似宜在不越轨之范围内受相当之尊重也”。何应钦奉蒋介石、汪精卫之命，接受日方要求，与日本驻天津驻屯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的“何梅协定”，就是卖国协定，北平学生游行示威反对这种卖国行为，就是爱国行动，即使行动激烈也没有什么越轨不越轨的。所以这时的报纸的进步倾向比之1932年支持北平、南京和上海学生的爱国行动也有所后退。

《申报》的进步倾向，除了史量才自身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条件下爱国主义精神振作之外，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民主进步人士和中共地下组织的影响。1932年的改革和振兴就是在黄炎培、陶行知以及宋庆龄的影响和支持下实现的，而且在报业现代化基础上，使报纸的政治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报纸遭国民党邮禁，黄炎培、陶行知等暂时隐退之后，通过《自由谈》的改革和发展，《申报月刊》的创刊，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和文化界人士对报纸的进步倾向继续给予了支持。史量才遭国民党暗害后，随着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深化，又有邹韬奋、胡愈之和恽逸群等人士陆续接近《申报》，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员。早在30年代初，由《申报》、《新闻报》、《时报》等进步编辑记者组织的中国新闻研究会，经过几次变动组合，后来成为左翼记者联盟和记者座谈会。这些新闻界团体中的进步成员与《申报》时有联系和接触，进步思想继续影响报纸。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报馆主要骨干的思想状态逐渐从犹疑持重的境界中走了出来。

原来，迫于国民党的压力，《申报·自由谈》已在1935年11月停刊。现在为了把《自由谈》的战斗风格能继承下来，又能适应时局的变化，于1936年1月把《申报月刊》改为《申报周刊》。周刊将

每周国内外时势变化作系统的报道，对重要的时事问题作简短扼要的评论，以帮助读者了解时局发展的经过及未来的趋势，并附刊漫画插图。对学术上的新发现、艺术上的新倾向亦随时加以介绍。周刊的文字浅显，内容充实，适合广大读者阅读。该刊仍由俞颂华兼主编。

这时，对于报纸的评论，恢复了过去抓住时局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发表时评。针对日本在华北的大量增兵与美国对这一事态的声明，1936年5月21日发表时评，认为美国声明拥护九国公约，保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并非是对日本的警告，只是表示美国的道义立场。对于“日本黩武主义者不忌世界舆论，不惧外交辞令，而所虑者唯有武力。故美国应积极备战”。“吾人不可以过于重视美国之声明，救亡卫国，百分之八十在于自力”。这对于当时抵抗日本侵略，幻想依靠外力，过于相信盟国的口头声明，无异作了坚定的忠告。

对于广东陈济棠任期内发生七起重大贪污案，到了陈济棠下台国民党政府才予以透露，报纸对军队与政府官员贪污成风进行了激烈的抨击。7月30日发表《怎样根除贪污》，认为凡贪污的军人或官吏在位时，都把持和提高权位，为的是积累财富，将来成为富翁。时评说：“有人说过：中国如今没有真正的资本家，有的只是些下台的军阀和官僚。我们只要稍稍查一查许多银行大公司的股东名单，就可以知道这话不无相当理由。今日中国所以穷困危急到这般地步，委实可以归因于军阀官僚的贪污。”因为外患也是与内政的贪污腐败有联系的。为此，时评主张开放言论，实行公开监督，尊重法制，恢复固有的民族精神，以发挥民众的力量，以肃清贪污。

西安事变的爆发，上海中外报刊认为这将加深中国的危亡，不少人以为从此中国又将大乱，恽逸群在《立报》发表文章，提出西安事变有和平解决之可能。《申报》基本上也持有这种观点，在

事变的报道中反映了这种和平解决的进程，这对于国难深重之时安定人心起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之后，蒋介石嫡系部队约30万人，准备从河南进入陕甘发动对红军新的围剿。1936年底蒋介石到达西安，逼迫从东北撤至陕西的张学良部队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进攻红军。东北军广大将士对失去家乡大片土地感到痛苦，要求抵抗日本侵略，打回老家去，不愿同当时主张一致对外的红军作战。张、杨两将军又受到中国共产党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影响，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已经放弃“反蒋”口号，改变为逼蒋抗日的政策，因而不愿意接受蒋介石继续围剿陕北红军的命令。在蒋介石12月4日到达西安后，他们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多次进谏遭到蒋介石训斥和拒绝之后，被迫于12月12日将蒋介石扣留，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爆发。

12月13日，《申报》在显著地位发表了涉及事变真相的重要新闻：“据闻此次兵变之近因，系由于某部军队有通共嫌疑之故，张学良致电政府□□□□□□，张氏此举是否出于自动，抑或被动尚不可知。又闻张氏已有电致现在上海之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保证蒋氏的生命安全。”几天中，西安发向外界的消息中断，《申报》无法从自己的记者中获得信息。13日的新闻取自路透社12日的电讯。《申报》刊登时，张学良致政府的通电中有事变发生的原因，有要求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释放爱国领袖“七君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内容。但这些都为国民党政府新闻检查时删去了。本来，国民党新闻检查对删削之处是不许留下空白的，而这一次《申报》刊登时没有按照规定，而留下空白，以□□□□为读者留下悬念。从整段文字和文字连接中，联想张学良发动事变不是无缘无故的。国民党政府想掩盖事变真相，删去了不利于国民党的内容。

14日继续发表评论，认为经过几年的战乱，蒋介石已取得了

国内的统一。“蒋委员长是我国最高的军事领袖，他的威望一向是全国军政的唯一重心”。他的“失却自由，这就使统一的中国重复趋于涣散的危险”。所以评论希望“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中央还能保留对张学良方面接洽的途径，把蒋委员长营救出来”。评论不免带有“竭诚拥护蒋委员长”的味道。但从当时国内形势和后来中共从逼蒋抗日到“拥蒋抗日”的策略转变来看，这也有一定原因。报纸是希望国民党政府采取与张、杨两将军谈判的方式使事变转向和平解决的途径。

在如何解决西安事变的这个问题上，南京政府当权势力中出现过两种不同主张和行动。一派是亲日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他在取得了“讨逆总司令”的大权后，立即调兵遣将，准备向西安大举进攻，并出动飞机轰炸渭南。人们怀疑何应钦是意图乘国民党危难之机，发动一场混乱，让蒋介石葬身炮海，乘机夺取军政大权。另一派是亲英美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主张通过同张、杨谈判营救蒋介石。反对何应钦向西安进军。他们与有关人士多方接触活动，蒋介石的顾问端纳曾在14日去西安。

17日他在洛阳致电美联社，告知张学良不欲加害蒋介石。《申报》在19日从陕西人谈的消息中报道蒋介石确实安全。同一天，张学良释放了与蒋介石同时被扣留的蒋鼎文，让他带着蒋介石17日写给何应钦的手书回到南京，《申报》刊登了手书的全文。蒋介石在信中说：“近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日前可回京。”可是，何应钦并没有坚决执行蒋介石的手令，20日继续轰炸渭南，直至宋子文偕宋美龄去西安，轰炸还没有停止。为此，《申报》又将蒋介石的手书制成铜板，刊登在20日报纸上，以示确系蒋介石的亲笔，应当将指向西安的这场军事行动立即停止下来。

西安事变经过中共中央的代表周恩来和张学良、杨虎城参加的谈判，宋美龄作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发动抗战”的承诺。

24日晚，周恩来在宋美龄、宋子文陪同下会见蒋介石，蒋当面向周恩来表示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之后，张学良、杨虎城才解除了对蒋介石的扣留，使西安事变得和平解决。但在当时国民党严密的新闻封锁之下，中共方面顾全大局、转危为安、促进和平解决的诚心和努力，报纸不能公开报道，《申报》只是在朱家骅等人的所谓“张学良勾结共党”的谈话中约略透露。而张学良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只有“无可奉告，此来待罪”八个字见告记者，从此开始了他几近半个世纪失去自由遭受幽禁的人生悲剧。

来自延安和敌后的报道

马荫良、俞颂华，以及《申报》的编辑记者，对于1932年因激烈反对内战而遭到国民党的压制记忆犹新，他们对西安事变后逐渐明朗起来的国共合作，发动全民抗战的形势感到鼓舞。这是因为1937年1月从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北的保安到延安，从这里不断传出联合国民党坚决抵抗日本侵略的声明和决心。2月间，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商讨了对共产党和对日本的政策，如何实现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作出的停止进攻工农红军、发动抗战的诺言。在国民党开会期间，中共中央致电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以实现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曾经对《申报》走向进步起过重大影响的宋庆龄，于1月15日与何香凝、冯玉祥等13人，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以上这些重大事件，《申报》都大力宣传，希望从舆论上促进新形势的到来。

当时的陕北延安，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似乎还是一个“禁区”，或者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地方。而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正是从这里作出的。俞颂华回想到早年他作为《北京晨报》和《时事新报》特派员，与瞿秋白、李仲武一起访问苏俄，报道苏俄十月革命后

的新气象，对于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国共第一次合作所起的影响时，他与马荫良商量后决定访问延安。俞颂华和孙恩霖以《申报》记者名义于1937年4月9日经西安到达延安。这是继斯诺、范长江之后上海新闻界去陕北的记者。在延安，他们走访简朴无华的市区和军民同居亲密无间的街坊，遇到许多春寒料峭中都是穿着棉衣的官员和士兵。在窑洞里，毛泽东同他们谈了一个晚上，还访见了周恩来、朱德、徐特立、张国焘和傅连璋，回沪后写了《从上海到西安和陕北》的长篇通讯。他们把摄自延安的照片首先在《申报周刊》上作为封面发表，延安城墙上“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以及“停止内战”的大标语清晰可见。通讯几经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删节了不少地方。还不准在《申报》上刊登，他们只得在《申报周刊》二卷二十期上发表。通讯阐明抗日的前途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称陕北是“国难深重中的一线曙光”，“陕北的主张和行动亦是全国人民一致的主张”。从这里说明了国民党的南京，已不是全国的唯一的重心，而在陕北的延安，已经有了拯救中国的另一个政治中心。

当全民抗战的舆论逐渐高涨起来的时候，上海人民对国民党逮捕全国各界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等“七君子”事件深为不满。《申报》于1937年2月16日报道了上海各团体代表200余人，发起组织各界统一救国大同盟，并刊登了大会通过的宣言，主张团结一致，以舆论和道德力量共同对破坏统一的汉奸与军阀加以严厉制裁。大同盟推选杜月笙、骆清华、王云五、舒新城、朱学范等100人为执行委员，新闻界《申报》马荫良也为执行委员。报纸对蒋介石西安事变时释放政治犯的承诺至今未有执行，“七君子”仍然关在苏州高等法院监狱之事，于4月8日发表《从沈钧儒等案说到统一救国》的时评，认为政府应当允许人民有组织社团御侮救亡之自由。救国会领袖提出的救国主张，有不少是涉及政府与政权、人民阵线与救国阵线等

问题，根本不关系到所谓“危害民国与三民主义”。“在现代国家，本可以借报纸及议会之论战加以解决，而在吾国则因环境关系之牵制，必诉诸法律制裁而后。则就国家统一与人才集中而论诚属可扼腕者”。6月11日，沈钧儒救国会一案在苏州高等法院刑庭公开审理，《申报》当天发表时评，声明被告是无罪的：“素为社会知名人士，其构成罪嫌之出于爱国动机殊不容一笔抹杀”。国民党加罪于沈钧儒等所谓“危害政府”，而沈钧儒等过去之主张及行动，容有稍涉偏激之处，然其用意所在为当今政府所示之团结御侮方针并无二致。

在沈钧儒等被关押期间，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为营救“七君子”而四出奔走。当沈案开庭审理之际，为了使广大人民了解事实真相，应当将他们在法庭上的答辩书向社会公布，最好的办法是由影响最广的《申报》首先全文发表。胡愈之代表救国会，与《申报》担任编辑部主任的胡仲持联络，说明公布答辩书之必要性，俞颂华都十分支持。沈钧儒等当时还是“罪犯”，公开发表答辩书要承担一定风险，但《申报》已不顾及此，于6月8日发表，一直至15日每日在报纸上连载。接着其他一些报纸也同时刊登。答辩书一开始指出：在这敌寇日深，而内部纠纷依然严重的时候，天良未泯的人民都渴望着有一个广大的团结，能有一个全国统一的联合救国阵线。为了这个要求，各界的救国团体代表们在上海举行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人民救国阵线。而起诉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所定之罪名，“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或集会，或宣传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然以被告等爱国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正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答辩书列举起诉书歪曲救国会提出的主张是“不承认现政府有统治权，并于政府之外再组织一个政府”。“又指救国会关于政权的主张与共产党致国民党书中关于‘赞成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

主共和国，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如出一辙”。又指邹韬奋在去年7月12日《生活日报》上提出的“人民阵线”，用在我国的民族解放阵线，有国际背景，等等。答辩书指出：救国会和联合救国阵线与各党各派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抗敌纲领与政府根本方针显无二致。民众团体本着爱国热忱为此建议，决无不法可言。起诉书因未能瞭然于实际政治之趋势，以致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另外，起诉书对于政府与政权，政府与群众团体，政权、政府与救国阵线，共产党主张与救国会建议等等缺乏正确的认识，而且对救国会的文件置上下之不顾，断章取义，一再曲解。更属荒唐的是诬指被告勾结军人，谋轨外行动，意思是指参与了西安事变。答辩书指出：西安事变发生时，被告等早于是年11月22日被捕，时当被押于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身在囹圄，不但无法与外人联络且对该事件也无所知悉。

每当载有答辩书的报纸出版，上海广大读者，感到答辩言之有理，事实确属。原来以为沈钧儒等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一看之后原来都是为了爱国抗战，“七君子”真是一身正气，大义凛然。一些热衷于国事的读者更十分愤激，批评国民党自己不想抗战，也不让别人抗战，自己不想团结，也不让别人团结，爱国有罪，岂有此理。每当贴报栏贴出当天报纸，人们争相阅读，当人们读到答辩书所述起诉书文不对题，断章取义，前后矛盾时街头笑声四起，都觉得起诉书言之无理。读者议论激愤之情景，不亚于民国初年上海报纸集中地望平路街头贴报栏的“共和声”。

答辩书实际成了对法院公诉的批判书，在上海以至全国引起很大反响，最高法院理屈词穷，无法加罪于“七君子”。在报刊强大的舆论和各界人民群众团体一致声援之下，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在“七七”事变发生不久，将沈钧儒等七人释放出狱。

“七七”事变前后，国民党阵营中存在着一股幻想和平的暗流，亲日派张群为蒋介石提过“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后和，和而后

安”的主张。实际上，芦沟桥事变彻底暴露了日本侵略者并吞中国的野心。而蒋介石7月初在庐山就芦沟桥事变发表的谈话还是“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直到7月28日和30日北平，天津陷于敌手，7月31日蒋介石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中才表示：“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

“七七”事变是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开始，而出现的形式是日本在北平宛平附近举行军事演习，7月7日夜诡称一个士兵失踪要进入宛平搜索，在与中国驻军进行交涉时突然炮轰宛平城芦沟桥。在国民党人士中幻想这是一次地方事件，并希望通过调停来解决。而日本表面上也称这是地方事件，其实这是日本侵华战争中多次玩弄的阴谋。《申报》根据“九一八”、“一二八”历次日本侵略行动的教训，对此怀有警惕，当日军在宛平附近有所动作的时候，报纸刊登了北平5日来电，揭露日本的侵略阴谋，8日日军攻入宛平城，报纸第二天发表了《又一次侵略行动》的时评，指出这次“日本是有计划的侵略行动。其性质是严重的，足以震动全世界”。接着，时评在揭露美其名曰地方事件，既想避免国际谴责，进而达到侵占华北之后，在7月17日，8月4日更尖锐地指出：“试问我国共有几多地方，现被日本分化与践踏，我们不知还有几多地地方足供日人藉口！”指出把希望寄托于国际调停只是一种错误的和平幻想。报纸大声疾呼：“我国鉴于‘九一八’事变时过于依赖外援，抱着不抵抗主义，以致丧失了偌大的土地。只有坚决的持久的全面抗战，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给予全面的坚决的打击，才能博得国际同情转变国际形势，使其发展有利于我们”^①。

自“七七”事变至七月底，《申报》以《言论界总动员》^②的姿态

^① 《国际形势与全民抗战》，1937年8月4日《申报》。

^② 1937年7月23日《申报》。

每天发表重要时评，从日军增重兵进犯华北、平郊战争，防守华北之必要步骤，对平津形势紧张作最后忠告，华北战争中的外交路线，予打击者以打击，中国救亡图存之大道，建立战事体系等等作了系统的论述。这是报纸继 1932 年反对“攘外必须安内”和“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以来抵抗日本侵略的言论最为集中有力的时期。报纸不仅揭露和批评一味幻想和平、不抵抗主义的行为，而且以舆论发动和鼓舞全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志气。至 10 月初，报纸又设专论一栏，特约郭沫若、邹韬奋、章乃器、胡愈之、周宪文、金仲华、张志让、郑振铎、陈望道、沈志远、孙怀仁等担任撰述，他们的文章每日在第四版发表。

芦沟桥事变后仅一个月，“八一三”事件发生，日本侵略者突然进攻上海。《申报》第二天时评中再次提醒人们：芦沟桥事变以来，我们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本旨与敌人周旋，正是使日本人借以得寸进尺。日本的所谓“在华北无领土野心”，“也不希望上海事件扩大，完全是一片谎言”。

从此，中国开始全面抗战。国民党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再度合作，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统一团结御侮基础上决心共赴国难的宣言，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并开赴前线杀敌。对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申报》都作了大量报道。这时，中央社也发了一些客观的报道，为《申报》所采用。以后，《申报》也有不少直接发自延安的专讯。9月25日，八路军在晋北与日本侵略军激战，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平型关是山西北部长城的一个重要关口，关内外山峦叠障，地形险要。日军板垣师团从关外的公路入侵，企图南下山西，就在这条公路两侧遇到八路军林彪、聂荣臻一一五师的迎头痛击，三千余人被歼，一百多辆军车被毁。板垣师团已在中国领土上长驱直入，想不到会在这里遇到重创。《申报》于9月27日刊登了延安来电，报道平型关大捷，这是第一次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战胜日本侵略军的战斗

消息，为积愤已久的中国人民大张了抗日的志气。报纸 29 日评论中称：“平型关的胜利是国共合作后第一个喜讯，全国人民感奋极了。这次胜利不仅使平汉、平绥两线的战局换了样子，同时更证明了八路军将士忠勇卫国的赤诚。”当八路军前进到山西平型关一带时，还残留着一些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的散兵游勇，他们沿途抢劫，吓得老百姓往山沟里逃。当八路军一到，开始老百姓不了解，还是呆在山沟里不出来，不合作。经过八路军同志耐心解释，尤其是他们看到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秋毫无犯的军纪，才消除疑虑帮助八路军服务后勤。为此，报纸在同一篇评论中写道：“抗战是全面的持久的抗战，一时胜败并不足以左右我们的忧喜。”但它却使“我们得到一个深切的教训，要保证抗战胜利，政治工作必须与军事相配合，武力必须与民众相联合”。八路军就是过去的工农红军。国民党一直把他们宣传为害国伤民的“共匪”。从《申报》对平型关胜利的报道中，人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一支忠于祖国、爱护人民、坚决抗日的新型军队。

当中共领导的军队节节向华北敌后进军，而国民党的大军加速西撤，1937 年 11 月放弃上海、无锡、苏州、杭州等城市之后，12 月 13 日弃守南京，20 日宣告迁都重庆。这时，英美还没有加入中日战争，侵占上海租界周围地区的日军还未侵占租界，但对租界报刊的抗日宣传不能容忍，仗着武力的威势把侵略势力伸入到租界中来。10 月间，日驻沪领事三浦向租界当局提出要求取缔租界内抗日言论。公共租界工部局发布报刊“非向本局登记，不得在公共租界内刊行、印刷或分送”的规定。但态度上保持中立，一般具有抗日倾向的报刊都能领到营业出版执照。到了 11 月间，日本驻沪领事冈本致函租界当局总董樊克林，再次要求取缔租界内报刊的抗日活动。这时有一些报纸先后停刊，而《申报》凭着洋人创办，在租界已发行了 65 年的老牌子，继续进行抗日宣传的气氛也不稍减，其中尤其对抗日义勇军敌后抗战，八路军挺进华北，

陕北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中央领袖人物的形象、活动和言论广为传播。11月9日，在第一版以广告形式刊登了章铎声翻译斯诺的《毛泽东访问记》，关于外交、日本帝国主义、国内抗日联合战线等问题的谈话要目，还刊登了四张照片。同时还刊登赵德华编写的《朱德、彭德怀访问记》出版广告，介绍说：本书系将采集朱德、彭德怀的实际材料编成。这两个抗日先锋的风采、性格、言论、行动均由编者以灵活的手法一一摄入镜头。并附最近照片两帧，其神采尤能跃然纸上，令人神往。11月17日报纸对朱德、彭德怀的报道更为详细，报纸引用中央社记者王少桐由太原发来的访问八路军指挥部的通讯，记者生动地描绘了会见朱、彭正副总指挥时的情景：“下午，我们去总指挥办公室，一个身穿士兵服、戴眼镜、满脸胡子的人站在门口。我们几个人都没有十分注意而跨进了门，可是他们的参谋长立刻过来向我们介绍，这位是朱总指挥，刚从前线回来。这时我们的内心真是无限惭愧。可是这实在也难怪，他们没有领章，更没有一般高级长官的派头，额上既不刻字，你说一个不相识的人如何分辨出谁是长官，谁是士兵，虽说善于识别人的新闻记者，到此也技穷了。他的谈话同样没有客套，缓慢而有力，态度是沉着而刚毅，好像每句话的出发点，都是根据事实上的体会或经验。”记者在访问之余还对八路军进行了实地考察，说八路军所以能存在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坚持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

“八一三”之后，考虑到纸张等物资供应困难，发行受到限制，自8月15日起改出一张半，18日起又改出一张。但为了适应南北局势和战况瞬息变化，20日起加出一份《夕刊》，为一大张。王少桐八路军办事处的访问记就是在《夕刊》刊登的。随着广大地区沦入敌手，交通阻隔，消息来源减少，中央社未久也被迫停止发稿，《夕刊》于11月19日停刊。而报纸的正张继续刊行。由于租界内的报刊还坚持抗日宣传，引起了日本侵略军更大的仇视，日

本驻华大使馆武官原田因会晤工部局总裁费信惇等时称，如果租界当局不取缔抗日宣传，日本军事当局将采取行动。因之，《救亡日报》只得被迫迁往武汉，《立报》、《民报》、《时事新报》相继停刊。11月28日，日本果然采取行动，强占了设在南京路慈淑大楼的国民党上海新闻检查所。在国民党军队西撤、南京沦陷之后，这个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已无所作为，但日军之占据则是强行取而代之。日军12月13日通知各报刊，必须在14日晚上起将第二天的稿件小样送检，接受新闻检查，不受检查者不准出版。《申报》拒绝接受检查，不得不在1937年12月15日宣告停刊。这是《申报》自上世纪1872年4月30日创刊以来第一次停刊。《大公报》也同时停刊。《新闻报》在停刊五天之后表示接受检查，22日恢复出版。一时间，租界内抗日宣传的声势几近消失，人们陷入惶惶不安之中。

从汉口版到香港版

预计到上海、南京失陷后可能出现的局面和报纸的命运，为了坚持报纸能持续出版，马荫良、俞颂华等《申报》主持人员在1937年底上海停刊前，已将一部分印刷机器，物资等运往武汉。那里曾经是国民党军队从长江下流退守后的政治中心，有的报纸不能在上海坚持下去也有迁移去武汉。经过紧张筹备，武汉版于1938年1月15日出版。发刊词表示：以客观态度评议宇宙万象，以科学方法采访世界消息，坚持国家立场，不苟且，不屈服。抱定公正精神，不欺骗，不枉曲。表明报纸退出了上海，爱国抗日的立场决不改变。可是，自国民党政府弃守南京，迁都重庆之后，大军继续西退，一批批的城市相继沦陷。马荫良等考虑到武汉版发行能否长久前景难测，转辗到香港，于3月1日发行了《申报》香港版。在武汉版、香港版同时发行的情况下，原有《申报》订户

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贵州五省、香港、澳门及国外，均寄香港版，其他国内各地均寄武汉版。香港版初刊期间为对开4版，一版为社评和广告，第二版国内时事新闻，第三版上大半版为国际新闻，下小半版为华南要闻，第四版为本港新闻。张恨水的长篇连载小说《游击队》刊在第四版。报纸在献辞中说：本报之新闻网虽笼罩全球，而对新闻原料之估量则素称慎重。每有言论发表，尤务求致公无偏，不为威迫，不受利诱，以期保全多年坚守之报格。同一天，第二版发表了马相伯《申报发行感言》。文章回顾了《申报》六十多年来的历史和抗战中之现状，称赞上海沦陷后武汉版、香港版的发行，并确信报纸“光明之前途，将与我中华国运同其悠久”。

《申报》感到当时内地不少报纸消息贫乏、迟缓，由于限制较多，有的新闻难于刊出。报纸工作者不得不仰赖外国通讯社的消息，以充实篇幅。另一方面，政府对于洋商的中西文报纸向来放任，而对国人自办的报纸独严，“结果很多重要消息在洋商报纸上可以痛快直书，而在自办报纸上，只可字里行间去隐约猜想，民众当然多取彼而舍此。新闻记者纵然要代政府保守秘密，亦苦无法杜塞民众的耳目”。因此，希望政府改革新闻制度，同时改善国内战时电讯机构^①。

香港地处中国最南端的特殊地区，中国人自办报纸虽不受中国政府的制约，但由于战争频繁，与内地交通阻隔，消息来源受到限制，尤其是敌后地区的消息。为了改进这种状况，扩展消息来源，香港版与远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保持特约航讯，并且设置专电与特讯。专电由重庆、成都、上海、西安、昆明、桂林等城市的记者和通讯员发来，特讯由派往西北、西南各省的特派记者经实地考察后发来通讯、特写。欧洲及南洋等地亦有特派专员

^① 香港版社评：《战事的新闻记者》，1938年8月7日《申报》。

传递消息。评论特约社会著名人士和专家撰写。香港为中外交通枢纽，虽处战争环境，借道香港前往国内外的旅客仍然很多。为此，报纸约请中国旅行社编发航空、轮船和铁路出入时间表及变化的状况。这对往来的海内外人员、旅客起了不小的作用。通过频繁的人员往来，也有利于新闻的传播。

由于在扩展新闻来源方面采取了多种渠道，武汉版、香港版新闻报道比较及时，尤其是人们普遍关注的时局进展和战争消息，并且随时发表结合时局的评论。1938年3月下旬国民党军队与日本军队在山东台儿庄会战。这是李宗仁指挥下与日军作战取得的一次胜利。国民党阵营在欢庆胜利之际，有人认为抗战不久就可获胜，产生了轻敌侥幸心理。当时的《大公报》认为这一仗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我们的胜利使日本军阀就在精神上失去支柱，只有静候末日审判。《申报》汉口版则认为：台儿庄战役是中日战争的一次胜利，就有利方面着想，证实了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配合运用的功效。此后继续改进，必可置敌于死地。可是我们“绝不应为一时的胜利所陶醉，忽略了台儿庄一役必然引起更严重的测验。警惕日军卷土重来。会战不足为中日实力对比的测验，真正的测验，正有待于方长的来日”^①。

后来战争的发展证明武汉版当时的估计是正确的，抗日战争不但不能在一、二年之内取得胜利，而且进入了长期的持久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向西北、华北和东北等广大敌占区进军，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起抗日根据地，准备与日本侵略者长期作战。2月17日武汉版引用郑州民革社的通讯，报道晋察冀边区军事、政治、民众运动都表现了一种惊人的进步。过去政府与民众没有密切的关系，可是现在边区各级政治工作人员确实与民众打成一片。边区人民的知识程度虽然一般比较低，但是他们的民

^① 社评：《勿忽略更严重的测验》，1938年4月14日《申报》。

族意识，爱国情绪恰异常高涨。有了这个优良的条件，民众运动自然比较容易进行，边区民众运动可以说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功。八路军活跃冀东，8月间开滦煤矿工人有3000人加入游击队。8月1日香港版引自不久前从东北敌占区抵沪的可靠人士对路透社记者的谈话：八路军一大部已挺进东北，组织民众从事抗日，极获成功。

当国民党军队于10月21日放弃广州之后，接着于25日又弃守武汉三镇。《申报》武汉版已无立足之地，只好停刊。在内地抗日报刊宣传阵地继续缩减的情况下，《申报》坚持扩大自己的影响，12月5日起香港版从原来的1大张4版，扩大为两大张8版。《扩版献词》重申创刊以来“为国家正视听，为社会明是非，为群众谋福利”的方针。并且要把报道迅速，新闻详确，发表严正精辟的评论作为今后的努力目标。除每日评论外，还增加《星期评论》特约在港和内地的学者专家执笔。这时，1937年底上海停刊的《申报》也已于1938年10月10日复刊。一南一北，遥相呼应，《申报》的影响继续扩展。

当广州、武汉失陷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战局发生新的变化。报纸从重庆记者中获知《新华日报》发表了毛泽东《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新阶段》的文章。这是毛泽东10月间中共六届六次会议上报告的一部分。编辑部特别要重庆记者将全文航邮寄港，于12月14日开始在报上连载，刊头采用了毛泽东的书写体。编者按语说明：这是珍贵的历史文献，对时局有重要的分析与启示。

到1938年底1939年初，新四军与华中敌后的游击战争，在长江南北两岸迅速开展，香港版也不失时机地报道战斗部队的状况。12月19日，以本报特讯发表了《叶挺将军会见记》。《会见记》记述新四军将领平凡普通的一生：觉得普通报纸上对一般军官所用的形容词：目光炯炯，神采奕奕，以及威风凛凛一类字眼

对他都不适用。当时我们进了他的房里，一眼见到的是这样一个青年：头发梳得不太光滑，身上穿着全白的恤衫，没有结领带，腿上套着灰色的西裤，没有折痕。一切都似乎带点浪漫色彩，俨然像一个学生，看不出什么“武夫”的气概。

香港版的发行，从新闻舆论上对日本侵略者是一大打击，香港地区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较多，报纸的报道宣传在国际影响上对日本更为不利，因之日本驻港总领事向港府提出抗议，要求禁止《申报》发行。但港府以“华字报纸在港发行，无受第三国干涉”为理由，拒绝了日本的要求。香港版终于能以显明抗日救国立场，坚持发行了一年零四个月，直到1939年7月31日停刊。

借“洋旗”再回孤岛

抗日战争后的上海，由于当时英、美诸国还没有介入战争，租界对中日战争处于中立状态。日军占领了上海周围地区，但市区南起民国路（即今天的人民路）北抵苏州河，东自黄浦江，西至法华路（今新华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这一带属于租界的势力范围，英、法、美等国派军队在这里驻守巡逻，边界设防。这个地区之内也就是当时人们称之为“孤岛”地区。1936年时上海人口已增加到381万多人，其中外国人有3万8千多人。自1937年“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之后，战争频繁，上海周围及江浙一带的有钱人纷纷迁来避难或经商，生活贫困的到这里来谋求生计。一时人口再度膨胀，市面畸型繁荣，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生存空间。

在这里，自1937年底日本侵略者对抗日报刊采取毁灭性的摧残之后，除了《字林西报》、《上海泰晤士报》、《大美晚报》、《密勒氏评论报》等十多家外文报纸和纯属翻译的《译报》和《集纳》周报之外，中国的新闻事业几乎摧残殆尽。上海的新闻工作者考

考虑到这时候国民党已弃守南京，不久，南方的杭州、芜湖，北方的济南、青岛等城市也接着失陷，国民党难于在近期收回失地，而孤岛上抗日宣传不能长期留下空白。于是他们利用了英美西方国家与日本的矛盾和所处的中立地位，借重英美等国家一些民主人士的反法西斯热情，用聘请洋人担任发行人、领取开业执照的办法，使之原来被迫停刊的恢复出版或创办新刊。一时间，这种“洋旗报”成为孤岛进行爱国抗日宣传的一种重要形式。这些报纸，有国民党地下组织办的，有中共地下组织办的，也有民主爱国人士办的。政治背景、报纸形式、使用的语言有所不同，但一般都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上。这些报纸有《每日评报》、《导报》、《中美日报》、《大英夜报》，以及由爱国人士严宝礼筹备主持，以发行人兼总主笔英国人克明出面办的《文汇报》。这个时期，既是孤岛抗日报刊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是中国新闻史上“洋旗报”最兴盛时期。

《申报》马荫良等主持人对上海的情况十分了解，香港版的报纸上经常反映孤岛新闻事业恢复和发展的状况。这时武汉版已经停办，香港版虽在出版，但远离内陆。他们感到上海是《申报》创刊60多年来生长发展的基地，形成国内外广泛的社会影响。他们又受到港府当局曾经利用中立地位拒绝日本要求禁止香港版发行和上海“洋旗报”发展的启发，决定采取打洋旗的老办法，回上海复刊。当时上海“孤岛”上的日本特务和汉奸开始对抗日进步报刊和新闻工作人员施行恐怖手段，甚至加以暗杀，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但马荫良等亦在所不顾，决心回师孤岛。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以美商哥伦比亚出版公司的招牌，聘请美国人阿特姆斯任总经理，美国律师阿乐满为董事长兼总主笔恢复出版。洋人只是一种只拿钱不办报做事的虚职。19世纪后半叶的《申报》就是洋人出钱，中国的秀才办报。而现在是洋人挂名，中国人自己办报。今天的报人也已经不是当年的秀才，而是历经

战乱、饱经风霜的爱国民主进步人士。这时，俞颂华已应胡文虎的邀请去广州、香港创办《星岛日报》未再回上海。马荫良集中了原来《申报》的胡仲持、瞿绍伊、金华亭、伍特公、赵君豪、黄寄萍等编辑记者，还聘请了原《时事新报》总编辑潘公弼主持评论，恽逸群、于玲等撰写社论、专论，其他还有胡愈之、郑振铎、钱纳水以及《世界知识》的金仲华、冯宾符等支持或参加工作。著名的副刊《自由谈》恢复出版，王任叔（巴人）经胡仲持介绍担任编辑。这时候，《申报》人事上改变了过去史量才时不容纳党派人士的格局，报馆内有进步的民主爱国人士，有进步的国民党员，也有中共地下党员，像王任叔当时是中共上海地下文委成员。人才济济，阵容坚强。

报纸于1938年10月10日正式复刊，复刊词重申史量才一贯坚持的“主义不为感情所冲动，事实不为虚荣所转移”的方针。自当正义为依归，作为中国人民的喉舌，并一本已往不屈之主张，与艰苦环境作奋斗。复刊词还说明“在此纷糅错杂之气氛中，迄能保持其不偏不党之精神，利诱在所必拒，威迫亦置罔闻，一意为多数人民谋福利，尽指导舆论之天职”。报纸为对开8张32版。力求扩大时事战局、政治动态、文化教育、经济市场及敌战区人民生活状况的报道。保持了原来的《自由谈》、《春秋》两个副刊和多种专刊。并增出《游艺界》专刊，这是在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里，提倡正当娱乐，着重反映戏剧、电影、地方戏曲等游艺活动的专刊。创刊号上还有周信芳、黄金荣的题词。黄金荣是上海帮会中一帮的头子，担任过法租界的督察长，又投资办了共舞台、大戏院等游乐事业，是上海滩有名的“大亨”。“四一二”政变时，黄金荣帮助过蒋介石镇压工人纠察队。日本侵占上海时则称病蛰居不出，不愿当汉奸。《申报》要在复杂的环境中坚持出版，有时也不得不借助这些“大亨”的社会势力，以抵制或抵消来自各方面的麻烦。这也是过去史量才惯用的一种做法。

报纸复刊这个时期，战争形势急剧变化，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陷，人们对中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十分关心。《申报》复刊这一天正是中华民国国庆，报纸以显著地位刊登了蒋介石国庆告民众书，他表示不惜一切牺牲，努力抗战的决心。同时发表了周恩来在武汉向我国新闻记者的谈话。周恩来面对严峻的形势表示：不论武汉命运如何，中国均能继续抗战，共产党誓与国民党合作，妥协者悲观论必须打倒。周恩来宣告中共中央九月间在延安举行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情况，分析了今后抗战三阶段的发展形势。报纸又比较详尽地反映周恩来对国共合作表示的诚意：“抗战期间国民党已有长足的进步，余信有光明之前途。国民党与共产党以孙总理之三民主义为根据，并为之努力目标，即使战争结束后仍可继续合作，吾人现在正与国民党领袖商讨着切实的合作步骤。”《申报》的上述报道，对当时四面环敌的孤岛人民确是一种鼓舞，因为人民迫切希望坚决抗战，而国共合作才能大大增强抗战的力量。可是，形势发展则令人忧虑，10月21日国民党弃守广州，25日又弃守武汉三镇。11月间，报纸多次发表国民党军队从几个方面集结要夺回广州的新闻，但结果只是成了一种虚张声势的渲染，广州并没有收回，相反华南、华中大片国土继续沦入敌手。而周恩来通过外国新闻记者和报纸所宣告的抗战决心，却是由中共领导的军队逐步实现。在国民党大军节节后撤之后，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收回了大片国土，新四军和游击队在长江南北敌后进军，开辟建立抗日根据地。

当时的孤岛上，有一些进步图书陆续出版，《申报》在这方面也积极加以传播推广，凡出一本新书均以广告形式加以介绍。1938年11月8日为《资本论》、《列宁选集》的出版，刊登了征订广告。内容介绍中写道：《列宁选集》，是我们伟大的被压迫者的救星——列宁一生心血的结晶，也是他几十年中为人类社会而奋斗的收获。读者可以从这个集子里认出目前世界应走的道路，学得实

际斗争的经验。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英勇战斗，坚持在广大的敌人后方，钳制了全国约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的敌人。由于交通封锁、道路阻隔和邮路检查，敌后战况和胜利消息不容易传播到上海。《申报》除引用外国通讯社消息，还引用重庆《新华日报》记者采写的新闻通讯。1939年7月间，引用叶剑英对英国记者的谈话，说明战争第一年中日本以20个师团推进了1800公里。而第二年以30个师团及17个骑兵旅仅推进了200公里。这证明了日本军事能量的衰减，内部政治经济困难。而日本军队之所以无力再进，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游击队在日军后方的活动所致。《申报》对抗战形势的分析，对八路军、新四军在东北、华北和大江南北敌后不断取胜、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的报道，使上海人民感到孤岛并不是真正孤立的。

1938年底，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开叛国，向日本投降。他在河内发表的通电中，公然吹捧日本向重庆政府威胁诱降的近卫声明，汪精卫强调要与国民党“共同防共”。未过几天，即1939年1月间，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诱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决议，开始实施蒋介石制订的“防范限制共产党活动”的反动政策。这就形成了日后蒋汪共同反共的暗流，使抗战形势更加复杂化。

面对当时变化复杂的形势，报纸不断揭露汪精卫叛国投敌的汉奸面目，特别对他在香港散布的以所谓“防共”淆惑人心，中伤国共合作的阴谋进行充分的揭露，以引起国人的警惕。报纸发表评论^①说明：当时日、德、意的反共公约是法西斯混淆黑白的阴谋，是他们掩饰侵略向英、美、法等国家进攻的虚伪幌子。就国内而言，反共在今天已成为汉奸进行卖国的幌子，成为日本军阀

^① 社评：《论反共》，1939年1月10日《申报》。

灭亡中国的代名词，这一点中国人民应当加以极大的注意。中国人民必须用全力来拥护国共合作，它是取得抗战胜利的最大保证。对于国民党指责共产党违背诺言的说法，报纸文章解释中共已改变了原来的政策，为三民主义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的忠于抗战，日本人也不否认，以亲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汉奸对共产党的仇恨深刻就可以证明。

但是这个时期的《申报》主持人员，对国共摩擦、蒋汪暗流以至后来反共高潮的掀起缺乏预见，思想准备不足。报纸回顾国共两党十年来痛苦的经验，抛弃前嫌，密切合作，来抢救中国的独立和生存之后，肯定地说，“谁都不能否认国共两党像兄弟一样站在一起的事实”。^①这是出于好心的过分乐观的估计，事实上，蒋介石磨刀霍霍，酝酿着新的反共高潮。1939年10月25日，报纸转载《新华日报》毛泽东《抗战中的新状态与中国共产党》一文就说明了这一点。这篇文章揭露了国民党实施防共反共政策以来，残杀八路军战士，制造了博山惨案、深县惨案和平江惨案的事实，强调抵抗日本侵略与防范内部摩擦的必要，并申明准备反抗一切排斥共产党的企图。

1940年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在长江南北十分活跃，抗日根据地在苏北、皖北一些地区成片建立，这个地处京沪杭长江三角洲地区，不仅是敌后抗日战争从山地向江河湖海平原地区的发展，而且威胁着南京等汪伪统治中心。这个期间，《申报》有较多的新闻和文章介绍新四军的发展状况。1939年5月间，引用周恩来接见外国记者的谈话，说明日本占领军不但不能扫除其后方的游击队，而且游击队的数量日增，地位也日见强固。并且透露他自扬子江南岸江、浙、皖三省巡视后得出的一个重要论断：游击队不仅能在山间作战，而且也能在平原作战。他谈话中列举

^① 社评：《论反共》，1939年1月10日《申报》。

江苏某个宽500里、长百里的游击根据地的状况，日本军队只能盘踞在四面构筑碉堡的城镇里。不久，报纸又报道了上海外围的青浦、嘉定发生战斗，游击队袭击虹桥机场，日本兵在沪西虹桥路一带检查来往行人，说明新四军游击队正在迫近上海。报纸还多次介绍新四军将领，除了叶挺、粟裕之外，对陈毅将军的报道亦十分生动。1940年1月间江荻的《活跃在江南战场的陈毅将军》一文中描述说：“一年多来，他负着江南前线指挥重任，从艰苦的环境里奠定了新四军的基础，使敌蒙受巨大损失，不能在这锦绣山河任所欲为。”文中还提到陈毅在内战危急关头写的《断头诗》，说陈毅不只是一位战将，还是一位学识丰富的潇洒的儒将。

上海沦为孤岛后，蛰居和滞留的青年人不下几十万，其中不少是“八一三”之后从各地流亡到上海的。由于求业无门，教育萎缩，许多青年陷于徬徨、苦闷，甚至悲愤之中，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已远离上海，到哪里去才好呢？对此，报纸发表《上海青年往哪儿走？》的社评^①。评论说：到内地去，还不如到四周游击区去，那里也需要许多人参加工作，军队的政治工作，民众运动工作。游击区不但路途较近，而且一切人情风俗也容易了解。每一个青年应当参加一种救国运动的组织，一个人的单体救国是不可能的，只有组织到集体中去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国民党控制的报纸动员孤岛青年奔往重庆。《中美周刊》在读者信箱栏刊载了《怎样从孤岛赴重庆》的一组文字，介绍了上海去重庆的路线和所需费用。但许多青年还是纷纷投身到仅一江之隔的苏北、皖北抗日根据地。几年中新四军地方部队、游击队、民运组织、文化教育团体大量接纳了上海和从上海中转去根据地的青年，也有再从那里转往华中、华北抗日根据地和陕北延安的。《申报·游艺界》专刊几次报道电影演员蓝萍（后来易名江青）前去陕北的经过。还刊

^① 1939年1月29日《申报》。

登了她身穿军装举手行礼的照片。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军部及皖南的部队九千余人，按规定北移时，在泾县以南的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预先埋伏在那里的八万多军队突然袭击。新四军部队除两千余人突围外，其他大部分牺牲、被俘或散失。这一事件的报道成了当时孤岛新闻媒介的热点，孤岛虽然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重庆，但国民党仍然想通过某些“洋旗报”把宣传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当时的报纸都宣传抗日，但在对待国共合作、国共两党之间发生摩擦时则态度有所不同。皖南事变发生时，国民党控制的“洋旗报”，几乎都刊载了国民党军委1月17日诬“新四军抗命叛变袭击友军，已由顾祝同紧急处理，绳之军法，将该部全部解散”的通令。有的还就此大肆宣传，大作文章。如《正言报》，对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加以歪曲，以证实新四军确属“抗命叛变”。《申报》也刊登了合众社发的国民党军委1月17日的通令，但不把“抗命叛变”作上标题，在内容上引用国外通讯社或重庆的消息，揭露或透露惨案的背景，各方反映和共产党揭露的事件真相与对国民党的抗议。国民党军委会限令新四军在1940年12月31日之前开到长江以北，新四军部队1941年1月4日已在北移途中。读者从这里可以看到，何来“抗命叛变”，为什么要对新四军进行包围格杀呢？所以，皖南事变实际上是蒋介石为消灭异己而对新四军进行的一场大屠杀，是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的一部分。所以《申报》刊载路透社20日消息说：对于皖南事变各国人士已有所闻，本来是可以不流血而解决的，而现在颇感失望。同时，透露了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为皖南事变殉难者志哀的悲愤的题词。31日《申报》评论引用蒋介石说的皖南事变是军纪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是解散新四军，而不是处分共产党之后说：“此事无论怎样发展，不会得到国共分裂的当然结论。”这是《申报》从过去国共分裂惨痛教训出发，对当时许多爱国民主人士感

到皖南事变的发生，又将是1927年“四一二”政变的重演，国共合作快要破裂的担心的一种安慰。

可是，由于共产党方面的忍让和顾全大局，国共虽然没有立即分裂，但事态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重庆《新华日报》为皖南事变提出的抗议，被国民党重庆当局新闻检查时删去，只留下《我们的抗议》一个标题，题目之下一片空白。之后又因拒登蒋介石解散新四军的命令而遭国民党的迫害，不得不宣告停刊。这些，《申报》都引自外电如实报道。3月10日，还发表了国民参政会举行第二届会议时，共产党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拒绝出席的消息，并刊登了他们提出的为皖南事变进行抗议全文，和处置皖南事变的办法十二条。十二条说：制止挑衅，取消1月17日军委会的命令，严惩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恢复叶挺的自由，抚恤皖南事变伤亡之将士，交还全部人枪，释放一切政治犯，废除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逮捕亲日派首领，交军事法庭审判等。以上的这些报道，对澄清皖南事变真相，义正词严地反映共产党方面对处置皖南事变的的态度，起了正视听的作用。

从当时许多新闻和评论，或在处理外稿的态度中可以看到，《申报》是怀着一片善良的好心，不希望看到国共之间摩擦和可能发生的分裂。这也反映了当时孤岛上和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和民主、进步人士的心理。谁愿意在国难当头之时“同室操戈”，使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的图谋实现呢？可是，对于蒋介石抗战的两面性和反共本性《申报》认识不足。后来时局的发展到了分裂的边缘，《申报》的愿望未能实现，他们感到不幸和惋惜。这也许是当时具有进步倾向的报纸工作者的普遍心态。

报纸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

抗日战争中的上海孤岛，毕竟是四面环敌、孤立无援之地。战争头一二年，虽然出现过一度繁荣，但这是特殊条件刺激下造成的泡沫状态。不过一二年，政治形势和经济情况开始恶化，经济的萧条，引起了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生活无着者因饥寒交迫而倒毙街头巷尾者，一夜不下十余起至数十起。1940年初普善山庄发表报告，^①去年12月至今，普善山庄收葬的露尸达4.1万余具。因木板价格上涨，已往一具所费3.4元，而现在则非13.4元不办。为此山庄呼吁慈善人士广为义举。1941年1月6日报纸《衣食住行》专刊说：1941年是衣食住行的危险年，大家在风浪滔天中飘流，异常艰险，从千辛万苦中度过此黑暗时代。因经济陷入困境，社会不安定，盗匪横行，赌风大盛，邻近城郊的一些乡村尽遭洗劫。监狱人满为患，当局不得不将判五年以下徒刑者交保释放，但这也未能缓解继续恶化的社会治安。尤其汪伪特务汉奸与他们收买的地方汪伪势力和地痞流氓在租界内横行霸道，危害人民，报馆常遭到破坏，工作人员不断受到恐吓和暗害。抗日报刊陷入了生存危机。

由于上海地处长江下流的东部沿海，周边虽属战争环境，但与周围城乡和海内外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上海原有国际性城市的影响，也没有完全消失。所以，上海报刊的爱国抗日宣传、消息的报道不仅鼓舞着上海人民和周围的城市和乡村，而且传播到海外，这不能不引起日本侵略者的仇视和恐惧，而且力图加以控制和扼杀。

1939年4月，日本驻沪总领事三浦义秋、领事寺崎向租界

^① 1940年1月7日《申报》。

当局递交了要求租界当局取缔抗日报刊的备忘录。公共租界工部局与英美领事馆商讨对策，由英驻沪领事召见英商报纸总编辑，要求他们停止刊载有关抗日的新闻和文章。报社感到对此难以执行。4月26日，日驻沪总领事再次向租界当局递交备忘录，指责租界当局对制止抗日宣传未有成效。在日方多次交涉之下工部局警务处分别向《申报》、《新闻报》、《大美晚报》等九家挂美商招牌的报纸发出警告。4月底，工部局警务处还提出必须每日事前送检新闻报道的稿样。但受到各报的抵制。迫于日方的压力，租界当局只得再次发出禁止抗日宣传的布告，同时召开了发行人座谈会，要求报界审慎地处理涉及抗日的新闻和评论。

日本侵略者驻沪机构见租界当局制止新闻媒介抗日宣传的收效不大，决定亲自出马，并指使汪精卫的汉奸特务组织进行破坏活动。这个汉奸特务组织以丁默邨、李士群为首，设在沪西极司非尔路的“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这伙汉奸特务以恐吓、绑架、袭击和暗杀等残暴手段对付报纸和新闻工作者，使孤岛新闻界陷入恐怖之中。《文汇报》、《大美晚报》等报馆，几次接到装有血淋淋断手的邮盒，恐吓报馆人员如果继续宣传抗日，将会照此办理。《申报》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不得不加强戒备。他们在大门出入口、主要办公楼、沿马路阳台装置了铁丝网、钢板等防护设施。在四楼开辟了一个宿舍区，让一部分当班编辑留宿馆内，避免深夜回家。下班回家的穿街走巷、转弯抹角地行路，以防特务盯梢。即使在这样的防范之下，报馆和工作人员，仍然遭到暗害和袭击。第一个受到枪击的是编辑瞿绍伊。1939年6月7日，他在梅白克路（今风阳路）的律师事务所办事（瞿兼业律师），突然遭到一个闯进室内的特工的枪击，臂部中弹。他急忙转身躲避，特工再开一枪，因子弹卡壳，瞿绍伊幸免于难。7月26日暴徒又突然向发报间投掷炸弹一枚，两人死亡，五人受伤。

1940年之后，汪伪特工的破坏暗害活动变本加厉。4月间，营业部主任王尧钦被几个暴徒从家里绑架。暴徒们要他打电话通知另外几个报馆的同事，前去一个秘密地点吃饭，意图加害，遭到王尧钦的拒绝。接着庶务主任黄炎卿被特工逮捕。当正要绑架另一个重要职员陆以铭时，因陆事前闻风而避没有抓到，就将陆以铭年已七旬的老母和孩子全部抓去作为人质，但仍未达到绑架陆以铭的目的。7月16日清晨“东亚反共联盟”的暴徒从报馆窗口掷进一颗手榴弹，烟雾弥漫，弹片四射，职员石征鸿、工人王安陆等五人受伤。王因伤势过重而死亡。

为了进一步扼杀报纸的抗日宣传，1940年7月间，上海的汪伪政府向坚持抗日宣传的知名人士发出了通缉令，列入黑名单的共83人，其中49个是新闻工作者，《申报》马荫良、胡仲持、金华亭、瞿绍伊、赵君豪、伍特公、黄寄萍等都列入其内。7月14日伪上海市市长将《申报》发行人兼总主笔美国人阿乐满与《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威尔等七名外国人驱逐出境。

这年年底是汪伪中央银行开幕前夕。《申报》刊出了一篇《中日货币战》的座谈纪录，揭露日本的金融阴谋和伪币困窘的处境，大为汉奸们所仇恨。伪中央银行向《申报》送来一幅开幕广告，要求开幕这一天刊出。报馆严词拒绝，不予刊登。第二天黄昏，暴徒即向报馆投掷三个手榴弹，连累了四个路人受伤。报馆内外虽然有铁门、铁丝网等层层设防，但还有敌人化装潜入编辑部，在书橱、书报架、精装书盒内放置定时炸弹，因编辑部人员提高警惕、及时处置而未爆炸。

1941年2月间，发生了记者金华亭遭汪伪特务枪杀事件。金华亭是著名记者，时年40岁，浙江建德人，中学后前去北平大学读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曾与同行一起创办远东通讯社。1925年进申报馆，革命军北伐为随军记者。“一二八”，“八一三”上海战役中，金华亭冒着敌人的炮火，深入战地采访。他的新闻

报道均以内容翔实、文笔犀利在读者中留下深刻印象。1937年底报纸停刊曾派往《申报》武汉版工作，1938年孤岛复刊时再回上海。在拒登伪中央银行开幕广告时，金华亭态度坚决，他曾说：“此可登，则无不可登矣！”由于他的话被人泄露，引起“76号”特务的仇视和注意。2月3日黎明前金华亭工作完毕后回家，当行经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南方汽车公司附近时，被埋伏在那里的特务发现，连击四枪，金华亭以身殉职。

《申报·自由谈》孤岛复刊时，对面临艰难险恶的环境曾有过悲壮激烈的誓言，复刊词写道：“没有路，就铺一条血路；不自由，就抛一个头颅；个人的生命也会碰到幻灭，然而自由将永生在我手里！”言词间蕴藏着牺牲精神和悲壮气氛，代表了《申报》复刊时工作人员坚定的爱国抗日情怀。后来事实发展也证明抛头颅、洒热血的言词，不是危言耸听的过激之词，在孤岛坚持复刊的道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孤岛”环境的不断恶化，使报纸的工作条件愈来愈艰险。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此后英美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开进了租界，“孤岛”从此沉落海底。这一天，日本兵包围了《申报》大楼，劫持了申报馆。

太平洋战争后遭日伪劫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孤岛”的形势起了急剧的变化。原来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只是租界周围地区，而这一次日本借已对英美宣战进占了整个租界，孤岛已不复存在。抗日爱国人士和中共地下组织凭借租界坚持抗日新闻宣传阵地也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就在孤岛即将沉落之际，申报馆主人史泳赓、总经理马荫良和主要编辑记者已陆续撤离，留守报馆的是副经理王尧钦、编辑研究

会副主席武廷琛和书记赵君豪。

日本军队进入租界的这一天上午，日本海军占据了申报大厦，张贴了宣告日本海军占领的布告，而且宣布凡报馆职工，不准有一人离开上海，如果擅自出走，就要到那人家里去搜查。可是到了下午，又有陆军前来查封。支那派遣军上海军部山家亨少佐带了日本兵，封锁了无线电台、营业和发行等部门。山家亨少佐找副经理王尧钦谈话，并向职工宣告，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对英美人士的产业一律封闭。惟申报乃系暂时封闭，不久当可启封。隔了两小时，日本海军又派人到报馆要王尧钦交出全馆的职工名册。这种两个部队占领查封的行动，暴露了日本海陆军之间的矛盾，原来日本海陆军规定各自的占领范围，沿黄浦江至虞洽卿路以东（即现在的西藏路）一带地区属于海军，报馆一般在平望街，申报馆就在汉口路上，属海军管辖范围。但陆军不同意按地区划分，而是要按行业的性质划分，要把文化宣传事业划归他们来管辖。后来经过协商，考虑到陆军山家亨少佐已宣布《申报》不久可以启封照常出版，于是承认陆军管辖，但海军只承认陆军代管一年，以后要仍归自己管辖。

日本占领军进占租界的初期所采取的姿态，是力图想保持上海国际性都市的面貌。纳粹盟国也想在这个占领地分享一些权力和利益，因之，他们不急于改变租界的现状。山家亨少佐对报馆所说的不久可以启封照常出版，也带有这样的意思。没几天，日本方面负责新闻报道的陆军报道部部长秋山邦雄通过工部局警察本部日本课主任梅本守雄几次约见报馆王尧钦副经理，或到报馆讲话，要求报社仍以美商哥伦比亚出版公司的名义复刊，内容上可与停刊前一样不予变更。重庆方面中央社的电讯仍可刊登一些，但不允许南京汪伪方面的新闻与广告刊登。这种现象反映了日本海陆军之间进占租界初期策略采取上的某些矛盾，也说明军方不准备把《申报》一夜之间染成黑色，企图利用报纸的新闻宣传

来欺骗读者。但这种现象维持没有多久，当1942年5月南京汪伪宣传部长林柏生向日本军方提出交涉后，情况有所改变。尤其在新任报道部部长横山颜真代替秋山之后。横山在东京时已了解《申报》拒登南京汪伪方面的新闻。所以横山一上任要求《申报》加强“和平宣传”，宣传“中日合作的利益”。对南京政府的汪精卫、周佛海要称“汪主席”、“周部长”，标题要冠以官衔，不能只提名字。1942年秋冬之际，日伪对江苏长江南北和上海郊区进行“扫荡”、“清乡”。9月15日日本通讯社关于日伪清乡的消息，因送到报馆的时间已迟，来不及排印刊登，被日本南京陆军报道长岩崎大佐罚令停刊三天。横山还到报社恫吓，如不改正将会永远停刊。还查问报社编辑人员中有没有重庆分子，有无反对南京方面的人。报社编辑答复他编辑人员都是超然派，对重庆政府和任何方面都没有关系。其实，无视南京汪伪方面的消息，《申报》是按当时秋山的意图行事的，而且刊登的新闻都经过工部局日本课检查。《申报》一被劫持，在总的方面已被纳入“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了。

1942年10月，苏联红军在苏德战场上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了转折阶段。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虽然占上风，又乘国民党消极抗战继续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但已感到前景暗淡。特别受到敌后抗日军民的持久抵抗，感到军力负担沉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一面加紧向蒋介石集团诱降，一面急需加强汪伪政权，以便取得更多的战略物资以战养战。英美也从原来的牺牲中国改变为支持中国抗战，以便分散日本军力，减轻它由于太平洋战争引起的压力。1942年10月英美宣布放弃在华特权，归还租界，以后法国、日本也宣布归还租界。其实，上海公共租界已在日本占领之下，这些所谓归还租界只是让汪伪政权全盘接收而已，所有新闻宣传工具也要全部置于日本支持的汪伪政权之下。

在这个政治背景之下，日本海军在1942年11月25日又重新查

封《申报》。这天上午海军即令职工离开报馆，实行军管，报馆对职工暂时发给了最低限度的生活费。12月间任命30年代初期在《申报》撰写评论的陈彬龢为社长，正式复刊。

陈彬龢是江苏吴县人，小时候在苏州读书。1917年到上海英籍犹太富翁欧里爱·哈同和他妻子法籍中国福建人沈·逻辑所办的仓圣明智大学附属小学当教师，哈同把仓圣明智大学所在地称为“爱丽园”。在这里聚集了一些前清遗老、封建文人和军阀豪绅。王国维和章太炎也在这里教过书。陈彬龢在这里学到了汉学和汉魏篆隶书法，生活也过得不错。但他还是郁郁不得志。20年代中期去到北京，任中俄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总务长等职。1926年3月，北京群众在李大钊等领导下，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日英美等八国提出的撤除我国大沽口设防的最后通牒和日舰对大沽口的炮击，会后2000多人请愿，遇到段祺瑞政府的镇压，制造了“三一八”惨案。陈彬龢因参加这次运动被成为通缉对象，之后他即逃亡回到上海。1928年至1929年间，他与日本上海总领事馆岩井英一发生了联系。岩井英一曾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毕业，进总领事馆调查班做谍报工作，陈彬龢即为岩井英一搜集、提供情报，还创办了一个《日本研究》的刊物，作为活动的掩护体。

陈彬龢隐藏着他的反动面目，凭着善词令、能写作，披着他那久历江湖社会活动家的外衣与当时上海的一些抗日爱国民主进步人士接触，有的人为之迷惑。1931年春，经黄炎培向史量才推荐进了《申报》。当时正是蒋介石策动“攘外必须安内”的时候，每当史量才与黄炎培、陶行知等商谈改进报纸的场合，陈彬龢常常也加入其中，侃侃而谈，激昂慷慨，闻者为之动容，之后担任了评论主撰。

陈彬龢写的评论，多数署名。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狂轰滥炸，残杀人民。陈彬龢为了迎合当时需要，写了《注意日军之残酷行动》之类的评论。为了炫耀自己的

评论，陈彬龢还汇编两集自己写的《评论集》，他在自序中激烈抨击国民党，俨然成了一个道貌岸然的进步爱国之士。原来副总编辑张蕴和受到了他的欺骗，为他《评论集》写序言。而他署名文章其实多为别人代笔，他在古拔路的一座洋楼里组成了一个作坊式的写作班子，源源不断地向《申报》或其他报刊供稿。这里确实人才济济，不乏有真正的爱国的血性男儿。但他们写出的文章供陈彬龢署名，则是成了掩盖陈彬龢隐藏反动面目的工具。

1932年夏秋之际，蒋介石发动对江西红军的围剿。在陶行知积极支持并亲自起草之下，《申报》于七月间连续发表三论《剿匪与造匪》，遭到了蒋介石亲自下达的“禁止申报邮递”粗暴干涉。在解决这一事件中，蒋介石指名要黄炎培、陶行知和经常看到署名评论员“彬”或“彬龢”的陈彬龢离开《申报》。陈彬龢也只好暂时晦隐，1936年举家迁至香港。不久岩井英一也去香港，将陈彬龢介绍给日本谋略家和知大佐。香港沦陷后，由和知大佐介绍回上海，在日本片山机关关领导下，与该机关台湾人苏森联络，负责侦察情报。这时，他几乎每日将情报送至南京路外滩的华懋饭店该机关事务处。当1942年12月日本海军任命陈彬龢为《申报》社长时，这个过去隐藏潜伏的内奸，摇身一变而成为一个公开的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汉奸了。

陈彬龢是由日本海军豢养的，他住在原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今长乐路附近）豪华的三层公寓里，每月接受日本军方50万军用票的津贴。12月6日他去报馆上任时，乘坐了一辆高大宽敞的敞篷马车，把自己带去的13个亲信，安置在编辑业务和管理部门，使《申报》完全成为日本和汪伪进行欺骗宣传的工具。除了日常的宣传外，每当日本首相东条和汪精卫发表演说，或日本侵华战争×周年之际，总要出版特刊，以大量文字、新闻照片宣传日本的武力。宣传所谓“完成大东亚战争必胜之基，并得实现肇国以来万邦共荣之大理想”。1943年初汪精卫进行所谓“新国民运动”，协力大

东亚战争。陈彬龢强调“中国是东亚一部分，决没有东亚之危而中国独安，东亚亡而中国独存的道理”。他决心要把中国人民绑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上共存亡。1945年4月世界大战已发展到接近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时候，陈彬龢还发表《警察保甲化，保甲警察化》的评论，“在时局日益紧张的阶段”，他要上海人民安分守己，做一个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顺民。

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个原子弹，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解放区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装，接受日本投降。这个时候陈彬龢从南京打听消息回到上海，已知道了日本即将全面崩溃的情况。他于12日发表《从南京回来》一文，透露了时局的危难，但还主张上海“维持治安，安定民生”，而他则在将文章交给编辑部的当天仓皇出走逃亡日本。

十一、在终刊的那些日子里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一方面迅速抢占上海的各种新闻阵地。出版发行自己各派系的报刊；另一方面，则强化新闻统治，以各种借口查封民主、进步报刊和私营报刊。据1946年8月31日《大公报》报道，当时查封的报刊多达109种。内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加紧了严厉的新闻控制。1947年5月《文汇报》、《联合晚报》和《新民报晚刊》被封闭。最后连持有自由主义观点，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也因评论国民党的专制统制而被查封。

对于历史悠久、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申报》，是20多年来蒋介石试图直接控制而未能实现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重新统治了上海，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个实现控制《申报》的好机会。他核准了国民党政府拟定的对上海附逆报纸的处理办法，对如何接收《申报》作了指示。他又接见了史量才儿子史泳麇，那是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不久，经过钱之新的联络，他在重庆与史泳麇相见。史泳麇向蒋介石陈述《申报》被日伪劫持经过和报纸的一贯立场。史泳麇打算迅速回到上海，经营自己的报业，与陈景韩等原有报馆人员恢复《申报》。他以为自己的愿望是能够实现的。蒋介石并没有向他表明国民党的意图，只是询问了70多年来的报纸保存是否完整等一般事务性的问题。因蒋介石另有打算，对史泳麇的打算当然也不会支持。

日本投降后，日伪劫持时期主持报纸的汉奸特务陈彬龢逃往日本，一些为日伪卖命的编撰人员纷纷出逃。报馆留下了原《申

报》的一些老报人，他们在经济拮据、纸张供应紧张的情况下，消除了报纸的汉奸面目，维持了报纸的出版。国民党接收大员到达上海、迅速抢占新闻阵地的同时，通令《申报》暂行停刊，禁止原董事会一切活动，听候政府派员处理。《申报》于9月16日被迫停版。之后，国民党以《申报》附逆为名，指定由国民党中宣部指派的管理委员会接管，全部财产和附属事业也同时接收。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为潘公展，副主任委员李维果，委员有吴绍澍、陈训愈等11人。为了争取原有《申报》老人员，也把陈景韩列为委员。这些几乎都是国民党C.C派的要员。报纸日出对开一张，不久增至两张。

《申报》是一张民办报纸，自1872年创刊至抗日战争胜利已有70多年。民国2年由史量才接办，以后一直由史量才独资经营，自1934年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其产业由其子史泳麋继承，这是上海新闻界都知道的，也为工商界所公认。政治上，抗日战争期间报纸坚持爱国抗日立场。日本侵占上海，《申报》拒绝接受日伪新闻检查，宣告停刊。以后迁址武汉，发行了武汉版、香港版，到1938年回师“孤岛”，坚持爱国抗日立场，与日伪斗争。报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而也获得广大爱国民主人士和读者的好评。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占租界，“孤岛”沉沦，《申报》被日本劫持，这与国民党所加的所谓“附逆”的罪名完全是两回事。为此，上海新闻界、工商界的一些人士颇有议论，史泳麋、陈景韩几次提出意见。经过杜月笙的斡旋，国民党感到直接以“附逆”的名义加以劫夺的做法太露骨，决定改由渗入官股的办法来达到控制《申报》的目的。

1946年3月，国民党改组《申报》。首先，收购了报馆股权六千股。再由陈布雷、潘公展、陈训愈、程沧波等人的名义认购增股。使官股总额达到51%。接着改组了董事会，由杜月笙任董事长，史泳麋为副董事长。任命了潘公展为社长兼总主笔，陈布雷

弟弟陈训愈为总经理兼总编辑，副总编辑为王启熙、赵君豪、卜少夫。陈景韩为发行人。主要骨干多为国民党C.C要员，实际权力为陈布雷幕后操纵。经过这一次彻底的改组，国民党终于达到了二十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控制《申报》的目的。

陈景韩是史量才接办《申报》后的总主笔。20年代末他离开《申报》，游离于新闻界，度过了日伪统治时期之后，这次重新回到了《申报》，但他已不再是掌管报纸业务的实权人物，可是他还希望恢复《申报》原有的主张和民间色彩。11月22日复刊那天《重与读者相见》的社论，申述了《申报》是一张民间主办的报纸，它的目的在宣泄民隐、申达民情。但这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样的说法则是以虚假的态度来掩盖国民党劫持报纸的反动面目。而国民党的那些要员们则是直言不讳地宣称《申报》为国民党的报纸，甚至是不挂党报招牌的党报。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孝炎说潘公展主持的《申报》，为国民党所办的报纸。曾虚白也称《申报》因主持人是国民党的重要干部，故言论立场与政府接近，而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尚较正式党报为大。他们的这些讲话，已经清楚的表明了《申报》性质的改变。由于国民党的党报反民主、反共、反人民，逆社会潮流而动，在社会上已经没有多大影响力，因而他们寄希望于控制原来《申报》这样民间报纸，来进行反动宣传。1946年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政府颁布“勘乱总动员令”之后，在报纸上对共党、共军一律称之为“匪”，虚假的伪装面目也彻底撕下来了。

这样的时间并没有维持多久，当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节节取胜，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时候，主持《申报》的潘公展、陈训愈等国民党要员指定陈景韩的儿子为总编辑，而自己纷纷出逃，前往香港或台湾，一些持有反共观点的编撰人员也先后出走，有的则不告而别。只有作为发行人的陈景韩、经理王尧钦等原有《申报》人员维持残局。这时，报纸逐渐改变反动立场，除了

刊登国民党官方规定和发布的新闻外，经常刊登解放战争各个战场进展的消息，国民党统治区工人、学生反内战、反饥饿举行罢工罢课的消息。1948年1月底，同济大学学生一千余人，因要求修改部颁的新自治会章程和要求释放两名被开除的学生未准而赴京请愿，在途中受到国民党军警阻拦，学生数人被捕，引起学生抗议，与军警发生冲突。前去压制学生的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被学生群众包围，当少数军警冲入人群，将市长救出时，此时市长已失去了其终日不能离身之眼镜与烟斗，且满身泥迹，头发蓬乱，丧失昔日威严的一副狼狈相——暴露于新闻报道之中。

1949年春天，上海的物价飞涨，货币大幅度贬值，社会经济崩溃，《申报》反映大学师生员工生活困难处境。上海交大、复旦、同济等师生争民主、求生存致政府的上诉书中，说教授们的月薪只值三枚银元，享有公费同学每天的副食费平均只能买到半根油条。由于寒流袭沪，慈善机构一月份六天中收埋的露尸达538具，人民已陷入重重的苦难之中。

蒋介石感到大势已去，1949年1月1日发表求和声明。紧接着1月12日毛泽东签署了对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八项条件，其中明确提出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政府军队，成立联合政府，接收国民党政府及地方政府的一切权力。蒋介石感到末日将临，1月21日宣布引退，并于当日下午离开南京，总统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李宗仁表示愿意在中共方面提出的八项条件基础上和平谈判。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和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斗争之下，蒋介石被迫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和前景，《申报》都作了连续而详细的报道。

2月1日北平的解放，《申报》以“本报北平三十一日电”发布，并引自陕北电台的广播，称北京的解放是执行毛泽东和平谈判八项条件，以和平方式结束战争的好榜样。当4月下旬国民党拒绝在和平条件上签字，毛泽东、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出全国进

军令的报道中：“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面地歼灭中国境内的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号召见诸报纸显著地位。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解放之后，5月下旬，人民解放军逐步肃清上海周围的残敌进入市区，26日上海人民开始欢庆解放，《申报》发表了大世界高悬巨幅毛主席像和市民宣传队在南京路张贴欢迎解放军标语的新闻照片。

5月27日《申报》终刊，这一天的报纸上，刊登了沪杭甬路全线打通。慈溪、宁波均告解放消息。中国民主促进会留沪人士为上海解放告同胞书，上海学联为迎接解放复课的通告等消息。刊登了圣约翰大学女生宣传队在街头扭着秧歌庆祝解放的新闻照片。还刊登了一篇记者在沪西一带的巡礼。记者写道：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见有一队很长的人民解放军行列由西向东开去，适值一秧歌队到达静安寺路冠生园前，两人把旗子扯起，歌声、口号声、欢呼声四起，情绪很热烈。再向西去，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附近，有一批被俘的国民党士兵，佩着“平”字的符号，由几个解放军押着，自西向东，俘虏的神色很是颓丧。折回的时候，经过愚园路、静安寺路，见一队佩着红星、红花的秧歌队、宣传队，到卡德路（今石门路）转角，一大队人民解放军士兵坐在墙边休息，这时暴雨如注，他们宁可忍受着雨淋，不肯入民家避雨休息，铁的纪律赢得市民赞美……

几位著名新闻工作者，如徐铸成，在评价这张新中国成立前发行最久的报纸时说过：《申报》之所以不得善终，是由于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遭到日伪的劫持和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被国民党劫夺，从这几年《申报》遭受的厄运来看，确实如此。如果再从1949年劫夺报纸的国民党要员们纷纷出逃，上海临近解放的那些日子看，当时报馆人员虽然还身处逆境，但改变了报纸态度，倾向到人民一边，反映了《申报》的最后还是善终的，当然，这是终刊前的最后日子。

《申报》终刊的前一两天，汉口路309号的申报大楼里，已聚集着随人民解放军南下以范长江、恽逸群为首的一批解放区来的新闻工作者。可能是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进展神速，其速度为人们难以预料，原有报馆编辑人员是匆匆离开的，有的办公桌的抽屉里还留下没有用完的香烟和茶叶。但报馆的一切设施和办公用品保存完好，这就使得南下新闻工作者能够顺利地运用原有办公室，原有铅字和印刷机器于28日清晨出版了《解放日报》，标志着一个划时代的新闻事业新时期的开始。

附录:

《申报》七十八年大事记

(1872—1949)

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

△4月30日 英国商人安纳斯脱·美查与其友人共四人合办《申报》。筹备就绪，于这一天创刊，每两日出版一次，为双日刊，每期一张。蒋芷湘为主笔，赵逸如为买办(经理)。这期创刊号上，刊登有《本馆告白》与《本馆条例》。

△5月7日 第五期出版，从这天起改为日刊，星期日休刊。

增聘钱昕伯、何桂笙襄理笔政。

△11月11日创办《瀛寰琐记》(月刊)，为4开本，24页，内容有论说、诗文及外国小说等(至1875年1月停刊)。

1874年(同治十三年)

△8月 日本借口台湾人杀害琉球人和日本人，兴兵进攻台湾，美查派人前往台湾现场采访消息，写了通讯刊在报上，使读者争先阅读。《申报》销路由五六百份增至数千份。

△9月12日 《申报》过去用毛太纸印刷，从这一天起，改用连史纸印刷，版面亦稍大。

1875年(光绪元年)

△2月1日 出版《四溟锁记》(月刊)。(1876年1月停刊)。

△10月11日 发表《论本馆作报本意》一文，进一步说明本报宗旨。

1876年(光绪二年)

△2月1日 出版《寰宇琐记》(月刊)。(至1877年1月停刊)

△3月30日 另出《民报》一种，每逢二、四、六出版，发刊词说：“此报为民间所设，故字句俱如寻常说话”。此为我国第一张通俗报纸。

△9月9日 印刷出版亚洲地图，为我国最早出版之地图。

1877年(光绪三年)

△9月1日 经销《瀛寰画报》，刊载世界时事及各地风景图片，并附有文字说明，每期出十余页，为不定期刊物，前后共出4卷。

1878年(光绪四年)

△6月 陕、豫、冀三省大旱，灾情严重，《申报》除连续刊登灾情及捐募文章外，并且自费工本，印刷并劝赈的书籍《馈贫粮》2000本，分送各慈局推销，将所得之款1000元，悉数赈济灾民。

1879年(光绪五年)

△4月27日 从这一天起，每逢星期日亦照常出版。

1882年(光绪八年)

△1月16日 第一次刊登国内电讯，并刊出启事，宣布自今以后“每日京报上谕皆由中国新设之电报局传示”。此为我国报纸利用电报传递新闻的开始。

1884年(光绪十年)

△3月 中法战争爆发后，《申报》雇用俄人为战地特派员赴前线采访战讯。

△5月8日 创刊《点石斋画报》(旬刊)，内容“选择新闻中可喜可惊之事，绘制成图，并附事略”，深受读者欢迎。

△5月 主笔蒋芷湘中进士离职，由钱昕伯继任主笔。

1885年(光绪十一年)

△3月 法舰侵扰我国东南沿海，《申报》又派人前往观察法舰攻打等波实况，写成战讯在报上发表。因记载翔实，使《申报》声誉为之大振，发行与广告均有增加。

1888年(光绪十四年)

△4月 《申报》经营的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用活字版印刷《古今图书集成》告成，共1628册，外人称此为“康熙百科全书美查版”。

1889年(光绪十五年)

△9月20日 开始较多地刊载地方通讯，这一天刊有福州通讯三则，苏州通讯三则。

△10月15日 美查兄弟将其所经营的事业改组为“美查有限公司”，将

《申报》作为该公司经营的事业之一。美查兄弟收回原股本2000股(约银十两)后，返回英国。公司事务由董事四人主持，此时买办赵逸如去世，由席裕祺(子眉)代理，总主笔也改由黄协坝(式权)担任，此时维新运动兴起，黄协坝批梁批康，反对维新。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

△12月13日 买办席裕祺病故，由其弟席裕福(子佩)继任。

△12月20日 从即日起，《申报》改用油光纸印刷。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

△3月 美查公司举行第八次常年股东大会，经理报告请求邮局核减报纸寄费的经过。

1904年(光绪三十年)

△2月14日 《申报》发行一万号，发表评论“申报一万号”，向读者表示《申报》已有渐图改进之意。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

△1月下旬 《申报》进行第一次大改革，以便与上海其他报纸竞争。总主笔由金剑华担任，并聘请刚从日本返国之张蕴和专任社论。

△2月7日 《申报》在论说栏内宣布办报新方针：(1)改变言论，赞同变法维新；(2)扩充篇幅，标题力求醒目，并开始采用新闻分栏编辑法；(3)多载专电，通讯，广译外报评论。

△2月8日 改革后的第一篇社论题为《述东瀛度岁之感以励中国前途》，一改过去视康梁为叛徒的态度。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

△2月5日 发表《论阅报者今昔程度之比较》一文，就各界读者对阅报兴趣的提高作了分析比较，是一篇读者调查的文章。

△9月 清慈禧太后迫于形势，为了欺骗人民，于一日下诏预备仿行宪政。九月十六日，《申报》同上海其他四家报纸联合发起“报界庆祝立宪会”。

△秋冬之季 王钟麒、刘师培两人任《申报》编辑，两人所作社论，每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排满之意，顿使《申报》由维新倾向革命。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春季 美查公司大班表示有出售《申报》馆之意，买办席裕福筹款买进。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 8月29日 《申报》发表美查在英病故的消息，并刊登《美查事略》，表示哀悼。

1909年(宣统元年)

△ 1月25日 《申报》开始用白报纸两面印刷，初具现代报纸的形式。

△ 5月31日 买办席裕福以七万五千元购进《申报》，主权移归国人所有，但名义上仍为外商所办。

△ 8月 席裕福购得《申报》后，因财力不胜负担，约上海道蔡乃煌合作，以《申报》股份的一半让与蔡，实行官商合办。馆务仍由席主持，蔡仅派一人为襄理，监理会计。不久解约，蔡氏的股份由席出资收回，《申报》仍由席独资经营。

1910年(宣统二年)

△ 1月 每逢星期日，出版一种周刊，专门刊载各种重要文件，名称《新申报》，以补《申报》之不足。

1911年(宣统三年)

△ 7月24日 《自由谈》副刊问世，专刊文艺诗词作品，由王钝根主编。

△ 8月20日 《申报》进行第二次大改革，宣布新的编辑方针为“合简便与详尽于一纸，兼顾严肃与活泼”。

△ 9月19日 从这一天起刊载徐家汇天文台供给的气象报告。

△ 10月10日 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率清兵反扑，攻陷汉口与汉阳，《申报》将汉口访员来电“某日汉阳复”，改为“汉阳失守”刊于报端，读者不信，竟有若干人拥到报馆门前质询电讯从何而来，虽经馆方出示电讯底稿，群众仍不置信，击破门窗玻璃十余块，几乎造成重大事件。显示出人民民族意识高涨。

1912年(民国元年)

△ 9月23日 席裕福经营《申报》一蹶不振，乃将《申报》售与史量才等五人，售价十二万元，就在这一天订约。与史量才合作接办《申报》的，有张謇(季直)，应德闳(季中)，赵凤昌(竹君)，陈冷(景韩)等四人。

△ 10月20日 席裕福办理移交，由史量才接收自任总经理，陈冷(景韩)为总主笔，席仍任经理(至1913年冬解职，由张竹平继任经理)。但为了避免军阀干涉，《申报》在名义上仍托名为外商所有。

1915年(民国4年)

△ 冬季 席裕福因感到过去转让售价太低，突然向上海公共租界会公廨控告，要求赔偿，结果《申报》败诉，判决赔偿席裕福二十四万五千两银子。张、应、赵等均无意继续经营而相继脱离，由史量才一人设法赔偿(请上海工商界巨子徐静仁作保分期偿清)。从此，《申报》全部产权为史氏一人所有。

1916年(民国5年)

△ 1月1日 袁世凯称帝，下令称这一天为“洪宪”元年元旦，强制各报在报头上加印“洪宪”年号。《申报》及其他一些报纸以六号铅字“洪宪元年”四字在公历下印出，表示消极抵制。

1917年(民国6年)

△ 1月26日 增辟《老申报》一栏，专门刊载四十多年来《申报》所刊载的奇闻怪事(至11月8日停刊)。

1918年(民国7年)

△ 《申报》业务蒸蒸日上，旧址不敷使用，史量才乃在汉口路自建五层馆楼，内有房间百余间，于10月间落成，迁入办公。与此同时，向美订购最新式的印报机也已运到，安装后投入生产，每小时可印报三万余份，其他设备也相继更新。

1919年(民国8年)

△ 5月15日 “五四”运动发生后，国人一致排斥日货，实行经济抵制。包括《申报》在内的七家中文报纸议决不再刊登日商广告，并于5月15日在报上发表声明。

△ 8月31日 创刊《星期增刊》，由项远邨主编，每星期日出一大张，随报附送，内容除刊载国际时事外，并大量介绍外国报刊的论著，以补充每日国际电讯之不足。

1920年(民国9年)

△ 4月1日 《自由谈》副刊由周瘦鹃主编。

△ 1日 增辟《常识》版，介绍各科新知识，内容丰富，有常识、科学、卫生、市政、经济、法律等，使读者能获得丰富的知识。

1921年(民国10年)

△ 11月27日 创办《汽车增刊》，每周出一大张，随报附送，提倡修筑公

路及使用汽车，以促进交通运输之发展。

1922年(民国11年)

△4月30日 为纪念《申报》发行五十周年，由黄炎培主编，出版题为《最近之五十年》的大型纪念册，内有史量才亲自撰写的《自序》。

△11月21日 英国伦敦《泰晤士报》北岩勋爵来报馆参观，称《申报》为中国的《泰晤士报》。

1923年(民国12年)

△10月15日 出版《教育与人生》(周刊)，专门发表教育新闻，并讨论当时存在的教育问题。该刊单独发行，至1924年9月29日停刊。

1924年(民国13年)

△2月8日 创办《本埠增刊》，每日出版，登载本埠社会活动的新闻，专门为本埠读者服务，不送外埠订户。

△10月31日 增辟《商业新闻》版，每日见报，报道市场动态及行情涨落。

△12月8日 增辟《教育新闻》版，每日见报，代替《教育与人生》周刊。

1925年(民国14年)

△5月31日 在广告栏内刊登上海工部局为英国人对“五卅”惨案所负罪责辩解的宣传广告《诚言》，引起上海学生联合会的反对，群众拥到报馆门前责问，打破橱窗玻璃。

△9月22日 将《艺术新闻》与《艺术评论》两栏合并，改成《艺术界》专栏，每日见报，至1931年底停刊。

1928年(民国17年)

△11月19日《申报》发行二万号，出版二万号纪念特刊，称《申报》为历史的缩影。当时《申报》销路已超过十四万份。

1929年(民国18年)

△1月1日 《新闻报》总董福开森将该报股份60%售与史量才。史准备改组《新闻报》，遭到馆内汪伯奇以及其他职工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亦深怕史量才组织新闻托拉斯控制舆论，亦左袒汪氏，史不得已让出三分之一的股份给上海工商界人士。《新闻报》仍由汪伯奇为总经理，但遇重大事件须请示最大之股东史量才。

△7月18日 开始使用《申报》专用的“铎”商标。

△冬季 总主笔陈冷辞职，由张蕴和继任；经理张竹平因在外经营《时事新报》而辞职，理由马荫良继任。

1930年(民国19年)

△5月18日 创刊《图画周刊》由戈公振主编，采用橡皮影写版印刷，十分精美，每逢星期日出版，随报附送。

1931年(民国20年)

△春季 为筹备明年纪念《申报》发行六十周年，史量才常约黄炎培、陶行知等人商议改进报纸工作。

△1月11日 成立《申报》总管理处，为统辖一切馆务的机构，史任总经理兼总务部主任，马荫良副之。陶行知任顾问，但不发表。

△9月1日 在时评栏内发表“本报六十周年纪念宣言”，宣布今后办报方针：(1)提倡科学，努力介绍科学知识；(2)重视国内外情势的报道与分析，供读者探讨，求得发展国民的坦途；(3)正视当前的社会问题，探求正当解决的途径，以谋社会民生的安定；(4)教育青年进入“健全、纯洁、勇敢、进取、奋斗之坦途”；(5)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而跻我国家民族于自由平等之地位”。

△9月2日 增辟《读者通讯》栏，为读者解决求学、职业以及婚姻等问题提供意见。

△12月13日 发表时评“再论自由之真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无故扣发上海各报，要求言论出版自由“有绝对之神圣，为任何人与任何势力所不能侵犯”。

△12月20日 刊登宋庆龄对第三党领袖邓演达在南京被害一事发表的宣言，痛骂蒋介石“个人独裁”，“借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并揭露其残杀邓演达之罪行，引起蒋介石对史量才的怀恨，欲置史量才于死地而后快。

1932年(民国21年)

△2月26日 发表题为“募集兴国公债”的社论，坚决主张兴国公债“绝对不准移作内战之用”。

△4月 连续发表题为《剿匪与造匪》的社论，公开反对国民党的反共围剿，引起国民党的不满，禁止邮递，使《申报》一时不能在国内发行。

△7月15日 创办《申报月刊》，由俞颂华主编，在创刊辞《我们的使命》一文中表示，要把该刊办成一种政治、经济、文艺的综合性杂志，成为“学

术文艺界的一个公共园地”。对于社会经济特别提出“合理分配”的要求。

△9月15日 《申报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出版，内有《纪念九一八特辑》，并开始连载翁照垣的《淞沪血战回忆录》一文。

△11月30日 在时评栏内发表《今后本报努力工作》，具体宣布它的编辑方针以及今后将兴办的社会服务事业：(1)扩大国外通讯网，遍及苏联等国，特别重视日本；(2)国内通讯特别注重东北失地的现状；(3)在编排方面，标题力求醒目；(4)改进副刊《自由谈》的内容，使其大众化。

△12月 创办申报流通图书馆，由李公朴主持，深受上海店员、学徒、工友的欢迎，起到普及教育的作用。

△12月1日 副刊自由谈由黎烈文主编，经常刊登鲁迅杂文和其他左翼作家的作品。

△12月29日 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史量才表示赞成，曾出席该同盟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但未担任任何职务。

1933年(民国22年)

△1月8日 增辟第二副刊《春秋》，由周瘦鹃主编。

△1月 创办《申报》新闻函授学校，史量才为校长，张蕴和为副校长，办学宗旨在于普及新闻教育，为中国报界培养新闻人材，聘请谢六逸等新闻学家编写讲义，作为教材。

△3月13日 新办之《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开学，由李公朴任校长，店员、工友、学徒纷纷报名入学。

△3月24日 《申报年鉴》(1933年)出版，刊有史量才撰写的《申报六十年发行年鉴之旨趣》一文。该年鉴由张梓生主编，内容编排仿照世界各国出版的年鉴。

△6月 《申报》妇女补习学校开学。

△6月 《申报丛书》陆续出版发行，内有《美日苏三国军备》等书。

△6月11日 设立《申报》服务部，代内地读者购订书报杂志。

△8月16日 请地理、地质专家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等测绘编制的《中国分省新图》出版发行，供青年学生使用。

△11月15日 《申报月刊》第二卷十一期出版，载有鲁迅以洛文为笔名发表的两篇杂文：《世故三昧》、《谣言世家》。

1934年(民国23年)

△3月15日 《图画周刊》复刊，更名为《图画特刊》，每周发行二次。

△4月20日 由地理学家、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曾世美等测绘编制的《中华民国新地图》出版发行。

△5月9日 《自由谈》主编黎烈文去职，改由张梓生主编，继续刊登鲁迅杂文。

△9月21日 添置套色印刷机安装竣工，开始刊印封面套色广告。

△11月13日 史量才在杭州休养后自杭州沿沪杭公路返沪，下午1时许，车经海宁与杭县交界处，遭国民党特务暗杀身死。《申报》产业由其子史泳赓继承，内部人事一仍旧贯，无变动。

△12月8日 史量才死后，《申报》举行追悼会，张蕴和主持，马荫良、俞颂华、瞿绍伊等致词。全体同人发表誓词：“同人誓以至诚，继续史总理遗志，积极奋斗，此誓！”

△12月23日 上海市政府、上海市参议员、上海市地方协会等81个机关和民众团体举行史量才的追悼大会。

1935年(民国24年)

△5月5日 与中国科学社、中国经济学会等合作，发刊《科学丛谈》，《经验丛谈》，《农村丛谈》等特辑。

△5月18日 史量才灵柩移杭州安葬。向外分发《史量才先生讣告》，刊有黄炎培写的《史量才先生之生平》一文，称《申报》为史量才“一生心血之所凝结”。

△7月1日 《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由李公朴接办，更名为“量才业余补习学校”，另组校董会，1936年11月李公朴被国民党非法逮捕后，上海市社会局派员接管改组。

△11月1日 副刊《自由谈》暂停出版。

△12月5日 设立量才奖金基金团，补助清寒高中生升入大学，对大学毕业生出国留学及在学术上有特别创造者给予奖金。

△12月15日 《申报月刊》四卷六期出版。宣布“本刊自明年一月起改为周刊”。

1936年(民国25年)

△1月1日 总主笔张蕴和因病退休，暂由副总主笔周梦熊代理，不久

周亦辞职，由俞颂华、伍特公、张叔通三人代理。国民党反动派加强对上海报纸的控制，除检查全部新闻外，并要检查全部广告，使《申报》受到更大的限制。《申报周刊》创刊号出版，仍由俞颂华主编，随报附送，不另收费，内容侧重“时事问题的解释与重要事实简明综合记述”。

△1月5日 《图画特刊》改为每周发行一次。

△2月 约金仲华、胡愈之等撰写社论。

△3月 约顾颉刚和通俗读物出版社合作，出版《通俗周刊》。

△4月 《申报年鉴》一九三六年版出版。

△5月 派记者胡仲持赴日本考察新闻事业，返国后于七月普遍征求读者对《申报》改进意见。

△11月15日 《申报周刊》一卷第四十二期出版，刊有《悼鲁迅先生》一文。

1937年(民国26年)

△4月9日 派记者俞颂华、孙恩霖两人去延安采访，来回16天，拍摄照片多张，并将其见闻写成文章。

△5月9日 《申报周刊》第二卷第十八期出版，以俞、孙记者所拍摄的延安城门的照片作为封面，“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以及“停止内战”大字标语，清晰可见。

△7月7日 《申报》正式改为股份有限公司，由史泳麋、张蕴和、王尧钦、孙洁人、马荫良五人任第一届董事会董事，但全部股份仍为史泳麋所有。

△7月23日 《申报周刊》第二卷二十期出版，刊有俞颂华、孙恩霖的《由西安到陕北》一文。此文虽然经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删去不少内容，但仍反映了作为全国抗日中心的延安一些真实情况，同时还刊登了他们在陕北拍摄的照片多幅，使读者约略看到延安的情况。

△10月 《申报》将一部分机器设备运往汉口，准备出刊《申报》汉口版。

△12月14日 上海沦陷后，日寇妄图控制报纸，《申报》拒绝日寇新闻检查，在这一天(出版第二三二〇八号后)宣布停刊，当天报纸的报端刊登《启事》云“兹因环境关系，自十二月十五日起停刊”。

1938年(民国27年)

△1月15日 《申报》汉口版出版。其数号衔接沪版为二三二〇九号。复刊辞中说：“抱最大决心，间道来汉，筹划复刊”。并宣布编辑方针：“以客观

态度，评论宇宙万象，以科学方法，报道世界消息。”

△3月1日 《申报》香港刊出版。这一天的报纸用红色套印，并刊有《本报启事》，内称：“兹为适应华南人士及海外侨胞需要起见，即日起在香港另刊港版”。

△7月31日 《申报》汉口版停刊，先后共发行一九七期。

△10月10日 《申报》在上海复刊，名义上用美商哥伦比亚出版公司名义，阿特姆斯任总经理，阿乐满任总主笔，马荫良任经理。

副刊《自由谈》由进步作家王任叔主编，社论或专论经常请中共地下党员、进步人士梅益、恽逸群、于伶、柯灵等执笔。

△12月14—20日 《申报》香港版连续刊登了毛主席著作《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八日扩大的六中全会上的报告》。编者按语称此文“为至可珍贵的历史文献，对时局有重要之分析与启示”。

1939年(民国28年)

△6月17日 编辑瞿绍伊被汪伪刺伤。

△7月26日 汪伪特工投弹炸坏发报间，工友受伤者5人，死1人。

△7月31日 《申报》香港版停刊，先后发行将近一年有半。

1940年(民国29年)

△1月17日 在《申报》任职三十五年之久的总主笔张蕴和在沪病逝。

△7月1日 汪伪报纸《中华日报》刊出汪伪“通缉”83人的名单，内有《申报》马荫良、伍特公、胡仲持、张叔通等人员。

△9月14日 《申报》又遭汪伪特工投弹袭击，幸无伤亡。

△12月30日 发表“中日货币战”座谈记录，揭露敌伪在金融界的阴谋诡计，致使敌伪大为震怒，加紧暗杀《申报》编辑、记者的罪恶活动。

1941年(民国30年)

△1月6日 再一次遭受汪伪特工投弹袭击，有路人四人受伤。

△2—4月 又有职工多人先后被汪伪敌工暗杀或绑架。

△4月30日 《申报》发行七十周年。

△6月 开始举办《申报》读者助学金，历时四年半，获得资助入学的青年达两万多人。

△12月8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入公共租界，《申报》再度停刊。

当天上午日军海军进入《申报》，查封机器；下午日军陆军亦派兵进入《申报》，封闭无线电通讯室。

△12月10日 工部局警察本部日本课主任梅本宇雄到报馆。日军陆军报道部部长秋山邦雄下令强迫《申报》于日内复刊。

△12月15日 在日军的胁迫下，《申报》与《新闻报》同日复刊，完全为日军报道部所控制，但仍使用美商牌子，妄图欺骗读者。

1942年(民国31年)

△2月5日 日军“对于《申报》及《新闻报》所希望之事项”中，规定两报的编辑方针是：“发扬中日提携精神”，“宣明大东亚战争之意义，强调东亚民族之解放，以及确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重要性”。

△11月15日 日军军部突然派人查封《申报》，并勒令全馆职工于上午12时以前离馆。《申报》再度停刊。

△12月6日 日军海军派汉奸陈彬龢以“军管会”的名义接管《申报》，并任命陈彬龢为社长。

《申报》在日军海军控制下，再度复刊。

1943年(民国32年)

△10月 上海一些汉奸报纸联合成立“上海新闻联合会”，陈彬龢被推为常务理事。

△11月 陈彬龢代表《申报》出席在东京召开的“大东亚新闻大会”(第三次会议)，这次会议后决定成立“大东亚新闻协会”，并通过了协会规程及大会宣言。

△12月 《申报月刊》复刊，为大32开本。

1944年(民国33年)

△7月 《申报》年鉴(1944年)出版。

1945年(民国34年)

△8月15日 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汉奸陈彬龢潜逃。《申报》停刊。(1946年11月4日国民党上海高等法院检查官对陈彬龢以汉奸罪提出公诉)。

△8月 国民党反动派以《申报》“附逆”为名，派人接管，将设备封存。

△12月22日 《申报》复刊，国民党派潘公展为指导员，立法委员陈训愈为总理兼总编辑。“指导”时间为6个月，自此《申报》完全为国民党所控制。

1946年(民国35年)

△5月 国民党以《申报》“附逆”为名，强迫史泳赓将《申报》股权51%让与政府，成为官商合办，并改组公司董事会，以杜月笙为董事长，史泳赓为副董事长。

△5月15日 举行董事、监事联席会议，决定任潘公展为社长兼总主笔陈训愈为总经理兼总编辑，陈冷(景韩)为发行人。

△10月 发行《申报》影印板，版面大小仅及原版面的四分之一。

1947年(民国36年)

△3月13日 陈训愈以《申报》代表名义参加“中国记者访日代表团”赴东京活动。

△3月17日 编辑部与上海十八家广播电台联合举办新闻广播，每日广播三次。

△4月30日 《申报》发行二五〇〇〇号，适逢创刊75周年纪念日，出版纪念特刊一册，刊有史泳赓的《申报二万五千号感言》一文。

△10月6日 陈训愈借中美直接通航开始的机会，乘飞机前往美国活动。

1948年(民国37年)

△2月1日 《申报》篇幅由二张半缩至两张，发行数字每况愈下，广告收入锐减，几乎无法维持。

△5月 资料室开始整理1936—1947年的《申报》，将旧报装订成册，共168大本。1872—1935年的《申报》业已装订成册。

△7月 《申报》中国分省图(战后订正版)出版，并开始发行。

1949年(民国38年)

△3月 上海即将解放，潘公展、陈训愈相继逃出上海，临逃前使用金蝉脱壳计推出陈冷之子陈亦代替总主笔、总编辑、总经理职务。

△5月27日 《申报》于今日终刊，共出至第二五五九九号。上海于5月25日获得解放，中国共产党派工作人员进入《申报》馆，于28日在《申报》馆原址出版《解放日报》。

(大事记原刊于1983年8月25日上海新闻学会通讯，此次刊出经本书作者补充校订。)

(沪)新登字302号

责任编辑 方小芬

封面设计 邹越非

《申报》的兴衰

宋军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社科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625 插页2 字数185000

1996年2月第1版 199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7-80618-190-3/K·207

定价: 12 元

(沪)新登字302号
本书是作者《申报》研究专著，旨在“回顾”《申报》历史，以史为鉴。全书共分八章，第一章为导论，第二章至第八章为正文。全书约30万字，分上下两册出版。本书可作为新闻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新闻教育、新闻研究、新闻工作者培训等教材，也可供新闻界、新闻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新闻教育、新闻研究、新闻工作者培训等人士参考。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社科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625 插页2 字数185000
1996年2月第1版 199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7-80618-190-3/K·207
定价: 12 元

号508字漫藤(9)

卷中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藤字漫》

卷一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0年11月

1980年11月

1980年11月

1980年11月

1980年11月